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卷2期
2026年2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近代荆轲”“中国安重根”式抗日英雄查子香事迹研究 - 常伦惠 - 1-4

再论佉卢文契约之“家庭要素” - 李育骏、魏驿函 - 5-10

《周易·同人卦》的共同体思想意蕴及其当代启示——基于瞿塘先生对《同人卦》的深度注解 - 丁惠炯 - 11-17

试论成化年间的杨晔案 - 刘光昕 - 18-23

明清海防视野下胶东武术的“御侮”功能与社会角色研究 - 商昌敏 - 24-28

《不存在的女孩》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 王敬文 - 29-31

教育理论与实践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命题质量历时研究 - 过君琰 - 32-38

“双减”政策背景下人机协同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 李远航、杨朔 - 39-42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的收集、甄别与利用机制探析 - 张洪玉 - 43-48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学生参与权 - 邢海燕 - 49-54

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 税晓燕、杜婉绮、宋水英 - 55-61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设计与实施 - 陈文灿 - 62-67

国风游戏作为文化表达“催化剂”的教学转化研究 - 李嘉 - 68-72

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 张薇、李慧琳 - 73-77

《高级日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案例 - 金锦善 - 78-83

社会与治理

经济地位与心理适应：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综述 - 李忻媛、葛蒲、陈天姿、白倩 - 84-90

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规范建构与路径选择 - 杨天朗、潘坤鹏 - 91-93

历史保护与中心城市复兴：以费城协会山项目为例（1957-1964） - 姚佳星 - 94-100

文化外交视角下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策略研究 - 郭春雨 - 101-105

元代基层社会的日常防盗机制 - 周立新 - 106-110

“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审视、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 滕瑞、刘衡宇 - 111-115

明朝“大一统”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演进 - 崔华青 - 116-122

经济与管理研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的政府债务观研究 - 张光先、杨柳依 - 123-129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重庆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 唐梦秋 - 130-136

资源经济视角下石林全域旅游的目标与实现路径研究 - 郭家乐、周迎香 - 137-143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 隋华峰 - 144-148

贸易便利化视角下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的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 - 马思雨·马存军、李婉瑶、姚宇冉、宋科娟、张雅洁 - 149-152

生猪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 黄小芄、熊怡萱、孙佳怡、沈洋洋 - 153-164

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困境与优化路径——以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为例 - 魏茹蓉 - 165-168

会展经济赋能下广西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探索——基于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分析 - 季彪 - 169-173

科技文化融合背景下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建设研究 - 唐勖、张羽涵、孟钰婷、葛蒲、张卓 - 174-179

传媒与艺术研究

简·坎皮恩传记电影的创伤叙事与身份建构 - 陈矿、孟杨 - 180-185

元宇宙视域下壮族炮龙节的创新传播策略研究 - 杨舒帆、刘春仪、韦美茹、胡佳莹 - 186-192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的个人学术应用界面设计研究 - 曾文昊、刘春仪、潘钰、胡佳莹 - 193-199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建构、历史演变与当代设计转译研究 - 年政旭、吴鑫馨、孙旭、贾涵迪 - 200-203

乡村美学视域下崇州天府粮仓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的旅游表达 - 石婷婷 - 204-207

AI 技术赋能传统手工艺符号的文创创新路径研究 - 贾涵迪、吴鑫馨、孙旭、年政旭 - 208-212

“近代荆轲”“中国安重根”式抗日英雄查子香事迹研究

常伦惠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名为查子香的传奇英雄,其壮举堪比“荆轲刺秦王”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据记载,在日军于南京沦陷后举行的庆祝仪式上,查子香孤身犯险,持斧突袭,斩杀在场为首日本军官,重伤一名陆军大佐。此等壮举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然而,这位孤胆英雄的事迹却鲜为人知。本文将基于相关史料,对查子香的英勇事迹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荆轲; 安重根; 抗日战争; 英雄事迹; 查子香; 历史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01

一、引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进城实施大屠杀。同日,大连日本殖民当局举行“南京陷落庆祝大会”以示庆祝并祭奠日军阵亡人员。在此次集会中,一位名为查子香的华人对在场日军主官实施了刺杀行动。这一行为中断了殖民当局的庆典仪式。尽管查子香的壮举在当时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但相关事迹在现有历史文献中仅见零星记载,大连市及英雄故乡均未设立纪念设施。本文拟综合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新近发现的史料,对查子香的历史事迹进行考证与梳理,旨在补充相关历史叙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二、查子香生平概述

2.1 英雄的出生与早年经历

查子香(1912—1939),原名查全保,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梅川镇下程村查三房垸。其家庭出身贫苦,父辈务农,家中兄妹共十人^[1]。尽管家境拮据,受当地重教风气影响,其父曾筹措资金供其接受教育。后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查子香在读书四年后被迫辍学并从事农业劳动^[2]。为谋生计,其父主张其习得一技之长,查子香遂前往广济县城学习织布技艺。然而,受当时社会局势动荡及布匹滞销等因素影响,织布经营难以为继。

恰逢理发店主吴庆业返乡招徒,查子香遂报名应试。广济县素有凭借理发技艺外出谋生的地域传统。当地学徒制惯例为三年期内不支付薪酬,仅提供食宿,学徒除需从事理发工作外,尚须承担店主家中的挑水、劈柴、清扫等繁重杂务。鉴于广济籍理发学徒具备吃苦耐劳之特质且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远赴异地经营的吴庆业遂专程返乡招募学徒。

吴庆业于大连市南山区(今中山区昆明街与华昌街交界处)开设“仁和轩”理发馆,服务对象主要为日本人,经营状况良好。此次返乡招募时,吴庆业基于查子香具备受教育背景且资质聪颖,遂予以选中。查子香亦有意外出谋生并习得技艺。1934年10月,查子香随吴庆业抵达大连,开始为期三年的理发学徒生涯^[3]。

大连市南山区(今属中山区)时为日本达官显贵聚居之地,吴庆业开设的“仁和轩”理发馆主要客户群体为日本人。吴庆业因善于应对日本人,生意得以维持。然而,其对日人的卑躬屈膝姿态令查子香深为反感。尽管该店凭借精湛技艺及细致服务获取了众多日本顾客的青睐,但顾客中亦不乏傲慢无礼者。部分顾客常对发型刻意挑剔,或在接受服务后拒付费用,亦有醉酒日军军官在店内肆意寻衅。查子香性情刚烈,对此类现象极为愤慨。

某日,一名醉酒日本士兵至店理发,吴庆业上前逢迎,并以日语阿谀,该士兵遂大笑不止。因见查子香未

作者简介:常伦惠(1993-),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医师,研究方向为皮肤病与性病学、中国近现代史、医学疾病史。

通讯作者:常伦惠

如吴庆业般逢迎，该士兵即暴怒并持续辱骂。查子香克制情绪完成了理发工作。然而，该士兵照镜后竟对查子香施以掌掴，且指骂吴庆业，意图拒付费用。吴庆业唯唯诺诺，连连致歉，并强令查子香赔礼，查则坚持不屈，保持沉默。最终，吴庆业免收费用，该士兵方才离去。当晚，吴庆业唯恐此事影响生意，竟携酒强迫查子香前往该士兵处再次赔礼。此类屈辱事件并非孤例。

查子香与同乡高骆驼闲谈时愤慨言道：“东洋鬼子真是可恨，我不杀他几个，都不配称中国人！”时人多将其言语视为宣泄愤懑，未予重视。然查子香并非空言，其所处之理发店每日有不少日本人往来，手握剃刀的他，若欲加害单个日本人易如反掌。但查子香未逞一时之快，反而一改往日态度，对日本人恭敬有加，且主动向师傅学习日语。据此推测，查子香此时或已暗藏谋划，意图实施较大规模的反日行动，而非针对普通日本人。查子香天资聪慧，不久便习得流利日语。其后，他秘密前往小岗子（今西岗）桥立町（今博爱街）的露天市场，购置一柄锋利的日式斧头及一套和服，静待行事时机^[1]。

2.2 英雄的抗日事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大连日本侨民情绪高涨。大连日本在乡军人会（该组织具备预备役职能，同时负责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社会控制及军国主义宣传等工作）于当日在大连市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举办“攻占南京军民祝捷大会”。当日，中央公园实施管制，仅准许日本人出入。查子香判断此时行动时机成熟。当日清晨，查子香身着和服，将一把日式斧头藏匿怀中，前往中央公园。因其身材瘦小，着装符合当地习惯，且日语流利，在与守卫交涉时应对自如，遂顺利混入会场。

1937年12月13日上午8时许，包括日本军政要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抵达戒备森严的大连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忠灵塔。该塔建于1925年，系为纪念日俄战争结束二十周年而建，用于供奉日俄战争中阵亡或病故的日军士兵骨灰。其原址大致位于今大连劳动公园大型足球景观处，后于1949年改建为“五一塔”，1975年7月被爆破拆除。当日，忠灵塔广场南侧聚集约一万余人^[2]，场面宏大。参会者涵盖关东军司令部及旅顺要塞司令部代表、大连日本殖民统治机构首脑、在乡军人会成员，以及工商界、文教界代表与大量日本普通居民。会场周边由日本宪兵及警察实施严密警戒，严禁中国人靠近。

此次大会旨在庆祝日军攻陷南京并悼念阵亡人员，首要议程为祭祀仪式。会场设于公园忠灵塔前广场，祭台铺设红布，上置日军灵位。在仪式开始前，查子香趁人群低头默哀之机，潜入覆盖祭台的红色布料下方。上午9时，祭奠仪式正式开始，全场日人行90度鞠躬礼。查子香在布料下方观察，确认前排为日军军官，后方为各界人士。当全场向祭台致哀时，查子香锁定第一排正中佩戴红边帽檐及满胸勋章的目标，判断其为在场最高级别官员。随即，查子香从祭台下方冲出，挥斧向该军官颈部猛击，致其头颅落地。随后，查子香试图袭击另一名军官，该军官闪避时左臂被砍断，现场顿时陷入混乱。在场日本军警迅速反应，因忌惮误伤己方而未开枪，使用两架长梯将查子香夹住^[3]。最终，查子香因寡不敌众被制伏捆绑，押送至大连日本警察署^[4]。

2.3 英雄事迹的结果与影响

日本警方起初试图对消息进行封锁，但事件仍迅速传播。据日军内部消息，死者为大连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山田永一（退役陆军大佐），另一名左臂被砍断者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代表加藤大佐。日军举办此次大会旨在庆祝“胜利”并悼念侵华战争阵亡官兵，却遭查子香袭击。此次行动以刺杀日军高级军官的方式，实质上构成了对侵华日军的反抗与对中国抗战牺牲同胞的祭奠。

事件发生后，日本殖民当局鉴于颜面受损及担忧进一步激发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遂严密封锁消息，未予公布。然而，事实真相终难掩盖，部分爱国志士在大连各交通要道秘密张贴标语，书有“庆祝南京陷落，欢呼脑袋掉落”等字样，以示嘲讽。查子香的义举迅速传至全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查子香被捕后，日本军警企图通过威逼利诱迫使其供出同党，因其认定查子香非独自行动。然而，查子香始终坚贞不屈。日本军警遂对其进行长达近两年的酷刑折磨，但查子香未尝屈服。日本殖民当局原计划公开处决查子香以震慑抗日民众，但顾虑此举可能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遂改变计划。1939年9月，查子香于旅顺监狱被秘密杀害，时年27岁^[5]。旅顺监狱曾为秘密处决朝鲜义士安重根之地，日本殖民当局将查子香视为继安重根之后的又一重大威胁。

三、查子香与荆轲和安重根事迹的异同之处

3.1 查子香与荆轲和安重根事迹的相同之处

查子香秉持强烈的爱国热忱与牺牲精神，在明知难以生还的情况下仍毅然实施行动。尽管此次行动未能改变战局走向，但有力震慑了敌对势力，并显著鼓舞了己方抗日军民的士气。其行为系反抗强权、挽救民族危亡的体现，充分彰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气节。

3.2 查子香与荆轲和安重根事迹的不同之处

查子香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其刺杀行动系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自发实施，这与荆轲、安重根等有组织的行动存在显著差异。荆轲本为卫国人，与燕国缺乏深厚情感基础，因受燕太子丹以“国士”之礼厚待，为报知遇之恩而担负刺杀秦王之责。安重根出身朝鲜两班贵族世家，家族世代为官，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因反对日本吞并朝鲜而投身抗日独立运动。相较于二者在组织策划下的行动，查子香的自发行为更彰显其个人意志之坚定，亦更具悲剧色彩与感召力。

四、讨论

查子香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自发特征，而非有组织的行为，主要依据如下：

4.1 身后的认定与纪念方式具有民间性。

查子香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原籍湖北省黄冈市广济县追认为抗日烈士^[3]。其衣冠冢位于老家村口，未列入广济县或大连市的烈士陵园。大连作为事发地，亦未设立相关纪念设施。其事迹仅见于《大连市志》《大连近百年历史人物》《广济县志》等少数文献。上述情况表明，查子香的行动缺乏中共背景。

4.2 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缺失。

从被捕到遭日军酷刑处决，查子香未获得国民党方面的营救或宣传。国民政府所立忠烈祠名录中亦无其名，表明其并非国民党系统成员。

4.3 事迹宣传存在局限性。

查子香的事迹长期未获广泛传播，至今鲜为人知，连其父母兄弟姓名亦不可考。在其家乡湖北广济县，相关宣传亦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官方层面的宣传力度明显不足。

4.4 个人情绪的公开表露。

查子香在理发店遭受日本人打骂侮辱后，曾向同乡高骆驼公开表达“不杀几个东洋鬼子，不配称中国人”的愤慨。这种公开宣泄个人情绪的行为，与有组织行动所要求的保密原则相悖。

4.5 经济状况与个人形象的局限。

查子香家境贫寒，在大连做理发学徒期间无薪水收入，且未留下照片或画像。这种经济状况与有组织行动通常具备的资源支持不符。

4.6 行动方式的非典型性。

若查子香隶属于国共两党，其行动通常作为组织任务执行，武器选择应为炸弹、手枪或手雷等，而非原始的斧头。对比 1909 年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时使用的勃朗宁 M1900 半自动手枪，查子香的武器装备差距显著。此外，有组织的行动通常会通过周密策划以避免人员被俘遭受酷刑，并在行动后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但这些特征均未在查子香事件中体现。

综上所述，查子香的行动应属个人自发行为，非受国共两党指派。事发后，因日军当局的保密措施，国共两党可能对行动者身份一无所知，仅知悉有日军高级军官被刺杀，故而未能对查子香的事迹进行宣传。

五、结语

查子香的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以个人之力实施刺杀，不仅造成敌方重大伤亡，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行动性质之壮烈不亚于战国时期荆轲刺秦。在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正是无数类似查

子香的志士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抗战胜利。鉴于目前对查子香事迹的宣传力度尚显不足，学界及社会各界有必要进一步弘扬其精神，使其英雄事迹为更多公众所知晓并铭记。

无论查子香的行动属于组织派遣还是个人自发，亦无论其具体动机如何，其事迹均值得全体中国人民铭记与敬佩。查子香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其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追求独立的重要象征。鉴于查子香与朝鲜义士安重根同于旅顺监狱就义，且被日本殖民当局视为第二个安重根，这一历史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其历史地位。正如荆轲刺秦王载入史册、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被朝鲜半岛奉为民族英雄，查子香的事迹同样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参照哈尔滨设立安重根纪念馆的先例，作为事发地的大连及查子香家乡湖北省广济县，理应为其建立纪念馆，以缅怀其英勇事迹，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为传承与弘扬民族英雄精神，建议将查子香的事迹纳入小学教材，此举旨在铭记历史与英雄壮举，而非煽动仇恨。同时，建议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原广济县）为其修建纪念设施，虽无需宏大，但应足以表达对英雄的敬意与缅怀。大连市可借鉴哈尔滨建立安重根纪念馆的经验，设立查子香纪念堂，或将现劳动公园（原中央公园，即事件发生地）更名为“查子香纪念公园”，以纪念在此实施行动的抗日志士。湖北省应大力宣扬查子香的事迹，其孤胆英雄式的行动与湖北人“敢为天下先”的地域性格特质高度契合，其精神内涵与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亦相通。通过上述举措，有助于公众全面了解查子香的历史功绩，并将其精神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 [1]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 大连市志: 人物志[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86-87.
- [2] 王胜利. 大连近百年史人物[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9.
- [3] 湖北省武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济县志[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4.

Study on the Deeds of Zha Zixiang: A Modern Jing Ke and Chinese An Jung-geun in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ANG Lunhui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re lived a legendary hero named Zha Zixiang, whose feats of bravery we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Jing Ke’s assassination of the King of Qin” and “An Jung-geun’s assassination of Itō Hirobumi.” Records state that during the Japanese celebration ceremony following the fall of Nanjing, Zha Zixiang, acting alone, boldly infiltrated the event. Armed with an axe, he launched a daring attack, slaying the senior Japanese officer present and severely wounding a Japanese Army Major. This extraordinary act dealt a significant blow to the arrogance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greatly boosted the morale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However, the story of this lone hero remains relatively unknown. This article will delve into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thoroughly research and explore the heroic deeds of Zha Zixiang.

Keywords: Jing Ke; An Jung-geu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eroic deeds; Zha Zixiang; History.

再论佉卢文契约之“家庭要素”

李育骏¹ 魏驿函²

(1.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2.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Doug Hitch 于 2009 年发表 *The Special Status of Turfan* 一文, 文章主旨为支持“贵霜统治塔里木”, 其中一个章节以多语种契约对比展开, 认为除吐鲁番以外的塔里木契约具有相似的特征, D.H 将其总结为“四项要素”, 其中对于“家庭”单位的职能, 而吐鲁番则并不具有这些特征, 阅读之后, 本人发现其论证中, 对于“家庭责任”的定义过于单一, 故此, 本文将重新检定佉卢文契约中的“家庭”要素, 为之做一个客观的解释。

关键词: 佉卢文; 契约文书; 对比研究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40

一、问题的提出

Doug Hitch 在其论文 *The Special Status of Turfan* 中, 横向比较了多语种契约文书, 包含巴利文 (Prakrit)、于阗文、图木舒克文、吐鲁番回鹘文、叶尔羌回鹘文、巴克特里亚文和汉文, 研究之后, 总结出了除吐鲁番之外的塔里木地区契约文书具有四项相同的要素:

Family members have the same obligations and rights as one of the parties

双方的家庭成员享有相同的责任与权利

A prohibition against disputing the agreement or decision

禁止对协议或决定提出异议

A financial penalty paid to the state, and/or

向国家支付经济罚款

A corporal punishment through lashes with a stick

用棍子鞭打体罚^①

为便于行文, 以上四项要素, 在下文将被简称为: “家庭责任”、“禁绝争议”、“经济处罚”、“体罚”; 且鉴于中西文之间的翻译问题,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上述四项要素, 尤其是第一项——“家庭责任”进行必要的解释与说明。

他认为以上四项要素均来自于西方, 而非中国, 并以此为论据, 认为除吐鲁番之外的塔里木地区为贵霜王朝统治, 由此受到了贵霜王朝法律传统的影响。

Doug Hitch 认为: 巴利文、于阗语、图木舒克语、叶尔羌回鹘文、巴克特里亚文, 这些契约文书单独的来看或许无法涵盖所有的“四项要素”, 但整体来看, 它们在这些方面又具有相似性, 而吐鲁番回鹘文的家庭责任要素不明显, 其他的三项要素更是无从体现, 反而整体呈现出汉地契约特征, 故此, 他认为吐鲁番回鹘文书表现出的特殊性可以作为支持“贵霜统治塔里木”说的论据。

在研究视角与研究范式上来看, Doug Hitch 具有相当的贡献, 他提出的四项要素是少有的跨语言研究的成果,

作者简介: 李育骏(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西域史;

魏驿函(2006—), 女, 在读学士, 会计学专业。

通讯作者: 李育骏

^① Doug Hitch, “The Special Status of Turfan.” in Victor H. Mair(eds.), *Sino-Platonic Papers*,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这点应当予以肯定，但他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的漏洞：对“家庭责任”的定义是否过于狭窄，家属在处理财产时是否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契约主体违约时，其他家属是否承担违约连带责任。

D.H 在书写时并未深入讨论上述问题，提出的“家庭责任”具有标签化之嫌，其得出的论断略有不妥。

本文将利用已前人已翻译过的佉卢文契约文书，回答 D.H 未论及的问题。

二、样本选择

“家庭责任”在佉卢文契约中的语言反应十分直白，多以“我的儿子、女儿、儿子的后代……”、“无论我的家族成员任何人想……都将无效……”之类的词语出现，从字面意思上，我们只能得出“限制家庭成员毁约”或“限制家庭成员未来行为”这一特点。

从目前的释读的佉卢文书看，相较于整体的佉卢文书，直接的、完整的佉卢文契约存留量较少，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只有 52 篇，然而佉卢文中存世的针对违约方的司法判决书仍可以为我们研究佉卢文契约提供侧面依据，不过司法判决书与惩罚条款牵涉较深，此部分并未纳入统计。

现将收集到的佉卢文契约文书以表格的形式做一展示，以期能更好的了解古代楼兰、于阗、龟兹等地的情况。

表 1 契约统计

编号 ^①	主要内容	类型
Kh.186	“将土地售与鸠伐耶 (Ku v aya) ”	土地买卖
Kh.195	“若是此驼死去或遗失……此众兄弟将会陪藏乌波格耶一峰同等价值之骆驼”	借驼契约
Kh.208	“由税监鸠伐耶妥为保存”	书面契约
Kh.209	“无论和人将来欲改此协议，彼等收相同之处罚……”	人口买卖
Kh.222	“作为田地之回报、彼等公平达成协议”	土地买卖
Kh.322	“将一名叫做僧葛之于阗男子给予精绝僧团”	人口买卖
Kh.324	“将其作为礼物送与秦人史家智”	人口买卖
Kh.327	“价钱已支付，计 10 之牝牛”	土地买卖
Kh.328	“伽特伽耶对此男子具有全权”	人口买卖
Kh.331	“伽左那由地上拾起此女，并将奶费支付与波离耶帕驼”	领养契约
Kh.336	“事关土地，由主簿索闾伽妥为保存”	土地买卖；残缺
Kh.348	“吉利耶格购买此罐并支付了价钱”	买卖契约
Kh.380	“彼被当做一件赠礼”	奴婢买卖
Kh.401	“将（其）租与耶吠阿瓦纳”	骆驼租赁
Kh.415	“该妇人将其子给予男子伽左那领养”	领养契约
Kh.419	“她们曾将一作 <i>4apcira</i> 之葡萄园及在 <i>misi</i> 中之 <i>letga kuthala</i> 地块出卖”	土地买卖
Kh.420	“柯罗罗康闾伽欠下贵人沙罗施帕一峰 <i>vtala</i> 驼”	债务契约
Kh.421	“此系主簿夷陀伽与主簿伏陀之印”	债务契约；残缺
Kh.422	“阿耆那耶及其兄弟将土地卖与鸠伐耶”	土地买卖
Kh.425	“有一位名叫吉伐蜜多罗之沙门，彼曾与卡拉周伽帕作一笔生意[...]解除（债务）”	债务契约
Kh.437	“彼等将 5disti 身高之女售与沙门佛陀舍那及摩施帝格”	奴婢买卖
Kh.495	“伽黎格耶埋下该地”	土地买卖
Kh.527	“彼时苏怙陀与史伐伽曾就 12 掌长之地毯及 6 弥里码谷物起诉”	债务契约
Kh.549	“此等诸兄弟曾出面将播种量 1 弥里码 10 晒之田地售与沙门僧伽菩提”	土地买卖
Kh.568	“我，伽波格耶，给予苏怙陀十只绵羊作为其财产”	财产赠予
Kh.569	“其幼子叫作萨满奈罗，曾为鸠宁陀所领养”	领养契约

^① [英]托马斯·巴罗著、刘文锁译：《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 年；带有 Kh 编号的文书均来自此著作

编号 ^①	主要内容	类型
Kh.571	“彼曾将其 misiya 地连带树木卖与司书罗没索磋”（限制所有人权利）	土地买卖
Kh.572	“彼曾出面将 10kuthala 给予其邻居鸠宁陀”	土地赠送
Kh.573	“其与阿罗黎曾将阿罗黎之女给予作史格耶”	婚姻契约
Kh.574	“罗没索磋自穆尔德耶之诸奴隶处曾买得土地”	土地买卖
Kh.579	“彼曾出面将 akri 地卖与司书罗没索磋”	土地买卖
Kh.580	“彼出面将 misiya 地卖与税监罗没索磋”	土地买卖
Kh.581	“此位达摩闍曾出面将一座葡萄园售与司书罗没索磋”	土地买卖
Kh.582	“彼曾出面将土地售与税监罗没索磋”	土地买卖
Kh.586	“彼曾出面将一座葡萄园连带树木售与司书罗没索磋”	土地买卖
Kh.587	“他们曾出面将播种量为 7 晒 shaini 之 ciraimta 地售与司书罗没索磋”（王廷无效）	土地买卖
Kh.589	“他们于饥谨时期将一名叫史弥查之女孩，卖与司书罗没索磋”	奴婢买卖
Kh.590	“有一男子名曰僧左，其出面将一名叫做黎帕耶之妇人卖与司书罗没索磋”（王廷无效）	奴婢买卖
Kh.591	“黎贝耶与婆沙尔萨曾由卡拉娄克支处买得一男子”	奴隶买卖
Kh.592	“其出面将一身高 4distis 女孩黎弥娑耶卖与司书罗没索磋”	奴婢买卖
Kh.598	“彼等已带来价款”	书面契约；未知类型
Kh.648	“彼等及其父亲出面将土地卖与伏美耶”（与父亲一起售卖）	土地买卖
Kh.652	“将播种量为 1 弥里码之土地卖与司书黎帕特伽”	土地买卖
Kh.654	“彼出面播种量为 3 弥里码之 agri 地卖与牟伽陀”	土地买卖
Kh.655	“出面将 misi 地卖与沙门、kutajadaḡa 佛陀法摩”	土地买卖
Kh.656	“其出面由其本人之财产中将一件礼物给予檀支牟腊”	土地买卖
Kh.677	“给予土地礼物与柯色那耶”	土地买卖
Kh.678	“此左摩伽将播种量 3 弥里码之 kurora 地卖与耶波怙”	土地买卖
Kh.715	“彼等曾出面[...]并将播种量为 3 弥里码之 misiya 地出售”	土地买卖
Kh.782	“卖出能播种 1 弥里码 cuthie 种子之 misi 地”	土地买卖
BH5-3 ^①	“将得到惩罚：四岁骗马，杖七十”	土地买卖
HTB000405 ^②	“将上缴四岁之马一匹，杖七十”	婚姻契约

从契约类型分布来看，土地买卖占据主导，共有 27 篇，占到了统计契约总数的一半；其次是人口、奴隶买卖契约，共 10 篇；债务契约 4 篇；领养契约 3 篇；婚姻契约 2 篇；性质不明的契约 2 篇；租赁契约 2 篇；财产赠予 1 篇；买卖契约 1 篇；这为分析“家庭责任”的适用场景提供了背景。

三、从契约结构来看“家庭责任”

佉卢文使用时间大致相当于我国的汉晋时代，时间跨度大，亦有契约完整的契约格式，以下为一篇较为完整的佉卢文土地买卖契约，即上文之 Kh.222:

兹于大王、天子、侍中摩醯利 (jitugha mayiri) 陛下之第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是时司书罗没索磋、苏怙陀、苏难陀、鸠宁陀于左史格耶，就主簿索闍伽之一块可种下 2 晒^③adini 种子之 akri 田地一事前来申诉，另涉及

^① 段晴：《元孟八年土地买卖楔印契约国图：BH5-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语、佉卢文卷》，上海：中西书局，2013 年

^② 吴赞培：《和田博物馆佉卢文尺牍放妻书再释译》，《西域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77 页

^③ 弥里码 (milima) 与晒 (khi) 均为谷物之计量单位。20 晒相当于 1 弥里码。段晴在《元孟八年土地买卖楔印契约》一文中，认为“1khi (晒) 相当于晋代的一斗，用粟计算相当于 1 公斤。”载段晴，张志清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98 页。

在外之更多田地，其范围两者合计为（诸如可种下）5 晒 adini 种子。主簿索阁伽现身并给予司书罗没索磋及苏怛陀一份礼物，即一张价值 10 目厘（mulī）^①之地毯（kojava）以作为田地之回报。彼等公平达成协议。自今日起，逐步索阁伽有全权在该地播种、犁耕、用于交换，为所欲为。

以上为一份土地买卖契约，买方为主簿索阁伽，卖方为司书罗没索磋，二者交易的土地以可耕种面积为单位，交易价格为 10 目厘之地毯，通过实物进行直接交易。

结合上述 26 篇土地交易契约和人口买卖契约，我们可以得出佉卢文契约的一般格式：

文书主题及封印说明；

缔约时间；

缔约双方、标的物及其交易方式；

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

证人；

违约处罚；

契约书写人；

“断绳”人。^②（此处的“断绳”为佉卢文契约的一种书写格式，一律写于契约最后，格式为“xxxx 断绳”，断绳一般由低级官吏执行。^③）

对比其他契约，我们可以发现在佉卢文契约中，交易通常以实物进行，以牲畜作为交易媒介是一种及其普遍的现象，如：Kh.186、Kh.195、Kh.209、Kh.327、Kh.331、Kh.401、Kh.415、Kh.422、Kh.437、Kh.495、Kh.569、Kh.571、Kh.573、Kh.574、Kh.582、Kh.586、Kh.589、Kh.648、Kh.654、Kh.655、Kh.715、Kh.782；手工艺品毛毯亦作为一种交易媒介，如：Kh.222、Kh.527、Kh.549、Kh.579、Kh.592

贵金属也出现在佉卢文契约中，如：Kh.324、Kh.348、Kh.419；^④酒、毯、谷物也都作为交易媒介出现，甚至会出现多项物品共同作为交易媒介的情况，如 Kh.571 以“两岁驼”、“10 晒酒”来交换土地，^⑤Kh.587 以“6 晒葡萄酒与 10 晒谷物”交换土地，^⑥故此我们可以得知，佉卢文契约中承担交换功能的物品十分庞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以物物交换为主。

从数据统计来看，D.H 所定义的“家庭责任”在契约中的分布稀少，在上述契约文书中，符合 D.H 定义、也即限制家庭成员权利的契约，仅有 Kh.437、Kh.573 两篇，而 Kh.573 又为交换婚契约，其本身又因此具有特殊性，那么实际意义上真正提及“家庭责任”的契约，就只有 Kh.437，转写如下：

此牒事涉购自苏耆之女萨迦那帕雅，由摩施帝格妥加保存。

此系主簿伽波格耶与吉查依查陆都之印。

于天子、侍中安归伽陛下之第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在此治下，有一位精绝国男子官帕腊（Kompala），彼属于 camkura 伽波格耶及其子之封地……自现时起，摩施帝格对该女有权为所欲为，彼应为该女之全部事情做主。将来无论何人-无论其为 camkura 伽波格耶之兄弟，抑或其兄弟之子、孙，抑或其亲属或封地之人（kilmeci），再次于诸司土（úasa）及诸税吏（aḡeta）前对该女提出异议，意欲翻案，彼之上诉于王廷将是无效，彼并须受一匹四岁口之骗马及五十下笞打。此处罚应全数支付，此应如上文所书予以保留。此由我，司书般没左（Bhammecca），受 camkura 之命书写。

上为一份奴婢买卖契约，卖方为精绝国男子官帕腊，买方为沙门佛陀舍那及摩施帝格；在上述契约中加粗字

^① 目厘，mulī，意为“一种价值单位”。巴罗在对 kh.210 号文书注文中指出：“12 目厘=5 目厘+140 晒，即 7 目厘=140 晒=7 弥里码，因为 20 晒=1 弥里码。因此，目厘是一个价值单位，其值等于 1 弥里码谷物之价值。”《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载《尼雅考古资料》，第 207 页。对于目厘在契文中作为折价单位，林梅村在《沙海古卷》“籍帐”类中也予认同：“1 弥里码（milima）=1 目厘（mulī）=20 晒（khi）”，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157 页。

^②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297 页

^③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37-38 页

^④ 出现在佉卢文契约中的金属货币单位为金斯塔尔（satera）、德拉马克（trakhma），属于古希腊金币，亦出现在于阗语文书中，参见 H.W.Bailey, “Introducion Gaustana: The Kingdom of the Saka in Khotan”, in Khotaness Texts 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8

^⑤ 托马斯·巴罗著，刘文锁译：《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 年，202 页

^⑥ 托马斯·巴罗著，刘文锁译：《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 年，216 页

体为有关家庭成员的语句，但是上述契约中针对双方家庭的权利限制并不明显，反而是从属于“意欲翻案，彼之申诉于王廷是无效”这一类禁止翻案的条款当中，“家庭责任”在契约中难以视为一个单独的特殊要素。

其次，我们根据逻辑来判断，佉卢文契约中有“规定双方权利”的格式，若在“规定双方权利”之外，单独增设家庭成员权利限制，与契约格式的简洁性不符；司法判决文书鲜少具有针对违约方家庭成员的惩戒，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直接的罚款或体罚；但是以上情况并不能排除家属在交易中的作用，佉卢文书中亦有众多家属参与交易的契约。

四、家庭联合交易与司法验证

在佉卢文契约中，交易双方多人共同参与缔约的行为并不少见。在统计的 52 篇契约文书中，以个体交易，即一对一交易较多，有 Kh.209、Kh.324、Kh.327、Kh.331、Kh.348、Kh.420、Kh.425、Kh.495、Kh.568、Kh.569、Kh.571、Kh.572、Kh.574、Kh.579、Kh.580、Kh.582、Kh.586、Kh.592、Kh.652、Kh.654、Kh.656、Kh.677、Kh.678、Kh.782；买卖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多人联合交易的有 Kh.186、Kh.222、Kh.322、Kh.401、Kh.415、Kh.437、Kh.527、Kh.587、Kh.590、Kh.591；明确交易双方中至少有一方有血缘关系的有 Kh.195、Kh.419、Kh.549、Kh.589、Kh.648、Kh.655、Kh.715。

例如，Kh.549 的土地买卖契约，交易双方便确定有血缘关系，契约关键信息如下：

此契（订立于）四月七日。牟伽陀（Moḡata）与摩宁格耶（Mañigeya）于童格罗伽大王之阿瓦纳（aṅana）^①，此等诸兄弟曾出面将播种两计 1 弥里码 10 晒之田地售与沙门僧伽菩提。摩宁格耶与牟伽陀收到价款计 1 张于闐 alena 毯及 5 弥里码谷，价钱计 15.....

由上述加粗字体可知，这篇土地交易契约为兄弟二人——牟伽陀（Moḡata）与摩宁格耶（Mañigeya），但是后续的契约文本中并没有专门限制家庭成员的权利的内容。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Kh.648 中，交易双方信息为：“有一男子名曰陀美耶（Tameya），及另一位名曰帕尔苏格（Parsuḡe），彼等及其父亲出面将土地卖与伏美耶（Vumeya）”，此文书更加直白，卖方为父子，且在后续的规定双方权利的内容中，并没有出现明显指向家庭成员的语句。

故此，在佉卢文契约中，家庭联合交易的情况，应当是普遍存在的。

司法验证。佉卢文司法文书针对违约行为的司法判决鲜少提及家庭。若“家庭责任”确为契约执行中的重要机制，则司法判决中应体现对家庭连带责任的追究。然而现有判决文书显示基本没有针对违约方家庭的惩戒或判决，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Kh.39 号佉卢文契约：

[主簿萨摩舍那（cojho Samasena、）、布瞿（Puḡo）启。

大德、大王敕谕主簿萨摩舍那、布瞿如下：]黎贝耶冰雹道，其奴支弥伽未得其允许，而将其女给予伽波格之奴作为养女，该养女由彼等所养育。尚未给奶资。当[此印封之楔牒传至你处，]你须得查明其奴是否确实曾未征得其许可给予伽波格之奴以养子，而尚未付给奶资。（如是）黎贝耶自伽波格之奴处取得一匹三岁口之牝马或牡马，而养子则全数归属于彼等。然则如有何等之争讼，[须依法给予判决。如你不能澄清此案，则将彼等押至王廷，再做审理。

黎贝耶、伽波格之事宜]^②

该份文书为拖欠奶费（收养费，实际上为人口买卖的费用）之司法判决文书，案件内容为两名奴隶奴支弥、伽波格在未征得主人同意下私自进行领养活动，这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缔约行为，如果这两位奴隶签订领养契约，并且明确的规定“家庭责任”，那么家庭势必要在后续的违法判决中被波及，然而根据契约我们可知，王廷直接下达司法判决，指定奶资的赔偿额度，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扩大处理。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 Kh.11 这一份处理领养纠纷的司法判决中，王廷做出的判决是“依据就有之领养子女支付偿金之法令”，而没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裁决。

关于违约行为的司法判决文书十分多样，目前可见的司法判决文书中，涉及违约惩罚的条款（如 Kh.27、Kh.31）

^① 一种行政区称呼，巴罗译作“村”，林梅村译作“县”，段晴译作“聚落”，此处为孟凡人所采取之音译；分别参见 Thomas Burrow, *A Transa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The Rouyal Asitaic Society, London, 1940；林梅村：《沙海古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段晴：《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上海：中西书局，2016 年；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② 托马斯·巴罗著，刘文锁译：《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23 页

均未提及家庭连带责任，这一倾向与契约中“家庭责任”的稀缺性形成呼应，如上文 Kh.39 提及违反领养契约的奴隶伽波格对其惩罚仅限于按照正常的奶费额度进行赔偿，而没有对其家人进行直接惩罚。

五、总结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 D.H 定义的“家庭责任”在佉卢文契约中的几个问题：首先，分布较为有限，仅有两例较为明显；其次，家属联合交易属于常见现象，在此类契约中少有出现专门的限制家庭成员权利的条款；最后，针对违约行为的司法判决，鲜少以家庭为单位执行。

故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佉卢文契约文书中“家庭责任”及其所体现在契约文书中的话语，应当属于一种民间习惯，其分布并不十分普遍，仅少数个例中有所书写，且根据逻辑来判断，佉卢文契约中有“规定双方权利”的固定条款，若在此之外，再次增设家庭成员权利限制的条款，在结构上有杂糅之嫌；从契文内容上看，家属联合交易在佉卢文契约中也有存在。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 D.H 提及的“家庭责任”——对买卖双方家庭权利的规定、限制，在现存佉卢文土地、奴婢买卖契约中，并非是一种固定条款，其实际效力也可能因契约类型而异，需结合更多婚姻、继承财产类文书验证；此外，婚姻契约（如 Kh.573）中“家庭责任”或与身份转移相关，其功能可能不同于经济契约，需另结合新材料探讨。

参考文献：

- [1] 托马斯·巴罗著，刘文锁译.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
- [2] 林梅村.沙海古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3] 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 段晴.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牘[M],上海：中西书局,2016
- [5] 段晴，张志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M].中西书局,2013
- [6] 吴赞培.和田博物馆佉卢文尺牘放妻书再释译[J].西域研究.2016,(3).
- [7] Doug Hitch,The Special Status of Turfan[J].in Victor H. Mair(eds.),Sino-Platonic Papers,Philadelphia: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9

Reconsidering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y in Kharoṣṭhī Contract Documents

Li Yujun¹, Wei Yihan²

(¹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²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Henan, Zhengzhou)

Abstract: In his 2009 article *The Special Status of Turfan*, Doug Hitch advocates for the theory of 'Kushan rule over the Tarim Basin.' A central chapter employ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lingual contracts, arguing that documents from the Tarim Basin—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of Turfan—exhibit a distinct homogeneity. Hitch encapsulates these shared characteristics as the 'Four Elements,'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the 'family' unit plays a specific functional role, a feature conspicuously absent in Turfan contracts. Upon critical review, however, this author finds Hitch's conceptualization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to be overly reductive.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seeks to reassess the 'family elements' within Kharoṣṭhī contracts, offering a more objective and nuanced interpretation thereof.

Keywords: Kharoṣṭhī; Contract Documents; Comparative Study

《周易·同人卦》的共同体思想意蕴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瞿塘先生对《同人卦》的深度注解

丁惠炯

(梧州学院管理学院, 广西梧州 543000)

摘要:《周易·同人卦》系统呈现了古代共同体建设的哲学智慧。卦象“天火同人”通过五阳一阴的爻位结构,揭示以柔顺中正为核心凝聚多元力量的共同体建构模式;其核心命题“同人于野”倡导打破宗族界限的开放型共同体,其六爻辞序列完整展现了从初始构建、冲突化解到稳固成型的动态过程;“类族辨物”原则阐释了在差异中求统一的辩证思维,为“和而不同”的共同体存异智慧提供理论依据。上述思想体系通过“大同”理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古今对话,为全球治理贡献了超越西方“契约共同体”模式的东方智慧——以道德自觉、文明感通与渐进整合为核心的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阐释了《周易》思想对现代社会组织理论、全球治理范式创新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同人卦》; 共同体思想; 理论构建; 当代启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2

一、《同人卦》的符号系统与哲学基础

《周易·同人卦》集中体现出中华传统哲学对“和同与人”思想的追寻,其独特的符号系统为我们理解共同体建设思想提供了经典范本。《同人卦》由乾上离下组成,卦象为天下有火,卦辞核心“同人于野”则展现超越血缘、地缘局限的广阔共同体视野。这一卦象系统不仅蕴含着古人对于理想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也为当代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哲思基础。

(一) 卦爻结构与释义

《同人卦》的爻位结构呈现出“五阳一阴”的独特形态,六二爻作为全卦唯一的阴爻,居于下卦之中位,既得位又得中,成为其他五阳爻共同追寻和亲附的对象。这一结构象征着在共同体建设中,柔顺中正的核心要素能够吸引和凝聚各种力量,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六二爻与九五爻形成中正相应的关系,代表共同体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相互认可。正如《彖传》所言:“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周易·同人》),表明这种以柔顺居中位,而又能与刚健相应和的态势,确是“同人”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

对爻位关系分析可见,初九“同人于门”展现出共同体建设的初始阶段,强调以开放姿态接纳他人;六二“同人于宗”则警示狭隘的小团体意识可能带来的局限;九三“伏戎于莽”揭示了共同体内部的紧张与竞争;九四“乘其墉”表现出在冲突面前的自我克制;九五“先号咷而后笑”象征着经历磨难后达成的真正和谐;上九“同人于郊”则体现了一种虽然疏远但仍保持认同的共同体边缘状态。这种层层递进的爻位安排,系统描绘了共同体从初创到巩固的全过程,揭示了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及其应对之道。

(二) 卦象象征与解读

《同人卦》的上乾下离结构,即天下有火之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火焰向上的本性与天道运行的刚健有力相互呼应,形成志同道合的态势,这正是共同体构建的理想基础。程颐对此解读道:“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

作者简介:丁惠炯,男,管理学博士,梧州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兴系统哲学、管理哲学、养老体系构建。

上，与天同也，故为‘同人’。”^②这种基于共同本性和趋向的联合，超越了简单的利益结合，体现了深刻的价值认同。

从另一角度看，乾（天）代表权力与秩序，离（火）象征文明与智慧，二者结合提示：真正的共同体建设需要文明引导与权力保障的有机统一。《象传》显示：“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强调君子应当效法这一卦象精神，在保持事物类别差异的同时寻求共通之处^③。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正是《同人卦》对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启示。参见表 1。

明儒来知德以象数阐释义理，以义理印证象数，其对《同人卦》的卦象解析强调“天在上，火性炎上，上与天同”^④，其核心在于阐述火与天的特性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

“类族”者，于其族而类之。“辨物”者，于其物而辨之。如是则同轨、同伦，道德可一，风俗可同，亦如天与火不同而同也。（《周易集注》，第 194 页）

火具有向上升腾、光明炽热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同人卦》中被用来象征光明与行动的特质。卦象中以“天”代表至高无上的刚健，以“火”代表光明与热情，两者结合体现了光明磊落、积极进取的精神。“与天同”指火性向上与天的刚健特性相契合，象征着顺应自然规律、遵循正道。来知德认为，这种相通性体现在两方面：光明属性，火能发光发热，象征着驱散黑暗、照亮前路，与天之光明相呼应；刚健属性，火的燃烧需要持续的能量支持，正如天的运行需要刚健的意志维持秩序。这一观点延伸了五行学说中“火”的象征意义，强调人与自然规律的一致性。

来知德认为，九五爻的刚健与六二爻的柔顺形成互补，这种阴阳相应关系体现了天道变化的规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亿兆之众志虽不同，惟此正理方可通之，方可大同人心。若私邪不正，安能有于野之亨，而利涉哉？此所以“利君子贞”也。（《周易集注》，第 194 页）

九五爻作为上卦中位，具有统领作用；六二爻作为下卦中位，象征群众的基础支持。两者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石。“‘君子贞’则总六二、九五言之。”（《周易集注》，第 194 页）这一观点强调领导者需以刚健中正之道引领群众，而群众需以柔顺配合支持领导，共同实现天下大同的目标。

表 1 《同人卦》的符号系统及其象征意义

构成要素	象征意义	共同体建设启示
乾卦在上	天、刚健、公正、秩序	共同体的权力结构与制度保障
离卦在下	火、光明、文明、智慧	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文化基础
六二阴爻	柔顺、中正、核心	共同体的凝聚中心与协调机制
九五阳爻	刚健、中正、尊位	共同体的领导力量与权威来源
相应关系	六二与九五的阴阳感应	共同体内部的上下沟通与良性互动

（三）《同人卦》的思想渊源

《同人卦》的共同体思想并非孤立产生，而是与西周早期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推翻商纣统治后，周王朝面临如何整合多民族、多部落的严峻挑战，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统一理念与“柔远能迩”的怀柔政策，其政治智慧在《同人卦》中得到了哲学提炼；同时，西周建立的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也为《同人卦》思考不同层级共同体关系提供了现实参照。

从思想脉络看，《同人卦》展现的共同体观念与儒家的大同思想、道家的齐物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可以说直接源自《同人卦》“同人于野”的精神境界；而

^②[宋]程颐著，《周易程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58 页

^③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57 页。

^④[明]来知德撰，《周易集注》，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93 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也与《同人卦》破除狭隘自我、追求广泛和同的理念相通^⑤。这种跨学派的价值取向，表明《同人卦》的共同体思想触及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共享的文化资源。

二、“同人于野”：共同体的层次性构建模式

“同人于野”作为《同人卦》的卦辞核心，凝练地表达了构建理想共同体的原则，代表着打破各种边界限制、在最为广阔的领域内实现人类和谐共处的宏大愿景。这一理念为当代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思路与方法。

（一）共同体构建的层次性递进

《同人卦》通过爻辞系统展现了共同体建设的层次性，从“同人于门”（初九）、“同人于宗”（六二）到“同人于郊”（上九），最终指向“同人于野”的终极理想，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扩展逻辑。这种层次性既尊重了人类情感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指出了共同体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发展方向。参见表2。

初九“同人于门”代表共同体建设的初始阶段，即在较为亲近的社交圈内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这里的“门”象征着家庭与社会的交界，提示共同体建设可以从身边人开始，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培养基本的信任与合作习惯。这种初级共同体具有情感基础浓厚、互动频率高、监督机制自然等优势，为更广泛的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²。

六二“同人于宗”则警示了共同体建设可能陷入的困境——宗派主义。当共同体局限于特定血缘、地域或意识形态群体时，就会形成封闭的“小圈子”，产生排斥异己、自我固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屡见不鲜，从政治派系斗争到文化本位主义，都是“同人于宗”的负面表现。《同人卦》明确批评这种狭隘意识，指出其结果为“吝”，即道路越走越窄。

上九“同人于郊”代表着一种虽然尚未完全实现“于野”理想，但已超越“于宗”局限的中间状态。“郊”比“野”更接近中心，但比“宗”更为开放，象征着共同体在扩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同体已经具备了相当包容性，但尚未达到真正的普世性，不同群体之间仍保持着某种安全距离。这或许是现实中最具可行性的共同体模式，既避免了狭隘封闭，又不会因过度扩张而导致内部整合困难。

表2 《同人卦》中共同体构建的层次性

层次	爻位	空间意象	社会关系	建设要点
初始阶段	初九：同人于门	家门口	亲近邻里	建立基本信任
警示阶段	六二：同人于宗	宗族内	血缘关系	避免小圈子意识
冲突阶段	九三：伏戎于莽	林莽中	竞争关系	防止暴力相向
克制阶段	九四：乘其墉	城墙上	对峙关系	保持自我克制
和谐阶段	九五：先号咷后笑	中心区域	核心关系	历经磨难达成和谐
扩展阶段	上九：同人于郊	郊外	边缘关系	保持适度联合
理想境界	卦辞：同人于野	旷野	普世关系	全面开放包容

（二）“利涉大川”：共同体的功能导向

《同人卦》卦辞中的“利涉大川”揭示了共同体构建的功能维度——有能力帮助成员克服单一个体难以应对的挑战时，“共同体”的存在才具有现实意义。“涉大川”代表着最具危险性的挑战，需要集体协作才能完成；

^⑤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31页。

这一意象暗示，真正的共同体不仅仅是情感认同的群体，更是功能互补的合作体系。

从现代社会视角看，“利涉大川”可以理解为共同体应对各类社会风险、实现共同发展的能力。无论是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还是文化冲突、社会失序，都需要通过共同体层面的协作来有效应对。《同人卦》的这一观点，与当代社会学中的“风险社会理论”不谋而合，两者都强调集体协作对于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利涉大川”的前提是“同人于野”，即只有建立在开放、包容基础上的共同体，才能充分发挥其应对挑战的功能。历史上那些封闭排外的共同体，无论短期内如何强大，最终都难以适应环境变化而走向衰败。这提示我们，当代共同体建设必须兼顾内在凝聚力与对外开放性，才能在保持特色的同时获得持续发展能力。

三、《同人卦》的共同体形成过程：六爻的阶段性展开

《同人卦》的六爻爻辞系统描述了一个完整共同体从初步形成、经历考验到最终巩固的全过程，每一爻代表一个特定阶段及其面临的独特挑战。这一动态发展模型为我们理解共同体建设的复杂性和阶段性提供了宝贵框架，其中蕴含的智慧对当代社会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一）初九“同人于门”：共同体的初始构建

初九爻辞“同人于门，无咎”揭示了共同体建设的起点。“门”作为内与外之间的界限，象征着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过渡，提示共同体构建可以从身边人开始，逐步向外扩展。这种基于地缘亲近性的初步联合，符合人类情感发展的自然规律，也体现了共同体建设的渐进性特征。

“同人于门”可以理解为基于社区、职场场所或共同兴趣的初级共同体建设，其具有面对面互动的优势，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直接交往建立信任，形成互助网络。这种初级群体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通向更广阔共同体的起点，是更大范围社会整合的基础。

初同于门，即欲咎之，又谁得而咎之。

所同者广，而无偏党之私，又谁有咎我者？（《周易集注》，第194页）

初九作为阳爻居阳位，且与九四无应，表明在这一阶段，共同体建设主要依靠主体的积极主动，而非依赖外部支持。这提示我们，共同体构建的初始动力往往来自内部成员的自觉努力，而非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同时，由于初九位置较低，也提示在共同体建设初期应当保持谦逊、审慎的态度，避免过于激进的发展策略。

（二）六二“同人于宗”与九三“伏戎于莽”：共同体建设的内部挑战

六二爻辞“同人于宗，吝”揭示了共同体建设中最常见的陷阱——狭隘的宗派主义。六二作为全卦唯一的阴爻，本是五阳共同亲近的对象，但如果只与相应的九五联合，就会形成排他性的小团体，违背“大同”原则。现实社会中，从政治派系到学术门户，从商业集团到文化圈子，都可能陷入“同人于宗”的困境。

六二爻辞强调“吝”，即道路越走越窄，表明这种狭隘的共同体观念最终会导致发展受限。从历史经验看，那些固守小团体利益的共同体，无论初期如何强大，最终都难以适应环境变化而走向衰败。这与现代系统论中的封闭系统“熵增定律”不谋而合——不与外界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系统必然走向无序和解体。

阴欲同乎阳，所私在一人，可羞之道也。（《周易集注》，第195页）

九三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进一步展现了共同体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竞争态势。九三作为阳爻居阳位，且处于下卦之上，象征着刚强好斗、企图通过强力争取六二的支持。这种内部竞争如果失控，就会导致共同体分裂甚至瓦解。爻辞中“三岁不兴”的警示，表明这种内部冲突长期消耗共同体资源，会影响整个社会高效发展。

九三爻的困境提示，共同体建设需要建立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将内部竞争控制在建设性范围内，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处理冲突，将冲突转化为创新动力，这一点与《同人卦》的智慧高度一致。

“三岁不兴”者，以理与势俱屈，故不能行。盖“行”者即兴动而行也，“安”者，安于理势而不兴也，故曰“安行”。（《周易集注》，第195页）

（三）九四“乘其墉”与九五“同人”：共同体的转化与巩固

九四爻辞“乘其墉，弗克攻，吉”展示了共同体建设中的关键转化点。九四已进入上卦，地位较高，但因其以阳居阴位，刚而能柔，最终选择“弗克攻”，不采取攻击行动。这种自我克制对于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它避免了内部矛盾的激化，为更高层次的整合创造了条件。

真正的共同体不能依靠暴力或强制手段建立，而必须基于成员的自愿参与和真诚认同；而基于文化认同和共同利益形成的共同体，即使结构松散，也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一点对共同体的构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四刚强，本欲攻二，然其志柔，又思二乃五之正应，义不可攻。攻欲不可攻，二者交战，往来于此心，故曰“困”。若知其不可攻，则此心不困矣。言“乘其墉”矣，岂其力之不足哉？特以义不可同，故“弗克攻”耳。其“吉”者，则因困于心，而反于义理之法也。因困则改过矣，故“吉”。“义弗克”，正理也。“因而反则”，九四功夫也。（《周易集注》，第195页）

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代表共同体经过磨难后达到的和谐状态。九五作为全卦尊位，与六二正应，本应顺利结合，但由于九三、九四的阻隔，需要经历“先号咷”的过程，最终通过“大师克”即集体努力才能“相遇”。这一过程生动表明，真正稳固的共同体不是掩盖矛盾，而是通过直面并解决矛盾而形成的。

九五爻的“后笑”象征着共同体成员在经历冲突后达到的更深层次理解与更强凝聚力，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创伤后成长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共同经历并克服危机往往能够强化群体纽带。这一点在抗击自然灾害、应对社会危机等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那些共同渡过难关的社区或其他共同体通常展现出更加牢固的团结。

九五所以“先号咷”者，以中正相应，必欲同之也。（《周易集注》，第197页）

（四）上九“同人于郊”：共同体的边界与弹性

上九爻辞“同人于郊，无悔”呈现出一种不同于理想状态而现实可行的共同体模式。上九处于卦之极位，已远离中心，只能实现“于郊”程度的联合。这提示我们，在共同体建设中，并非所有成员都能达到同样紧密的联系程度，允许存在不同层次的参与度，是保持共同体弹性与包容性的重要策略；正像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对于“差序格局”的包容，“我们的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⑥

从现实角度看，“同人于郊”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松散耦合的共同体形式，如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合作组织、论坛和联盟。这些组织不一定要求成员放弃自身特性或完全服从统一指挥，而是通过寻求有限领域的合作，逐步建立信任，为更深层次的整合创造条件。这种渐进式、多层次的共同体构建策略，在复杂多元的当代社会中尤为可行。

无人可同，则不能通天下之志矣。“志未得”，正与通天下之志相反。（《周易集注》，第197页）

上九爻辞“无悔”，表明这种有限联合虽然未达理想，但同样具有价值。这体现了《同人卦》思想的现实主义维度——在坚持“大同”理想的同时，也承认并肯定阶段性成果的意义。对于当代共同体建设者而言，这提示我们既要有终极关怀，也要有耐心和智慧，认可并珍惜每一个进步。

四、“类族辨物”与“和而不同”：共同体的存异智慧

《周易·同人·象传》提出“君子以类族辨物”的原则，深刻揭示了共同体建设中的差异处理智慧。这一思想与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理念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对于多样性共存的独特思考，为当代共同体社会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类族辨物”的辩证思维

“类族辨物”包含两个辩证统一的环节：“类族”即根据事物的共性进行归类，“辨物”即根据事物的个性加以区分。这一原则表明，真正的共同体建设不是要求“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统一；不是强制同化，而是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交流。这种思维既不同于强调绝对统一同质化的思维，也不同于强调绝对差异的分裂化思维，而是追求“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辩证统一。

^⑥费孝通著，《乡土中国》，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第41页。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类族辨物”提示:共同体建设应当尊重不同群体的文化身份和政治权利。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实践表明,那些承认并保障少数群体文化和权利的国家,往往比推行强制同化政策的国家更具凝聚力;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多样性空间,不仅不会削弱国家认同,反而能够强化公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

从组织管理视角看,“类族辨物”启示:有效的共同体应当建立多层次认同结构,允许成员在不同情境下激活并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拥有多重群体认同的个体通常更具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能力;成功的共同体建设不是要求成员放弃原有身份,而是帮助他们在不同认同之间建立连接,形成更为包容的复合身份。

(二) 求同存异的实践智慧

《周易·同人·彖传》提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的原则,强调通过文明、刚健、中正的方式实现和同,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实践智慧。其中“文明”代表以文德教化而非暴力强制实现整合;“刚健”代表坚持不懈但又不失灵活性的努力;“中正”代表公正持平、不偏不倚的立场。三者共同构成了求同存异的方法论基础。

在实际操作中,“求同存异”首先要求发现和扩大共同利益。《同人卦》六二爻作为全卦核心,提示有效的共同体需要明确的共同利益基础。这种共同利益可能是经济互补、安全保障、文化繁荣或价值实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提供现实动力。阐释国际或区域一体化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从具体领域的技术合作入手,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一体化,正是求同存异智慧的现代应用。

其次,“求同存异”需要建立有效的差异管理机制。《同人卦》中九三、九四的冲突态势提示,共同体内部差异可能演变为公开冲突,需要相应的预防和调解机制。现代组织实践表明,成功的多样性管理需要包括对话平台、协商程序、妥协机制和争端解决在内的制度安排,使差异能够以建设性方式表达和协调。

最后,“求同存异”依赖于培养成员的共同体伦理。《同人卦》强调“君子正也”,表明共同体的维持最终有赖于成员的道德素养。这种伦理包括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善于妥协、遵守承诺等品质,它们构成共同体得以运行的软性规范。现代社会发展实践充分证明,“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共同体往往更具凝聚力和创新力,而其核心正是这些促进合作的伦理规范。

(三) “和而不同”的现代意义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进的当代世界,“和而不同”的智慧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随着人口流动加速、文化交流频繁、社会结构多元化,几乎所有现代社会都面临如何整合差异的挑战。《同人卦》提供的不是消除差异的统一模式,而是差异共存的和谐理想,这为思考当代多元文化社会提供了替代性思路。

在政治领域,“和而不同”启示我们应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政治整合道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元一体”理念到中国的“一国两制”实践,当代政治实践正在探索各种尊重差异的整合模式。这些在复杂现实中平衡统一与多样性的努力,正是“和而不同”理念在政治领域的生动展示。

在经济领域,“和而不同”提示我们可以探索超越纯粹竞争模式的新型合作形态。现代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产业集群内的协作网络、国际经贸中的互利合作,都体现了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寻求协同效应的智慧。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关系,正是“和而不同”理念在经济领域的生动体现。

在文化领域,“和而不同”为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它既不赞成文化孤立主义,也不追求文化同质化,而是倡导不同群体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开展平等对话,通过相互学习丰富人类文明图景。这种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正是“和而不同”理念在处理不同民族和国家关系的生动实践。

五、“人心聚合”与“财富共创”:共同体的良性循环

来知德认为,《同人》的综卦是《大有》卦,其在《周易集注》中指出:“《序卦传》言‘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所以次同人。”(《周易集注》,第197页)^⑦

《同人》《大有》两卦卦象上下颠倒(《同人》下离上乾,《大有》下乾上离),体现了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

^⑦[明]来知德撰,《周易集注》,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

系。来知德认为,《同人》象征“与人和同”,《大有》则代表“万物归附”,二者通过爻位互换(六二与九五换位)相互转化,体现出“和同即能大有、大有促进和同”的辩证逻辑。“和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前提,而“大有”则是“和同”的必然结果,又能反哺“和同”,二者相辅相成、良性循环,形成“和同—大有—更广泛和同”的螺旋式上升;“和同”并非简单的趋同,而是通过“错综其变”实现阴阳调和、万物共生。

这一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智慧;《周易·序卦传》也阐释“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⑧,即“和同”能够凝聚力量,进而实现“大有”强调团结协作是实现富足的基础,与来知德的综卦论断相互印证。

来知德的这一论断,既是对《周易》象数哲学的创造性诠释,也为解决当代社会矛盾提供了文化资源,并广泛体现于社会发展的诸多场景;在老龄化加剧的社会压力下,政府间基于养老的协作是必然的也是切合实际的,而政府各部门间的“协同”是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相融合达成“善治”的核心思维模式;同样,行业组织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助力小微企业克服困难,体现“和同”的凝聚力;同样,中医文化传承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使命,通过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实现“大有”,进而推动文化“和同”,等等。

参考文献:

- [1][明]来知德著.周易集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2][宋]程颐著.周易程氏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4]黄寿祺、张善文著.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5]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6]丁惠炯.政府合作战略框架下的社区养老体系构建——基于公共管理视角[J].改革与开放,2019,(01):80-83+87.

The Implication of Community Thought in Hexagram Tongren of Changes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i Zhide's detailed commentary of the hexagram TongRen

Hui-Jiong D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Guangxi, China, 543000)

Abstract: The hexagram TongRe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systematically embodies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ancient community-building. The hexagram image "Heaven and fire form the Tongren hexagram" reveals a model of constructing communities through harmonious unity by structuring its five yang and one yin lines, with its core proposition "Coexists with others in the wilderness" advocating for open communities transcending clan boundaries. The complete sequence of the six line texts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dynamic process from initial construction to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eventual stabilization. The principle of "Distinguish the types and situations of things" (differentiation of clans and identification of objects) demonstrates dialectical thinking that seeks unity amidst differenc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wisdom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in community coexistence. This ideological system engages in dialogue with modern concepts of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hrough the ideal of "The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offering Eastern wisdom that transcends the Western "Contractual community" model for global governance. It explores how Zhouyi philosophy inspires modern social organization theories and innovations in global governance paradigms.

Keywords: Hexagram Tongren ; Community thought;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⑧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0页。

试论成化年间的杨晔案

刘光昕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成化十三年, 明宪宗设西厂, 以汪直督领。杨晔, 故少师杨荣之曾孙, 与其父杨泰暴横乡里, 戕害人命, 十余年皆得官府庇护。成化十三年, 福建按察副使冯俊奏劾, 宪宗震怒。杨晔为营救杨家, 逃匿京师, 与亲戚贿赂内外。汪直得知此事后抓捕涉案人员, 以酷刑治狱, 终致杨晔父子身亡, 家产抄没。杨晔案交织地方势力、官僚庇护与宦官权力, 反映出成化朝的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 为理解明代宦官专权及皇权作用提供了关键视角。

关键词: 明代; 宦官; 汪直; 西厂; 杨晔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8

明代的宦官专权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 明朝建立之初, 朱元璋对宦官防范极严。但随着皇位更迭, 皇帝日益昏庸, 便不能有效控制宦官, 最终酿成宦官专权之祸。《明史·宦官传》:“明太祖既定江左, 鉴前代之失……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预者斩。’”可见上述观点大抵来源于正史。这种观点往往把皇帝昏庸视为宦官专权的原因, 本身蕴含着把明君-昏君、君子-小人、大臣-宦官对立起来的道德预设, 从而忽视了皇帝在宦官专权中的真正作用。胡丹在《明代宦官制度研究》中考得, 至少在内臣刺事的问题上, 宦官干预政治的现象恰恰始于朱元璋时期。靖难之役后, 朱棣设立东厂, 任用宦官督领官校缉事, 锦衣卫亦受制于宦官。我们会注意到, 宦权作为皇权的延伸, 是皇帝有意使之扩张的。那么, 宦官专权的问题, 就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皇帝昏庸的结果。

明代的厂卫制度是宦官专权的制度基础之一。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对该问题的研究影响深远, 方志远的《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和胡丹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对厂卫干预司法有相当多的探究。方志远就指出, 宦官代表皇帝参与司法, 体现了明代国家权力运行中“以内制外”的原则。由此可见, 皇帝任用宦官掌管厂卫, 有借内臣制约外臣, 借厂卫制约三法司之意。成化年间, 明宪宗设立西厂, 以太监汪直督之。汪直初掌西厂便兴办大案, 治杨晔之狱。杨晔案本为地方案件, 但因牵涉多方利益且影响恶劣而上升至朝堂, 卷入政治斗争之中。该案件比较典型地展现了宦官如何干预司法, 且关系到西厂废立之争。笔者认为, 通过梳理该案件的始末,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成化朝的政局, 宦官专权的原因, 以及皇帝在其中的作用。

一、杨晔案的起因

杨晔, 或称杨业、杨毕, 其名在不同史料中写法不同。《明史》中作“晔”, 《明史纪事本末》中作“业”, 《弇山堂别集》中作“毕”, 根据不同史料中对其人其事的记载, 可以确认为同一人, 大抵乃抄写之讹误。为叙事方便, 笔者后文将采取《明史》中“杨晔”的写法。

杨晔是福建建宁卫指挥使, 故少师杨荣之曾孙, 《皇明资治通纪》载杨晔为东阳少师之曾孙, 可知东阳少师即杨荣。杨晔之父杨泰, 乃致仕指挥同知, 其所管卫所史无明言, 但可以推断为建宁卫。杨泰之父情况不详, 史无明言。杨晔之曾祖杨荣, 字勉仁, 建安人, 于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四朝为内阁大学士, 英宗时升任少师。查《明史·地理志》, “建宁府, 洪武元年为府。领县八。四年正月置建宁都卫于此。”建宁府领建安、瓯宁、建阳等县城。由此可知, 杨家至少自杨荣开始, 在建安县乃至建宁府都颇具影响力。根据梁志胜的《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明代文武大臣如立有重大军功, 可以荫子为卫所武官。杨荣以武略见称, 多次辅佐皇帝作战。由此, 笔者认为杨荣之孙杨泰、曾孙杨晔担任卫所武官, 大抵受杨荣荫庇。杨家不仅在地方政治有影响力, 在京师也有一定的关系, 杨晔的姊夫董璵担任中书舍人, 叔父杨仕伟担任兵部主事。此外, 据《明史》记载, 杨

作者简介: 刘光昕(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通讯作者: 刘光昕

家“家富”。总的来说，杨家显赫四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具有相当的优势。然而，杨家即将因杨晔而遭到重创。

关于杨晔的行径，不同史料的记载各不相同。《明史》只是记载杨晔“与父泰为仇家所告，逃入京”，但没有说明杨晔到底做了什么。《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杨晔“居乡逃罪入京师”，但没有明言杨晔犯了什么罪。《皇明资治通纪》则记载杨晔“殴死人命”，但没有写明杨晔杀了几个人。《国朝献征录》更进一步，记载杨晔“殴死一男子”。不同的史料在叙事上各有取舍，也体现史家的价值取向。但关于杨晔的具体行径，上述史料的记载既不充分，也不明确。相比之下，《明实录》、《广西通志》和《万姓统谱》的记载较为可取：

福建建宁卫指挥同知杨晔，……与其父致仕指挥同知泰暴横乡里，戕害人命，为仇家所奏。

本朝右副都御史冯俊墓在九龙山北麓，御赐墓祭……建宁卫指挥杨晔者，利军□民，□资钜万，以私憾杀数十人。晔本东杨学士之□，闽中上官多庇之，负冤者无所控诉，十余年矣。公□其也，人见公行事风烈，乃诉之公，自鞫问，旬日狱具疏上其事。

冯俊，字士彦，宜山人，天顺庚辰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折狱，以仁恕闻。成化己未擢福建按察副使，建宁卫指挥杨晔者，席势资以私憾杀数十人，有惧其箠楚而诈死入棺以苟活一时者，毕知其状，即令举火焚之。闽之上官以毕东阳学士孙多庇之，负冤者咸饮恨无所控诉。俊临其地，亲自询问，旬日狱具疏上其事。

由上述史料可知，杨晔与其父杨泰，而不是杨晔一人，都凭借杨家在地方的权势暴横乡里，戕害人命。杨晔杀人也不是只杀一人，而是杀数十人，并不如《国朝献征录》记载只“殴死一男子”，否则《明实录》不必用“暴横乡里，戕害人命”的字眼描述此事。杨晔杀人的具体行径，《万姓统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虽不足以全部采信，但仍然可见杨晔凭杨家权势欺压百姓的嘴脸。杨家因故少师杨荣的荫庇，在地方和京师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且杨家“家资钜万”，足以打点上下以脱罪。因此，闽中上官多庇护杨家，被欺压的百姓即使有冤也无处控诉。这样的情况居然持续了十多年，那么杨家与其他家族结仇，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成化十一年，冯俊擢福建按察副使，负责监察福建。冯俊“天性刚毅，遇事敢为，精敏绝人”“以仁恕闻”。因此，“人见公行事风烈，乃诉之公”。冯俊亲自审问，并将此事上奏朝廷。宪宗闻之震怒，“命刑部主事王应奎、锦衣卫百户高崇往勘”。然而，在勘提官到达杨晔家乡前，杨晔便逃匿至京师，藏在其娣夫中书舍人董璵家中，并试图通过锦衣卫百户韦瑛营解。而后韦瑛将此事报告给汪直，汪直以西厂治杨晔之狱。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杨晔案的起因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家在地方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杨荣乃四朝老臣、士大夫之领袖，门生故吏遍天下，极受尊敬。不论杨晔还是杨泰，作为杨荣的后裔，官员对其终究有所顾忌，因此“闽之上官以毕东阳学士孙多庇之”。第二，杨晔、杨泰受杨荣荫庇，在建宁卫担任武官。这意味着杨晔、杨泰在地方官僚的圈子内，在地方政治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杨家在京师有亲戚担任官员。如杨晔的叔父杨仕伟担任兵部主事，娣夫董璵担任中书舍人。这意味着杨家在京师有一定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加强杨家在地方的权势。第四，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杨家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疏通上下，杨晔、杨泰犯罪十余年，福建地方官僚不为所动，恐怕就有这层原因。

其次，杨家在地方的优势地位，并没有用于造福地方而用于欺压百姓。这反映了明朝中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危及了王朝统治。第一，杨家“暴横乡里，戕害人命”，平民百姓控诉无果，官府十余年不能解决，民怨不断积累，不利于官府统治。第二，杨家犯罪，官府十余年不报。而朝廷派刑部、锦衣卫官员往福建勘提，杨晔竟有所闻而逃匿京师。可见官官相护，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已被严重腐蚀。第三，杨家只是个案，除杨家以外，类似情况恐怕不少，积累下来对基层社会和朝廷都不利。

最后，正因为杨晔犯罪的事情反映了明中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危及了王朝统治，该案件才有上升至朝堂、卷入政治斗争的可能。冯俊将此事上奏朝廷后，宪宗闻之震怒，可见皇帝对此事的重视。然而，官官相护导致司法失灵，这至少已经十余年了。事发后，皇帝派遣刑部主事和锦衣卫百户勘提人犯，杨晔居然能逃窜到京师。杨晔藏匿到董璵家后，董璵便联系锦衣卫营解，可见这种门路久已有之。因此，试图解决这种社会矛盾，其阻力必然是巨大的。对于皇帝而言，既然三法司、锦衣卫等既有的法律、监察机构都难以信任，那么借助编外的、非正式的人员或机构以解决问题，就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二、汪直治杨晔之狱

汪直是广西大藤峡的瑶族人。成化元年，明朝廷成功镇压大藤峡的瑶族叛军，汪直作为叛乱瑶民的后代，因年幼被净身送入皇宫。《罪惟录》记载，汪直最初以昭德宫内使服侍宪宗皇帝的宠妃万贵妃，因“年小便黠”深受

万贵妃宠幸。据《广西通志》和《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汪直累权至司设监太监，因“年少黠谄”得以侍奉宪宗皇帝左右，并深受皇帝宠幸。汪直不到二十岁，便升任御马监太监，而御马监是宦官机构中仅次于司礼监的重要衙门，可见皇帝对汪直的器重。

汪直年仅几岁便净身送入宫中抚养，侍奉宪宗皇帝和万贵妃，某种意义上说，汪直是宪宗皇帝和万贵妃看着长大的。联想到皇帝此时膝下无子，我们或许可以知晓汪直受宠的另一个原因。而汪直不到二十岁便掌管御马监，这不仅说明皇帝的宠幸，还说明汪直至少有一定的能力。对于皇帝而言，汪直在宫中甚至是在皇帝、贵妃身边长大，而且有一定的能力，是值得信任的，或许可以委任做事。

成化十二年，妖人李子龙以左道蛊惑内使鲍石、郑忠，以符术勾结太监韦舍，借以私入大内，至万岁山观望，欲谋不轨。事发后，李子龙伏诛。该事件对宪宗皇帝的影响较大，很可能增加了皇帝的疑心，自此欲知外事。于是，皇帝委任汪直更换服装，率领几名校尉秘密外出侦察，而外人对此一无所知。成化十三年正月，可能是因为汪直刺事有所成效，宪宗皇帝决定扩大刺事规模，选拔善于刺事的锦衣卫官校百余人，于灵济宫前设立西厂，并命汪直统领西厂，“纵之出入，分命各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俚谚悉采以闻”。李子龙事件可能使宪宗皇帝对既有的司法、监察机构感到失望，于是皇帝设立新的缉查机构，任用年轻而又缺乏政治经验的汪直，借以突破现行体制的约束，从而加强皇帝对外事的了解。而杨晔案就是西厂成立之初经办的一个大案。

成化十三年二月，杨晔逃匿到京师后，藏在娣夫中书舍人董璵家中。为营救杨晔一家，董璵到锦衣卫百户韦瑛家中请求帮忙。韦瑛正想要为汪直刺事而没有理由，于是表面上答应董璵，私底下派人报告汪直说，杨晔“东阳少师之曾孙，家资钜万，造恶百端，尝纳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挟黄白数千两，来京贿求内外，将欲招纳亡命，下海谋不轨”。汪直闻之大喜。韦瑛所言大抵属实，但杨晔“将欲招纳亡命，下海谋不轨”的说法未必可信，这可能是韦瑛希图上进而添油加醋的说辞。但对于刚刚统领西厂一月的汪直而言，杨晔案是他立威的机会。于是汪直立即派遣官校前往韦瑛家中捉捕杨晔、董璵，并对其进行严刑逼供。很快，杨晔的叔父杨仕伟牵连其中，被捕入狱，其家惨遭抄掠。《睿斋琐缀录》记载了西厂办案的细节：

时福建都指挥杨晔以殴死人命，蒙差刑部锦衣官勘提。晔逃匿京师其娣夫董中书璵家。董托锦衣百户韦瑛营救，适英正欲汪刺事而无由，即潜报汪谓晔东阳少师之曾孙，家资钜万，造恶百端，尝纳生人于棺，合置诸火。今事露，乃挟黄白数千两来京，贿求内外，将欲招纳亡命，下海谋不轨。汪甚喜，昏夜驰至韦家酣饮，发官校掩捕晔等，就韦舍，鞠之。发厂监禁搜得一单，拟送各当道土宜，商阁老及三法司堂上与司礼黄陈二太监，皆与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挟黄白，晔、璵备尝刑具，如所谓琶者，锦衣极酷之刑，每上琶遍身骨节俱离，寸许汗下如雨，几死复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武选主事仕伟所，遽令数校径往兵部，猝缚而来，拷掠如晔。又令当驾力士数十人，围守仕伟等。方黎明，数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门，妻仓皇揽衣起，及四五妾婢并获至厂。汪累加讯责，仍命押回追搜，囊篋倾罄。绑笞敲拶，昼夜苦楚，责追不已，哀号彻天，过者流涕。时成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汪直治狱之手段不可谓不狠毒，这是不言自明的。但办案过程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汪直派官校抓捕杨晔、董璵时，搜得一份清单。清单上列举了杨晔、董璵贿赂的详情。根据清单的记载，内阁大学士商辂、三法司的堂上诸官以及司礼监的黄赐、陈祖生都是杨晔、董璵的贿赂对象。考虑到这份清单可能是西厂对杨晔、董璵以及上述受贿人员的栽赃，又考虑到汪直有可能伪造一份牵涉过广的清单挟私报复、扩大政治影响，我们应当审慎地看待这份清单。

那么，杨晔、董璵是否贿赂过清单所列人群呢？笔者首先推断，三法司堂上诸官大概率是杨晔、董璵的贿赂对象，毕竟三法司直接关系到杨晔案的审判。其次，根据《弇山堂别集》记载，太监怀恩向大学士商辂传达宪宗皇帝决定废除西厂的旨意后，“辂等皆顿首谢。恩曰：‘先生不知，吾辈数人者，已箝其口。’问为谁？曰：‘黄赐、陈祖生也，皆阉在东华门外，不容进见矣。’汪直谤其福建人，与杨晔善，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根据《西园闻见录》，西厂废除后，“直泣言于上曰：‘此非出忠意，乃司礼黄赐、陈祖与奴隙，嗾忠使为也。’遂出赐祖于南京。”由此可知汪直与黄赐、陈祖生有矛盾，那么清单上列有黄赐、陈祖生，就很可能是汪直对黄陈二人的陷害。最后，商辂是否收到过贿赂，这一点《睿斋琐缀录》有着颇为微妙的记载：

是日，司礼太监到内阁议他事，商因白：“璵尝为晔通送金带一腰，即峻斥之，不容入门，且辂纵贪滥，岂忍受前辈先生家物乎？”语得转达，有旨安慰。然同僚刘叔温又秉此挤排，商亦危矣。

杨仕伟被抄家当天，商辂趁司礼监与内阁议事之际为自己辩白，表示自己没有收受杨晔、董璵的贿赂，还说自己纵使贪婪，也不忍接受故内阁大学士杨荣家的财物。商辂辩白后，皇帝降旨安慰，但这无疑说明，商辂是杨晔、董璵的贿赂对象。而像“金带”这样的贿物，则证明韦瑛所说的“今事露，乃挟黄白数千两，来京贿求内外”实非虚言。此外，商辂作为杨晔、董璵的贿赂对象，也变相说明汪直搜得的清单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汪直根据这份清单用酷刑逼迫杨晔、董璵供出杨仕伟，并对杨仕伟家大加抄掠以追查赃款。我们并不清楚清单上是否记载了贿赂的数额，但我们可以设想，汪直及其麾下的韦瑛等官校，很可能为了搜掠财富而妄报赃款数额。应该说，西厂残忍的手段以及宦官、官校的贪婪，最终导致了杨仕伟家的惨剧，以至“昼夜苦楚，责迫不已，哀号彻天，过者流涕”。此后的事情，尹直在《謏斋琐录》中亦有记载：

越三日，晔死于厂中。汪召御史相验，到迟罚跪数刻乃释。而司礼诸太监亦畏汪诋毁避嫌，莫敢呶舌。遂遣钱太监同英飏驰往闽。时勘提官已械晔父致仕指挥泰等北来。英途中辄具本递奏勘提官受贿回互，俱坐谪罢。及至晔家，尽没资财人口，起京往还，所过鸱张虎噬，有司贿赂狼藉，送迎旁午。又搜得晔每岁贿结巡按御史及在京当道簿籍，扬言面奏，闻者心惊魄丧。及抵京，英以赃败，戍边，簿亦莫达，人通快之。泰死于狱，人口悉发宁，家惟二女妇，以逃归外家，续获解至，乃发浣衣局。

杨晔在严刑拷打下死亡，董璵、杨仕伟则根据《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在狱中惨遭酷刑，濒临死亡，又根据《明史》的说法，杨仕伟等人均遭贬谪，看来最终是活了下来。杨晔死后，汪直召御史查验，并借机耀武扬威。随后，汪直派遣钱太监钱能与韦瑛一同驰往福建。根据尹直的说法，最早派去的勘提官已经抓获杨晔之父杨泰，正在北来的路上。韦瑛不知是何原因，奏参勘提官受贿为杨家回护，致使勘提官横遭贬谪。钱能、韦瑛到达福建杨家后，“尽没资财人口”。回京途中，韦瑛狐假虎威，受沿途官府的殷勤相待，以致“贿赂狼藉”。根据尹直的记载，韦瑛还搜得杨家每年贿赂巡按御史及京城当道官员的清单簿册，还在回京途中扬言面奏。不过韦瑛回京后，西厂已在商辂的强烈要求下废除，再加上韦瑛赴福建办案期间贪赃枉法，皇帝“召怀恩数直罪责之，谪韦瑛戍宣府”。因此，韦瑛在杨家搜得的清单簿册就未能到达京城。杨泰被押送京城后死于狱中，杨家的人口基本上都惨遭发配。

三、关于杨晔案的分析

以上，我们完成了对汪直治杨晔之狱经过的梳理。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首先，皇帝为何要用汪直？其次，汪直治杨晔之狱是否完全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汪直治杨晔之狱造成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首先，关于皇帝为何要用汪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确皇帝试图做什么。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借杨晔案的起因说明了成化年间的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在下积累民怨，在上侵蚀官僚体系，严重危及了王朝统治，本质上于皇帝不利。正因为如此，冯俊奏报杨晔案时，宪宗闻之震怒。但是，为了缓和这种社会矛盾，对下还百姓以正义，对上整顿官僚机构，宪宗皇帝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杨晔案的若干细节已经说明，既有的官僚体系难以信任，况且妖人李子龙事件还增添了皇帝的疑心。久居深宫的皇帝接触的人群较少，除官僚体系的大臣外，宫中的太监是皇帝接触较多的群体。与官僚体系的大臣和部分出身宫外的太监相比，反而是自小在宫中长大，在宪宗身边，且有一定能力的汪直，对于宪宗而言显得更值得信任。更重要的是，汪直以及随后成立的西厂，都在旧有的官僚体系之外，与既得利益群体无涉，因此更可能敢想敢干，突破重重利益结构，解决皇帝试图处理的问题。此外，不论是汪直还是西厂官校，他们都急于立功以树威信，因此往往办事操切，突破现行制度的约束，放手大干，这可能也是皇帝看重汪直、设立西厂的原因。

其次，笔者认为汪直治杨晔之狱，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积极与否是相对而言。对于在福建建宁卫受杨家欺压的百姓，汪直在京师制造的惨剧是无关自身的，朝堂上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亦是如此，杨晔、杨毕被杀、杨家被抄没是否合乎法定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积累的怨气得到了释放，心目中的正义得到了伸张，尽管汪直、韦瑛对杨家的所作所为既不合规，也未必出于公心。而且，此案影响的不仅仅是福建建宁卫一地，全国各地像杨家这样暴横乡里的宦官家族未必是少数，杨晔案对这些家族能够起到短暂的警示作用。对皇帝而言，汪直治杨晔之狱震慑了那些曾收受贿赂的大臣。汪直和韦瑛搜查到的清单起到了警示群臣的作用，尤其是韦瑛在福建杨家搜得的“晔每岁贿结巡按御史及在京当道簿籍”，当韦瑛扬言面奏，《謏斋琐录》记载“闻者心惊魄丧”，《广西通志》则记载“士夫无不丧气”。应该说，皇帝借助汪直、韦瑛以及西厂，成功地敲打了群臣，短期内能在一定程度上整顿官僚体系。而且，杨晔案结案后，西厂权势的扩张，本质上是皇权的扩张。

最后，皇帝任用汪直治杨晔之狱，纵使能够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长远来看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汪直是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的酷烈手段治杨晔之狱的，而不是用公正的方式来解决杨晔案的。一方面，这是一次特事特办，并没有真正地解决社会矛盾，地方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或程序以防止像杨家这样的宦官家庭欺压百姓；另一方面，西厂打倒杨家，本质上是解决一个问题，新增一个问题，地方的宦官家庭很快会发现，贪婪残暴的宦官可能是更好的贿赂对象。韦瑛从福建返京期间，“所过鸱张虎噬，有司贿赂狼藉，送迎旁午”，就是明证。同样的道理，官僚体系的整顿也只是短暂的，作为外部力量的汪直与西厂，对官僚体系起到的更多是冲击和破坏作用，官僚体系内部并没有实质改进。相反，汪直治杨晔之狱是典型的宦官干预司法的案例，对国家的司法运行影响负面。杨晔纵使罪不容赦，也应当经三法司判决死刑，而不应该因严刑拷打而死。西厂从正规司法机构

中夺走的权力，本质上增加了司法的不可控。此外，汪直治杨晔之狱牵涉过广，多方结怨。汪直和韦瑛搜得的清单，直接牵连了官僚体系的一大片，并引起了涉事官员乃至士大夫群体的恐慌与不满，这是不利于政局稳定的。西厂对杨晔、董璚、杨仕伟的缉捕、拷问和抄家更是影响恶劣，以至于见者流涕。此外，杨晔案后，西厂权势骤然提高，破坏了政治平衡。西厂“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这也为西厂废立之争埋下了伏笔。

四、余论

汪直治杨晔之狱期间，搜查得到的杨家记录贿赂详情的清单牵涉过广，涉事官员皆惴惴不安，士大夫无不丧气。而西厂的权势也在杨晔案后骤然提高，更使群臣及士大夫感到不嘛。应该说，士大夫对汪直这种宦官或者说小人的仇视与怨恨，直到明朝灭亡后依旧延续了下来。《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时汪直开西厂，罗织数起大狱，臣民悚怵。”谷应泰对汪直和西厂的态度，详见他在《汪直用事》卷末的评述：

谷应泰曰：有明百余载，海内义安，朝野蒙业，太阿潜移，刑人执柄，中官之祸屡作。至宪宗命汪直设西厂，喟然废书叹曰：嗟呼！法之凉也，国制乱矣……乃欲刺事暮夜，诋人床第，方言巷语，竟入宸聪；瓜蔓枝连，立成大狱。不知竹箒钩距，贤吏薄之，谓其行衰俗恶。况以万乘之尊，行攻讦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权近寺，招致奸民，显行系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将闻呼天。因而权归北寺，狱奏黄门，祸发清流，惨同白马……宪宗躬法桓、灵，养奸甫、节。卿贰大臣，直皆收问；局司近侍，直得更张。槛车逮治，南署空曹；缇骑行边，北门不守。明世中人，多窃宠灵，亦未有显挈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昔高皇帝罢锦衣卫狱，焚其械具，垂示子孙，刑人于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闼，委命奄壁也。西厂继罢，弊不复革，谨读直书，魏倾善类。至怀宗手平内乱，晚年东厂，罗捕无遗。商鞅治秦，道无偶语，元济窃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风，衰国乱亡之渐也。

在谷应泰眼中，汪直其人类似酷吏，其行坏国制而乱祖宗之法，其祸堪比商鞅治秦。而明宪宗更是如桓帝、灵帝一般的残暴君主，姑息养奸、打压大臣。而明宪宗用汪直刺事，致使“权归北寺，狱奏黄门，祸发清流，惨同白马”。谷应泰进而认为，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宦官专权，而明中期“亦未有显挈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所以明宪宗用汪直开启了祸端。我们能够看到谷应泰历史观念中，强烈的君子与小人之争，清流与浊流之辨，卿臣与宦寺之势不两立的思维方式。我们更能看到，士大夫对宦官专权的不满超越时间的。

《弇山堂别集》记载：“时太监汪直行事，官校势益横，公私骚扰，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惴惴不自安。”于是，以商辂为首的诸位大臣提议废除西厂。《明实录》记载了商辂上疏的全文，但限于篇幅不作引用。《明史纪事本末》有相对简略的记载，因此列叙如下：

大学士商辂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往者曹钦之反，皆遽果有以激之。一旦祸兴，卒难消弥。望陛下断自宸衷，革去西厂，罢汪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罪。”

奏疏上后，皇帝震怒，派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质询商辂等大臣，《弇山堂别集》记载了商辂等大臣面对怀恩时的争辩：

内阁大学士商辂、学士万安、刘翊、刘吉有言，上震怒，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至阁下，历色传旨，谓辂等曰：“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事？尔等遽如此说，是谁先主意？”辂等对曰：“汪直违祖宗法，坏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辂等同心一意为朝廷除害，无有先后。”恩曰：“不然，圣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笔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挟势害人，人人要说，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谁独为先？”翊奋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宫，迄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无事。今忽汪直为害，使远近不安，何忍坐视。某等誓不与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纵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贬黜谪罚，亦惟命耳，所不避也。”于是恩降辞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开具奏之由，今皆执论如此，当具实回话。倘上召问，幸勿变前言。”辂等曰：“唯。”

杨晔案后不久，内阁大学士便上疏请求奏罢西厂。西厂废立之争中，皇帝明显倾向于汪直，认为任用汪直能够缉访奸弊，反对废除西厂。商辂等大臣则认为汪直“违祖宗法，坏朝廷事，失天下人心”。此时商辂等大臣团结一致，皇帝也不好独断，因此在商辂等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宪宗宣布废除西厂。

但是，困扰着宪宗皇帝的疑心病仍未解除，皇帝仍然希望任用汪直为他做事。因此，尽管废除了西厂，宪宗仍信任汪直，调与汪直有矛盾的太监黄赐、陈祖生于南京司香，削职与汪直有矛盾的大臣项忠，为日后重建西厂埋下了伏笔。一个月不到，一位久久不得升迁的御史，知晓了皇帝的心理，上奏请求重开西厂。戴缙宣称：“未

闻大臣进何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闻群臣革何宿弊，进何谋猷，以匡治理。惟太监汪直缉捕杨暹、吴荣等之奸恶，高崇、王应奎等之赃贪。又如奏释冯徽等冤抑之军囚，禁里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者也。”于是，西厂恢复，宦官专权的局面得以继续。

参考文献：

- [1]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2] 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
- [3] 卫建林.明代宦官政治[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4] 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 [5] 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 [6]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 [7] 怀效锋.明代中叶的宦官与司法[J].中国社会科学,1985,(06):193-206.
- [8] 吴高庆.明代宦官特务司法初探[J].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01):37-41+44.
- [9] 何平.明朝大宦官汪直用事述评[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94-99.
- [10] 赵兴元.中国古代宦官是非论——以明代成化年间宦官活动为例[J].社会科学辑刊,1996,(04):91-96.
- [11] 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 [13]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 [14] 明宪宗实录[M].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版.
- [15] 陈建.皇明资治通纪[M].明末张名振评点本.
- [16] 梁胜志.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7] 嘉靖.广西通志[M].
- [18] 焦竑.国朝献征录[M].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 [19] 凌迪知.万姓统谱,钦定四库全书[M].浙江大学图书馆影印本,子部十一.
- [20] 陈建.明通纪法传全录[M].明崇祯九年刻本.
- [21] 查继佐.罪惟录[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 [22] 尹直.睿斋琐缀录[M].国朝典故本.
- [23] 张萱.西园闻见录[M].民国二十九年排印本.

A Discussion of the Yang Ye Case during the Chenghua Reign

Liu Guangxin

(Affili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Chenghua reign, Emperor Xian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Western Depot, appointing Wang Zhi to oversee it. Yang Ye, the great-grandson of the late Junior Preceptor Yang Rong, and his father, Yang Tai, had long tyrannized their hometown, even causing deaths. For over a decade, they enjoyed protection from local officials.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Chenghua reign, Feng Jun, the Surveillance Vice Commissioner of Fujian, impeached them, which enraged Emperor Xianzong. In an attempt to rescue the Yang family, Yang Ye fled to the capital and bribed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officials. Upon learning of this, Wang Zhi arrested those involved, used harsh interrogations, and ultimately led to the deaths of Yang Ye and his father, with their family properties confiscated. The Yang Ye case intertwined local power, bureaucratic protection, and eunuch authority,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social conflicts during the Chenghua reign. It provides a cruci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eunuch dominance and the role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Ming Dynasty; eunuch; Wang Zhi; Western Depot; Yang Ye

明清海防视野下胶东武术的“御侮”功能与社会角色研究

商昌敏

(烟台文化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 胶东半岛——如今的烟台、威海一带——在明清两代被誉为“京师左腋”，其海防地位之重，可谓“南卫江浙，北拱神京”。在这五百多年的海防建设过程中，胶东武术从来不只是肢体运动或体育技艺那么简单；它深深嵌入了军事防御、民间自卫乃至社会控制的肌理之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从明清海防的史实出发，结合胶东地区的卫所建制、绿营兵制以及社会组织的变迁，尝试探讨胶东武术在抵御倭寇、镇压海盗以及各类抗清斗争中所发挥的“御侮”实战功能。同时，我们也想理清它在官方军事体系中的转型轨迹、在民间团练里的普及方式，以及在秘密结社中可能发生的异化。研究表明，胶东武术其实是海防军事需求与胶东本地社会结构相互碰撞的产物；它的演变，折射出的正是这片土地从“军事边疆”逐渐转向“海疆社会”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胶东武术；明清海防；御侮功能；社会角色；军事体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7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扼守渤海咽喉，与辽东、朝鲜隔海相望，堪称拱卫京畿的海上屏障。明代“南倭北虏”的边防压力持续加大，胶东沿海更是倭患频仍；到了清代，尽管海疆统治趋于巩固，但海盗侵扰、内部动荡（比如各类反清活动）依旧不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胶东一带的军事防御体系——卫所、营寨、炮台、墩台等——与当地军民社会（军户屯驻、移民聚落、流动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动机制。胶东武术（螳螂拳、八极拳、地功拳等流派，也包括一些长拳类支系）正是在这个时期蓬勃生长起来；和内陆武术相比，它身上带着鲜明的海洋烙印与军事基因。本研究旨在说明：武术从来不只是个人修身养性的技击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往往直接呼应着社会结构与军事需求。这样的视角，或许不仅能填补胶东武术史研究的一些空白，也能让我们从“身体技术”这个微观层面，去窥探明清海防体系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眼下学界对胶东武术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梳理技术套路、考证传承谱系或者个别拳种的起源上，很少把它放到明清海防那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虽然也有学者讨论戚继光与武术的关系，但针对胶东这一特定区域，武术到底如何具体服务于海防？它在卫所军户制度向绿营兵制转变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些缝隙中做些探索，把武术史与军事社会史交织在一起，看看“身体技术”在国家海防体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明清胶东海防体系的构建与演变

（一）明代胶东海防：卫所制度与倭寇防御

明代在胶东沿海布置了密集的卫所网络，威海卫、成山卫等核心卫所构成了规模化的屯兵防御体系。按照当时的军制，每卫定额 5600 人，这些兵力分布在沿海各个要害地段。卫所制度下的军户身份世代相承，逐渐形成封闭的军事社区——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兵源的稳定，也强化了军队的组织战斗力。

胶东的海防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里说得明白：山东海防“惟在登、莱二郡”，而胶东正是登莱海防的核心承载区。明代这里不仅是抵御倭寇的前沿，也是海运漕粮的关键中转站，甚至还在万历朝鲜之役中承担后勤保障任务。换句话说，胶东海防的价值兼具防御与补给双重属性。

为了提升海防的协同能力，明代在胶东建立起“驿传—烽传”二元信息调度体系。驿传系统依靠驿站和急递铺，保证军政文书与命令的快速传递；烽传系统则以烟墩（烽火台）为核心，在成山头等重要地点形成预警网络，白天燃烟、夜间举火，执行标准化的警报机制。就这样，一张“水陆相维、军民联防”的立体防御网逐渐织就。

作者简介: 商昌敏(1996—)，男，讲师，研究方向为武术理论与方法

通讯作者: 商昌敏

（二）清代胶东海防：绿营兵制与体系转型

清代对明代的卫所制度进行了系统性裁撤，原有卫所或并入州县，或改编为绿营。顺治年间，莱州卫、登州卫等胶东核心卫所相继裁并，随后清廷设立了登州镇、文登营、宁福营等绿营建制。登州镇总兵成为胶东海防与陆防的最高指挥官，统辖水师营与陆路营，形成“镇—营”两级指挥体系。

清代胶东海防的策略发生了明显转变：重心从明代严格管控民间出海，转向抵御外侮和维护海疆秩序。随着火器技术的推广，防御逻辑也从单纯固守海岸线，朝着“水陆协同、攻防兼备”的复合模式演变。

雍正年间，清廷在胶东沿海要地——成山头、烟台山、威海卫等地——大规模修筑炮台。早期的炮台多为夯土或简易石砌，虽然形制简单，但已经具备炮位布置、弹药储存和兵力驻守的复合功能。这标志着胶东海防开始从冷兵器主导，朝着热兵器适配的方向转型，海防近代化的萌芽悄然露出。

二、“御侮”功能：胶东武术的军事化与实战化

（一）军事训练：卫所军户的武术传承与战术适配

明代中叶，山东地区常向江南输送“青齐长枪手”，这个背景也推动了胶东武术长器械技法的发展，比如杨家枪法在军旅中的本土化演变。针对倭寇擅长倭刀、身法灵活的特点，胶东卫所军队逐渐摸索出“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协同战术：长枪手列阵在前，构成防御屏障；刀牌手紧跟其后，专攻近身格斗，以此破解倭寇的贴身突袭。

登州水师作为海上力量，作战环境往往是狭窄颠簸的船舱——这种特殊空间直接催生了胶东短拳的刚猛特质。太极拳、太祖拳这些拳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寸劲爆发、马步沉稳、近身靠打”的核心技法。所谓“寸劲”，是为了适应狭小空间的发力限制；“沉稳步法”是为了应对船体摇晃；而“近身靠打”，则是在空间不足时依然能有效制敌。武术与水上作战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准的适配。

（二）抗击倭寇：实战场景中的武术经验积淀

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的重点虽在浙闽，但胶东作为海防预备基地与后勤枢纽，也频繁遭遇海盗与倭寇的袭扰。在这个过程中，胶东武术通过军户调动、军事交流等渠道，广泛吸收了浙闽地区的抗倭实战经验，完成了技法体系的实战化升级。

成山卫、威海卫等核心卫所的防御实践，让胶东武术呈现出鲜明的“守御导向”。守军善于利用山地隘口、海岸礁石等地形，把武术技法和伏击战术深度融合——在山地靠短打游击袭扰，在海岸借礁石构筑据点，以“封、拦、缠、抱”等手法应对倭刀劈砍，让地形优势与武术技法协同增效。

戚继光曾任登州总督，他的《纪效新书》强调“实用为本、摒弃花法”，这一理念对胶东军旅武术影响深远。他主张武术必须服务于实战，讲究“狠辣精准”，这直接推动胶东武术摆脱民间杂耍式的花架子，转向“朴实刚烈、直击要害”的风格。有意思的是，胶东代表性的螳螂拳，其起源传说就常与明末抗倭实践挂钩；它的核心技法“封、闭、闪、挪”，恰恰是针对倭刀劈砍逻辑而来的——用快速身法规避攻击，以短促手法实施反击，可说是抗倭实战经验的一种技法凝练。

（三）内部“御侮”：清代武术的反抗属性与治安功能延伸

进入清代，胶东武术的“御侮”功能显现出双重维度：一方面延续抵御外侮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因应时代变化，延伸到反抗清廷统治与维护地方治安的场域。

顺治至康熙年间，栖霞人于七（本名乐吾）领导的抗清起义，可谓胶东武术与反清斗争结合的典型案例。起义军以胶东锯齿牙山等复杂山地为依托，凭借民间武术团体的组织能力与山地作战经验，与清军周旋十余年。他们将民间武术中的山地奔袭、近身格斗、器械配合等技法全面用于游击作战，这说明当时的胶东民间武术已经具备成熟的军事组织属性，成了反抗统治压迫的重要工具。

于七起义失败后，清廷加强了对民间习武活动的管控，胶东武术的传承方式也随之转变：很多拳种从卫所教场、民间武馆的公开演练，转入家族内部或秘密结社的口传心授。一些武术团体甚至逐渐衍生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属性。这种地下化传承，不仅保证了拳种的延续，也为后来义和拳等民间武术组织在山东的兴起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随着海疆治安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合法化的民间武术团体也参与到巡逻海岸、打击海盗的活动中，让“御侮”功能悄悄延伸到了地方治安领域。

四、社会角色之一：军事体系中的武术

（一）武科举制度与绿营兵制的武术联动

清代沿用并完善了武科举制度，这套制度不仅为底层百姓开辟了一条军事晋升的通道，也通过标准化考核，推动了胶东武术的规范化与官方化传承，成为连接民间武术与国家军事体系的关键纽带。

胶东地区民风历来剽悍，尚武风气浓厚，武科举的推行正好契合了这一地方传统，也催生了不少武举人才。对军户后裔等底层群体来说，武科举成了他们突破身份限制、进入绿营等国家军事体系的重要途径——考取功名后，可直接授予绿营军职，从基层军官一步步晋升。这就形成了一条“民间习武—武举应试—绿营任职”的完整链条，进一步激发了地方的习武热情。

清代武科举的考核分“外场技能”与“内场策论”，其中外场技能直接对应军事实战需求，对胶东武术的技法发展影响很深。考核科目包括：弓术（马射、步射），要求精准命中移动或固定靶，促进了射箭技法的精细化；刀术，侧重重刀演练，讲究力量与技法的结合，推动了刀法的规范化；石锁（硬功），考核力量与体能，让石锁、打桩这类传统力量训练更加系统；马术，则要求在马背上完成射箭、挥刀等动作，强化了武术与马术的协同训练。这些标准化的考核，使得胶东武术逐渐摆脱民间自发演练的随意性，形成了一套贴近军事需求的规范体系。

在胶东绿营兵（如登州镇标兵、文登营兵）的日常训练里，尽管火器逐渐普及，但冷兵器格斗仍是重要考核内容。武科举的考核标准直接转化为绿营的训练规范，石锁硬功、桩功、长短器械技法等，都被纳入官方军事训练体系，成为士兵选拔与晋升的核心指标。尤其是登州镇作为海防中枢，其标兵训练更强调武术技法与海防作战的适配性，把长兵拒敌、短兵破袭等技法融入营伍操练，形成“训练—考核—晋升”的闭环，强化了武术在军事体系中的实用价值。

（二）水师与陆营的作战环境差异及武术风格分化

随着清代绿营兵制的完善，胶东武术在官方军事体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兵种分化——水师营与陆路营因作战环境、任务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武术技法体系。

陆路营主要负责驻守城池、隘口和内陆防线，作战环境以开阔平原、山地隘口为主，侧重集团阵战。因此，陆营武术风格突出“重集体、重防御、重长兵”：战术上强调纪律与协同，通过长枪阵、刀牌阵等阵型发挥集体威力；技法上以长兵（枪、矛、镗）和重兵器（大刀、狼牙棒）为主，注重力量与范围打击，旨在构建前沿防御屏障；训练则强化阵型演练与器械配合，淡化个人技法的花哨展示，一切朝着“稳、准、狠”的实战导向走。例如文登营，其武术训练就重点围绕山地隘口防御展开，把长枪拒敌与短兵护阵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合山地作战的阵战武术体系。

水师营的任务涵盖海上巡哨、炮台防守、剿捕海盗等，作战环境主要在两类场景：战船船舱（水兵）和沿海炮台（守兵）。特殊的空间催生了灵活、紧凑的武术风格。清代水师明确区分“水兵”与“守兵”，二者技法各有侧重：水兵常在船舱、甲板等狭窄颠簸处格斗，因此武术风格偏向“灵活紧凑、近身高效”，技法上多用钩、镰、短刀等便携器械，便于在狭小空间施展，也能破坏敌船；同时特别注重“抗眩晕格斗”训练，靠桩功稳固底盘，形成“小范围腾挪、短距离发力”的特点，以克服船体颠簸的影响。守兵则以炮台防御为主，需要兼顾远程火器配合与近距离防御，因此武术风格呈现“攻防兼备、长短结合”的特征：远程配合火炮，近战则以短刀、盾牌为核心，应对敌方登岸突袭。登州水师的船战武术，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发展起来的，成为胶东武术中极具海洋特色的一支。

五、社会角色之二：民间组织与自卫

（一）村落自卫：团练组织、乡约体系与地方防御实践

明清时期，胶东海防的官方力量主要集中于城镇要塞和核心卫所营汛，广大沿海村落处于防御末梢，驻军稀少，常受海盗、土匪侵扰。这种防御空缺，催生了民间自卫体系，其中团练组织与乡约制度的结合，成为胶东村落自卫的核心模式，而武术则是这一体系的技能支撑和精神纽带。

胶东沿海村落多依宗族聚居，形成“乡绅—族长—村民”的层级结构。乡绅作为地方精英，负责联络官府、调配资源；族长则依靠血缘纽带凝聚村民。这样的社会结构，为团练组建提供了天然基础——团练以宗族为单位，由乡绅或族长牵头，选拔村中壮丁组成自卫队，武术教头多由村中习武长者或退役军户担任，形成“血缘凝聚+精英引领+武术赋能”的组织模式。

团练的运作深深嵌入乡约体系，通过“约规”明确习武自卫的责任与义务。日常训练多在农闲进行，内容兼顾基础体能与实用技法，比如长枪拒敌、短刀防身、石锁练力等，贴近村落可能面临的近战、巷战需求。同时建立预警机制，与邻村结成联防网络，一有海盗土匪踪迹，就通过鸣锣、放烟互通消息，协同防御。物资保障则依靠宗族公产和村民摊派，筹集兵器与粮食，确保组织能够持续运转。

文登、荣成等沿海县域的村落防御实践颇有代表性。据地方史料记载，文登营防区内，民间普遍推行“堡—

铺”并设的防御模式：官方急递铺负责公文传递与军情上报，民间则在村落周边修建夯土“堡垒”，作为团练训练和防御的据点。比如荣成石岛附近的村落，借助海岸礁石地形，在堡垒外挖壕沟、设栅栏，团练队员凭借武术技法，依托礁石掩体打伏击，多次成功击退海盗。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既弥补了官方防御的不足，也让武术成了胶东农村的普遍生存技能，体现出一种“耕战结合”的民间智慧。

（二）秘密结社：武术与民间宗教的融合及社会控制的双重性

清代中后期，随着海防松弛与社会矛盾加剧，胶东武术的民间角色逐渐超越单纯的自卫范畴，开始与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深度结合，成为既反抗清廷统治、又维系地方秩序的双重力量，呈现出复杂的社会控制属性。

于七抗清起义之后，胶东民间对清廷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而白莲教分支、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则为这种情绪提供了精神寄托。武术成了宗教与结社之间的重要纽带——秘密结社往往以“习武强身”“互助自保”为名，吸引信徒参与武术训练，把宗教仪式和武术演练结合起来。比如集会时先举行宗教祈福，再集体习武，通过身体训练强化信徒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像胶东的“无极会”这类组织，教义里融入“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武术训练则成了培养战斗能力、实现组织动员的核心手段，形成一种“宗教聚心+武术聚力”的运作模式。

从清廷的角度看，这类习武结社团体无疑是“海疆奸宄”，威胁统治稳定。一方面，它们依托武术形成武装力量，且与反清诉求绑定，直接挑战官府权威；另一方面，部分结社通过控制地方资源、干预民间事务，削弱了官府的基层治理能力。因此，清廷多次颁布禁武令，加强对民间习武的管控，对秘密结社更是严厉镇压。

但从民间视角看，这些习武团体也具备维护地方治安的正面功能。清代中后期，胶东沿海海盗频发，官方力量难以全面覆盖，秘密结社反而凭借武术优势，成了抵御海盗、土匪的重要民间力量。例如康熙年间，胶东半岛东部沿海遭遇大规模海盗侵扰，一些秘密结社就组织信徒参与防御，依靠熟练的武术技法和协同作战能力，协助官府击退海盗，保护了村落安全。这种双重属性，使得胶东武术在清代中后期的民间社会里，既是反抗压迫的工具，也是维系秩序的支撑，折射出传统社会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

六、社会角色之三：文化传承与海防精神

（一）武术中的海防记忆：历史隐喻与地域尚武精神建构

胶东武术的传承体系里，积淀了大量与“抗倭”“抗清”相关的传说叙事与技法仪式。这些文化符号，可不仅仅是拳种源流的附会；它们其实是明清胶东海防历史记忆的具象化表达，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带有防御特质与地域性格的尚武精神。

胶东代表性拳种的起源传说，往往与海防军事实践紧密相连，背后是对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拿螳螂拳来说，流传很广的“王郎观螳螂搏斗创拳”“吸纳戚继光《拳经》技法成拳”等说法，其核心隐喻并非单纯追溯源头，而是把拳种的诞生与抗倭御侮的历史语境绑定在一起——螳螂“以小胜大、灵活御敌”的特性，恰恰是胶东军民对抗装备精良、身法灵活的倭寇时的战术投射；而传说中对戚继光武术思想的吸纳，实则是对“实用为本”这一军旅武术传统的认同与传承。通过将拳种与民族英雄、抗倭伟业关联，海防的历史记忆就在武术传承中一代代延续了下来。类似地，八极拳“刚猛制敌”的技法传说，也暗含着清代胶东军民抵御海盗、守护海疆的斗争记忆，成了海防精神的文化载体。

胶东武术“重硬功、尚铁骨、求落地生根”的审美取向，也不只是技法偏好，而是地域自然环境与海防实践共同塑造的精神特质。胶东半岛濒临渤海、黄海，风高浪急、礁石密布，恶劣的自然环境养成了当地人坚韧的性子；而作为明清海防前线，长期的军事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刚劲务实”的尚武导向。武术训练中对石锁硬功、桩功的强调，追求“落地生根”的步法稳固，既是为了适应海岸崎岖地形和船舱颠簸的环境，也象征着胶东人守护家园、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念；“朴实刚烈、直击要害”的技法原则，摒弃花架子，与海防作战“高效御敌”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最终凝结成“刚毅务实、守土有责”的地域尚武精神，成为胶东海防文化的精神内核。

（二）武术与海防民俗的融合：功能转化与社会整合意义

明清时期，胶东武术逐渐超越单纯的技击与军事功能，深深融入与海防相关的民俗活动里。通过庙会演武、祭祀仪式这些载体，它实现了从“军事技能”到“文化符号”的转化，成为凝聚社区力量、强化海防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胶东沿海民众靠海为生，对海洋安全的诉求极其强烈，形成了以海神庙（天后宫、龙王庙）为核心的祭祀体系，而武术表演正是庙会“出会”活动的核心环节，兼具宗教祈福、军事威慑与娱乐教化的多重功能。在天后宫妈祖诞辰、龙王祭海等重要民俗活动里，各村镇的武术团体都会前来演武——或是演练长枪短刀的协同战术，或是展示石锁硬功、拳法套路，既以“娱神”的形式祈求海上平安、海疆稳固，也以“娱人”的方式丰富民间文化

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演武其实是在向潜在的海盗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全民皆兵,能协同御敌”,让民俗活动与海防防御产生了隐性联动。比如荣成石岛天后宫庙会的演武,不仅吸引周边村民参与,也成了沿海团练组织的“隐性练兵场”,通过集体演练强化协同作战能力,使民俗活动意外成为海防防御的补充形式。

武术与海防民俗的融合,进一步强化了沿海社区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在庙会演武这类场合,不同村落、不同宗族的武术爱好者聚到一起,通过技法交流、集体演练,打破了地域与宗族的隔阂,形成一个跨社群的海防文化共同体。对普通百姓来说,参与或观看武术表演的过程,也是接受海防教育、强化守土意识的过程——演武中蕴含的“御敌守家”理念,借助民俗活动的轻松氛围,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民众,让“守护海疆”逐渐成为集体共识。同时,武术作为民俗活动的核心元素,其传承也带动了海防历史故事、英雄事迹的传播,比如在演武间隙讲述抗倭、御海盗的往事,把历史记忆传递给下一代。这种“民俗+武术+海防”的融合模式,最终实现了社会整合的功能,让武术成了胶东沿海社会构建海防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

七、结语

明清胶东武术的演变,始终与胶东海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明代倭寇袭扰的海防危机,催生了它军旅化、实战化的技法特质;清代卫所裁撤、绿营建立的制度变革,推动了它的官方化与兵种分化;而海防松弛与社会矛盾激化,又让它转向民间自卫与秘密抗争。从根本上说,胶东武术是海疆社会中“国家权力—民间力量—海洋环境”三重因素互动的产物。它不仅记录了明清海防体系的运作机理与变革困境,也承载了胶东人民应对海洋风险、守护家园的集体智慧与精神信仰,为我们理解传统海疆社会的治理逻辑与文化建构,提供了一个“身体技术”的微观视角。那份“刚毅务实、守土有责”的精神内核,至今仍是胶东海疆文化的重要遗产,或许也能为当代海疆文化建设、海洋强国理念的地域化传播,提供某种历史层面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宫中怡.胶东螳螂拳文化变迁研究[D].宁夏大学,2024.
- [2] 赵帅帅.明代山东海防驿传系统空间布局研究[D].天津大学,2022.
- [3] 侯萍,王超.明代胶东地区的海防建设与启示[J].百科知识,2021,(24):13-14.
- [4] 赵艳红.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胶东海草房研学基地环境设计研究[D].山东建筑大学,2020.
- [5] 王宏伟.黄河下游地区传统堡垒聚落群系研究[D].天津大学,2019.

A Study on the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Function and Social Role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astal Defense

Shang Changmin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Jiaodong Peninsula, now encompassing Yantai and Weihai, was hailed as the "left armpit of the capita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s significance in coastal defense was so great that it could be described as "guarding Jiangsu and Zhejiang to the south and protecting the capital to the north".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of 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 Jiaodong martial arts have never been merely a form of physical exercise or sports skills; they have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the fabric of military defense, civilian self-defense, and even social control, becoming a special cultural form.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coastal defens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mbin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garrisons, the green camp system, and the changes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Jiaodong region,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function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in resisting Japanese pirates, suppressing pirates, and various anti-Qing struggle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im to clarify its transformation trajectory in the official military system, its popularization in civilian training, and the possible alienation in secret socie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Jiaodong martial arts are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military needs of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of Jiaodong;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is lan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a "military frontier" to a "maritime society".

Keywords: Jiaodong martial arts; Ming and Qing coastal defense; function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social role; military system

《不存在的女孩》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王敬文¹

(1. 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 本文从移民文学视角讨论露丝·尾关《不存在的女孩》中的跨文化身份建构。小说以奈绪的英日混写日记与露绪的阅读追索交织推进, 呈现语言杂糅如何标记身份位置, 并在家庭与学校的他者关系中显影创伤经验与归属焦虑; 同时, 日记的漂流结构推动人物在理解与再叙述中重整自我认同。文章指出, 作品将身份问题呈现为持续协商的过程, 为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共存困境与自我重组提供了文本参照。

关键词: 移民文学; 跨文化身份建构; 语言杂糅; 创伤叙事; 日记漂流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71

引言

移民文学作为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文学类别, 主要关注移民个体及群体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生存经验、身份认同与文化交融的复杂过程, 它既描绘迁移后的生活图景, 也揭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多面性。日比嘉高指出研究移民文学有重审边界、探究语言的混合性与与他者接触和共存三重价值。^[1]强调移民群体往往处于文化边界的连接位置, 其双重身份既带来资源与可能, 也造成游离与紧张, 使身份认同更常表现为在主流社会与原生文化之间的持续协商。

日裔美国作家露丝·尾关的作品《不存在的女孩》以被海浪冲上岸的日记为叙事枢纽, 将从美国回到日本的少女奈绪的自述与加拿大日裔女作家露绪的阅读追索交织起来, 使跨文化处境在讲述与理解、记录与翻译的往复中持续地展开。^[2]

本文将《不存在的女孩》置于移民文学脉络之中, 讨论作品如何通过语言混合的书写、家庭与学校关系的压力结构以及叙事结构等意义资源的调动, 呈现全球化语境中移民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

一、语言杂糅与身份建构

《不存在的女孩》中, 奈绪的日记以英语为主要书写媒介, 这一选择首先对应她在美国成长的语言习惯, 也把她回到日本后的疏离感与不适感直接呈现在文本表层。英语的主导地位强化了奈绪作为文化外来者的处境, 而日语短语与词汇的穿插则常被用于承载情绪与特定文化概念, 显示她仍试图保留与日本文化的联系。语言的选择并非中立, 具备多语能力的人选择某种语言中的某个词往往出于特定原因。克里斯汀·沃尔德指出, 在很多情况下, 语言选择会成为自我定位的一种资源。^[3]少数族裔在话语中插入某种语言成分, 使其身份的特定侧面在交际情境中变得相关, 从而提示与该语言相联系的归属与位置。

日语成分的插入首先集中出现在强情境的社会互动中, 尤其是那些预设角色分配与礼貌秩序的场景。比如女仆咖啡厅的迎接用语可译为“欢迎回家, 主人”, 这类敬语化称谓并不只是场景装饰, 而是将服务关系的脚本直接写进语言, 把奈绪置于被规训与被观看的位置。类似地, 陌生人上门询问父亲时使用的礼貌询问语“打扰了, 请问父亲在家吗”, 它展示着日本社会交往中对距离与身份的精细调节。奈绪在叙述中保留这类表达的存在感, 呈现她对礼节尺度的迟疑与不适, 语言成为她进入日本社会规则时的第一道门槛。

更能体现语言与归属绑定的, 是对固定寒暄语的处理。文本写到一种常见出门寒暄语可译为“我出门了”, 以及对应回应为“路上小心”, 奈绪却无法顺畅完成对答。此类固定寒暄语在日常语境中隐含着会平安返回的承诺, 当家庭处于不稳定状态时, 这种承诺失效, 语言便出现卡顿。奈绪说不出口的回应, 既标记了家庭秩序的裂缝, 也让读者看到她并非不懂规则, 而是在规则失去现实支撑时失去了进入其中的信心。

除句子层面的插入外, 日记还保留了大量日本社会与文化专名, 尤其是“归国子女”这一称谓, 本身就携带社会目光与标签化机制。奈绪在叙述中保留该称谓的存在感, 相当于把外部命名方式一并纳入自述, 使她的处境既

作者简介: 王敬文(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文化。

被命名也被反思。换言之,文化专名不仅指称对象,更携带社会评价的重量,使身份问题从内心感受落到可被辨认的制度性位置上。

因此,语言杂糅在作品中构成一套持续运作的身份标记机制。英语的主导使奈绪的美国经验始终在场,日语成分的插入则在关键处把她拉回日本社会的礼貌秩序与文化语感,两者交错使她既难以回到单一的美国身份,也无法被动完成对日本身份的同化。语言在这里既是表达工具,也是位置声明,跨文化身份建构由此呈现为一个可被追踪的过程,它不依赖一次性的融入或决断,而是在每一次言说与被言说之中反复生成。

二、与他者接触与共存中的跨文化身份建构

日比嘉高指出,身份认同是在与周围关系的缔结中逐步构建的,个体在家庭与地区的人际交往、学校教育以及可利用的话语资源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完成自我认同的生成与调整。

当移民并不受欢迎,甚至遭遇排挤与攻击时,与他者的接触就不再只是日常交往,而会变成一套把人推向边缘的位置机制。斯图尔特·霍尔在讨论移民群体身份时指出:“文化身份不是等待被发现的本体,而是在表述中不断生成的定位。”^[4]因而移民经验的意义并不等同于归属的缺席,是迫使主体在差异中不断重新命名自身。《不存在的女孩》对这一过程的呈现并不抽象,它把奈绪置于父母、同学与老己子三类他者关系之中,表明文化身份并非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一次次接触、受伤、回避与重新学习共处的过程中被迫调整出来的。

回到日本之后,奈绪首先面对的是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形。父亲在美国遭遇挫败后返日,无法重新适应日本社会的文化环境,他的失业与多次尝试自杀不仅是经济压力的体现,更直接撕裂了家庭日常的稳定感。父亲在两套评价体系之间反复受挫,家庭空间由此弥漫着羞耻与无力感,奈绪对父亲既同情又愤怒,亲子之间的接触常常被紧张气氛替代。母亲原本试图充当调和者,却在丈夫的抑郁与家庭困境中逐渐退缩,她沉溺于观察水母,对奈绪在学校遭遇的伤害缺少有效回应,甚至认为奈绪是因为不够努力结识新朋友。

在这种关系结构里,奈绪并不是缺乏沟通意愿,而是找不到可以承接她经验的对象。她的情绪更接近被迫吞咽后的内伤,难以在家庭对话中获得解释,最终只能把那些无法被接住的感觉转移到日记里。

家庭的他者接触因此呈现为一种悖论,亲密关系本应提供庇护,却因为成年人自身的失能而变得不可靠,奈绪的自我定位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偏移,她越来越像被留在门外的人,既无法回到美国式的自我叙述,也难以进入日本式家庭秩序所期待的角色。

学校中的他者接触则更直接地把差异固定为标签。作为归国子女,奈绪回到日本后面临严重的校园欺凌,这不仅凸显她在当代日本社会中的文化边缘化身份,也使她的日常感受被持续推向恐惧与警觉。小说用鬣狗围猎的比喻描写这一过程,“它们从四处逼近,把兽群里最可怜的动物隔离开,包围它,一点儿一点儿收紧……是一只敏捷而卑劣的小鬣狗最先一跃而上,撕开皮肉,血沫横飞。”欺凌者从四处逼近,把她隔离开来,表面上看起来像善意的游戏,实际上却是持续一整天的伤害与羞辱。他们用糟糕的英语唱问候语来嘲弄她,把对身体与气味的污名化当作集体娱乐,反复说出“恶心死了,她闻起来像外国人一样臭”。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以污名概念解释某些差异如何在互动中被转化为可被嘲弄的缺陷,从而使被标记者在公共空间中被迫自我监控并内化羞耻。^[5]小说中同学对奈绪气味与身体的攻击正是把文化差异具体化为污名的过程。

这一类语言暴力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把奈绪的身体当作可任意评判的对象,使她在公共空间里难以保有最基本的尊严感。更重要的是,伤害并不止于当下的疼痛,它会在叙述中留下痕迹。奈绪反复回到逼近的路线、围观的目光、身体的割伤与瘀青,细节被一遍遍写下,这种重复更像是经验无法被顺畅整合时的一种停留方式。创伤在这里不是被提出来的概念,而是通过叙述的固着、情绪的骤变与对细节的执拗再现被写出来的,奈绪的身份也因此被迫收缩成外来者与被驱逐者的形状。

不过,作品没有把奈绪的文化身份固定在被排斥的终点。与老己子的接触为她提供了另一种共存关系。奈绪明确说过,如果己子没有教她怎样养成超能力,她可能早就死了。这里的超能力并不是奇观式的设定,更像是一种在痛苦中保住自我边界的生活技艺,它让奈绪从只能被动承受的状态里稍稍退开一步,重新获得应对的可能。老己子作为家庭中的长辈,提供的不只是陪伴,更是一种把个人经验重新放进家族记忆与文化传统之中的路径,使奈绪在与长辈的日常相处里重新理解家庭与文化。

当学校将她不断推出共同体时,老己子却以另一种方式把她拉回关系之中,奈绪的身份由此不再只是被命名的归国子女,也出现了能够主动理解自身处境并重新安放的空间。

三、日记漂流中的跨文化身份建构

《不存在的女孩》并不把跨文化经验当作人物设定的背景板,而是把它写进叙事机制之中。奈绪的日记被海浪带到异国海岸,被露丝拾得并进入她的日常生活。两条线索因此不是简单并置,而是在同一本日记的牵引下相互咬合。奈绪的书写原本是对当下困境的自救式记录,但当日记落入另一位日裔写作者手中,书写就不再只是自我倾诉,它开始自动具备面向他者的属性。跨文化身份建构也因此从人物内心的独白,转为一种通过媒介发生的关系过程。身份在这里不是先被确立再被叙述,而是在被阅读、被追索、被理解或被误解的往复中逐渐显形。

露丝的阅读过程让这种协商性更为具体。她对日本文化的认知并不完整,许多细节既熟悉又陌生,日记里出现的日常表达、习俗线索与历史记忆不断触发她的停顿与回查。她需要查资料、找人确认、反复对照语境,才能把日记的意思拼接起来。正是在这些停顿里,露丝的身份被迫从默认状态转为自我审视。她意识到自己既不是“完全的外部读者”,也无法回到一种纯粹的原乡位置。日记把她拖进一个中间地带,她一边以北美生活经验来理解奈绪的处境,一边又在语言与文化细节处不断碰壁。碰壁并不等于失败,恰恰相反,它让露丝看见所谓归属感并

非来自知识的完备,而来自在陌生感中仍愿意持续靠近的关系姿态。露丝在阅读中逐步重整自己的家族记忆与文化位置,她对奈绪的追索也是对自我的追索,跨文化身份因此表现为一种被动卷入又主动回应的协商过程。

奈绪一侧的身份变化同样通过日记得以呈现。前两章写到她在家与学校里反复受挤压,差异被放大为污名,亲密关系无法承接她的求助,公共空间又不断向她投射敌意。在这种处境中,日记最初更像一间密室,容纳她无法说出口的羞耻、愤怒与恐惧。但随着书写的推进,日记逐渐从密室变成通道。它把经验整理为可以被他人看见的叙述,把碎片化的痛感转化为可被指认的事实,让她至少在纸面上重新获得命名自身处境的权利。日记在这里不只记录伤害,也承担整理生活的功能,它把她从只能被动承受的位置上稍稍拉开,使她开始重新安排自己与家庭、与语言、与文化的距离。跨文化身份因此不是被外部标签框死的结果,而是在持续调整中生成的自我定位。

两条线索最终在日记这一媒介上形成回路。奈绪写下日记时未必知道会被谁读到,但日记的漂流让她的叙述获得了现实中的听者。露丝并非只是在阅读一个故事,她的阅读本身构成对奈绪存在的确认,也构成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再组织。奈绪的书写让露丝重新触摸那些断裂的文化线索,露丝的阅读则让奈绪的书写不再只是孤独的自言自语。两人隔着海洋与时间,却在叙事结构中互为他人。跨文化身份建构正是在这种互为他人的关系里完成的,它不是线性地从某一端走向另一端,而是在理解与误解、接近与退避、被命名与重新命名之间反复移动,最终呈现出一种动态而开放的自我组织过程。

结语

《不存在的女孩》所呈现的跨文化身份建构并非静态归属,而是在失衡与调整的往复中逐渐形成。奈绪以英语书写并夹杂日语,语言的摇摆对应她在日本社会中的疏离感与自我定位;家庭失序与校园排斥将差异推向伤害,使创伤沉入日常并反复回返;与老己子的相处则提供了新的共存关系,使她在被驱逐的现实中获得重新安放自我的可能。

小说通过日记漂流与露丝的阅读,将身份问题推进到跨地域的理解关系之中。书写在被阅读时获得回应,阅读在追索中重整文化记忆,两条线索彼此牵引,表明跨文化身份并非二选一的选择,而是在语言实践、他人关系与叙述重写中持续生成的自我位置,并由此凸显移民文学对于理解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边界与共同体关系的解释力。

由此可见,作品把身份问题从单一文化归属的答题转向持续的关系实践与伦理选择,同时也提示移民文学可以在叙事层面提供理解他者与重建共同体感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 日比嘉高著,魏晨译.日裔美国移民日语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2),1-16.
- [2] [美]露丝·尾关著,袁田译.不存在的女孩[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 [3] Lexander, Kristin Vold. "Analyzing multilingual texting in Senegal: An approach for the study of mixed-language SMS." *Language mixing and code-switching in writing*. Routledge, 2012. 146-169.
- [4]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5] [美]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s*

Jingwen Wang¹

¹Northeastern University, Liaoning,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migr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cultural identity in Ruth Ozeki's *A Tale for the Time Beings*. Interweaving Naoko's diary written in a hybrid form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with Ruth's reading and pursuit, the novel reveals how linguistic hybridity marks one's identity position, and how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anxiety of belonging are manifested in the other-oriented relationships within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s. Meanwhile, the drifting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diary propels the characters to restructure their self-ident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re-narr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ork portrays identity as a process of constant negotiation, providing a textu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dicament of cross-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self-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Immigrant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Hybridity; Trauma Narrative; Drifting Diary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命题质量历时研究

过君琰

(无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05)

摘要: 本研究以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2016-2024)为样本, 参照 Bachman & Palmer 的考试任务特征框架, 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年修订版)》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24版)中的听力理解能力总表, 从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命题质量历时分析。研究发现四、六级听力测试基本符合《指南》、《考纲》和《量表》的要求, 内容效度较高, 但主题和考查技能维度比较集中、话轮数跨度较大、部分语篇难度过大、语速过快。基于研究结果, 文章为今后的四、六级听力测试命题和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听力测试; 语篇输入; 预期回答; 大学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 十二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ZGWYJYJJ12A11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02

一、引言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ollege English Test, CET)从1987年开始实施, 至今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服务于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考试, 四、六级考试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大学英语课程对学生的英语能力要求的变化过程。早期大学英语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译)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1]。《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指出大学英语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语言综合应用能力”^[2]。因此,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内容、题型和比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初期的阅读占最高比重(40%), 其它部分包括听力(20%)、写作(15%)、语言知识(15%)和综合能力(10%), 到现在听力和阅读比重一致, 各占35%, 翻译和写作各占15%^[3]。

听力是语言理解和交际能力的基础。良好的听力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在交际中迅速理解他人的言语内容, 准确理解其意图, 进而提高沟通的有效性。同时听力还是提升口语、阅读和写作等其它语言技能的重要基础。鉴于听力的重要性及其在四、六级考试中的突出比重, 本研究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2016年改革后的听力文本及问题进行命题质量分析, 以期对未来的考试命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建议。

二、研究框架

Bachman & Palmer^[4]的测试任务特征理论包括测试环境、测试说明、语篇输入、预期回答、以及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的关系五个部分。国内研究者主要从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这两个方面对国内听力测试进行分析。语篇输入是指考生要处理和回答的测试材料, 包括材料的呈现形式和语言特征。前者包括材料使用的语言、长度和输入材料的速度等, 后者包括材料的话题、结构和语篇特征。预期回答是指考生对测试任务做出的反应和输出。辜向东、李亚果^{[5][6]}的两项研究围绕2005年的CET改革, 分析了1996至2008年的四、六级听力理解真题的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任务特征。除了CET听力以外研究者还运用该理论分析了高考英语全国卷^[7]、英语专业四级^[8]和法语专业八级听力测试的命题质量^[9]。

然而纵观现有CET听力试题的研究, 我们发现, 目前还没有对2016年最近一次改革过后的试题分析。本研究参考Bachman & Palmer^[4]的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两方面的任务特征、结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以下简称《指南》)、《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考纲》)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24)(以下简称《量表》)中的听力理解能力总表^[10], 对2016年6月至2024年6月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真题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其命题质量。

作者简介: 过君琰(1984—), 女, 博士, 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外语测试。

通讯作者: 过君琰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数据库

研究者收集整理了从 2016 年 6 月到 2024 年 6 月共 35 套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真题文本和问题，分别构建了四级和六级听力两个平行语料库。

(二) 分析框架与方法

本研究按照以下框架进行数据分析(表 1)。

表 1 大学英语四、六级命题质量分析框架

项目	内容	描述	涉及部分	分析方法
语篇输入	体裁	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描写文、应用文	除长对话以外的部分	ChatGPT 4o、人工
	主题	文化与艺术、科技与创新、环境与生态、教育与工作、历史与地理、健康与医学、社会与时事、经济与商业、生活与情感	所有部分	
	词汇	词汇丰富度 (形符数、类符数、复杂度、多样性)	所有部分	Vocabprofilers (type, token, frequency), TAALED 1.4.1 (MTLD), TAALES 2.2 (Academic Word List, AWL)
	难度	词汇难度、句法难度、文本难度、四六级考试大纲的覆盖率、超纲词汇词云图	所有部分	阅读分级指南针
	话轮数	长对话的话轮数	长对话	人工
	平均语速	平均每分钟朗读每则听力材料的词数	所有部分	人工
预期回答	考查技能	1. 理解明示的信息 (主旨大意、重要信息或特定细节、说话人明确表达的观点和态度等) 2. 理解隐含的信息 (推断隐含的意义、话语交际功能、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等) 3. 运用语言特征理解听力材料 (辨别语音特征、理解句间关系)	所有部分	Chat GPT 4o、人工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节按照表 1 的分析框架将结果进行归纳和讨论。

(一) 语篇输入特征分析

1. 体裁

从表 2 的统计结果可知，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体裁较为多样，覆盖了记叙、说明和议论三种体裁。其中说明文占比最大。从各分项来看，除四级的新闻听力外，其余各分项也是说明文的比例最高，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真题(1996-2008)分析结果一致^{[5][6]}。由此可见，说明文以解释、介绍和阐述为目的，加上客观性、条理性、简洁性和知识性等特征，有助于学生获取信息。与四级相比，六级记叙文比重明显降低，议论文比重加大。议论文旨在表达观点、论证主张，因此注重运用逻辑进行推理，思辨性更强，与其它体裁相比，对学生的听力理解要求更高。由此也可以看出，六级的考查难度要高于四级。六级的第三部分中，讲座最多，共 44 篇 (41.9%)，其次是报道 35 篇 (33.3%) 和讲话 26 篇 (24.8%)。

表 2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体裁统计

试卷类型	测试部分	体裁		
		记叙文	说明文	议论文
四级	短篇新闻	52.4%	45.7%	1.9%
	听力篇章	15.2%	66.7%	18.1%
	总计	33.8%	56.2%	10%
六级	听力篇章	10%	67.1%	22.9%
	讲话/报道/讲座	8.6%	61.9%	29.5%
	总计	9.1%	64%	26.9%

2. 主题

听力材料的题材多样,本研究将其归类为九大主题。从表 3 可知,生活与情感(四级 26.5%, 六级 21.6%)、社会与时事(四级 18.9%, 六级 19.2%)、教育与工作(四级 13.6%, 六级 17.6%)是四、六级听力文本最常考的三大主题,符合《指南》中“题材熟悉”的内容。从具体子部分来看,六级的三个部分均涵盖了九大话题,比四级的部分涵盖更广泛。研究者进一步将四级和六级类型相同的两个子部分(长对话、听力篇章)进行对比。四级的长对话主题中 88.6%是日常对话包含筹备派对、驾考、健身、旅行、网购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主题,11.4%是职场对话,主题包括公司业务、商业资讯等。就对话形式而言,其中有 3 个对话(4.3%)是以访谈形式进行,主题分别是剧场的特色与经营、英勇救人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六级长对话中访谈形式的对话比重达到 32.9%且受访者类型多样,如作家、教授、市长、退役篮球运动员、时尚杂志编辑、物理学家、植物学家等。51.4%是日常对话,主题包括参加婚礼、创业、推荐电视剧、写论文等,32.9%是职场对话,主题包括公司运营、合同修改、绩效管理等。这一点与《量表》中听力理解能力总表的六级要求能听懂正常语速的职场对话相符。就听力篇章的九大话题覆盖比例而言,六级比四级更均衡,而且同一话题切入更深。例如 2021 年 12 月四级第 1 套听力篇章第 1 篇提出了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家庭作业的建议,而同年 6 月六级第 2 套听力篇章第 1 篇则更细致地讨论了家庭作业对学生的影响及争议。

表 3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主题统计

试卷类型	测试部分	主题								
		生活与情感	社会与时事	教育与工作	健康与医学	科技与创新	环境与生态	经济与商业	历史与地理	文化与艺术
四级	短篇新闻	18%	33.3%	3.8%	7.6%	10.5%	10.5%	3.8%	5.7%	2.9%
	长对话	40%	4.3%	25.7%	4.3%	2.9%	2.9%	12.8%	0%	8.6%
	听力篇章	25.7%	14.3%	15.2%	13.3%	9.5%	9.5%	4.8%	10.5%	0%
	总计	26.5%	18.9%	13.6%	8.9%	8.2%	8.2%	6.4%	6.1%	3.2%
六级	长对话	24.3%	12.9%	27.1%	2.9%	5.7%	4.3%	7.1%	1.4%	14.3%
	听力篇章	12.9%	15.7%	12.9%	17.1%	8.6%	7.1%	7.1%	10%	8.6%
	讲话/报道/讲座	25.7%	25.7%	14.2%	3.8%	7.6%	4.8%	4.8%	6.7%	6.7%
	总计	21.6%	19.2%	17.6%	7.3%	7.4%	5.3%	6.1%	6.1%	9.4%

3. 词汇

形符数(token)是文本中所有单词的数量,而类符数(type)是文本中不同单词的数量。例如 I can't say I like the toy.一句中有 8 个形符数(缩略词 can't 是 can 和 not 分开统计,是 2 个形符)和 7 个类符数(I 重复了一次)。表 4 汇总结果显示,四级听力文本中长对话的最多(分别为 274 个和 146 个),短篇新闻最少(173 个和 107 个)。六级中讲话/报道/讲座题型的形符数和类符数最多(405 和 207),听力篇章最少(262 和 153)。此外,无论是将缩略词分开还合并统计,四级三篇短篇新闻的总单词数均高于四、六级考试大纲的范围(表 5)。词汇的多样性指标以 MTLD (Measure of Textual Lexical Diversity)^[11]来计算,数值越高则说明越多样,我们可以从表 4 看到六级的平均值明显高于四级。词汇复杂度其中之一的指标学术英语词汇(Academic Word List, AWL)^[12]显示,除四级新闻听力外,六级各项的学术英语词汇也多于四级。

表 4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词汇统计

试卷类型	测试部分	词汇							
		形符数 (token)		类符数 (type)		多样性 (MTLD)		复杂度 (AWL)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四级	短篇新闻	173	120~208	107	71~134	70.9	39~128.8	0.048	0.005~0.161
	长对话	274	239~302	146	113~170	73.5	43.8~117.7	0.026	0~0.119
	听力篇章	241	211~287	136	112~167	70.7	40.2~116.4	0.055	0~0.149
	总计	224	120~302	128	71~170	71.5	39~128.8	0.045	0~0.161
六级	长对话	321	287~344	170	142~193	79	47.3~121.6	0.041	0.003~0.099
	听力篇章	262	248~292	153	116~179	84.8	39.8~141.2	0.066	0.008~0.15
	讲话/报道/讲座	405	347~464	207	162~243	79.1	42.6~132.3	0.067	0.01~0.137
	总计	340	248~464	181	116~243	80.7	39.8~141.2	0.059	0.003~0.15

表 5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单词数与考纲对比

试卷类型	测试部分	形符数 (缩写词分开计算)	单词数 (缩写词合并计算)	四、六级考试大纲
四级	短篇新闻 (总共)	520	507	总共 450-500
	长对话	274	263	每篇 240-280
	听力篇章	241	236	每篇 220-240
	长对话	321	311	每篇 280-320
六级	听力篇章	262	256	每篇 240-260
	讲话/报道/讲座 (总共)	1216	1190	总共 1200

研究者用 Vocabprofilers (<https://www.lex tutor.ca/vp/comp/>) 的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和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 数据库统计四、六级听力文本词频。在听力理解中, 如果听者能够听懂其中 95% 和 98% 的词汇, 即 95% 和 98% 的词汇覆盖率, 则被认为是足够的和理想的^{[13][14][15]}。从表 6 我们可以得知, 总体而言, 最高频的 3,000 词可以覆盖 95% 的四、六级听力文本, 最高频的 4,000 词可以覆盖 98% 的听力文本。具体而言, 四级听力的三部分中, 最高频的 3,000 词和 4,000 词分别可以覆盖 95% 和 98% 的短篇新闻和听力篇章文本, 最高频的 2,000 词和 3,000 词分别可以覆盖 95% 和 98% 的长对话文本。六级听力的三部分中, 最高频的 3,000 词可以覆盖每个部分 95% 的文本, 最高频的 4,000 词可以覆盖长对话和讲话/报道/讲座 98% 的文本, 而听力篇章则需要前 5,000 词才可以覆盖 98% 的文本。

表 6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词频统计

试卷类型	试题部分	词频平均覆盖率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四级	短篇新闻	81.8%	92.4%	97.2%	98.5%	/
	长对话	90.5%	96.3%	99.2%	99.6%	/
	听力篇章	82.2%	92.7%	97.6%	98.6%	/
	总计	84.1%	93.5%	97.7%	98.7%	/
六级	长对话	86.7%	93.8%	97.4%	98.6%	/
	听力篇章	79%	90%	96.1%	97.9%	98.8%
	讲话/报道/讲座	80.5%	90.6%	96.8%	98.3%	/
	总计	81.8%	91.3%	96.8%	98.3%	/

四、六级听力文本难度通过“阅读分级指难针”(LanguageData.net/tester)进行衡量统计^[16]。“指难针”以2000年至2022年间的中考、高考、大学四、六级和考研英语阅读真题文本进行词汇、句法和篇章三维度12个核心特征进行难度计算,确定难度级别范围,并将其与《量表》中的三至七级衔接。我们将四、六级听力文本输入“指难针”,系统将分析文本与阅读真题文本的难度级别范围进行匹配,呈现其难度等级与难度数值。例如表7中,CET-4短篇新闻的词汇难度是5.15,整数为5,说明该文本难度大致处于“五级(CET-4)”水平¹,小数位为0.15,说明该文本在同等级别的阅读真题文本中难度排序百分位约为15%。

表7的统计结果显示,四级听力词汇与文本难度与阅读真题难度相比处于四级(高考)水平,句法难度处于三级(中考)水平。三个部分中短篇新闻的词汇难度和文本难度最高,有21篇(20%)词汇难度达到了六级(CET-6)水平,16篇(15.2%)文本难度达到了六级(CET-6)水平。这可能与新闻词汇的多样化和专业化有关。六级听力词汇与文本难度与阅读真题难度相比处于五级(CET-4)水平,句法难度处于四级(高考)水平。由此可见,六级听力三个维度的难度均高于四级。三个部分中,讲话/报道/讲座部分的三个维度的难度最高,其中分别有41篇(39%)、12篇(11.4%)和39篇(37.1%)的词汇难度、句法难度和文本难度达到了七级(考研)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四、六级听力文本的句法难度比词汇和文本难度低,主要原因可能是听力要求听者在短时间内理解信息,复杂的句法会增加难度和记忆负担,同时听力文本也依赖语境和辅助信息来帮助听者理解信息。

研究者同时还运用“指难针”计算《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以下简称《要求》)^[17]词汇和四、六级考试大纲词汇对四、六级听力文本的词汇覆盖比例。四级词汇可以覆盖四级听力99%以上的词汇。因为98%是理想的词汇覆盖率,所以掌握《要求》和《考纲》的四级词汇对四级听力理解已足够。然而,四级词汇对六级听力的覆盖率低于98%(尤其是第二部分听力篇章和第三部分讲话/报道/讲座),有11篇覆盖率甚至低于95%,因此四级词汇对六级听力考试是不够的,需要六级词汇才可以覆盖99%以上的听力文本词汇。但仍有一些文本过难,例如2017年6月第2套讲话/报道/讲座部分第3篇六级词汇覆盖率只有93.09%。

四级听力文本中,四级超纲词汇最高频的是own,包括它的派生词owner,ownership,共出现在22个语篇中,其次是participant,出现在12个语篇中。六级听力文本中,六级超纲词汇最高频effective包括其副词effectively和名词effectiveness,都是出现在16个语篇中,其次是participant和own(owner,ownership),都是出现在9个语篇中。

表7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难度

试卷类型	试题部分	难度				
		词汇难度	句法难度	文本难度	四级词汇覆盖率	六级词汇覆盖率
四级	短篇新闻	5.15	4.02	5.13	99.03%	99.13%
	长对话	4.15	3.59	4.11	99.66%	99.68%
	听力篇章	4.90	4.14	4.88	99.12%	99.18%
	总计	4.80	3.96	4.78	99.22%	99.29%
六级	长对话	4.68	3.96	4.68	98.31%	99.53%
	听力篇章	5.48	4.30	5.44	97.60%	99.12%
	讲话/报道/讲座	6.26	5.50	6.29	97.92%	99.10%
	总计	5.58	4.72	5.59	97.94%	99.23%

5.话轮数和平均语速

四级和六级长对话的平均话轮数都是6轮,总体与之前的5-8轮的研究结果相符^{[5][6]}。四级最少2轮,最长10轮,有20%少于5轮,8.6%多于8轮。六级最少是3轮,最长是13轮,21.4%少于5轮,10%多于8轮。由此可见,四、六级话轮数跨度较大。

根据表8的统计结果,四、六级总平均语速基本一致(140词每分钟左右),其中长对话相对来说语速较快约为150词每分钟,属于《量表》的听力理解总表中的语速较快范畴(约140~180词/分钟)。其它各项为每分钟135词左右,属于语速正常范围(100~140词/分钟)。与《考纲》要求(四级每分钟120~140词,六级每分钟140~160词)相比,四级真题的属于正常偏快语速,六级真题的语速基本符合。其中六级2016年6月、2020年12月听力篇章第2篇均超过每分钟167词。四级2016年12月第1篇长对话和六级2023年12月第2篇长对话

¹ 三级(中考):3.00-3.99,四级(高考):4.00-4.99,五级(CET-4):5.00-5.99,六级(CET-6):6.00-6.99,七级(考研):7.00-7.99。

的语速均超过每分钟 180 词。四级的录音时长为平均 94 秒，六级为 143 秒。

表 8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文本语速和时长统计

试卷 类型	试题部分	语速(wpm)		时长(s)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四级	短篇新闻	135	115~167	75	52~94
	长对话	155	113~181	103	79~142
	听力篇章	134	113~160	106	84~128
	总计	140	113~181	94	52~142
六级	长对话	154	131~183	122	102~142
	听力篇章	134	108~167	116	92~145
	讲话/报道/讲座	136	106~158	175	139~222
	总计	141	106~183	143	92~222

(二) 预期回答特征分析

四、六级听力理解考查的技能虽覆盖了《考纲》的理解明示的信息和理解隐含的信息两大类，但集中在考查理解明示信息（四级 97.9%，六级 98.6%），尤其是考查重要的信息或特定的细节（四级 95.5%，六级 97.4%，见表 9）。这符合《指南》中基础目标的“获取要点和细节”^[2]、提高目标中的“抓住要点和相关细节”^[2]以及《量表》中听力理解能力总表五级的描述语“获取要点和细节”^[10]。

表 9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考查技能分析

试卷 类型	试题部分	考查技能						语用语言特征 理解听力材料	
		理解明示的信息			理解隐含的信息				
		主旨大意	信息细节	观点态度	隐含意义	话语交际	观点态度	语音 特征	句间 关系
四级	短篇新闻	4.9%	93.9%		1.2%				
	长对话	0.7%	93.9%	1.1%	3.2%	1.1%			
	听力篇章	1.1%	97.7%		0.9%		0.3%		
	总计	2.1%	95.5%	0.3%	1.7%	0.3%	0.1%		
六级	长对话	1.4%	96.1%		2.5%				
	听力篇章	1.2%	98.4%		0.4%				
	讲话/报道/讲座	1.1%	97.8%		1.1%				
	总计	1.2%	97.4%		1.4%				

五、总结与建议

通过对 2016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命题质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整体来说四、六级听力测试基本符合《指南》、《考纲》和《量表》的要求，内容效度较高。题材较为多样，主题比较广泛，难度基本适中。四级和六级也有一定的区分度。其次，具体而言测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主题方面比较集中于“生活与情感”、“社会与时事”和“教育与工作”这三个方面。难度方面，部分六级听力讲话/报道/讲座部分语篇的难度已经达到考研阅读真题水平。此外四级和六级都存在话轮数跨度较大、部分语篇语速过快等问题，且四六级总体平均语速区别不明显。考查技能方面过于集中在“理解明示的信息”，尤其是“重要信息或特定细节”的复现。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尝试为大学英语四、六级测试以及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测试命题方面，应当丰富听力文本主题内容，稳定语篇难度和语速，拓展考查技能，提升全面性。其次，在教学中，应当注重拓展学生的听觉词汇知识和词汇深度知识（近义词、词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最高频的 3,000 和 4,000 词可以覆盖 95%和 98%的四、六级听力文本，然而 Guo^[18]的研究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只掌握了最高频的 1,000 词的

听觉词汇知识。同时教师还应培养学生的信息概括、总结和解释能力。

参考文献:

- [1] 金艳, 杨惠中. 走中国特色的语言测试道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三十年的启示[J]. 外语界, 2018(2): 29-39.
-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4、11、13.
- [3]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 (2016 年修订版) [EB/OL]. (2016) [2024-12-15]. <https://cet.neea.edu.cn/html1/folder/16113/1588-1.htm>
- [4] BACHMAN, L. F., PALMER, A. S.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useful language test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9-60.
- [5] 辜向东, 李亚果. 改革后 CET 听力测试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4): 71-74+79.
- [6] 辜向东, 李亚果. CET 听力测试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历时分析(1996-2007)[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2(3): 17-26.
- [7] 彭莹莹. 2017 年高考全国卷英语听力测试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分析[J].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18(4): 11-16.
- [8] 孟凡娜. TEM-4 听力测试语篇输入及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历时分析(2005-2014 年)[J]. 考试研究, 2015(6): 68-75.
- [9] 卢晓帆. TFS8 听力测试语篇输入及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历时分析(2009-2019)[J].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21(2): 34-46+9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S].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4: 9.
- [11] MCCARTHY, P. M. An assessment of the range and usefulness of lexical diversity measures and the potential of the measure of textual, lexical diversity (MTLD)[D]. Memphis: 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2005.
- [12] COXHEAD, A. A new academic word list[J]. TESOL Quarterly, 2000(2): 213-238.
- [13] DANG, T. N. Y., WEBB, S. The lexical profile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4(33): 66-76.
- [14] NATION, I. (2006). How large a vocabulary is needed for reading and listening?[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6(1): 59-82.
- [15] SCHMITT, N., COBB, T., HORST, M., & SCHMITT, D. How much vocabulary is needed to use English? Replication of van Zeeland & Schmitt (2012), Nation (2006) and Cobb (2007)[J]. Language Teaching, 2017(2): 212-226.
- [16] 金檀, 陆小飞. 阅读分级指南针[EB/OL].(2023-03)[2024-12-24]. https://doi.org/10.1007/978-7-309-05825-1_110825
- [17]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通知 [EB/OL]. (2007-07-10)[2025-2-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0707/t20070710_110825.html
- [18] GUO, J. Exploring the role of vocabulary in EFL learners' speaking proficiency: A mixed-methods study[D]. Auckland: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3.

CET 4/6 Listening Test Design Qualit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unyan Guo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Wuxi University, Wuxi,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ET-4 and CET-6 listening tests (2016-2024) as sampl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quality of test papers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put and the expected response based on Bachman & Palmer's framework for test task characteristic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Guide (2020)", the "N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st CET-4 and CET-6 Syllabus (2016)", and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competency table in the "China Standards of English (2024)."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ET-4 and CET-6 listening tests genera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uide," "Syllabus," and "Standards", with relatively high content validity. However, the themes and skills assessed are somewhat concentrated. There is a large variation in the number of speech turns. Some of the materials are too difficult, and the speed of some of the speeches is too fast.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paper offer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ET-4 and CET-6 listening test design and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listening test; input; expected respons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双减”政策背景下人机协同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李远航¹ 杨朔²

(1.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2.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三小学, 河北 唐山 063200)

摘要: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数字化转型促使智能技术迅速进入教育教学实践,为“双减”政策的有力推进提供了来自技术层面的支撑,也为教师构建了一个人机协同教学的新教学实践场景。研究立足人机协同教学中的教师专业发展,以教师身份认同为研究主体,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明晰人机协同背景下教师身份认同内涵,通过问卷调查明细其结构以及水平,为如何提升人机协同教师身份认同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双减”政策; 人机协同; 身份认同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双减”政策背景下基础教育师资核心能力重构与提升路径研究(SD20221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16

一、研究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为“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为有效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基础教育学校开始加大对网络资源的建设力度,加大智能技术应用力度,通过创设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新型育人环境,为学生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在此背景下,智能技术与教学各环节的融合程度不断深入,智能技术与教师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人机协同”的教学伙伴关系,智能技术的加持有效地帮助教师避免重复性工作,但也造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可能会变弱(张培蓓, 2020),教师不再是唯一的传授者(史闽瑞, 2020),对教师的认同标准越来越高,教师对自己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胥兴春, 2018),教师面临着社会评价和自身评价的矛盾,时代挑战和自我素质的失衡(侯滢斯, 2020),这就产生教师对自身价值和成就持否定态度(张培蓓, 2020),教师面临着更大的教学压力,教师身份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基于此,本研究从人机协同教学情境入手,对新情境中教师身份认同的内涵及基本结构进行探索。

二、人机协同教师身份认同内涵

身份认同就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识,是个体在自己身处的群体中对个人认知以及表达的系统进行建立,是个体对于自己的工作内容、自己的身份以及在社会中自己所身处的角色的基础上对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语言表达或者做一些主观行为进行表现。(史闽瑞, 2020)。一般身份认同被细分为两种,分别是自我、社会身份认同,其中:自我身份认同指个体对于自身的身体经历以及自己的心理路程的强烈认同,这也是个体对于自己身份一种明确的过程;社会身份认同则在人的社会属性上进行聚焦。

教师身份认同主要是通过社会身份与自己身份进行相互结合的方式对外展现。泰科勒(Tickle.L.)认为教师身份认同不局限于教师自身的学历生活背景以及个人的实践经历,其实也包含了教师在社会上所面对的期待。国内学者李茂森深入研究了影响身份认同的几个因素,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以及认同的本质意义等角度对教师身份认

作者简介:李远航(1976—),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数字化资源开发;

杨朔(1999—),女,本科,初职,研究方向为小学信息科技教学。

同进行了剖析。李茂森认为其实教师身份认同不是一蹴而就式的，而是渐进式的，需要教师个体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己身处的文化环境中对个人身份进行构建。

人机协同是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工作的新情境，强调教师与智能技术共同分担教学任务。结合身份认同的内涵，本研究将人机协同中的教师身份认同描述为在教师与智能机器共同完成教学过程中，对自我认识的确认和重构，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描述。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样本和工具

1.研究样本。为了了解新教学环境下教师身份认同的情况，本研究选取河北省有在智能技术环境中进行学习和教学经历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发放问卷 201 份，回收 201 份，问卷的回收率达到 100%；剔除 24 份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77 份，有效率为 88.10%。

2.研究工具。为了了解教师身份认同的结构，研究结合人机协同教学环境的特色，编制《人机协同教学中教师身份认同的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用于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如性别、年级、专业，共 3 个题项；第二部分为对身份认同的调查，用于了解智能技术进校园后教师身份认同的基本情况，共 21 个题项，本部分的题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量表进行描述，被试者按照自己的情况进行打分。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1.信度分析。研究利用 SPSS 22.0 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是 0.905，而且每个变量的信度系数数值均大于 0.7 (0.917, 0.873, 0.847, 0.737)，表明问卷具有良好信度。

2.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对量表进行效度分析。经初步验证，样本的 KMO 值为 0.946，Bartlett 球形检验值达到 0.000 显著水平，样本数据拟合度较高，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验证因子负载，保留特征值大于 1、因子载荷超过 0.5 的主成分作为因子，最终得到有效项目 21 个，方差解释率为 69.184%，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均超过 0.5，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研究将人机协同环境中教师身份认同划分为四个维度，根据每个维度所包含题目，分别命名为：技能认同、地位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1.人机协同环境中的技能认同。教师技能认同指教师为了能胜任教育工作而表现出来的努力提高其教师职业技能的行为倾向，具体测量题项如“我对有智能技术参与的教学活动充满激情”“与智能技术协同教学，能使我的工作得到较大的提高”“与智能技术教学给我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等。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技能方面不断提高自己。教学中应用智能技术给教师提供了便利，也因为教师工作习惯和个人习惯的原因给教师带来了压力，教师需要不断充实自己，适应不断发展的智能技术。对本研究中的技能认同做描述分析，技能认同得分均值都高于 3 分，平均得分约为 4.177 高于中间值 3。最高一项为与机器协同教学给教师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4.25 分)；最低一项为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竞赛活动 (4.11 分)。说明教师在技能认同方面对与机器协同教学表现出明显的认可态度。

2.人机协同环境中的地位认同。教师地位认同指的是教师的社会地位所持的积极评价，具体测量题项如“虽然智能技术参与教学改变了教学模式但我依然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会将教学内容与智能技术相结合，创新地进行有机器参与的教学活动”“我认为有智能技术参与的教学活动能更好地激发自身的潜能，对教学有利”等。对本研究中的地位认同做描述分析，地位认同得分均值都高于 3 分，平均得分为 4.274 高于中间值 3。最高一项为教师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4.35 分)；最低一项为教师可以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 (为 4.18 分)。整体水平偏高，说明教师在人机协同教学中对地位认同态度向好。

3.人机协同环境中的情感认同。教师情感认同是教师乐意将自己看成是一名专业教师和具有长期从事教育工

作的情怀,具体测量题项如“虽然智能技术进课堂改变了我的教学方式但我依然能不断进取,有执着的追求”“虽然智能技术运用到教学后教学过程发生变化但我依然能不断反思教学改正不足,提升教学能力”等。智能技术与教学工作的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的存在,教师是否对教师这个职业还是充满激情,在情感上乐于服务教师行业,不会产生颓废感,是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本研究中的情感认同做描述分析,情感认同得分均值都高于3分,平均得分为4.206高于中间值3;最高一项为教师对颂扬教师职业时感到欣慰(4.33分);最低一项教师对教师话语的质与量的考虑,(4.07分),整体水平偏高,说明教师在情感认同方面对与机器协同教学表现出明显的认可态度。

4.人机协同环境中的价值认同。教师的价值认同是教师对自身职业的意义和作用的积极认识和评价。当教师需与智能技术协同教学时,智能技术强大的分析概括、资源整合能力以及高效的判断力对教师的自我价值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对教师对自身的价值判断造成了影响。为了解教师的价值认同,本研究设计了“虽然智能技术在某些方面比教师更强大,但我依然认为教师具有重要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要重视在人工智能教学中对学生能力和学习方法的培养”等选项。统计结果显示教师的价值认同得分均值都高于3分,平均得分为4.36高于中间值3,教师的责任和使命感得分最高(4.40分);最低一项教师对学生的培养(4.32分)。由统计结果可见,教师对与机器协同教学表现出明显的认可态度,对自身的价值认知情况较好。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整体均值在4.177到4.360之间,整体高于中间状态。对四个维度进行排序后发现,教师在价值认同方面较其他认同要高一点,其次是地位认同和情感认同,而技能认同相较于其他最低。在人机协同教学中教师的身份认同这四个维度整体均高于4,高于中间状态,说明教师在与机器协同教学时对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认可状态。

四、思考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文献调查法,确定问卷的题项信息;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界定教师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人机协同环境中教师身份认同感由四个因子构成,分别为技能认同、地位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其中教师对价值观念的认同度最高,地位认同居其次,对情感、技能的认同度最低。第二,根据数据分析发现,教师的整体身份认同超过4分(4.254),身份认同度高。价值认同最高,均数达到4.360,处于较高水平。教师认为对与机器协同教学自身的价值能得到一个较好发挥,能促进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和对学生的培养,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第三,教师对地位认同度比价值认同度略低,有4.274。反映当前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对教师地位带来的冲击,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教师对这个维度身份认同呈现出较平和状态,分值都比较高,说明教师面对与机器共同教学而带来的危机,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度。只有正视教师发展中的困难,才能保障教育教学在发展中顺利进行。第四,教师的情感认同度较好,达到4.206。教师表现情感的对象主要有教师职业和教学过程。在这两个方面,教师对教师职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较强。当别人表达对教师职业的感情时,教师自身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情感认同,这表现了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当智能技术进入教学成为一种趋势,当教师与智能技术协同教学成为一种教学常态时,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角色,建立身份认同感和职业认同感,是教师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问题,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身份认同是处于运动状态的并不断发展进步的,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需要教师主观能动的参与。当智能技术出现并应用到教学中而产生身份认同问题是,应积极应对,抓住机会学习新事物,在学习新技术的基础上,积极思考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路径和方式,积极思考新技术导向下的新工作范式,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专业素质和数字化素养,成为积极的技术使用者。

2.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提升教师身份认同感。教师需要积极投身于自己的职业中,不断进行自我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适应新时代下的新需求。增强教师的职业技能和教学能力等素养,积极组织教师去进修学位、邀请专家来指导教师教学、学习智能技术的相关知识。教师教学的自信心提高,来源于学生的认可度也会不断的提升,教师被认可以后身份认同感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从而进入良好的循环状态,以适应新时代下对教师的新要求。

3.教育改革发展,智能技术进入课堂与教师进行协同教学,当教师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时,应积极地应对,

帮助教师进行身份认同的重构。教师是人机协同教学的发展者,帮助教师稳定度过身份认同危机,建立职业自信。

参考文献:

- [1]方丽娟.以智慧教育引领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J].天津教育,2021(14):174-175.
- [2]Lebkuecher Gina,Hornewer Marley,Samoska Sydney,Khan Sarah,Rempala Kit,Vukov Joseph. Bioenhanced "Virtues" May Threaten Personal Identity[J]. AJOB Neuroscience,2021,12(2-3).
- [3]万雅莹,戴志娟.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背景下高职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实证研究及启示[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1,34(08):60-62.
- [4]展素贤,薛齐琦.我国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构建:自我感知与情境塑造[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1,25(02):46-54.
- [5]王冠.大数据时代高校青年外语教师身份认同及专业发展[J].英语广场,2021(09):99-101.
- [6]李俊丽,李桂花.“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英语专业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探析[J].校园英语,2020(43):28-29.
- [7]李鹤春,范木娇,张银起.乡村小学小科教师“身份”与“身份认同”的理性思考[J].农家参谋,2020(23):195+217.
- [8]李心钰.高校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研究[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04):73-75.
- [9]张培蓓.“互联网+”背景下安徽省高校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现状的研究与对策[J].科教导刊(中旬刊),2020(08):74-75.
- [10]史闽瑞.信息时代高校英语专业教师身份认同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0(04):96-97.
- [11]侯滢斯.课程改革中教师个人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研究[J].教育现代化,2020,7(12):77-79.
- [12]龚孟伟.高校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成因与对策——基于积极心理学视野的策略考察[J].安康学院学报,2019,31(06):1-5.
- [13]容中逵.教师身份认同构建的理论阐释[J].教育研究,2019,40(12):135-144.
- [14]安坤伟.“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英语教师身份构建研究[J].海外英语,2019(14):137-138.
- [15]胥兴春,徐雪.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身份认同问卷编制及现状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8(07):38-46.
- [16]寻阳,孙丽,彭芳.我国外语教师身份认同量表的编制与检验[J].山东外语教学,2014,35(05):61-67.
- [17]范兴华,陈锋菊,刘文,张尚晏.六年制免费师范生的教师职业认同结构及特点[J].心理研究,2014,7(02):81-85.
- [18]马红宇,蔡宇轩,唐汉瑛,吴伦敦,李凯,周宗奎.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的内在结构与特点[J].教师教育研究,2013,25(01):49-54.
- [19]杨华利,郭盈,黄涛,赵媛.人机协同支持下的小学英语写作教学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0,30(04):74-80.
- [20]祝智庭,俞建慧,韩中美,黄昌勤.以指数思维引领智慧教育创新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01):5-16+32.

Research on Teacher Identity i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ontext

Li Yuanhang¹, Yang Shuo²

¹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²The Third Primary School of Caofeidian District, Hebei, Tangshan 063200, China

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to teaching practices. This technological shift provides substantial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introduces a novel teaching scenario characterized by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Focusing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this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this study centers on teacher identity as its core subject. Grounded i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t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er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structure and levels of such identity are delineated,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eacher identity withi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Identity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的收集、甄别与利用机制探析

张洪玉¹

(1.烟台文化旅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 本文以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其定义、范围与特点, 深入探讨其对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的价值与意义。研究发现, 稿纸档案具有原始性、动态性、分散性和专业性等特征, 是记录教师教学科研过程的珍贵资源。针对高职院校稿纸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科学规范的收集与甄别机制, 包括多渠道收集、分级甄别和标准化管理流程。同时, 构建了档案利用的多元化开发途径与服务体系, 如数字化编研、案例库建设、权限分级管理和特色服务模式。研究建议高职院校应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完善资源共享机制, 充分发挥稿纸档案在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中的作用。

关键词: 高职院校; 专任教师; 稿纸档案; 收集机制; 甄别标准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18

一、引言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高职院校发展的关键环节。教师档案作为记录教师专业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 是评价教师能力、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依据。然而, 目前高职院校教师档案管理多聚焦于正式成果(如论文、教材、获奖证书等), 而忽视了教学科研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手写材料(如教案草稿、科研笔记、教学反思等)的价值。这些原始手写材料, 即本文所指的“稿纸档案”,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性证据, 具有独特的研究与应用价值。稿纸档案是教师在教学、科研及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手写材料, 如教案草稿、实验记录、教学反思笔记等, 它反映了教师思维的原始状态、教学设计的迭代过程和科研探索的思考轨迹。在职业教育强调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背景下, 稿纸档案不仅是教师专业成长的见证, 更是教学改革、科研创新和师资建设的重要资源。然而, 当前高职院校对稿纸档案的管理仍存在诸多问题: 收集渠道不畅、甄别标准缺失、管理流程不规范、利用机制不完善等。因此, 建立科学的稿纸档案收集、甄别与利用机制, 对于提升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二、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的定义与特点

(一) 稿纸档案的定义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 是指教师在履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及专业发展等岗位职责过程中, 自然形成的各类原始手写性记录材料的总称。其载体以传统纸质稿纸为主, 涵盖教案草稿、教学反思手记、科研思路札记、实验原始记录、课程设计草图、校企合作方案初稿等多元内容形态。相较于正式出版的教材、公开发表的论文、归档的教学方案等规范化文本, 稿纸档案具有显著的非正式性、原始性与过程性特征, 它完整留存了教师在教学设计、学术研究、实践探索中的思维萌芽、逻辑推演与方案迭代轨迹, 是记录教师专业成长历程、反映教师职业能力发展动态的核心文献载体, 也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与学科专业发展的重要隐性资源。结合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特色与专任教师的岗位工作属性, 其稿纸档案的范围可划分为教学、科研、实践三大核心类别, 具体内容如下:

教学类稿纸档案: 聚焦课堂教学与人才培养全流程, 包括课程教案的多版本草稿、教学重难点分析手

作者简介: 张洪玉(1972—), 女, 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高职档案管理。

记、课堂互动设计草图、学生学习情况反馈记录、教学方法改革尝试的思路笔记、听课评课的心得批注等,是教师优化教学策略、提升教学质量的直接实践记录。科研类稿纸档案:围绕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涵盖项目申报书的初稿与修改痕迹、实验过程中的原始数据记录、文献阅读的批注与摘录、研究思路的推演草图、学术论文的写作提纲与修改草稿、技术攻关的方案设计与试错记录等,是教师科研能力与学术素养的重要体现。实践类稿纸档案:凸显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实践导向特征,包含教师深入企业顶岗实践的工作笔记、校企合作项目的方案初稿、产业技术需求调研记录、实训基地建设的规划草图、学生实习指导的心得总结、技术服务的过程性记录等,是连接理论教学与产业实践的关键纽带。

(二) 稿纸档案的特点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既具备一般人事档案的原始凭证属性,又因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与教师的岗位特征,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原始性是稿纸档案最核心的本质特征。稿纸档案以手写形式为主,完整保留了教师在工作过程中的原始思维痕迹,诸如手写批注、涂改修改、标注符号、思路断片式记录等非正式信息,均是教师真实工作状态与思维过程的直接映射,这些细节信息是经过整理、规范后的正式文档无法替代的,具有极高的凭证价值与研究价值。

动态性:稿纸档案并非静态的文本材料,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时间连续性与内容迭代性。一份完整的稿纸档案往往包含同一主题的多个版本草稿,例如教学设计从初步构想、框架搭建到细节完善的多轮修改稿,科研思路从萌芽、推演到成型的系列札记,清晰反映了教师教学理念、科研思维的演变过程,是记录教师专业能力动态发展的“活态档案”。

分散性:稿纸档案的形成与保管具有较强的个体性特征。这类档案多由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自主创作、分散保管,缺乏统一的收集标准与管理规范,部分档案甚至随教师的工作变动而转移,极易形成“信息孤岛”。这种分散性不仅增加了档案收集与整理的难度,也导致其潜在价值难以得到系统性挖掘与利用。

专业性:相较于普通高校教师档案,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的专业性更凸显职业教育特色与实践导向。档案内容紧密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技术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无论是教学方案设计、科研项目选题,还是实践活动记录,均与区域产业发展、行业技术需求高度关联,体现了职业教育“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是彰显高职院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档案资源。

价值性:稿纸档案的价值具有多元性与长效性。从个体层面看,它是教师复盘教学过程、梳理科研思路、总结实践经验的重要依据,能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精准的自我诊断与优化方向;从院校层面看,它是高职院校开展师资队伍建设、推进教学改革、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参考资源,能够为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提供扎实的实践支撑。

三、稿纸档案的价值与意义

稿纸档案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价值,不仅能完整记录教师成长轨迹,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稿纸档案可清晰追踪其教学风格演变与专业能力提升路径,为个人反思和职业规划提供客观依据,还能借助教学反思手记等核心内容助力教师系统梳理教学实践中的经验与问题,有效提升反思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在“双师型”教师认证中,企业实践笔记、技术攻关草稿等材料可作为实践能力的重要佐证,强化能力认证的可信度。

稿纸档案对院校教学质量提升与科研真实性保障同样意义重大,在教学层面,教案草稿的迭代痕迹可为教学设计优化提供直观参考,助力发现并改进不足,教学反思手记与设计草图所记录的创新尝试能为教学方法改进和模式创新提供实证支撑,而产教融合相关记录还可作为教学改革的具体案例参考;在科研层面,科研原始数据、研究思路草图等能完整留存科研过程,为成果溯源和学术诚信提供核心证据,其版本迭代与修改痕迹可辅助科研管理部门判断研究的严谨性与创新性,为科研评价提供客观依据,同时技术攻关草稿、产业调研记录等也能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重要参考。

四、稿纸档案的收集与甄别机制

基于高职院校专任教师稿纸档案分散性、动态性的核心特征,构建科学规范的多维度收集机制是实现档案有效管理的前提。在收集渠道构建上,应打破单一化收集模式,建立“教师主动提交-系部定期归集-科研项目专项收缴”的三维联动体系:一方面通过宣传引导强化教师档案归档意识,鼓励其在教学科研实践中同步整理并主动提交具有保存价值的手稿材料;另一方面明确系部档案管理员的岗位职责,按学期或学年开展常态化集中收集工作,确保档案收集的时效性与连续性;同时在科研项目管理全流程中嵌入档案收集要求,将科研原始记录、研究手稿等材料作为项目结题的必备审核要件,由项目负责人专项提交。在收集流程规范上,需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三类档案的不同属性制定差异化操作规范:教学类稿纸档案实行“学期末集中提交”机制,由教师整理提交教案草稿、教学反思手记等材料,经系部初审核验完整性后移交学校档案馆;科研类稿纸档案实行“项目全周期追踪”机制,在项目立项阶段即明确档案收集范围与标准,结题阶段由科研处对相关手稿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核后统一移交归档;实践类稿纸档案实行“项目结束即时归集”机制,针对教师企业实践、校企合作项目等活动形成的手稿,由教务处或校企合作中心牵头收集,经实践单位与院校双重核验后完成移交,确保各类档案收集流程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稿纸档案的甄别是保障档案质量、提升利用价值的关键环节,需结合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办学特色与不同类型档案的核心价值,建立多维度、差异化的甄别标准体系。对于教学类稿纸档案,甄别核心聚焦其教学支撑价值,重点考量三方面维度:一是教学设计价值,重点审查是否完整记录教学设计的创新思路、方案迭代过程及教学重难点的突破策略,能否为教学优化提供有效参考;二是教学反思深度,关注手稿中是否包含对教学实施过程、学生学习效果的客观分析,以及针对教学问题提出的具体改进措施,体现教师反思性实践能力;三是师生互动价值,核查是否记录师生互动中的典型问题、解决路径及教学反馈信息,为学情分析与教学策略调整提供实证支撑。对于科研类稿纸档案,甄别核心聚焦其科研真实性与严谨性,核心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数据真实性,严格核查手稿中是否包含原始实验数据、现场观察记录、调研问卷原始信息等一手资料,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二是思路完整性,审查是否系统记录研究思路的形成、推演、修正全过程,清晰呈现科研逻辑的演变轨迹;三是过程可追溯性,确认手稿材料能否完整支撑科研成果的形成过程,为学术诚信核查与成果溯源提供可验证的依据。对于实践类稿纸档案,甄别核心聚焦其产业对接与教学转化价值,主要考量三方面标准:一是产业对接度,审查手稿是否真实记录与区域产业需求、行业技术标准对接的具体实践内容,体现产教融合的实践成效;二是技术应用价值,关注是否包含技术攻关中的关键问题、解决方案及技术创新点,反映教师的实践技术能力;三是教学转化可能性,评估手稿内容能否为课程内容更新、实训项目开发、教学案例设计提供直接参考,实现实践成果向教学资源的有效转化。

规范的管理流程是保障稿纸档案有序保存、高效利用的基础,需建立涵盖标准化整理、全周期版本控制、精准化归档时限的闭环管理体系。在标准化整理流程方面,需遵循“分类清晰、整理规范、著录精准”的原则,严格执行全流程操作规范:首先进行组件整理,按教学、科研、实践三大类别对稿纸材料进行系统归集;其次开展材料修整,去除金属装订物、修复破损材料,保障档案物理完整性;随后完成装袋标注,将整理后的材料装入专用档案袋,清晰标注档案名称、形成时间、责任人等核心信息;进而实施三级分类,按照“年度-教学单位-课程/项目”的分类标准进行系统化分类,确保档案检索的便捷性;再按时间顺序或版本迭代顺序完成材料排列,清晰呈现档案的时间脉络与演变过程;随后进行组卷编目,将关联性材料组成案卷,标注案卷标题、起止日期、卷内材料清单等信息;最后完成编页著录,对每页材料进行规范编号并在档案管理系统中精准登记,完整录入关键词、元数据等信息,实现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与精准检索。在版本控制机制方面,需建立全周期版本管理体系:一是制定统一的版本号规则,采用“主版本号.次版本号”的规范标识方式,如教案 V1.0、科研手稿 V2.1 等,清晰区分不同修改阶段;二是实施标准化版本标记,在每份稿纸档案显著位置标注版本号、修改日期、责任人及修改说明,确保版本追溯的清晰性;三是建立重要版本留存机制,针对核心修改版本、关键迭代节点的手稿进行完整存档,形成覆盖全演变过程的版本记录,为研究教师思维演变与专业成长提供完整依据。在归档时间要求方面,需结合各类档案的形成规律制定差异化时限标准:教学类稿纸档案需在每学期结束后 1 个月内完成归档,确保教学档案的及时性;科研类稿纸档案需在项目结题验收后 2 个月内完成归档,保障科研档案与项目管理的衔接性;实践类稿纸档案需在企业实践或校企合作项目结束后 1 个月内完成归档,避免实践档案的流失,通过明确的时限要求确

保各类档案归档工作的有序推进。

五、稿纸档案的利用机制与服务体系

稿纸档案的利用开发需立足其原始性、专业性与价值性特征,构建以数字化为基础、案例化为核心、改革赋能为目标的多元开发途径体系,最大化释放档案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效能。在数字化编研层面,需以“保真+赋能”为核心目标推进全流程数字化转化:对兼具历史价值与实用价值的重要手稿实施高精度扫描备份,建立“纸质原件+电子备份”的双轨保存模式,保障档案的安全性与可及性;同步开展规范化元数据标注工作,围绕学科门类、学段层次、教学方法、应用场景、科研领域、实践主题等核心维度设定元数据字段,提升档案检索的精准度与高效性;依托文本分析技术对数字化档案内容进行深度挖掘,系统提取教学设计创新点、科研思路演进逻辑、实践技术应用经验等关键信息,形成结构化信息资源库,为后续开发利用奠定基础。在案例库建设层面,秉持“分类建设、精准赋能”原则构建三大特色案例库:教学案例库聚焦优秀教案草稿、教学反思手记等材料,按“学科+教学方法+应用场景”的三维分类标准进行系统梳理,筛选具有示范价值的教学迭代案例,为教师教学设计优化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科研案例库重点整理科研手稿中的研究思路萌芽、方法创新、问题解决路径等核心内容,形成覆盖不同科研领域的创新案例集,为教师科研能力提升提供思路参考;实践案例库侧重挖掘企业实践笔记、技术攻关草稿中的产业技术应用经验与教学转化路径,构建产教融合特色案例资源,助力实践教学质量提升。在教学改革支持层面,强化档案开发与院校核心工作的深度融合:通过解析教案草稿的多版本迭代轨迹,开展教学设计演变规律分析,总结不同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与适用场景,为教学方法改革提供实证支撑;依托实践类稿纸档案中记载的校企合作细节、产业需求调研数据等原始信息,开展产教融合实施路径与成效研究,为院校产教融合机制创新提供数据支撑与实践依据;通过系统整理科研手稿中的原始数据记录、思路推演过程、方案修改痕迹等内容,实现科研过程的可视化呈现,为科研管理部门开展过程性评价、优化科研管理机制提供直观参考。

构建科学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保障稿纸档案高效利用的关键支撑,需围绕“精准服务、安全可控、场景拓展”的核心目标,打造涵盖权限管理、场景适配、平台赋能的全方位服务架构。在权限分级管理方面,基于“权责对等、安全优先”原则建立四级权限管理体系,实现档案资源的精细化管理:赋予教师个人对自身全部稿纸档案的查阅、回溯权限,支撑教师开展自我反思与专业成长复盘;赋予系部对本系部教师教学类档案的查阅权限,为系部开展教学评估、教师发展规划制定提供数据支撑;赋予校级管理部门(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等)对全校教师科研类、实践类档案的查阅权限,服务于全校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管理优化、产教融合推进等宏观工作;针对外部用户(如兄弟院校、科研机构等)实施审批准入制度,仅开放非涉密、可公开的档案内容,同时明确查阅范围与使用规范,保障档案信息安全。在服务场景拓展方面,立足院校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研创新、产教融合等核心工作需求,拓展多元化服务场景:在教学竞赛备赛场景中,为参赛教师提供历史优秀教学档案参考,助力其精准把握竞赛导向、优化参赛作品;在新教师培训场景中,搭建“资深教师-新教师”的档案传承桥梁,通过分享资深教师的教案迭代过程、教学反思经验等档案材料,帮助新教师快速掌握教学技巧、提升教学能力;在科研诚信审查场景中,将科研手稿中的原始数据、过程记录作为学术诚信核查的重要依据,通过比对科研成果与原始档案的一致性,验证科研过程的严谨性与真实性;在产教融合项目申报场景中,整合实践类稿纸档案中的企业调研数据、合作方案草稿、技术需求分析等原始材料,为校企合作项目申报提供扎实的实践依据与数据支撑。在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方面,以“用户为中心”构建集检索、推荐、反馈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平台:优化平台检索功能,支持关键词检索、多维度组合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实现档案资源的快速定位;嵌入智能推荐算法,基于用户身份、查阅历史、工作需求等信息,精准推送相关档案资源,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建立用户利用反馈机制,实时记录档案查阅频次、利用场景、用户评价等信息,形成“开发-利用-反馈-优化”的闭环管理,持续提升档案服务质量与开发水平。

六、高职院校稿纸档案管理的优化建议

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是破解稿纸档案分散性难题、提升管理效能的核心路径,需立足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战略,构建“技术赋能-功能完善-安全可控”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在系统功能完善层面,应聚焦稿纸档案的特殊性

优化核心功能模块：集成高精度 OCR 识别技术，实现手写稿纸文本的精准识别、提取与结构化处理，打破传统纸质档案的检索壁垒，提升档案利用的便捷性；建立标准化元数据管理体系，结合高职院校学科专业特色与教学科研需求，科学设定学科门类、学段层次、教学方法、科研领域、实践主题等核心元数据字段，实现档案资源的精细化分类与精准检索；嵌入智能版本控制功能，通过系统自动标记版本号、记录修改时间与责任人，构建全周期版本追溯链条，确保档案历史演变轨迹的完整留存。在技术选型与实现层面，需秉持“实用性、兼容性、前瞻性”原则精准选型：采用 B/S 架构搭建档案管理系统，支持 PC 端、移动端等多终端访问，满足教师远程查阅、异地利用的需求，提升服务的可及性；融合云计算技术构建分布式存储平台，实现档案数据的安全备份与弹性扩展，同时依托云服务提升档案检索与数据处理的高效性；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数字化档案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提炼教学设计规律、科研创新路径、实践教学经验等核心信息，为院校教学改革、科研管理、师资建设等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是释放稿纸档案多元价值的关键举措，需构建“校内统筹、校际协同、社会联动”的多层次共享体系，同时兼顾共享效率与信息安全。在校内资源共享层面，实施分类分级共享管理模式：对于教学案例库、优秀教学反思手记等普适性强、无涉密风险的资源，实行无条件全开放共享，供全校师生自由查阅借鉴；对于科研原始记录、技术攻关草稿等涉及科研隐私与知识产权的资源，实行有条件共享机制，需经课题组或相关负责人授权后方可查阅，同时明确查阅范围与使用规范；建立权限动态调整机制，结合档案利用频次、教师岗位变动、院校发展需求等因素，实时优化共享权限设置，实现资源共享的精准适配。在校际资源共享层面，以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依托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立高职院校稿纸档案共享专栏，推动同类院校间优质教学、实践类档案资源的互通互鉴；牵头组建区域高职院校稿纸档案联盟，制定统一的资源共享标准、数据规范与版权保护协议，破解校际间档案格式不统一、共享流程不规范等难题，实现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定期开展校际档案管理经验交流与资源对接活动，提升整体档案开发利用水平。在社会资源共享层面，深化产教融合与社会服务导向：与行业企业建立实践类档案共享合作机制，定向共享企业实践记录、技术应用案例等资源，为企业技术研发、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同时吸纳企业技术需求信息优化档案开发方向；通过开源协议向社会开放优质教学案例库、科研创新案例库等资源，主动服务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模式与科研创新的协同进步。

加强档案编研与应用是提升稿纸档案实用价值的核心抓手，需秉持“内容创新、方法优化、成果转化”的核心思路，推动档案资源向教学科研资源的高效转化。在编研内容创新层面，突破传统编研模式的局限，打造特色化编研成果：构建教学设计可视化图谱，通过梳理教案草稿的多版本迭代轨迹，将教学设计的思路演变、方法优化、重难点突破路径等内容可视化呈现，直观展现教学创新过程；开展科研思路演变专项编研，系统整理科研手稿中的研究萌芽、思路推演、方案修正、成果形成等全流程记录，清晰呈现科研创新的思维路径，为教师科研能力培养提供鲜活案例；汇编实践经验集锦，精选企业实践、校企合作等场景中的典型案例，提炼技术应用经验、产教融合实施路径、实践教学转化方法等核心内容，形成针对性强的实践指导材料。在编研方法优化层面，构建多元化协同编研机制：建立档案馆、教务处、科研处、系部等跨部门协作团队，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收集-整理-编研-应用”的闭环协作流程，提升编研工作的系统性；邀请教学名师、科研骨干、行业专家参与编研过程，从专业视角对编研方向、内容筛选、成果优化等提出建议，提升编研成果的专业性与实用性；坚持用户需求导向，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式精准掌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等不同群体的核心需求，针对性开展编研工作，确保成果贴合实际需求。在编研成果转化层面，搭建“档案资源-教学科研资源”的转化桥梁：将优秀教案草稿、教学反思等编研成果转化为微课、教学课件、教学案例解析视频等可视化教学资源，直接服务于课堂教学；依托科研思路编研成果，梳理科研创新点与技术应用前景，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提供思路支撑与技术参考；将实践类编研成果转化为师资培训教材、实训指导手册等材料，用于新教师岗前培训、“双师型”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精准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建立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是确保稿纸档案管理工作长效推进的制度支撑，需构建“激励引导、保障有力、权责明晰”的制度体系。在激励机制建设层面，将档案工作与教师发展深度绑定：把稿纸档案的规范提交、积极参与档案开发利用等情况纳入教师年度考核、绩效考核体系，明确考核权重与评价标准，形成正向引导；在职称评

审、评优评先等工作中,将稿纸档案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性证据,重点考量其在教学创新、科研突破、实践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凸显档案的价值认同;设立专项奖励制度,对积极提交优质档案、参与档案编研并取得显著成果的教师、团队给予表彰与物质奖励,激发教师参与档案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保障机制建设层面,筑牢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支撑:强化经费保障,将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修复、编研开发、人员培训等经费足额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建立经费动态增长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加强人员保障,配备兼具档案管理专业素养、职业教育认知与信息化技能的复合型档案管理人员,同时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提升档案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完善安全保障体系,建立档案物理安全与信息安全双重防护机制,加强纸质档案的防潮、防火、防虫等保管措施,对数字化档案实施数据加密、访问日志监控、病毒防护等技术防护,同时制定档案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安全演练,确保档案资源的完整与安全。

七、结语

稿纸档案是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过程性记录,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研究从其定义、范围与特点出发,系统剖析了档案价值,构建了科学的收集甄别机制与多元化利用服务体系,并提出针对性管理优化建议。稿纸档案的规范管理与有效利用,可精准支撑教师专业成长、教学设计优化与科研创新,为教学质量提升及产教融合发展提供重要资源保障。未来,随着教育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高职院校需积极探索稿纸档案与新兴技术的融合路径,深化档案潜在价值挖掘,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 [1]王莉. 新时代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困境与突破策略[J]. 兰台内外, 2025, (28): 22-24.
- [2]吴君怡. 高职院校构建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体系的安全保障策略[J]. 四川劳动保障, 2025, (16): 112-113.
- [3]张倩. 面向技能训练的高职院校学生档案数据素养教育[J]. 山西档案, 2025, (08): 154-157.
- [4]王冰楠. 职业本科背景下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的难点与对策[J]. 办公室业务, 2025, (13): 138-140.
- [5]王冰楠. 新时代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作用与启示[J]. 办公室业务, 2025, (11): 100-102.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for collecting, screening, and utilizing manuscript archives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ang Hongyu¹

¹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handong, Yantai 2640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manuscript archives of full-time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definition, scope,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deeply explores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manuscript archives are characterized by originality, dynamism,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are valuable resources that record teacher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cesses.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manuscript archiv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collection and screening mechanism, including multi-channel collection, graded screening,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processes. At the same time, it construc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aths and service systems for archive utilization, such as digital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case library construction, permission graded management, and characteristic service model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archive informatization, improve the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and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manuscript archive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ull-time teachers; manuscript archives; collection mechanism; screening criteria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学生参与权

邢海燕¹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要:构建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既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内在需求,也是促使高校由传统管理向利益相关者协商治理模式转变的突破口。治理视阈下,内部质量保障的建设涉及多元治理主体,多主体的互动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其中,学生参与权被虚置,参与权的核心——决策权利被忽视。打破内部质保中学生参与权发展不充分需要以健全制度为基础,细化章程为依据,厘清学生组织职能为保障。

关键词: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治理;学生参与权;决策权

基金项目:中国消防救援学院2023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行业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研究》(2023ZLGLO1Z);中国消防救援学院2025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多模态数据驱动下的学习绩效评价路径与策略研究》(2025ZLGL0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17

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进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时代,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格局因“质量问题”而改变,与此同时治理理念兴起,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障逐渐成为共识。学生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与高校构成平等的契约关系,对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享有参与权。但因我国高校过去处于中央统一管理机制,对利益相关者权利认识不够,参与机制尚待健全,故学生参与权在高校权力配置格局中被隐蔽,窄化为单一的质量“举证”行为,参与权被虚置。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从根本上要求多方面参与,共建共治共管。¹迁移至内部质量保障建设中,认识并充分保障学生参与权的行使是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体系的着力点,亦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点。

一、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被定义为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久过程,是一种从控制走向协调的持续的互动。²大学治理包括内外部治理,外部治理的要点在于高等教育子系统结构、关系、功能的重新建构,而内部治理则强调打破传统管理者单一决策角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构建由大学内部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机制。内部质量保障建设作为典型的内部治理行为,其涉及到大学内部众多利益相关者,是多元主体权力相互协调、制衡的复杂过程。

(一)内部质保体系中存在多元治理主体

多元治理主体是治理的逻辑主线。罗伯特·罗茨(R.Rhodes)指出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过程,或者是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或者是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³罗茨在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时强调,治理需要各种行为体的合作互动,而这种协作与互动会形成一种自组织网络,这种自组织网络是自主的而且是自我管理的网络,从而实现社会系统的良好发展。简·库伊曼(J.Kooiman)和范·佛利艾特(M.Van.Vliet)将治理看做一种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出现的模式或结构,它是所有被涉及的行为者互动式参与努力的“共同”结果。他们指出,“治理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所以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⁴可见,多元化的主体是治理的前提与主要逻辑线,谈及治理话题,区别于传统的管理,必然涉及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作者简介:邢海燕(1991—),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教育政策评估。

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包括以党委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以校长为核心的行政权力,以专家学者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以学生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为主的利益相关者权力四种。依据法律法规,不同主体权力范畴得以确定,达到了主体之间的平衡。《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党委系统依据政治权力实施对学部、院(系)党委系统自上而下的逐层控制,影响高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决策,决定了高校发展的方向与性质。行政权力则是以校长为核心的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实施管理。同时,为厘清高校内部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边界,2014年审议通过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指出:“高等学校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学术委员会代表行使学术权力,依法对于学科建设、教师聘任、教学指导等事务承担相关职责并管理各基层学术组织。利益相关者权力则主要通过各种组织行使自身权力,如学生会、校董会、教职工大会等。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根植于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呈现出体系内多元主体架构的特征。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建设起始阶段,由于大学内部责任划分不清,学校内部就“谁对质量保障负责”而产生疑惑。随着内部质量保障建设工作的推进,其逐渐呈现“系统”、“刚性”和“常态”的特征,⁵内部质量保障突破了某一职能部门,某种权力范畴,成为多主体参与的共同事项。一般来说,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管理制度体系由校、院两级管理,或在两级之间增设质量管理的专门机构。学校层面以学校党政一把手,校长及分管学校教学的副校长为核心形成决策机构;学校层面下,以教务处为核心,在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下进行日常工作安排,对全校的质量管理活动进行统筹把控并主导质量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反馈;院系作为主体架构中“沉重”的部分,在学校整体组织架构中,其主要是执行学校质量管理相关规定,并且反馈基层信息以供决策机构参考。在院系内部亦形成了一个多主体参与的架构,一般以院党政领导组织成立院系质量决策机构,根据自身院系发展现状、特征结合学校大的质量管理方向做出决策,以下设有院(系)教学办公室、督导组等机构来对院系的质量问题进行把控,落实相关质量文件。不论是在整个体系中,或是分解两级来看,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中均存在多个主体,表现为既有党政系统、行政系统还有学术委员会等相关主体。

(二) 内部质保体系涉及了复杂权力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关系,所谓的权力依赖,是指参与公共活动的各个组织,无论其为公营还是私营,都不拥有充足的能力和资源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⁶多元主体间的权力依赖使得单一的主体无法维持系统的运行,只有多主体共同参与,构建资源共享机制才能够对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达成协商一致的行动策略。权力依赖关系的成立打破了原有权力结构,多主体间的权力“主次”地位变得模糊,同时,随着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权力也处于不停的扩张。这样的改变导致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打破了“固定特征”,变得动态且复杂。

大学是一个由各种学科和不同层次的行政组织组成的学术组织系统,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是大学的组织特征和权力现象,学术权力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发挥着支配的作用,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维系着高校组织的存在和发展。⁷除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外,还存在相对较弱的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权力。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参与,不同的主体带有不同范畴的权力,受到环境影响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行政权力逐渐僭越学术权力,二者形成冲突,同时,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参与权、监督权的诉求日益增长。一般来说,将质量标准内化,形成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设计的决策系统是校长、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职能部门,质量保障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和其他教学科研辅助部门则主导了内部质量保障的执行,可以说行政权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内部质量保障的构建及运行秩序,同时,行政权力在持续扩张,学术权力在内部质保权力结构中受到“挤压”。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⁸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权力结构的边界模糊特性和外在环境的变化都刺激了权力的膨胀。随着全面质量管理、量化管理、程序化管理等技术的进入,行政人员不仅在以上部门中呈现出数量的增长,更体现于权力的扩大。传统意义上,作为人才培养的直接参与者与设计者,教师应最有权决定教学的安排、课程设计、学生考评等内容,但为迎合标准化的质量评估,教师自由决定的权力被限定在行政权力划归框架之下,表现为教师对于教学、课程、成绩评定等方面的自由决定须符合行政权力对课程开设、成绩要求等方面的规定。同时,随着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身份逐渐受到认同,大学场域内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学生主体对内部质量保障提出了高层次参与的诉求。在质保建设初期,学生参与的空间较为狭窄,形式局限于“质量举证”,即用大量的学生调查结果(教评、课程评价、毕业生调查、在校生调查)与行为数据反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在质保体系整体设计及质保工具设计的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学生参与则处于“空白状态”。随着质量保障的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程度加深,

学生对参与权的诉求由以建议权为核心的初级层次,逐步发展至以行动权为核心的中级层次和以决策权为核心的高级层次。⁹

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从根本上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实现协同治理,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实践与经验指出只有围绕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形成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多主体之间共同协作的“强联系”¹⁰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结合学校发展愿景与学生个体发展意愿为一体的质量文化以推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这样的“质量文化是基于管理者、老师和所有学生的主动要求改进的意愿,而不是对高校质量管理制度、要求和程序的服从和配合,更不是一种妥协,它独立于任何官僚化的程序和规范。”¹¹

二、学生参与权内涵与价值

重视学生主体地位是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完善的内部治理需对高校内不同性质权力予以合理架构,关注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学生的权利落实。

(一) 学生参与权内涵

“参与”一词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其定义为“参加(事务的计划、讨论、处理)”。政策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参与的研究范畴得到了极大拓展。在政策科学理论视域下,参与被视为“公众参与”、“公民参与”、“大众参与”、“公共参与”等词汇的简称,直接指向了参与的对象,即公共政策,折射的是公平公正、共同协商、高度涉入等价值观。斯凯夫顿报告(Skeffington Report)将公众和政府共同作用,一起制定行政公共政策和议案的行为称为参与,并指出:“参与涉及言论和行动两个方面,充分的公众参与,只实现于公众能够积极参与制定规划的整个过程之时。”¹²;谢尔·阿斯汀(Sherry Arnstein)在《市民参与的阶梯》一书中指出:“公民参与是对公民权力的一种表述。这些权力,能够使那些原本没有权力的、当前被从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排斥的公民,有意地参与进来。”¹³;俞可平认为:“公众参与,通常又称公共参与、公民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¹⁴;蔡定剑认为:“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制度,即指进行法律制度的突破性制定、公共集体决策以及进入到公共事务性领域的决策时,作为参与组织者的公共权力机构必须采取开放、多样的方式,实现对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相关利益组织的搜集信息活动、完全听取公众意见的程序,最终要以反馈互动的形式完全对公众意见的回应,实现公众意志对行政公共决策和行政公共治理行为的影响。”¹⁵可见,参与首先体现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是“行为主体卷入群体活动并有所作为”¹⁶;其次,参与不同于“参加”、“加入”等,指向的是公共事务,而非个人事务,是影响公共管理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如内格尔(Stuart S.Nagel)所言,“参与是一种行为,政治制度中的普通成员,通过它来影响或试图影响某结果。”¹⁷

当前,在我国现行教育立法中尚不存在“学生参与权”的正式表达,学界并没有对学生参与权的内涵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多数学者认为学生参与权是一种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活动的权利,如“学生参与权可理解为高校学生作为学校的成员依法享有通过一定方式对学校事务发表意见、参与决策的权利。”¹⁸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参与权的权利范围,“学生参与权主要是指高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参与权、高校具体事项管理参与权和充分参与权三项内容”。¹⁹荣振华、管又飞从新兴权利的视角,指出学生参与权属于新兴权利,高校治理中的学生参与权不仅停留在“参与”的行动层面,更是对某些职能部门的运行产生一定威慑力,能够参与改革校务决策的一种权利。²⁰其二,学生参与权是一种参与高校管理的权力。²¹或有强调“学生权力包含在民主权力之中,学生参与权是学生享有参与大学内部治理权力的简称,是一种影响力,是指学生个人或学生组织基于法律赋予的合法地位和责任。”²²其三,学生参与权是学生参与高校管理,既是作为教育消费者与接受者的重要权利,又是其保障自身利益的合法权力。²³

权利与权力是政治社会中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要素,是公法学上的核心范畴。权利天然有之,先于权力存在,具有原权性和自然正当性。权力来源于权利,通过权利让与政治共同体——国家而获得,权力基于保护权利而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公共性、意志性、强制性等属性。²⁴二者从根本上遵循不同的规则,权利遵循的规则是“法不禁止即自由”,而权力的规则是“法不授权即无权”。学生参与权是“权利”抑或是“权力”取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高校依法设立并承担高等教育职能,代表行使公权力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具有行政性,其有义务开设课程,为学生成长提供所需服务与资源,且在符合法定条件下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现有招生体制及成本分担机制下,学生依据分数自愿选择学校,缴纳一定额度学费,在校服从学校管理,进行课程研读,达标后取得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基于上述法律关系呈现的特征,可以认为,学生与高校实际上建立了契约,属于行政法律关系。那么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则属于行政参与权,是相对人有效地参与行政管理过程并能影响行政决定作出的权利。学生参与内部质量保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应有的权

利, 改变大学内部权力的构成与分配。如果将学生排除在此活动之外, 学生则不能保护自己已有的权利, 也无法获得更多新的权利。结合高校管理活动内容和性质, 学生参与权可被认为是学生主体依法参与学校内部管理, 对相关事项充分行使参与、批评、监督和决策的权利, 其核心是学生有权利参与决策并影响决策结果。具体来说, 学生在内部质保建设过程中的参与权并不局限于现有的征求意见、意见表达或者是证据举证的环节, 更是一种围绕人才培养所形成的直接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集合。学生作为个体或者是群体组织能够了解学校内部质量保障顶层设计的理念、参与学校质量保障规划的制定与决策之中, 并且在质保关键点, 如教学决策、教师评价、教学保障等方面拥有实质的决策权。

(二) 强调学生参与权的价值

强调学生参与权是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²⁵, 利益问题伴随着各类组织的发展, 利益博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各主体为了自身利益, 在组织互动过程中, 不断妥协与融合。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平等地位, 协商式的合作方式, 而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要载体, 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 而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关系的重构与主体间的协调互动。在高校众多利益相关者中, 学生地位之重, 处于核心位置。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 强调学生属于第一层次范畴的利益相关者。²⁷ 内部质量保障是高等教育系统对外质量回应的转化, 同时也是内部系统发展的必然需求, 对我国高校管理而言, 构建内部质保体系是高校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治理模式转化的突破口。在内部质量保障建构范畴内明晰学生参与权, 而非“参与行为”, 有助于重构大学场域内的权力结构, 厘清治理主体及其地位, 更能通过学生参与决策的压力推动高校内部协商治理模式的建构。

强调学生参与权是落实高等教育民主化、法治化的民主化基本要义。学校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行使的是公权力, 而学生参与权的充分行使代表了学生与学校角色地位、交流方式、关系的变化, 从原有的被管理者转化为合作者、协商者的角色。一般来说, 权力与权利是对立的, 权力越大, 权利越小, 反之亦然。对于高校而言, 其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承担公共教育职责, 行使的是公权力性质的行政权力, 权力滥用现象不可避免, 只有通过造就权力对立面的权利才可以制止权力滥用的必然规律。高校在运行权力的过程中, 学生参与权能够起到对高校权力运作的有效监控, 更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学生合法权益, 推进了高校民主化与法治化的进程。学生的参与权保障学生能够参与到高校质量管理的过程中, 能够使得学生个人意志体现于教育的过程中, 这样的管理下, 满足了学生这一主体对权利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追问, 也是形成契约精神的良好契机。学生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 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学校质保事务中, 根本上能够提高质保措施的有效性。

强调学生参与权契合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强调合规到关注发展的变化。“合规”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强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须达到国家或者行业所规定的标准, 这样的教育才是有质量的教育。“合规”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从政府维度出发, 较多地考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 高校组织自身处于被动“迎合”外部评估的状态中, 过度强调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经济发展之间的“对标”, 学生此时完全被置于“被管理者”角色之中, 权利概念无从谈起。大众化程度加深的同时伴随着公众参与渠道的拓展、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等变化, 高等教育质量观从单向度的政府主导开始走向关注“个人发展”, 不仅强调人才培养的“合规性”, 更强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个人发展的潜力与个人意愿, 强调“让学生成为想成为的人”。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中开始突出学生体验, 重视学生学习成果。可以说, 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中, 学生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关注个体受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强调个体的发展。基于此, 学生通过教学反馈、参与高校事务的决策过程和学生组织等途径与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 通过满意度的反馈对高校行动纲领、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和审查, 是参与权落实的表征, 也是高等教育质量观发展的趋势使然。

三、落实学生参与权的路径选择

打破内部质保中学生参与权发展不充分需要以健全制度为基础, 细化章程为依据, 厘清学生组织职能为保障。

(一) 健全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有了较大的进展, 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形成, 但还存在部分表述笼统的问题, 在学生参与权的认定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不仅没有直接的“学生参与权”的表达, 对于“学生合法权益”包含内容也并不明确, 且对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等也无操作细则。从高等教育比较发达和质量保障践行较好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 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学生的民主参与权可有效保证学生权利的践行。“博洛尼亚进程”一直强调“学生参与”, 并积极推动将“学生参与权”落实于各国教育法律法规中。2010年布达佩斯会议对博洛尼亚十年发展进行了总结评价, 并且提出: “我们全力支持教师和学生参与欧洲、国家和院校层面的决策制定机构”²⁸ 各国通过签署宣言肯定了学生在其中的参与权, 赋予了学生参与欧洲地区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合法性。故,健全法律法规,是保障学生参与权落实的根本途径。在法律上确立学生的参与权,并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制定更具体、可操作的细则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学生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中甚至是其他高校内部事务上的参与权。首先可通过修订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对现行的学生参与权进行明文确认。如《高等教育法》第一章“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学生能够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在第四章“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中可增设学生通过学生组织参与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条款;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学生的权利与义务中”明晰学生可参与的范围,除强调学生参与外,还需要对学生的表决权做出规定。

(二) 细化大学章程

除国家的法律法规外,可在大学章程中明确学生参与权。制定大学章程作为高校的一种“立法”活动,在章程中需要明确学生对学校管理活动的参与内容和范围,着重明确其能够参与到决策环节。同时,各校可在制定章程的过程中,考虑到院校实际情况对学生参与权的内涵和边界做出相应规范,既能够保障学生参与权的实现,同时可规避学生参与权滥用的潜在风险。由于大学章程是纲领性的文件,不可能对学生参与的事项面面俱到,所以需要校内配套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来落实学生参与权,尤其是内部质保方面的规章制度中更应对学生参与权做出详细规定。可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健全学生参与的路径。规范学生参与的机制,对个人、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等参与内部质保的决策路径,在相关决策和执行机构中的人数比重安排等内容进行明确说明;第二,建立学生对质保措施及工具的反馈机制。针对目前内部质保反馈机制中,学生层面反馈不到位的情况,可利用网络便捷性、交互性和共享性搭建反馈平台,使得学生直接能够了解到内部质保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方面的讯息,即时反馈个人意见,并能了解到个人意见的采纳程度,通过及时有效的互动促进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理解程度,形成彼此尊重互信的友好氛围,也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参与积极性与效率;第三,完善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在内部质量保障践行的过程中,对于学生成绩评定、个人表现等方面的异议或其他损害学生合法权益的规定,可通过成立申诉处理委员会、学生事务仲裁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来对学生参与权的落实等争议事项作出裁决,给予学生充分表达的途径,避免对学生合法利益诉求造成损害。

(三) 厘清学生组织职能

学生参与权是一种个体权利同时也表现为群体性权利,学生可通过学生会、社团及其他组织形式行使民主参与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五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学生团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第一章第十五条规定:“学生会、研究生会的基本任务:沟通学校党政与广大同学的联系,通过学校各种正常渠道,反映同学的建议、意见和要求,参与涉及学生的学校事务的民主管理,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学生组织作为学生自发形成的利益组织,其对学生的诉求、满意程度等问题有着最为直观的认识,是学生参与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组织保障。但目前,我国学生组织发展尚不充分,在学生权益保护方面作用不够显著。一方面源于学校规章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在于学生组织自身发展与认识定位不清,过度聚焦于学生生活的组织,忽视了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学生参与权”在内部质保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落地,应从学校规章制度增设学生组织权力细则入手,健全组织建设与参与途径,加大学生组织与学生个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学生的基本需求直接反馈并作用于学校相关决策中。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不仅依赖于制度的健全与组织的优化,更有赖于学生主体性的真正彰显与参与权的切实保障。只有将学生从被动的“质量数据提供者”转化为主动的“质量共建决策者”,才能构建起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质量文化,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 [1] 刘振天.从反精英、泛精英到高质量: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与走向[J].高等教育研究,2024,45(09):8-17.
- [2]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
- [3] [美]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J].木易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42.
- [4] J.Kooiman. Modern Governance: 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M].London: Sage press,1993:42.
- [5] 刘振天.系统·刚性·常态: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三个关键词[J].中国高教研究,2016(9):12.
- [6] 沈荣华,周义程.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J].理论探讨,2003(5):6.
- [7] 秦惠民.学术管理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冲突[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2(00):171.
- [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54.

- [9] 夏民,庄倩如.大学生参与权的法哲学思考——基于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分析[J].江苏高教,2012(4):53.
- [10] 计国君, 邬大光, 薛成龙.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以厦门大学 IQA 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 55.
- [11] 秦琴.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的焦点问题及新趋势[J].中国高教研究, 2016 (9) : 31.
- [12] The Skeffington Committee. People and Pl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The Skeffington Committee Report)[OB/EL]. <https://doi.org/10.1080/2325548X.2017.1257279>
- [13] Arnstein S.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the Amenci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69 (4) : 218.
- [14] 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N].学习时报, 2006-12-19.
- [15] 蔡定剑.公众参与: 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5.
- [16] 陈向明.参与式教师培训的实践与反思[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2 (1) : 66.
- [17] [美]斯图亚特·内格尔.政策研究: 整合与评估[M].刘守恒, 张福根, 周小燕译.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3.
- [18] 韩兵.完善我国高校学生参与权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11) 63.
- [19] 王建富.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权浅析[J].唯实, 2012 (7) : 75.
- [20] 荣振华,管又飞.高校治理中大学生参与权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表达[J].复旦教育论坛,2017,15(06):34.
- [21] 曹军,李祥永,郭红保,任惠兰.权力观视阈下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6(04):63.
- [22] 郑旭辉, 余慧莉.大学内部治理中学生参与权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视角[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 : 94.
- [23] 李玲玲,李家新.“学生权利”与“学生权力”:论高校管理中的学生参与[J].重庆高教研究,2014,2(05):60.
- [24] 胡杰.论权力的权利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2): 85.
-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2: 82.
- [26] [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谢宗仙等, 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192.
- [27] Budapest-Vienna Declaration o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EB/OL].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2010_conference/documents/Budapest-Vienna_Declaration.pdf.2012-01-16.
- [28] 刘湘玉.大数据背景下提升地方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 2019(20):41-42.

Student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n the University

Xing Haiyan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demand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the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governance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volves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forms a complex power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students' right to participate is set up in the void, the core of participation right -- decision-making right is ignored, and only their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s highlighted.To break the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righ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ystem as the basis, refine the regulations as the basis, clarify the functions of students' organizations as the guarantee.

Keywords: the university;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governance; the right of student participate; the right of decision-making

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税晓燕¹ 杜婉绮¹ 宋水英²

(1 内江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内江, 641100; 2 合阳中学, 重庆合川, 401520)

摘要: 为了了解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分析原因, 提出对策。本研究采用访谈法对来自16所农村幼儿园的16位教师进行访谈, 发现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率低、开展方式单一、教学内容碎片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缺乏重视、支持与保障; 家校合作不佳; 教师专业素养不足。为此本研究提出更新观念, 增强对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筑牢保障, 完善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硬件设施; 三位一体, 家校社共筑幼儿心理健康; 加强学习, 提升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策略, 以供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参考。

关键词: 农村; 幼儿; 心理健康教育; 策略

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农村幼儿教育研究中心新时代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 (NYJ2024060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28

一、引言

大健康教育是以提升儿童心理素质作为目标, 致力于促进幼儿身体、心理、社会适应以及道德等方面协调发展, 从而培养体魄健壮、人格健全和具有健康能力的个体^[1], 树立“大健康”理念, 不仅是2016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所提出的核心, 也是当下时代发展, 社会变迁的必需品。健康包含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一直以来身体健康备受关注, 而心理健康往往被忽略。近年来, 层出不穷的儿童青少年抑郁、自杀等心理问题让大家开始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甚至将提升学生心理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2025年两会期间, 心理健康问题也再度成为热点议题。学前期作为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 不仅对儿童的心理成长十分重要,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儿童的人格^[2], 是未来的基石^[3]。学前期儿童所处环境的变化及身心快速发展对他们情绪感受以及人际交往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挑战和阻碍^[4]。而且一项元分析结果显示24.3%的学龄前儿童存在着某种心理健康问题^[5], 中国学龄前样本儿童中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较高, 为31.6%^[6], 农村地区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城市^[7], 甚至有研究显示农村学龄前儿童近70%(663/950)至少有一种心理健康问题^[8], 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非留守儿童^[9], 贫困、偏远的农村地区心理健康的风险更为显著^[10]。由此可见, 关注幼儿心理健康, 尤其是农村幼儿的心理健康迫在眉睫。

心理健康教育是指根据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特点, 采用心理健康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对其开展教育的方式, 是预防与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学龄期有效心理干预有助于解决成的年心理障碍^[11]。国外相关研究显示通过融合不同类型的创新课程, 例如: 社会情感学习、压力管理课程等, 能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情绪管理等^[12], 通过训练生活技能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自尊, 降低他们的抑郁等消极情绪^[13], 而且在教学中以小组学习的方式更能降低学生的情绪问题^[14]。此外, 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均有益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15], 通过家庭访问者模式即在家庭中与其互动治疗的模式提升学龄前儿童的心理健康^[16]。但国内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小学生、青少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17], 鲜有研究者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况且已有研究显示农村幼儿与城市幼儿相比较, 仅仅只是在运动方面占据优势, 而在语言、认知、社会性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18], 而且他们在数学逻辑、语言推理、语言发展以及父母教育投入方面均低于城市幼儿^[19],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幼儿心理健康发展。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对农村幼儿教师进行访谈, 了解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作者简介: 税晓燕 (1990—), 女, 四川射洪,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杜婉绮 (1998—), 女, 四川内江, 助教, 硕士, 主要从事幼儿教育研究

宋水英 (1989—), 女, 四川射洪, 中学一级, 主要从事学生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 税晓燕

实施现状，并分析原因，提出应对策略，以期为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由于城镇化的发展，许多农村学校撤并，因此本研究中探讨的农村幼儿园包含了乡村幼儿园和镇上幼儿园。因此，本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对来自 16 所农村学校的 16 位女教师进行访谈，其中详见表 1:

表 1 具体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编号	年龄	从教年限	职位
A1	26-35 岁	5.5	教师
A2	45-55 岁	30	执行园长
A3	36-45 岁	8	教师
A4	26-35 岁	12	教师
A5	26-35 岁	6	教师
A6	26-35 岁	3	教师
A7	26-35 岁	5	教师
A8	26-35 岁	4	教师
A9	36-45 岁	10	教师
A10	26-35 岁	4	教师
A11	26-35 岁	5	教师
A12	26-35 岁	6	教师
A13	45-55 岁	25	教师
A14	18-25 岁	2	教师
A15	26-35 岁	6	教师
A16	26-35 岁	8	教师

(二)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参考何梦^[20]编制的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访谈提纲，从观念、实践与操作、影响因素和建议四个维度进行访谈，搜集资料。在何梦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包含农村及基层幼儿园，因此该访谈工具适用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三) 资料分析

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以及 Nvivo15 软件相结合，由 2 位研究者访谈文本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以及选择性编码，实现对所收集资料的分析，最终经过分析编码一致性系数为 0.941，编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表 2 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编码表

一级节点	二级节点	编码词汇	参考点
心理健康教育 定义	心理健康	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自我认识、行为及社会适应 (7)	21
	干预和纠正	干预与预防 (1)；心理问题纠正 (1)	
	结果	塑造价值观 (1)；得到快乐童年 (1)；形成积极人生态度 (1)；身体和心理健康 (2)；提升自我，摆脱消极情绪 (1)	
有必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手段、状态	教育活动 (2)；教育手段 (3)；教育状态 (1)	17
	缺乏条件	家庭教育无法提供，需幼儿园持续提供 (1)；隔代抚养 (2)；	
	幼儿发展特点	心理发展关键期，想法绝对，情绪冲动 (2)；易受外界影响 (1)；难以适应不同环境 (1)	

幼儿园心理健康重视情况	环境影响	社交媒体 (1)	
	心理问题显著	心理问题关注度高 (1) ; 心理问题频发并且低龄化 (3)	
	影响深远	心理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影响一生 (5)	
	不重视	无课, 不重视 (9) ; 无课, 没条件 (2)	
	一般重视	无课, 但一学期开展 2-3 次 (1) ; 无课, 但融入一日活动 (1) ; 无课, 但从五大领域进行延申 (1)	16
自己开展内容及方式	重视	设课每周固定 1 节 (1) ; 无课, 每周一节 (1)	
	开展方式	全班活动 (9) ; 观察一对一 (5) ; 与家长沟通 (3)	
	开展内容	社会道德 (1) ; 社会适应 (1) ; 自我认识 (1) ; 人际交往 (3) ; 情绪管理 (10) ; 不良习惯 (1)	36
心理健康教育适合的方式	不开展	没开展, 不知如何做 (2)	
	开展主体	个别指导 (3) ; 观察幼儿 (2) ; 家校共育 (9)	
	开展形式	故事 (1) ; 案例讨论 (1) ; 游戏 (3) ; 绘本(4); 视频动画 (1) ; 融入其他活动 (4) ; 微信推送 (1)	29
影响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	家校合作受阻	家长不配合 (5) ; 家长自身条件 (4) ; 家长不重视 (2)	
	学校因素	教师资料任务重 (2) ; 教师不重视 (3) ; 教师专业能力欠缺 (7) ; 教师自身心理健康 (1) ; 教学资源不足 (4) ; 幼儿园不重视 (4)	33
	社会	电子产品影响 (1)	
改进方式	学校	幼儿园重视 (3) ; 减少教师不必要工作 (2) ;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8)	
	条件	改善农村教学环境 (4) ; 增加教学资源 (6)	30
	家校合作	培训家长 (7)	

备注: 参考点指本节点下涉及编码词汇总数; 编码词汇从访谈原文中直接提取。

三、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现状

(一) 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率低

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建设课程以及实施课程的角度开展。但是 93.75%(15/16)的“幼儿园并不重视心理健康, 没有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A2)“幼儿园既没有设立专门的课程, 也未开展任何相关活动”(A13)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对幼儿开展普及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不过, 仍有教师表示“虽然没有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不过在一学期中会开展 1-2 次与心理相关的活动”(A7), 或者“教师自己将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融入到一日活动中进行”(A12)。因此, 通过课程全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在农村幼儿园并没有得到较好地实现。此外教育家陈鹤琴指出幼儿教育是家长和学校共同的责任, 但是访谈中教师表示, 在家校共育中“有的学生确实存在心理问题, 但是家长并不承认, 认为自己的孩子没问题”(A20), “教师与家长之间难以形成合力, 存在很多分歧”(A1), 这种家长的不支持, 不重视, 自身条件不足, 阻碍了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受阻, 从而使得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率较低。

(二) 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方式单一

在开展方式访谈中, 除 2 位教师明确指出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展, 因此在自己的班级中并未开展过心理健康教育”(A13,A15)。剩下的 14 为教师均表示自己在班级上会开展, 开展形式包含集体行动和单独观察辅导以及家校共育。其中, 集体行为的占比 64.28% (9/14), 单独观察的占比 35.71% (5/14), 此外“根据孩子的特点以及情绪变化进一步去了解孩子, 与孩子沟通, 倾听幼儿的内心想法, 与家长也及时沟通交流”(A14), 家校共育占比 21.43% (3/14)。由此可见, 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形式比较单一, 大部分依托于教师所组织的集体活动, 教师观察。

(三) 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碎片化

经过编码发现, 农村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包含 6 个方面, 但是主要集中于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其中情绪管理占 62.5%, 例如“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孩子会单独做心理辅导(如平常入园时很开心 突然不愿意入

园,很抵触)并根据孩子的特点以及情绪变化进一步去了解孩子,与孩子沟通,倾听幼儿的内心想法”(A14)。人际交往占比18.75%,例如,“长辈之间的感恩,和朋友之间的友善,还有包括遇到矛盾的时候怎么去应对等这一类的关系”(A10)。综上,农村幼儿教师在教育内容上虽然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由于他们在开展时都是根据个人经验进行,缺乏科学的设计,使得每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都零散,碎片化,没形成体系,从而减弱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四、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开展不佳的原因

(一) 缺乏重视、支持与保障

从2016年至今,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文件,其中《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幼儿园要对幼儿开展符合其心理发展特点的教育,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保障心理健康教育的规范化。而且《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明确提出要重视幼儿的健康,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高度重视心理健康。但是,通过访谈发现农村幼儿园管理者对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表现为,其一“幼儿园完全不重视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A5),其二,100%的幼儿园中并未配备专业心理教师,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没有开展的条件”(A14、A15),缺乏教学资源“建议幼儿园要专门购置更多相关绘本资源”(A11),同时“农村幼儿园条件差,希望改善教学条件”(A14)。农村幼儿园管理者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的支持与保障缺乏,导致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普及较低、教师开展方式单一,内容片面。

(二) 家校合作不佳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需要结合力才能促进他们的发展。但是,农村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96%是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隔代抚养^[21],甚至是祖辈代监,而虽然祖辈代监能让留守儿童有稳定的社会支持感,但是却表现出“重养轻教”的现象,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22]。在农村由于长期受到落后教育的影响,祖辈及父母等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只关心学校孩子的成绩教育,对于其他根本不关心^[23],正如访谈中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因素,“家长的不支持,家长过分忽视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说了也不会在意”(A10)。因此,幼儿教师很无奈“家长对幼儿心理健康意识不够,导致在学校教育后幼儿回到家中又回到原型(A12)”,所以农村幼儿园家校合作不佳也是导致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普及较低的原因。

(三) 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养不足

以往研究显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学历普遍偏低,专业素养不足^[24]。村、乡镇和县城相比较,村里幼儿教师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最多,而且从专业结构上看,非师范类及没有学前教育专业背景的教师占比较大,村里无职称的教师占比93.3%^[25]。在访谈中也发现,教师专业能力欠缺是影响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农村幼儿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不全面,存在一定的偏颇,其中占比最多的就是认为“娃娃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开朗,情绪稳定,可以很好地表达自己”(A3)和“幼儿自我认识,情绪管理和情绪控制”(A6)。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之所以不开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A13),“教师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找不到教育重点”(A1),甚至还有教师表现出“禁锢孩子的一些正常活动,天天就教室里坐着,或仅限于阳台活动”(A3)。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幼儿教师关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素养确实不足。所以,农村幼儿心理健康教育表现出开展效果不佳,方式单一,内容过于碎片化。

五、提升农村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有效策略

(一) 更新观念,增强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认知行为理论指出改变行为要从改变不合理的信念、想法、观念开始。而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仍然凭借经验,简单极端,动嘴不行就动手,最终形成“打一顿,就老实”的观念^[26]。作为农村幼儿教育主要承担者,农村幼儿教师教育观念仍然停留在,幼儿教师就是带孩子,幼儿园教学就是教孩子知识,例如:读拼音、写汉字、算数,幼儿教师不需要学习,幼儿教育只是幼儿园的事情与家庭、社区无关等观念^[27],对幼儿成长非常不利。虽然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心理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各部门及地方也相继颁布有关心理健康的相关政策,但是在幼儿心理健康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检出率^[12]。心理健康是一切行为的开始,如果幼儿的心理健康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那么他们能力的发挥和控制也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如杨明所指出的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自尊、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乐观因子状况越好,越能够很好地融入和适应所进入的城市的社会文化^[28]。而那些存在社交焦虑的幼儿在处理人际的过程中往往会做出一

些社交回避的行为,同时他们还容易遭到同伴的排挤^[29],严重的出现更为明显的抑郁问题,从而为他们今后的成长埋下隐患。因此,作为农村幼儿教育的教育者需要从教育观念开始改变,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不再仅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幼儿的安全方面,更要关注幼儿情感需要,减少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正如国外研究者指出,教育者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心理健康,要理解心理健康流行病学因素、风险与保护因素、社会文化影响因素等^[16]。

(二) 筑牢保障,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硬件设施

虽然目前并未出台像《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这样的明确规定了中小学要配备心理辅导室这样的文件,但是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幼儿心理健康^[16],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硬件设施,但是农村幼儿园并没有心理健康功能室,学校校园文化心理元素也不足。华生环境决定论指出环境对个体的成长至关重要,因此打造环境对幼儿心理健康成长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农村幼儿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均衡,甚至一些农村幼儿园资金投入不足,物质条件保障较弱,师资缺乏^[30]。基于此,农村关于心理环境的营造,首先可以通过挂横幅、贴标语、做心理健康相关的班级文化等来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元素;其次,利用有限的资源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室,例如:结合农村特点农村幼儿园可以采用蓝色的盆和经过消毒的沙土模拟沙盘,将小玩具作为沙具,这样简易的沙盘就可以建立,而平时幼儿上课的教室可以充当沙盘室。团体辅导室,可以用一个较为空旷的教室替代。心理档案室可以和幼儿园资料室放在一起,存放学生的心理档案。而关于个案辅导室的建立,可以利用教室的一角,采取一定措施打造出个案空间。

(三) 三位一体,家校社共筑幼儿心理健康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指出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发挥这不可替代的作用^[31]。根据布朗分布伦纳的系统生态理论来看,家庭是幼儿接触的微观系统,父母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同伴之间的关系是中间系统,社区、父母工作环境等是幼儿接触的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其中微观系统涉及家庭,中间系统涉及家庭、学校,外层系统及宏观系统涉及社会,而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成长是嵌套在这些相互影响的环境中,而这些环境也会对个体的成长产生影响。因此,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做到“三位一体”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国外关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提升,往往会针对父母、教育者开设一些家庭教育课程或者基本的技能课程,这样更有益于改变幼儿的不良行为,而在这个课程的开设中主要是联动社区与学校^[22],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在农村地区可以依据关系文化理论做框架,为幼儿园教师提供职前教育培训^[32],建立相互之间的关系,促进成长。

对于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相互协助,首先可以依托于家长会请专家来给家长开展幼儿心理健康讲座;其次,通过电话、微信、家访等方式与家长保持适当的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沟通;最后,可以为家长提供适当的家庭教育指导,例如:提供关于如何倾听孩子感受、如何处理家庭冲突以及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尊和自信的指导。另外,学校可以通过与社会相关机构相互合作,招募志愿者以及借助媒体宣传的方式运用社会资源^[33]。在农村可以利用好社区广播给家长普及幼儿心理健康知识以及家庭教育相关知识。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共同发力,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对幼儿心理健康成长赋能,促进幼儿心理健康成长。

(四) 加强学习,提升农村幼儿教师专业素养

学校是接受教育的主要阵地,其中教师对幼儿的影响不言而喻。以往研究显示农村幼儿教师不仅缺乏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知识,同时更加缺乏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向和指导^[34]。因此,要让农村幼儿教师有能力开展幼儿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他们的专业素养,给予他们相应的指导。为了增强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幼儿园可以通过积极与校外专业机构建立联系,引入专业人员对幼儿教师进行幼儿心理健康意识的培训、心理知识的培训以及沟通技巧的培训^[35],培训的形式可以有心理健康讲座,心理沙龙、心理活动体验等。另外,职前教育培训是教师如之前最重要的一步,在职前教育培训可以纳入幼儿心理发展特点、农村幼儿常出现的心理问题、农村幼儿心理问题的识别、应对等内容,让农村幼儿教师上任之前就有一定的心理知识,但是农村幼儿教师鲜少有机会参与除学前教育机构以外的组织举行的职前教育培训^[36]。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以与优质幼儿园一起对偏远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幼儿建立协同的机制^[37],开展教师专业培训,从而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养。

此外,教师的心理健康是学校的福祉⁴²,农村幼儿教师“教师的其余工作任务繁重(资料任务、家长工作、其余活动安排)(A8)”,使得部分教师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从而使得在对待幼儿时出现偏差。其实,已有研究显示自2012年开始幼儿教师的心理问题上升趋势显著^[38],越来越多的虐童事件也随之发生。因此,关注幼儿教师

的心理健康水平,定期为教师做心理健康方面的评估,对于需要心理援助的教师适时提供心理援助,提升幼儿教师自身的心理素养也非常重要,这对于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 [1] 曹英,孙立明,陈希.大健康教育:全面提升幼儿核心素养的实践探索[J].学前教育研究,2024,(02):87-90.
- [2] 蒋彦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早期经验思想在儿童人格发展中的影响[J].甘肃高师学报,2017,22(7):58-60.
- [3] 刘海嘉,孙卫.幼小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问题与路径研究[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37(3):81-86.
- [4] 黄鹤,王小英.正念教养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亲子关系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J/OL].心理发展与教育,2024(04):533-541.
- [5] Jing J Q , Yang C J , Wang Y ,et al.Impact of COVID-19 o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a meta-analysis[J].BMC Pediatrics, 2024, 24(1).
- [6] Wang L , Tian J , Rozelle S .Parenting style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at preschool ag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BMC Psychiatry, 2024, 24(1): 314.
- [7] 王燕,殷刚柱,郭锋,等.合肥市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现况[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04):543-545.
- [8] Li S, Chen K, Liu C, et al. Dietary divers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preschoolers in rural China[J].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021, 24(7): 1869-1876.
- [9] 郭彬,汪心海,徐凌忠,等.山东省农村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J].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53(01):87-92.
- [10] Glisson C, Schoenwald SK. The ARC organizational and community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treatments. Ment Health Serv Res. 2005 ,7(4):243-59.
- [11] Shastri P C.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in child mental health[J]. In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9, 51(2): 88-95.
- [12] Johnstone K M, Middleton T, Kemp E, et al. A pilot investigation of universal school-based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ology in childr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0, 76(7): 1193-1216.
- [13] Yu T, Xu J, Jiang Y, et al. School educational models and child mental health among K-12 students: a scoping review[J].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2022, 16(1): 32.
- [14] Van Ryzin MJ,Roseth CJ.The cascading effects of reducing studentstress: cooperative learning as a means to reduce emotional problemsand promote academic engagement[J].JEarly Adolesc. 2020;41:700-24.
- [15] Wong M D, Dosanjh K K, Jackson N J, et al.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of school climate with adolescent social and emotional health[J]. BMC public health, 2021, 21: 1-8.
- [16] McLuckie A, Landers A L, Curran J A, et al. A scoping review of mental health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initiatives for infants and preschoolers at risk for socio-emotional difficulties[J]. Systematic Reviews, 2019, 8: 1-19.
- [17] 游志纯,马建青.新时代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2013-2023)CSSCI 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01):232-240.
- [18] 周兢,张莉,NIRMALA R.我国早期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现状分析:一项来自 EAP-ECDS 的研究报告[J].全球教育展望,2018,47(7):114-128.
- [19] 任晓玲,严仲连,张泽东.农村幼儿发展历程:家庭教育时间投入与经费投入哪个更重要[J].学前教育研究,2022,(01):22-33.
- [20] 何梦.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22.
- [21] 沈奕斐.隔代育儿对儿童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述评[J].妇女研究论丛,2023,(03):113-128.
- [22] 刘志军.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J].人民论坛, 2025(2):79-83.
- [23] 余轩堂.影响农村地区家校合作的因素分析[J].教学月刊·中学版(语文教学), 2008, 000(022):32-35.
- [24] 李洋,陈希.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现状与促进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18,(09):61-63.
- [25] 占莉莉,叶存洪.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发展前瞻——基于江西省 16 个样本县(市、区)的调查[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3,44(01):103-112.
- [26] 李若彤,李志河.农村家长幼教观念的调查研究——以山西省高平市 C 村为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4,40(2):20-27.
- [27] 叶玲.农村幼儿教师教育观念亟待更新[J].早期教育 (幼教·教育教学) ,2006(1):16-16.

- [28] 杨明.流动儿童自尊、健康心理资本和社会文化适应特点及其相关性[J].中国健康教育,2018,34(07):636-639.
- [29] YOO Y G,LEE: D J,LEE I S,et al. The effects of mind subtraction meditation on depression, social anxiety, aggression and salivary cortisol level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South Korea [J].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2016 ,31(03) ,185-197.
- [30] 黎锦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研究[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31(3):110-114.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EB/OL].(2023-01-13)[2023-01-17].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2301/t20230119_1039746.html
- [32] Rodger S, Hibbert K, Gilpin M.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for school mental health in a rural community[J]. Handbook of rural school mental health, 2017: 63-79.
- [33] Jiang G. Coping Strategies for Suppor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Psychological Issues under the Collaboration of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A Perspective Based on Mental Health Effectiveness[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4, 12(12): 574-580.
- [34] 刘海嘉,孙卫.幼小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问题与路径研究[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37(3):81-86.
- [35] Stratford B , Cook E , Hanneke R ,et al.A Scoping Review of School-Based Efforts to Support Stud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uma[J].School Mental Health, 2020, 12(1): 1-20.
- [36] Yang Y, Rao 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ong preschool teachers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Education, 2021, 42(3): 219-244.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EB/OL].(2021-12-09)[2021-12-14].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2112/t20211216_587718.html
- [38] 赵成佳,邵蕾,俞国良.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4,(02):152-166.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SHUI Xiaoyan¹, DUWanqi¹, SONG Shuiying

(1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China; 2Heyang middle school; HeChuan ChongQ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analyze the underlying causes,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this study employed interview methods to conduct interviews with 16 teachers from 16 rural kindergarte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suffers from low popularity, monotonous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fragmented teaching content.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nclude: lack of attention, support, and safeguards; poor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mong teacher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updating perspectives to enhance the emphasis on you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safeguards and improving the hardware facilities for you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stering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among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o jointly support you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nd promoting learning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rural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se recommendations are intend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rural kindergartens

Keywords: rural areas; preschooler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ies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设计与实施

陈文灿

(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高中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是落实育人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 对于发挥英语学科独特优势、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课程综合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内涵、教学设计原则为基础, 结合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阐释了高中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施步骤和方法, 旨在促进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和运用跨学科知识, 提高其问题解决能力, 以为高中英语教师如何解决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些参考。

关键词: 跨学科主题学习; 英语教学; 核心素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6

一、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学习及运用英语语言的课程, 与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相衔接, 旨在为学生继续学习英语和终身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教育部, 2025)。高中英语课程内容以主题组织, 聚焦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主题, 这就意味着整个课程内容都体现跨学科主题的特征。因此,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对学生核心素养与跨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内涵、设计原则与实施路径和教学意义的正确认识, 是高中英语教师实施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基础(王蕾、刘诗雨, 2023)。

二、跨学科主题学习

作为各学科协同育人的一种课程内容组织和学习形式, 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因此,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是内容组织和学习活动设计的前端问题(朱爱华, 2023)。

(一)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内涵

跨学科主题学习是指为培养学生跨学科素养而有机融合两门及以上学科的知识、技能和方法, 引导学生对主题进行综合探究的学习方式。它将“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课程”和“主题(thematic)课程”结合起来, 既立足学科知识间的关联性, 又将其拓展到社会生活中, 围绕特定主题整合学生的知识、经验, 进行教学设计(李俊堂, 2022)。其核心是强化学科间的关联与融合, 打破学科界限, 即以某一学科为载体, 围绕主题整合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 构建多维度的教学内容体系, 进而开展综合性教学活动。与传统学科教学相比, 它更强调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开展实践探究, 通过主动参与问题分析、方案设计与实践验证等过程, 逐步形成跨学科的认知体系, 从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均衡发展。

(二)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特征

新课标中蕴含的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即整合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其中, 整合性是跨

作者简介: 陈文灿(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通讯作者: 陈文灿

学科主题学习的本质特征,强调各学科之间的综合与联结;开放性和实践性则强调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联系现实生活,引导学生在实践探究中运用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与方法,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素养。

1.整合性

著名跨学科学习学者克莱因 (Klein,J.T.) 认为,跨学科学习是学习者创造性地连接某一主题的多个学科知识,对主题属性进行多维整合的过程。整合性强调其贯穿学习设计、实施与评价的全过程,承载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实现知识融通的教育价值(董艳、夏亮亮、王良辉,2023)。它表现为多学科的课程内容整合、知识整合、方法整合等维度。课程内容整合是以学科主题为主体,把碎片化知识串联成有机整体。它包括学科内的纵向整合、多学科间的横向融合以及学科与社会的深度联结,由此形成“学科+”的多元课程形态,为促进各学科协同育人提供实践路径。方法整合要求教学注重吸纳不同学科的探究方法与思维工具,将其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需求相结合,形成与复杂问题相适配的方法体系。

2.开放性

“跨学科主题学习既基于学科,又超越学科,且融通学科,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学科的破壁与视域的延展(朱爱华,2023)。”分科课程虽然有助于构建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框架,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批判性和发散性思维。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单一学科学习向综合性主题学习转变,拓宽思维方式,同时将学生置于开放的教育资源环境中,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使学生适应的社会情境,从而实现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开放性。

3.实践性

新课标强调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性要求(教育部,2025)。跨学科主题学习以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作为重要实践依托,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已学知识,围绕真实问题开展实践活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是帮助学生打破传统学习中学科知识与问题解决相分离困境的有效途径。从当前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很难深度融入学习情境,这与传统教学中生搬硬套的模式紧密相连。创设真实且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突出学生学习的实践性与主动性,成为新课标的重要导向之一。

三、基于课程标准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设计原则

教师要基于课程标准和教材,围绕学科核心概念和原理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整体设计。

(一)以素养为导向,发挥教学评协同作用

跨学科主题学习作为加强课程协同育人理念的重要载体,其学科逻辑、内容组织及学业质量均需以素养为导向,同时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实现。要落实素养导向,关键在于确保教、学、评三者围绕素养目标保持一致,发挥其协同作用。教与学的一致性要求教师以素养目标为依据进行教学设计且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保证学生的学习进度与预设的教学目标一致;教与评的一致性要求教师依据素养目标设置学生学习成果的表现形态,并制定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将其融入教学全过程;学与评的一致性要求教师基于学生的实际学习内容确定评价范畴,参照评价标准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展开客观全面的评价。

(二)以学科为本位,兼具跨学科特征

跨学科主题学习不能脱离学科本身而独立存在,必须以学科核心内容为主,即学习仍注重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化的深度学习。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设置是对分科教学的补充、巩固和深化(董艳、孙巍、徐唱,2019)。基于此,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必须坚持学科立场。这表明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对多学科学习内容的多形态拓展,旨在提升学生的学科整合与迁移能力。坚守学科立场与凸显跨学科特征并不矛盾,跨学科性是其本质属性,因此在目标确立、主题选择、教学设计与评价等流程中,必须体现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融入跨学科特质。

（三）以学生为主体，建立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机制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逻辑起点在于学生，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教学设计应紧密围绕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展开。《新课标》提倡教学评价应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体现在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教育部，2025）。与传统的学习方式相比，跨学科主题学习更注重学生学习的动态化过程和素养发展。因此，在实际教学时应使用更加开放的融通性评价，建立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机制。一方面，评价要求主体间交互协作，学生通过自评与互评进行自我反思，实现自我成长与提升。另一方面，评价关注学生素养的生成，体现“以评促学”“以评育人”理念，通过过程性和开放性评价激活学生的思维，最终落实素养时代对人才培育的要求。

四、基于课程标准的高中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将结合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二 Unit 2 Reading and Thinking 的语篇 A Day in the Clouds，阐述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

（一）确定跨学科主题，选择教学内容

《新课标》强调“主题为语言学习提供主题范围或主题语境，为学科育人提供话题和语境”（教育部，2025）。主题的选择或创设应结合课标、教材、学生经验与社会生活等进行综合考虑。本单元的主题为 Wildlife protection，属于人与自然主题语境中的“环境保护”主题群，对应“自然环境”“人与环境、人与动植物”子主题内容。该板块的活动主题是 Learn about protecting endangered animals，语篇 A Day in the Clouds 主要讲述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的故事。

从学情角度分析，高一学生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但对珍稀动物的生存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涉猎较少；从教学目标角度分析，本单元的话题比较贴近学生的认知，但学生缺乏对如何保护珍稀动物的思考，以及对该行为背后蕴藏的环境问题的探索。因此，本课定位为高中英语与地理、生物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将围绕保护濒危动物发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倡议书。

（二）创设真实情境，提出驱动型问题

驱动型问题是引导学生和教师教学设计的、贯穿项目始终的回应性问题，具有挑战性、开放性、复杂性，并与学生学习目标相联系（桑国元等，2023）。基于主题设计并立足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设计驱动型问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当今社会，ChatGPT、DeepSeek 等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英语课堂学习情境的创设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与帮助。因此，教师可以运用 AI 模拟紧急电话进行课堂导入。通过真实的情景创设，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与好奇心。教师提出驱动型问题：

Q1: What are the two most urgent threats to Tibetan antelopes?

Q2: How do these threats affect their survival?

Q3: Why is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key habitat for Tibetan antelopes?

Q4: What one specific protection measure can you propose to stop rampant poaching?

（三）依据课程标准，明确教学目标

跨学科主题学习目标一定要承载学科核心知识，以此作为学生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驱动与支撑（郭华等，2023）。教师应遵从以终为始的目标导向设计原则，依据英语和所涉学科的课程标准，围绕核心素养发展明确可达成的教学目标。本研究将分析所跨学科课程标准中的素养发展与课程内容及要求（见表1）。

表 1 跨学科主题素养目标表

学科	核心素养	跨学科素养
英语	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素养	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沟通与合作、社会责任与担当
地理	人际协调观、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素养	
生物	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素养	

因此，主题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跨学科学习活动涉及英语课标中的“通过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等一系列融语言、文化、思维为一体的活动，表达个人观点、意图和情感态度，发展多元思维和批判性思维，提高英语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教育部，2025）；地理课标中的“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实地调查身边的环境状况，分析问题及成因，提出可行性对策”；生物课标中的“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参与环境保护实践”。

教师通过分析相关课程内容要求，明确该课学习重点与素养发展目标，制定相应教学目标：

- 1.掌握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相关词汇和表达，能用英文描述、表达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措施相关的问题；
- 2.通过小组分工与合作，获取并讨论关于保护濒危物种的措施与方法，提升学生的沟通与合作能力；
- 3.通过深入阅读，讨论人类当前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批判性地思考如何改变生活方式，并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
- 4.通过撰写保护濒危物种的倡议书，反思人类活动在大自然中的结果，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四）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设计跨学科学习活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倡导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学习方式（教育部，2025）。基于活动观，教师可设计层次递进、综合关联的意义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建构并内化新知，促进知识转化为能力与素养。考虑到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连续性，本研究设计了三阶段（三周）的学习任务。

1.关注语篇，打好语言基础，设计调查问卷

语篇是语言学习的主要载体（教育部，2025）。课堂初始，教师运用人工智能制作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拨打紧急求助电话的场景，呈现驱动型问题链，引出本课主题，呈现跨学科任务：基于语篇 A Day in the Clouds 的学习，获取与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词汇与表达。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初读文章，把握文章结构和主旨大意，并判断文本体裁。掌握语篇中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基本知识是完成本次跨学科学习的前提。因此，教师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内容，通过问题链的形式梳理 what the author sees, hears, and thinks。通过阅读，学生掌握了保护珍稀物种藏羚羊的濒危情况和原因、采取的保护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等相关知识和语言表达，为制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倡议书奠定基础。

接下来，通过设计并发放问卷，调查师生对保护濒危物种的态度和参与程度。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大部分学生知道人类需要保护野生动，而不了解如何对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学生设计问卷时，学习地理与生物学科的相关表达，并使用 AI 优化问卷语言，提高信息技术素养。

2.收集文献，扩充语言知识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利用网络资源收集有关藏羚羊等濒危物种的自然生存环境的文献，包括其地貌特征和物种多样性的表现，并在课堂上汇报搜集结果。在此过程中，地理教师解释自然保护区因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差异，并如何对地图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培养学生对地理学科的区域认知素养，学会从地域角度分析濒危物种保护问题。生物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英语教师指导学

生建立英语语料库，总结和整理与濒危物种和环境保护相关的词汇和表达，如 build nature reserve,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protect wildlife, exist in harmony with nature 等，为学生后续撰写英文研究报告提供语言支持。

3.分析案例，制作倡议书

学生围绕教师抛出的问题“What can we do to reduce threats to wildlife?”进行深入讨论，阅读教师提供的亚洲象案例，了解它的生活习性及分布范围，使用 AI 检索其种群现状并制定保护措施。教师指导学生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和方法分析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撰写英文研究报告，增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知。

最后，学生将研究成果可视化，设计并制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英文倡议书。各小组利用前期建立的英语语料库撰写文本，各学科教师提供相应指导，合作完成高质量英文倡议书。该阶段深化学生对跨学科知识的理解，培养探究、合作、多视角且批判性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真正的学科协同育人。

（五）展现跨学科教学成果，实施多元评价机制

在完成本次跨学科主题的学习后，各组将完成的英文倡议书进行展示。校长、教研组长、所跨学科教师、学生等组成的评审团对各组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评价是项目学习的关键环节。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应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并辅以终结性评价，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形式的多样化（教育部，2025）。对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评价也要以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为引领，即主体多元、维度多元、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机制（赵文辉，2025）。评价应围绕跨学科主题学习任务，紧扣学科和跨学科素养，评价可以包括英语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等维度（见表2），采取学生自评与互评、教师评价。

表2 人教版必修二 Unit 2 跨学科主题学习任务评价量表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个人 5	同伴 5	教师 5
英语学习能力	语言运用	能积累并运用教材单元与描述濒危物种的相关词汇与表达			
	综合表达	调查问卷与研究报告中语言表达准确、流畅，结构清晰，语用得体的			
跨学科主题学习能力	协作交流	积极主动参与每一次讨论，倾听他人建议或对他人方案提出建议			
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	自主探究	能完成小组内承担的任务，主动学习研究			
	批判创新	能提出与众不同的想法或新的解决方案			
	内容质量	内容完整，结构清晰，逻辑性强			
	价值观念	体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义和措施，提升师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			
	综合素养	体现用地理综合思维分析问题，用生物学科进行科学探究			

五、结语

新课标对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强调是推动综合性学习、弥补分科教学弊端的重要措施，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学科

核心素养,促进跨学科素养的发展。基于课程标准的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为语言学习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基础,让语言学习融入真实情境,回归学生生活。英语教师要基于英语学科立场,积极构建各学科关联,探索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有效路径,建立多元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评价体系,最终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展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跨学科素养和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 2025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5.
- [2] 王蕾,刘诗雨.在英语教学中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意义与关键问题解决[J].英语学习,2023,(07):4-11.
- [3] 朱爱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本质、特征及设计路向[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3,(05):73-81.
- [4] 李俊堂.跨向“深层治理”——义务教育新课标中“跨学科”意涵解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16-124.
- [5] Klein,J.T.A Conceptual Vocabulary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J]. Practising Interdisciplinarity,2000:3-24.
- [6] 董艳,夏亮亮,王良辉.新课标背景下的跨学科学习:内涵、设置逻辑、实践原则与基础[J].现代教育技术,2023,33(02):24-32.
- [7] 董艳,孙巍,徐唱.信息技术融合下的跨学科学习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11):70-77.
- [8] 桑国元,叶碧欣,黄嘉莉,等.构建指向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项目式学习标准模型[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06):49-55.
- [9] 郭华.跨学科主题学习:提升育人质量的一条新路径[J].人民教育,2023,(02):25-27.
- [10] 赵文辉.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设计与实施[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5,48(02):19-24.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Based on Core Competencies

Chen WenCan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 Zhong, China)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method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iving play to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English subject, breaking down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realiz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principle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method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by combining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 real-life scenarios, enhance their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address the relevant problems existing in English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activities.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English Teaching; Core Competencies

国风游戏作为文化表达“催化剂”的教学转化研究

李嘉¹

(1.太原师范学院外语系,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面对“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要求, 传统英语文化教学在激发学生深度体验与主动表达上存在不足。本研究探讨以《黑神话: 悟空》为代表的中国风游戏, 如何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新路径。游戏凭借其完整叙事、多感官融合和强互动性, 构建了独特的沉浸式学习环境, 能有效促进学生从文化“接收者”向“讲述者”转变。本文分析了游戏促进行为的内在机制, 即通过叙事提供理解框架, 通过视听与操作体验活化文化认知, 并通过交互激发表达欲望。研究还探讨了教学转化的关键过程及面临的挑战, 论证了国风游戏作为一种创新教学载体的潜力与价值。

关键词: 双新背景; 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风游戏; 文化教学; 跨文化表达

基金项目: 2025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2025SJ403)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1

一、引言: 从“文化输入”的困境到“文化输出”的诉求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与“双新”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双重语境下, 我国高中英语教学正站在一个关键的范式转型路口^[1]。长久以来, 文化教学在课堂中的实践主要遵循着一种“输入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依托于教材文本、纪录片或影视片段等传统载体, 旨在向学生系统地介绍、阐释目标语文化 (尤其是英语国家文化) 的知识体系、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尽管这种方式在扩大学生文化视野、积累背景知识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但其结构性局限在当代愈发凸显^[2]。一个核心的矛盾浮出水面: 教学在文化“输入”端日益丰富, 却在激发学生主动“输出”、实现文化意义的内化与创造性转化方面显得乏力。

这一困境首先表现为文化认知的“碎片化”。传统的教学资源, 受限于其媒介形式与呈现逻辑, 往往将文化切割为孤立的知识点或符号片段, 如节日名称、标志建筑、历史事件等。学生接触到的更多是“关于文化的知识”, 而非“活生生的文化体验”。当前文化教学内容呈现显著的碎片化特征, 知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深度脉络, 导致学生难以构建起系统、立体的文化认知图式。其结果便是, 学生对文化符号的记忆往往是短暂的、机械的, 无法与自身的情感、经验产生深刻连接, 更遑论形成具有个人见解的文化理解^[3]。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学生主体性的缺失与“表达内驱力”的不足。在“输入主导”模式下, 学生主要扮演着“文化接收者”甚至“文化观光客”的被动角色。教学过程侧重于理解、记忆与辨析, 缺少将所接受的文化信息进行个人化整合、批判性反思并运用目标语进行创造性再现的关键环节。学生鲜有机会在真实的、有意义的交际任务中, 为了表达独特的文化见解、分享深刻的文化感受或讲述一个动人的文化故事而主动调动语言资源。因此, 即便积累了词汇和句型, 在面对“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高阶任务时, 学生常常感到无话可说、无从说起, 或只能进行公式化、标签化的陈述, 其表达缺乏情感的温度、思想的深度与叙事的感染力^[4]。

“双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恰恰指向了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它绝非一项简单的语言转述任务, 而是一项融合了深度文化理解、批判性文化反思、创新性叙事建构与得体跨语言表达的综合性高阶素养。它要求学习者完成从“旁观者”到“讲述者”、从“消费者”到“创造者”的身份根本性转变。然而, 实现这一转变, 亟需一种能够同时提供深度沉浸的文化语境、激发强烈情感认同、并支持多维意义建构的新型教学载体。显然,

作者简介: 李嘉 (1994—),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具身认知下的教学转化。

静态的文本、线性的影视等传统媒介，在营造沉浸感、提供交互性以及赋能个体创造性表达方面，已触及其能力边界，显得力不从心。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黑神话：悟空》等为代表的中国风游戏，以其革命性的媒介形态进入教育研究者的视野，为破解文化教学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化难题提供了极具潜力的全新方案。游戏，特别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优质国产游戏，本质上是一个“高密度、高沉浸、高交互的文化意义系统”。它不仅仅呈现文化符号，更通过宏大的叙事架构、精密的视觉艺术、动人的音乐音效以及核心的交互机制，将文化价值、哲学思想与情感体验编织进一个可探索、可参与、可影响的虚拟世界之中。玩家（学生）在其中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过操作、决策与体验，主动参与意义建构的“共同作者”^[5]。

因此，本文的核心关切得以明确：在“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教学目标导向下，以《黑神话：悟空》为典型个案的中国风游戏，究竟如何凭借其独特的叙事力量、融合多种感官的表意方式以及引人投入的情感机制，帮助学习者从被动的“文化沉浸者”转化为主动的“文化表达者”。

二、国风游戏作为“输出”催化剂的核心机制

国风游戏在推动学生完成从文化“输入”到“输出”的跨越中，其效力并非源于对文化知识的直接、线性灌输，而是根植于其作为数字媒介所创造的、一个能激发持续互动与意义创生的环境。这一环境超越了传统课堂的单向传递模式，通过一系列复杂且协同的机制，将学习者置于一个主动参与、情感投入且持续建构的文化实践场域中。其催化跨文化表达的核心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一）游戏的叙事框架

游戏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强大的叙事能力。与教材中常被简化为孤立要点的文化介绍不同，高品质的国风游戏构筑了宏大、连贯且充满细节的故事世界。这种叙事不仅是在讲故事，更是在动态地展现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具体人物的抉择、冲突的化解与命运的沉浮，被真实地践行、考验乃至升华^[6]。以《黑神话：悟空》为例，其核心并非简单复述《西游记》的情节，而是深刻演绎了孙悟空从挑战“天命”的反抗者，到承受重压、历经内心挣扎，最终走向某种更高责任担当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一过程本身，便是关于个体自由与集体责任、叛逆精神与成长磨砺的中国式哲学叙事的生动写照。

对学生而言，深入体验这样的游戏叙事，就如同获得了一套理解文化的深层密码和情感逻辑。他们理解的不仅是“孙悟空做了什么”，更是“他为何这样做”、“他的荣耀与痛苦根源何在”。这种深度的理解，为后续的跨文化表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本和意义支点^[7]。当需要讲述一个关于“坚韧”或“智慧”的中国故事时，学生脑海中涌现的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词汇，而是一系列鲜活的角色形象、关键的情节转折、交织的情感波澜与价值冲突。这使他们得以超越简单的事实列举，转向建构有血有肉、有矛盾有发展的完整叙事，而这正是“讲好故事”的核心能力所在。

（二）游戏内蕴含的多模态符号系统

国风游戏是一个融合了视觉、听觉、动作甚至触觉反馈的综合性多模态文本。游戏中的文化符号——无论是金光熠熠的“金箍棒”、云雾缭绕的“蟠桃园”，还是角色施展“七十二变”时的特效与音效，或是场景中融合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与水墨意境——都不是以静态图片或文字说明的形式孤立呈现的。它们被有机地编织进探索、战斗、解谜等互动过程中，成为玩家（学生）必须感知、解读并为之互动的环境一部分。

根据具身认知理论，认知并非仅发生在大脑中，而是与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密切相关^[8]。学生在游戏中操控角色挥舞兵器、穿越仙境、施展法术时，文化符号通过视觉震撼、操作反馈和情境关联，与学习者的身体体验和情感状态直接绑定。例如，“金箍棒”不再仅是书本上描述的一件“可大可小的兵器”，而是在玩家手中（通过操作）感受到其重量、威力和变化无穷特性的“身体延伸”。这种“具身化”的认知经验，使得文化符号内化为一种富含感官记忆和情感温度的“知觉知识”。

当学生在英语课堂上需要表达相关文化概念时，这种具身经验便转化为无比丰富的“心理图式”和“联想网络”^[9]。描述“力量”时，他们脑海中可能浮现金箍棒砸下时的画面与手感；诠释“变幻”时，七十二变的视觉特效与操作逻辑成为直观例证。游戏因而为学生构建了一个庞大、立体且可感性极强的“内生性语料库”，极大缓解了跨文化表达中常因缺乏具体、生动的细节而导致的“内容贫乏”与“表达干瘪”问题。

（三）游戏的交互性与情感卷入

游戏区别于其他媒介的最根本特性在于其交互性。玩家不是旁观者，而是通过一系列有意义的选择和操作，直接影响叙事进程、角色命运乃至虚拟世界的状态。这种深度的介入感，催生了强烈的情感卷入。学生会在游戏

中为角色的困境而焦虑，为团队的胜利而欢呼，为探索的发现而惊喜，为精心策划后战胜强敌而获得巨大的成就感^[10]。

这种基于交互产生的情感联结与个人投资，是激发主动表达欲望最强大的内在引擎。学习动机从外部驱动的“教师要求我介绍中国文化”，转化为内部驱动的“我经历了这段震撼的冒险，我想与你分享我的所见所感”或“我为这个角色的命运深深触动，我想阐释他的选择”。表达的需求从任务层面上升到情感与分享层面。

更重要的是，在游戏过程中，学生已经无意识地实践了“叙事者”和“阐释者”的角色——他们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分析角色动机、制定行动策略并向同伴解释合作。游戏机制自然地赋予并强化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当回归到“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教学任务时，这种在虚拟世界中习得的“能动者”身份会自然迁移。学生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故事的经历者”和“意义的阐释者”，而非“知识的复述者”，从而在表达中注入更多的个人视角、情感色彩和说服力，这正是高质量、打动人的跨文化表达所必需的基石。

综上所述，国风游戏通过其深度的叙事架构、沉浸的多模态体验和根本的交互属性，三位一体地构建了一个激发、支撑并提升学生跨文化表达能力的动态生态系统。它不仅是文化内容的载体，更是转化认知、激发情感、塑造身份的表达式“催化剂”，为破解从“输入”到“输出”的教学瓶颈提供了基于学习科学和媒介理论的创新路径。

三、从游戏沉浸到文化表达：内化与转译的认知生成过程

国风游戏所构建的深度沉浸体验，其教育潜力并非停留于感官刺激或知识呈现的层面，而在于它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认知发生场”。在这一场域中，学习者与文化内容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静态的观察、记忆，转向动态的探索、决策与情感投射。这一过程本身，就潜在地孕育着从“接收”到“表达”的转化基因。教学设计的核心智慧，在于识别并催化这一内在的转化机制，而非从外部生硬嫁接任务。其关键路径在于，引导学习者经历一个从无意识的具身体验，到有意识的意义建构，最终指向创造性外化表达的、连贯的认知与情感生成历程。

（一）游戏体验的“叙事内化”与“情感赋值”过程

当学习者在《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中行动时，他们并非在被动接收一个关于“叛逆与皈依”的主题陈述，而是在具体的任务、战斗与抉择中，亲身“经历”这一主题。角色的困境成为学习者的困境，角色的成长引发学习者的共鸣。这种经由交互达成的情感卷入与叙事内化，使得抽象的文化价值观（如对“天命”的抗争与理解、个体责任与集体秩序的辩证）被赋予了个人化的情感温度与叙事肌理。学习者积累的，不再是与己无关的文化知识点，而是带着情感印记、附着于具体人物与情节的“活的故事记忆”。这构成了跨文化表达的深层动机与内容基石——他们想要讲述的，是自己“经历过”并产生共鸣的意义片段。

（二）游戏环境的“多模态解码”与“符号意义关联”过程

游戏世界是一个高度密集的多模态符号系统^[11]。一柄“金箍棒”，其意义不仅来自文本描述，更来自其视觉设计的威严感、挥舞时的力学反馈、在叙事中“定海”的神话功能，以及在玩家操作中展现的“变化随心”的交互体验。学习者在沉浸中，无意识地完成着对这套复杂符号系统的整合性解码，将视觉形象、操作逻辑、叙事功能与文化寓意关联起来，形成一种具身性的、网络化的理解。这种理解超越了语言的线性描述，是一种立体的“认知图式”。当需要表达时，这一图式便成为可被语言提取和组织的丰富矿藏，确保表达能超越苍白的概念罗列，充满具体的、可感知的细节与多维度的文化联想。

（三）游戏机制激发的“身份代入”与“视角转换”

游戏的交互本质，天然促使玩家代入角色身份，以角色的视角看世界、做决策。这种身份代入，为后续的跨文化表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心理基础与叙事立场。教学引导可以顺势深化这一过程，鼓励学习者从“操作孙悟空的人”，转变为“阐释孙悟空的文化使者”。这意味着视角的二次转换：从内部的行动者视角，抽离为外部的观察者与阐释者视角。学习者需要反思：我（作为角色）的行为，体现了何种文化逻辑？我的故事，如何能被另一种文化语境下的听众所理解与接受？这一过程促使学习者主动进行文化的比较、筛选与转译编码，为“讲好故事”做好认知与情感上的准备。

（四）游戏驱动的创造性表达

深度沉浸与理解内化之后，会产生一种表达的内在张力与创造冲动。游戏提供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只需复述的结论，而是一个充满留白、可供阐释的意义空间。例如，对同一段神话剧情，不同学习者可能产生不同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解读。教学的作用在于，将这种内在的理解与感悟，导向系统性的外化实践。这并非简单地复述剧情，而是基于个人内化后的理解，进行阐释性、对话性或创造性的意义再生产。无论是撰写角色分析、构建跨文化对

话场景,还是进行美学批评,其核心都是学习者将内化的游戏经验与个人思考相结合,运用目标语进行新一轮的意义构建与输出,从而完成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阐释者与共创者的关键转变。

因此,从沉浸到表达的转化路径,本质上是遵循并强化了游戏体验本身所引发的认知与情感发展轨迹。教学设计并非凭空创造任务,而是为这一自然的生成过程提供聚焦的方向、反思的框架与输出的支点,使游戏中萌发的文化感知与认同,得以明晰化、系统化,并最终获得在跨文化语境中自信表达的形态与声音。

四、教学反思与挑战

将国风游戏系统性地融入高中英语文化教学,虽展现出突破传统教学范式的巨大潜能,但其从理论构想走向普遍实践,仍面临着一系列需深刻反思与系统应对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关涉具体的技术操作,更触及课程观念、评价体系与教师发展的深层次变革。

(一) 内容甄别、教学适配与课程伦理的平衡

游戏作为商业娱乐产品,其首要设计逻辑并非教育。因此,教学转化的首要关卡在于严谨的内容甄别与精细的教学适配。教师必须对游戏内容进行前置性审阅,主动规避含有过度暴力、恐怖或不符合青少年价值观的片段。例如,应选取《黑神话:悟空》中展现神话景观、角色对话或艺术性战斗设计的片段,而非渲染血腥细节的场景。这要求教师不仅是玩家,更应是具备教育敏感性的“内容过滤器”。^[12]教师需扮演“教学设计师”角色,将长流程的游戏体验“切片”为聚焦特定文化主题、语言功能的“教学单元”。例如,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探索任务,提炼为围绕“古建筑命名与功能”的10分钟观察与描述任务。游戏内容的选择必须紧密围绕《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规定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主题语境,以及文化知识内容要求。活动设计需明确指向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等核心素养的具体维度,确保游戏是服务于课标目标的“催化剂”,而非脱离课程的“娱乐插曲”。

(二) 教师角色与专业发展的范式转型

成功实施此类教学,要求教师实现从“知识权威”到“学习生态构建者”的深刻角色转型。教师的核心任务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设计能激发学生探究游戏文化内涵的驱动性问题、脚手架任务和协作框架。在课堂中,教师是研讨的引导者、思维碰撞的催化者,帮助学生将游戏体验提升至文化反思与表达的高度。

教师需具备强大的数字资源获取、评估、整合与创造能力,建立个人的“游戏教学资源库”,对游戏片段、相关文化背景资料、学生作品范例等进行系统化管理,并能灵活配适于不同教学需求。这要求师资培训体系提供全新支持:包括学习基本的游戏机制分析、视频剪辑技能、跨学科合作教学,以及课程设计方法论的更新。教师自身也需要成为积极的学习者,勇于探索新的媒介与教学法。

五、结论

综上所述,国风游戏为高中英语文化教学提供了超越传统工具的新可能。它通过构建沉浸式的叙事世界、可感知的多模态符号以及高参与度的交互体验,能够应对学生文化认知浅表化与表达动力不足的核心问题。游戏促使学生在深度体验中自然完成对文化意义的理解与情感认同,并为其主动、创造性的跨文化表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内在驱动。

将国风游戏引入课堂,是对数字时代文化教学范式的一种有益探索。它着眼于学生真实的兴趣与体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培养具有坚定文化自信和有效沟通能力的年轻一代,开辟了一条值得深入探索的创新路径。未来的实践需在课程整合、教师支持与效果评估方面进行更系统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 张春莉,安凯,王子续.“双新”背景下教师新教材适应度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课程.教材.教法,2025,45(11):51-59.
- [2] 陈敏.英语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J].中国教育学刊,2019,(S1):93-94.
- [3] 朱一凡,林玉珍.提升文化认知与思辨能力——英语专业“读写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23,44(03):67-76.
- [4] 唐书哲,徐剑.提升高中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教学策略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5,26(01):61-66.
- [5] 白洋,张晓林.具身认知视域下《黑神话:悟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价值及启示[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5,44(01):138-144.
- [6] 蒲婷.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游戏的叙事创新研究[J].传媒,2025,(22):59-62.
- [7] 王钧,侯道宽.互动性叙事:非遗与电子游戏之间的跨媒介思考——以《黑神话:悟空》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

学,2025,(05):179-185.

[8] 叶浩生.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教育研究,2015,36(04):104-114.

[9] 夏晓燕,史红敏,郭亚玲,等.具身视角下外语教学 VR 课程化教学原理和顶层设计探析[J].外语电化教学,2021,(02):78-84+12.

[10] 何聚厚,黄秀莉,韩广新,等.VR 教育游戏学习动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08):70-77.

[11] 张秀丽,聂玉治.以数字游戏为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实践进路[J].中国编辑,2025,(03):70-76.

[12] 陈静,周小普.规则、随机性、符号: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以《王者荣耀》与《阴阳师》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8,40(10):134-156.

Research on the Instru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Style Games as a “Catalyst” for Cultural Expression

Jia Li¹

(¹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Shanxi, Jinzhong,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edagogical imperative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culture with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often fall short in fostering students' deep engagement and proactive expression.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Chinese-style video games, exemplified by Black Myth: Wukong, offer a novel pathway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Leveraging their comprehensive narratives,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 and strong interactivity, such games construct a unique 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facilit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s from passive cultural "recipients" into active "narra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ames drive this change: narratives provide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audiovisual and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bring cultural knowledge to life, and interactive elements stimulate the desire for express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amines the key processes and challenges involved in translating these affordances into instructional practice, arguing for the potential and value of Chinese-style games as an innovative pedagogical medium.

Keywords: New Curriculum & New Textbooks Reform;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Chinese-style games; cultural teaching;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薇 李慧琳

(浙江音乐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针对当前舞蹈教育专业存在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冲突、“为师”能力缺失等核心问题, 本文立足传统舞蹈文化资源, 构建以“三动四态”为核心的体验式教学模式。通过整合古典舞、民间舞等专业舞蹈资源, 挖掘“四态”教学形态与“三动”教学理念, 探索适应中小学身心健康发展的舞蹈教学路径。该模式突破传统技术训练导向, 强调以体验为核心的教学转化与文化传承, 旨在培养具备教材解构、素材整合、课堂创新等能力的舞蹈教育人才, 推动舞蹈教育回归“以舞育人”的本质功能, 助力青少年身心和谐发展与传统当代文化传承。

关键词: 舞蹈教育; 体验模式; 民间舞; 古典舞

基金项目: 2022年浙江音乐学院研究生教学创新项目(YCX20220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60

当前, 我国舞蹈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普遍面临结构性困境, 其标榜的师范性培养目标, 与实际运行中移植自专业表演训练的“技艺性”培养模式之间存在深刻错位。这导致毕业生虽精于个人技艺, 却普遍缺乏将舞蹈专业知识有效转化为中小学美育教学的能力, “为师”能力薄弱。这一矛盾使得舞蹈教育在服务青少年身心健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因此本文立足丰富的传统舞蹈文化资源, 提出构建以“三动四态”为核心的体验式教学模式。研究旨在通过理论阐释与案例结合, 探索一条连接专业舞蹈资源与学校舞蹈美育需求的实践路径。下文将首先剖析改革之现实诉求, 继而阐明该模式的基本理念, 并重点以“古典舞体验课”与“民间舞体验课”为例, 详述其如何依托“四态”教学形态与“三动”教学理念进行具体构建与组织, 以期舞蹈教育专业改革与“以舞育人”本质的回归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

一、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改革的现实诉求

(一) 舞蹈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的冲突

当今舞蹈教育专业的内在困境, 集中体现为其宣称的师范性培养目标与实际运行的培养模式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错位。这一错位并非偶然, 而是特定历史路径依赖、行业评价惯性以及教育理念滞后共同作用的结果。

舞蹈教育专业的本质目标应是培养能够运用舞蹈实施素质教育、美育培养的教育者。这意味着, 其毕业生不仅自身需具备一定的舞蹈艺术修养, 更关键的是必须掌握将舞蹈知识、技能与文化内涵, 转化为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活动的的能力。他们的核心价值, 体现为通过舞蹈教学启迪审美、陶冶性情、强健身心、传承文化, 最终服务于“以舞育人”的根本教育宗旨, 应关注舞蹈在提高生命意识、理解个体与集体的融合方面的重要作用、挖掘其在身心健康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理想的舞蹈教育人才, 应是一种复合型、应用型、反思型的专业教师, 应是通识型人才。作为单一型人才的对立面, 他必须知识宽广、能力全面。然而长期以来, 中国高等舞蹈教育体系在宏观上深受早期专业化、精英化培养模式的影响。这种模式源于对专业舞蹈表演人才的塑造, 其核心逻辑是选拔天赋、强化训练、锻造精湛的舞台表现力。它将“高、精、尖”的技艺水准和风格纯正度作为至高追求, 形成了一套高度系统化、程式化且评价标准单一的技术训练体系。历史地看, 这种“学院派”模式在

作者简介: 张薇(1974—), 女,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舞蹈教育、舞蹈编创;

李慧琳(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舞蹈学基础理论。

通讯作者: 张薇

提升我国舞蹈艺术专业水平上功不可没,但也使得众多地方院校、尤其是舞蹈教育专业,在缺乏深入辨析的情况下,将这种以技术为至高追求的模式简单迁移成为培养教师的唯一途径。

这种错位具体渗透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在课程体系上,教育专业的课程表往往模仿专业舞蹈院校舞蹈表演的课程,古典舞基训、民间舞、剧目排练等技艺类课程占据绝对主导与大量课时,而关于课程论、教学论、教材研究、教育心理学、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支撑师范性的核心课程则普遍薄弱、边缘化。课程之间呈现为以技能难度递进为逻辑的线性衔接,而非以教学能力生成为目标的模块化整合。

在教学方法上,课堂中心长期由“口传身授”的模仿与重复训练所占据。教师作为权威的示范者与纠正者,学生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与模仿者。这种适用于打磨身体技术的教学,与强调互动、启发、探究和创造的教育教学法相去甚远,导致学生浸润四年,却未曾被系统地教导过如何设计一份教案、如何分析学情、如何组织一个体验活动、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

在评价导向上,衡量学生专业水平的标尺,主要指向其个人身体的技艺完成度——跳得多难、转得多稳、模仿得多像、剧目表现得多么完整。毕业展演往往成为一场专业技能汇报,而衡量其作为未来教师潜质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模拟能力、育人反思能力则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估机制。这无形中强化了技艺即王道的价值观,使得学生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自身技术的提升。

(二) 舞蹈教育学生“为师”能力缺失

中小学舞蹈教育本质上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身体体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审美素养提升与文化认同培育。这一目标决定了学校教育必须与以培养专业表演人才为导向的舞蹈专业教育在理念、内容与方法上有所区分。然而,当前舞蹈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仍倾向于使学生精于舞蹈技艺的模仿与再现,未能充分适应中小学美育的实践需求。

“为师”所需的身体能力,应建立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基础上,注重在教学中开发学生的身体表现力与综合素养。当今舞蹈教育专业学生在面对中小学课堂时,普遍表现出教学转化、课程设计、文化传递与课堂组织等关键能力的薄弱,面临着无法迅速转化教学经验、未系统掌握适用教学方法、对教学内容理解浅表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教学转化能力薄弱,虽能完成古典舞规范舞姿、民间舞特定风格韵律,却难以拆解动作逻辑、设计循序渐进的体验活动,无法将专业舞蹈资源转化为中小学可接受的教学内容;二是课程开发能力不足,合格的舞蹈教师,不应仅仅是教材或现成教案的执行者,更应是能根据本校特色、学生兴趣与时代需求,进行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学资源创生的设计者。然而,当前学生普遍缺乏这种主动开发的意识与能力。他们对于传统舞蹈文化的认知,大多局限于课堂所授的风格性动作,却鲜少主动追溯其背后的历史源流、民俗语境、文学意象。缺乏挖掘传统舞蹈文化资源(如文史资料、民俗活动)并转化为教学素材的意识与方法,难以构建兼具文化性与趣味性的课堂;三是文化传递能力欠缺,熟知舞蹈流派风格却无法将其文化内涵转化为可理解的教学情境,难以引导中小学生通过身体体验感知传统文化魅力。

这种会跳不会教、懂技不懂育的能力短板,使其难以适配中小学舞蹈教育的实际需求,成为阻碍其从专业舞者向合格教师转型的关键障碍,也是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改革的核心动因。

二、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理念与特征

体验式教学模式与传统技术训练模式在目标、内容与方法上存在本质区别。传统舞蹈训练模式主要服务于职业舞蹈人才培养,强调对少数专业学习者进行系统化、程式化的身体规训,聚焦于高难度技术技巧的掌握与特定舞蹈风格的规范表达,容易让学生学习舞蹈动作的过程中忽视个体体验,忽略身体文化的多样性给予身体的不同体验。相比之下,体验式教学则具有鲜明的普适性与身心整合性,它以大多数受教育者的身体发展、心理成长与文化素养提升为核心目标,突出“以身体为媒介、以体验为路径”的教育理念。其根本目标并非培养专业舞者,而是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促进学生的身体感知力、情感表达能力、协作意识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进而服务于中小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与综合素质教育。

体验式教学的核心特征在于,以“体验”作为连接学生身体、认知与情感的桥梁,将专业舞蹈中的技术元素、

文化内涵与美学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表达的教学活动。在教学方式上,它摒弃单一模仿与重复训练,代之以游戏、模仿、即兴、环境互动、主题创设等多元形式,强调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互动性与生成性。例如:游戏舞蹈通过轻松自由的氛围激发学生身体表达的意愿,在玩耍中发展协调性、节奏感与合作能力;模仿舞蹈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与自然,通过身体模拟深化对世界的理解,拓展动作词汇与表现力;即兴舞蹈鼓励个体在瞬间动作中表达真实情感与想象,培养自信、自主与应变能力;环境舞蹈则注重身体与空间的对话,引导学生在特定情境中思考自我、他人与环境的关系,强化文化感知与社会意识。

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是将体验与传统舞蹈文化资源融合的一种课程开发理念,是将传承文化的舞蹈教育功能与体验教学实施紧密联系的课程探索。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首先在于挖掘文献材料、岩画图像、历史舞谱中等等的丰富传统舞蹈文化资源,同时结合国内外既已形成的古典舞等专业舞蹈教育体系的课程内容,进行适应于学校舞蹈教育体验舞蹈课程。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对于舞蹈教育专业的研究目标在于,引导师范舞蹈教育专业的学生,运用体验的手段,进行传统舞蹈文化与既有的“古典舞”“民间舞”动态有机整合,服务于非职业及中小学的学校舞蹈课堂,实现舞蹈教育功能的多元空间开掘。

三、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教学组织

(一)“古典舞体验课”与“四态”教学形态挖掘

“四态”教学样态(历史形态、教学形态、舞台作品形态、体验课堂形态)的提出,为中国古典舞的教学提供了从“形”到“意”、从“传承”到“创造”的完整认知与实践框架。而“古典舞体验课”作为一种以体验为核心、以文化传承与身心发展为目的的课程模式,其内涵与实践路径与“四态”教学形态高度契合、相互赋能。将“四态”教学形态有机融入“古典舞体验课”,不仅能够破解当前古典舞教学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更能引导学生在身体体验中完成对古典舞文化脉络、审美特质与当代价值的整体性把握,真正实现“以舞育人”的教育功能。

“古典舞体验课”的起点与核心在于对历史形态的文化挖掘与身体转化。区别于单纯的知识讲授,体验课强调引导学生通过身体“重返”历史现场,在动态模仿与情境想象中,理解古典舞动作生成的文化语境与生命逻辑。以“卧云”为例,教学并非直接教授标准化动作,而是首先引领学生追溯其戏曲源头——“卧鱼”。通过观摩《贵妃醉酒》《昭君出塞》等经典片段,学生直观感受同一舞姿如何随人物、情感而变:或显醉态妩媚,或示马背惊惶。这构成了初步的“视觉认知”。更深层的体验在于“历史情境模拟”。学生可想象身为唐宫舞者于地衣上徐徐卧倒,体味从容典雅;或想象如昭君般在颠簸中骤然伏地,感受坚韧与苍凉。这种具身化历史想象,将静态知识转化为动态的身体记忆与情感共鸣,使学生理解“卧云”不仅是造型,更是历史情境中生命状态的表达。此为后续学习奠定了坚实的意义基础,回答了“为何如此舞”的根本问题。

在“四态”框架中,教学形态是连接历史与舞台的桥梁。“古典舞体验课”对传统专业教学形态进行了重构,其核心在于将以技术传授与风格模仿为中心的训练模式,转化为以身体感知与文化体悟为中心的体悟式学习。传统课堂中,“卧云”常被分解为标准化步骤反复练习。而在体验课中则转换目标,注重探索拧倾圆曲的多样可能,体验内聚性动势的身心感受。教学方法上,大量采用游戏、即兴与探索任务。在此过程中,技术训练、审美感悟与文化理解被融为一体,学生主动发现与建构身体知识。

“四态”中的舞台作品形态,展示了古典舞语汇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生命力。“古典舞体验课”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但其重点并非让学生复刻作品中的高难动作,而是通过分析作品,引导他们理解编导如何对传统元素进行“易形”或“异形”,使其服务于当代情感与形象塑造。学生随后进行微创作,以“卧云”的动势内核为素材,围绕特定主题进行短句编创。这一过程将经典作品从观赏对象转化为方法论资源,使学生领悟到古典语汇在当代创作中的适应性与表现力,从而进行创造性的表达。

“四态”的最终落脚点是“体验课堂形态”,这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认知、教学体悟与创作尝试的综合生成场域。在“古典舞体验课”中,这一形态并非前三态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学生个体的身体体验与创造性表达为核心,进行的整合与升华。在这一阶段,课程可能以一个综合性项目展开。例如,围绕“寻迹·卧云”主题,学生需要完成历史阐释、元素个性化发展、以及主题短句创作与展示。课堂还可能引入拉班力效分析,让学生用不同动作

质感演绎同一舞姿，或利用环境与道具进行即兴编创。这种综合体验使学生完成了一次深度的文化身体旅程：他们用自己的身体验证了历史，实验了技法，并最终将传统元素内化为一种可供自由调用的个人化身体语言。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古典舞的审美认同与文化自信得以自然生发，舞蹈教育的“育人”功能——培养具有文化感知力、审美判断力与创新表达力的个体——也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古典舞体验课”以“体验”为方法论，以“四态”为认知框架，构建了历史形态、教学形态、舞台作品形态、体验课堂形态的完整教学。这不仅仅是在中小学或师范课堂推广一种趣味教学法，更是对整个舞蹈教育专业提出的深刻命题：未来的舞蹈教师，必须具备将深厚的专业资源转化为普适性教育动能的能力，能够设计并引领学生完成这种沉浸式、建构式的学习旅程。将中国古典舞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青少年的身体与心灵中实现生命力与育人价值。

（二）“民间舞体验课”与“三动”理念探索

“民间舞体验课”旨在超越对风格化动作组合的单纯模仿，强调通过体验的方式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感知地域动态文化艺术的魅力，过程中关注对民间舞蹈与地域文化内在联系的发现，从而真实而深入地感知民间舞蹈艺术中与之息息相关的文化生命力。课程构建依托“三动”教学理念——即“动势”、“动律”、“动姿”，作为解析、体验与转化民间舞蹈身体语言的核心框架。该理念将民间舞的学习，从对静态舞姿结果的追求，转向对动态过程中趋势、韵律与造型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把握，使文化体验具身于连贯的运动逻辑之中。

首先，“动势”是感知民间舞生命气韵的起点，连接着动作与生活源头的内在趋向。“动势”指动作的运动趋势与走向，是力量发起、流动与转换的势能。在民间舞体验课中，对“动势”的探究直接关联到对特定生活方式与劳动动态的理解。例如，在体验胶州秧歌时，教学重点不仅是“碾步”的脚位，更是体会脚步在泥土地上“推、碾、拧”的发力趋势，这源于农耕劳作中脚踏土地的实在感；东北秧歌中“出脚快、落脚稳、带动上身扭”的动势，则与关东人民在广袤黑土地上豪迈、泼辣的性格与行进方式相通。教师通过情境创设，例如模拟劳作场景，力效游戏等方式，引导学生先体验和想象孕育该舞蹈的“生活动势”，再将其提炼、放大为舞蹈化的身体趋势。这使动作摆脱了空洞的图形，被赋予了文化的动能与情感的指向。

其次，“动律”是把握民间舞风格命脉的核心，体现为身体有规律的内在韵律与节奏型。“动律”是舞蹈风格最鲜明的标识，是特定部位在特定节奏型中往复运动的规律。它是“动势”的节奏化、模式化呈现。在民间舞体验课中，掌握“动律”远比学会一串动作更重要。例如，藏族舞蹈的核心在于膝部连绵不断的“屈伸”动律；傣族舞蹈的灵魂在于重拍向下的“起伏”动律与“三道弯”体态中持续的内在抻拉感。民间舞体验课的教学智慧，在于从丰富的民间素材中精准提炼出核心动律，并将其转化为可体验、可探究的教学活动。例如，在彝族舞体验课中，教师通过“跳皮筋”游戏引导学生在单脚交替跳跃中自然形成重心转移，感知“快落慢起”的节奏；通过“手势模拟风的走向”，引导学生在移动中探索上身倾倒的“一顺边”体态。这种教学将“动律”从被模仿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在游戏与探索中的自我发现，实现了深刻的身体内化。

“动姿”是民间舞情感与意象的凝结性呈现，是在特定“动势”驱动下、遵循风格“动律”而形成的姿态造型。“动姿”包括静态造型与动态过程中的典型姿态。在传统教学中，“动姿”常常被作为教学的起点和终点，导致学习僵化。而在“三动”理念指导下的体验课中，“动姿”是“动势”与“动律”自然发展的结果，是文化意象的身体定格。例如，在蒙古族舞体验课中，学生对“雄鹰展翅”、“勒马远眺”等舞姿的把握，是在体验了草原般开阔的动势与肩部动律之后，通过模仿图腾、想象驰骋而自然生发的身体表达。在苗族舞体验课中，独特的“摆胯”体态与“斗鸡”式舞姿，是通过模仿鸭子走路与游泳的形态，在游戏化的跳动中自然而然呈现。因此，课堂上的造型学习，应始于对姿态背后动物、植物或劳动工具的意象讨论与动态模仿，让学生在理解“为何如此造型”的基础上，由内而外地行构出舞姿。

以“三动”理念建构的“民间舞体验课”，将“动势”、“动律”、“动姿”三者环环相扣，为民间舞教学提供了清晰脉络。这既能使中小學生更本质、更灵动地感知民族舞蹈之美，也为未来的舞蹈教师提供了将深厚民间文化资源转化为有效教学活动的科学方法论，真正使民间舞在课堂中“活”起来，成为传承文化、滋养身心的生动载体。

四、结语

本文针对舞蹈教育专业培养中的核心矛盾,系统构建了以“三动四态”为理论框架的传统舞蹈体验式教学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中小学生提供了感知传统文化、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的优质美育课程,更重要的是,它为舞蹈教育专业的学生——未来的教师,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法论,即如何将深厚的专业资源解构、转化并设计为以学生体验为中心的教学活动。未来我们应该不断探索舞蹈教学新模式,使舞蹈在当代教育中真正发挥其陶冶性情、启迪心智、传承文化的独特育人价值,助力培养出兼具文化自信与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邓佑玲.中国专业舞蹈高等教育研究综述[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3(1):1-6.
- [2]张薇.‘宅一族’们动起来——“身体问题”引发的对舞蹈教育功能的思考[J].舞蹈,2014,(01):62-63.
- [3]吕艺生.舞蹈人才类型的历史迁化[J].文化艺术研究,2019,12(03):25-34.
- [4]夏帆.试论中国舞蹈教育中的人才培养模式[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02):46-49.
- [5]史博,靳金.舞蹈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困局与破局[J].中国大学教学,2025,(12):44-49.
- [6]陆心怡,刘珊珊,吕园欣.义务教育阶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舞蹈美育研究[J].戏剧之家,2024,(26):139-141.
- [7]刘妍.普通高校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9,(06):113-118.
- [8]陆心怡,刘珊珊,吕园欣.义务教育阶段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舞蹈美育研究[J].戏剧之家,2024,(26):139-141.
- [9]郑慧慧.开展学校舞蹈教育的问题探赜[J].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1,6(03):90-96+101.
- [10]李延绍.新课程与教师的教育思想[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2.
- [11]张文海,靳金.舞蹈教育专业的历时性变迁与当代转向[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5,(01):127-131.
- [12]林扬帆,易晓明.从“离身”到“具身”:舞蹈教育的当代转向[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4,(01):150-155.
- [13]张薇.适应于个体身心发展的当代学校舞蹈体验模式研究[J].美育学刊,2017,8(06):17-23.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n Experiential Teaching Model for Traditional Dance

Zhang Wei, Li Huilin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Zhejiang,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core issues in current dance education programs,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models, and the lack of pedagogical competence, this paper draws on traditional dance cultura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an experiential teaching model centered on the "Three-Movement and Four-State" framework. By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dance resources such as classical and folk dance, the study explores the "Four-State" teaching forms and the "Three-Movement" teaching philosophy, aiming to develop dance teaching pathways suitable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model moves beyond traditional skill-oriented training, emphasiz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as the core for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t seeks to cultivate dance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equipped with abilities in curriculum deconstruction, material integration, and classroom innova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dance education to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educating through dance." Ultimately, it contributes to the harmoniou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youth and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Dance Education; Experiential Model; Folk Dance; Classical Dance

《高级日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案例

金锦善¹

(1.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本文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为案例, 围绕日语专业三年级《高级日语》课程, 系统探讨其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文章首先阐释《高级日语》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继而梳理课程思政教学整体框架, 再以第三课“日常的思想(日常の思想)”为具体载体, 详细探讨课程思政融入路径、“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具体教学方案及评价方式。研究旨在为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助力课程思政与日语教学深度融合、落地见效。

关键词: 《高级日语》; 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 实践案例

基金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XJGZ20230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61

一、引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中提出,“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2020)^[2]中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日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涉外行业、日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日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日语人才。”培养规格分为“素质要求”“知识要求”和“能力要求”3个子板块,这3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子板块实际上是对“培养目标”板块中人才的素养、知识和能力水平的具体阐释^[3]。在此背景下,如何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入日语专业教学已成为亟待探讨的核心议题,日语学界亦围绕该主题展开了诸多相关研讨。

汪帅东(2022)认为,《日本文学史与作品选读》课程可以通过挖掘与作家作品相关的中国文化元素进行课程思政建设^[4]。桂艳玲,陈娟(2024)提出,基于产出导向的《基础日语》课程教学目标、思政教学内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教学评价体系以及持续改进机制^[5]。陈安梅(2024)指出,《高级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要性和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6]。徐淑丹(2022)提出,挖掘《日文报刊选读》课程教学资源,把时政热点引入教学课堂,增加中国发行的日文中国时事资讯,培养学生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华文化^[7]。

综上所述,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已获得院校及一线教师的高度关注,针对日语专业各课程的思政教学策略构建与实践探索正稳步推进。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及各门课程中融入路径的宏观分析,对教学落地过程中的具体案例实操经验梳理与范式推广较为欠缺,导致多数一线日语教师虽具备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主观意愿,却面临实操层面的困境,难以将思政目标有效转化为教学实践。因此,思政教学具体案例梳理与应用,已然成为当前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亟待补充的关键环节。基于此,本文先介绍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级日语》课程的整体设计,再以第三课“日常的思想(日常の思想)”为研究载体,探讨课程思政融入路径、“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具体教学设计及评价方式,以期为高校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推动课程思政理念在日语教学中落地见效。

二、课程思政理念与《高级日语》课程融合的可行性分析及整体设计

作者简介: 金锦善(1969—),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日韩语言文化比较、日语翻译。

（一）课程思政理念与《高级日语》课程融合的可行性

《高级日语》作为日语专业三年级核心必修课程，其课程特点与思政理念具有适配性，契合高年级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成长规律，可行性主要体现在课程定位、教学要求与学生能力三个维度。

课程核心定位方面：该课程以语言技能培养为基础，同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思想传导功能。课程要求学生不仅熟练掌握单词、语法、句型，更需深入理解课文所涉日本历史、文化、社会、文学等内容，精准把握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这种“语言+文化+思想”的三维教学定位，为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提供了广阔载体，可实现语言习得与价值引领的同步推进。

教学目标延伸方面：课文内容的深度解读要求与思政目标高度契合。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具体历史事件、人物形象剖析文本蕴含的民族精神。在涉及中日两国共有特性的内容时，通过资料查阅、要点梳理等方式，能够强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同时以跨文化对比为切入点，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思辨能力。此外，通过完成课题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学生认知能力方面：三年级学生已具备扎实的日语语言功底，能够应对篇幅较长的日语原文文章，且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可主动参与资料搜集、主题辩论、感想文撰写等深度教学活动。这种认知基础与学习能力，能够避免思政教育陷入“说教式”灌输，在教学中能够自然渗透思政元素，提升育人实效性，实现能力培养与素养塑造的有机统一。

（二）《高级日语》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框架

《高级日语》课程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的课程思政要求为指导，紧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日语综合教程》第5册教材特点，重构“思政切入点—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评价方式”五位一体的整体设计框架，将评价方式深度嵌入各学习环节，实现课程教学与思政育人的深度融合。以下为《高级日语》每一课的总体设计框架，兼顾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具体内容如下（请参考图1）：

1. 三维教学目标的协同实现

以“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课程思政要求为指导，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日语专业特色，确立协同联动的三维教学目标，为五位一体整体设计框架落地筑牢基础。

知识传授目标：构建“中日文化双向认知”知识体系，推动知识内化与思维提升。一方面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词汇、语法、句型，重点认识和理解课文内容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深入把握文章所涉日本历史、文化、社会风貌及日本人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内容。另一方面，针对教材中国元素较少的短板，围绕课文主题补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素材，通过中日社会语言文化的对照分析促进思维碰撞、拓展认知，引导学生整合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架构、加深对文本内涵的理解，最终推动感悟沉淀，夯实语言学习与文化认知的双重根基。

能力培养目标：聚焦专业核心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全方位提升，覆盖多元能力维度。以文章分析、跨文化对比为核心载体，强化学生日语语言表达能力。依托课前预习、资料搜集等任务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与发现问题能力，通过小组合作、主题辩论等形式锤炼团队合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结合文章解读与观点辨析，培育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同时以思维导图绘制、感想文撰写等任务为抓手，提升对文本的理解深度、锻炼书面写作能力，适配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综合能力需求。

价值塑造目标：紧扣思政育人核心与办学定位，实现价值理念的全方位引领。课前依托自主学习模式，引导学生深度解读文章内涵、研习背景知识，有效激发学习兴趣，培育自律意识与主动探究意识。课中通过中外文化对比与交流研讨，助力学生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养成包容互鉴、尊重多元文化的处事态度，进而增强文化自信与个人发展自信。课后借助思维导图梳理与感想文撰写，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兼顾创新思维的培育，最终实现个人综合素养与价值取向的协同提升。

2. 思政融入点与对应评价方式设计

围绕五位一体框架中的“思政切入点”与“评价方式”，结合课前、课中、课后全教学环节，设计五大思政融入载体（详见图1），配套针对性评价标准，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确保思政融入可衡量、可落地。《高级日语》过程性评价占比50%，终结性评价占比50%。过程性评价中，期中考试占比20%，作业占比15%，课堂表现占比15%，具体评价方式如下：

课前在线预习（问题驱动）：作为课前思政切入点，依托线上教学资源布置预习任务，围绕课文主题设计思政导向问题，引导学生提前梳理课文脉络、搜集相关文化素材，初步形成认知。评价方式纳入平时成绩（作业维度），重点考核预习资料完整性、问题回答的深度及思政认知的初步呈现。

课中学生发表：作为课中核心思政输出载体，要求学生结合预习成果与课文思政元素，围绕指定主题准备PPT进行发表，展现对知识的掌握与价值认知。评价方式纳入平时成绩（课堂表现维度），从语言表达准确性、

内容逻辑性、发表仪态等方面进行评价。

课中小组讨论：作为课中思政深化载体，针对文章中的思政核心议题组织小组讨论，引导学生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深化价值认知。评价方式纳入平时成绩（课堂表现维度），以小组为单位考核讨论参与度、团队协作效果，结合个人表现综合评价。

课后绘制思维导图：作为知识与思政融合的梳理载体，要求学生课后绘制思维导图，串联课文语言知识、文化要点与思政元素，整合知识架构，构建“知识+思政”融合体系。评价方式纳入平时成绩（作业维度），考核思维导图的逻辑性。

课后撰写感想文：作为思政价值内化与终结性考核载体，要求学生结合课文思政元素与个人感悟，撰写感想文，实现“知识应用、能力输出、价值表达”的统一。评价方式纳入期中、期末考试，作为主观题型重点考核，侧重评价学生对思政元素的理解深度、跨文化思辨能力及价值取向的内化程度。



图1 《高级日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如图1所示，通过上述设计，将五位一体框架贯穿每一课的教学全流程，既坚守《高级日语》语言教学核心，又实现思政元素的精准融入与科学评价，破解思政教育与语言教学“两张皮”问题。

三、具体教学案例

（一）内容设计及教学目标

本节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日语综合教程》第5册第三课“日常的思想（日常の思想）”第7次课为例，设计课程思政教学。第三课主要讲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价值观变化和当今社会需要思考的价值观。本节课的主要教学活动分为梳理课文内容和输出自己的观点。本节课将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第三课“日常的思想”，掌握日本价值观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了解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知识，具有国际视野。

能力目标：通过思维导图和读后感，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讨论作者观点，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思辨创新能力；通过课文中的价值观分析，拓宽学生视野、扩展知识面。

价值引领目标：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价值观变化，使学生具有家国情怀、全球化意识及国际视野；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教学组织与实施

1. 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思维导图、拓展知识环节；

讲授法：梳理课文内容、拓展知识环节；

讨论法: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从总结作者价值观主张到生成学生自己价值观;

体验学习法: 学生完成读后感。

2. 教学过程

表1 《高级日语》课程教学过程

教学步骤	教学内容及说明	融入思政点	融入方式及评价
课前	课前作业: 学生用思维导图梳理全文内容, 整理作者的价值观观点, 并思考自己的价值观。	学生在梳理日本价值观变化的过程中, 思考价值观问题。	课前作业、完成思维导图 (作业维度评价)
导入	教师组织课堂教学, 师生互相问候。 1.1 学生展示思维导图作业, 教师进行点评。 通过思维导图讲解和老师的点评, 学生进一步了解文章脉络, 巩固文章中心内容, 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1.2 向学生交代本节课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 · 梳理课文内容; · 讨论作者的观点; · 知识拓展: 了解现在中日两国的价值观; · 小组分享: 交流自己的价值观。	养成文明礼仪习惯。 了解日本价值观的变化过程; 锻炼口头表达和思辨能力。 明确本节课教学目标, 引起学生兴趣。	问候礼仪 学生展示思维导图 利用 PPT
课中	1. 梳理课文内容 1.1 教师和学生以问答形式, 梳理文章结构, 即“起、承、转、结”四段内容。 1.2 以提问的方式, 梳理日本对立价值观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学生的观点: ①梳理“勤奋与享乐”价值观 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完全树立以劳动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勤奋成为了第一美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勤奋失去了作为唯一绝对价值的资格, 享乐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问题 1: 结合文中的二宫尊德的事迹, 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对待勤奋和享乐的问题? ②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过去一百年, 支撑日本人的价值观是勤奋、繁荣、进步。但物质上的繁荣导致了公害问题, 因此, 繁荣不能在价值的宝座上称霸。 问题 2: 结合文中的“繁荣和征服自然”问题, 思考作为当代青年应该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③思考“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进步中登场了嬉皮派的思想, 其主张是脱离劳动, 要过自由的回归自然的生活。 问题 3: 结合文中的嬉皮派思想, 思考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④概括并评价作者的价值观 作者主张: 在发现两类价值观的调和点的过程中, 寻找新的文明的原理。	· 劳动中心的价值观 · 勤奋、繁荣、进步的价值观 · 享乐、自然、自由的价值观 · 敬业、爱国的价值观 · 富强、文明、和谐的价值 · 进步、文明、和谐的价值 · 进步、文明、和谐的价值	梳理文章结构 结合感动人物二宫尊德回答问题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结合公害问题回答问题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结合嬉皮派的否定观回答问题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讨论	2. 讨论作者的价值观点 小组讨论: 是否赞成作者的价值观观点, 选代表说明其理由。	· 新旧价值观的和谐	讨论、发表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拓展	3. 知识拓展 3.1 介绍日本现在的价值观, 与学生探讨日本的价值观变化。 3.2 梳理日本价值观变化的同时, 自然引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学生用日语翻译具体内容。	· 国际视野、全球化意识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师生共同探讨 师生一起翻译
交流分享	4. 用日语分享自己的价值观 (输出) 学生用两个汉字 (如进步) 高度概括自己的价值观, 在小组分享后, 在全班发表自己的价值观。 教师点评同学们发表的价值观, 并鼓励大家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继续努力。	价值观 价值观努力	思考自己的价值观 分享交流 (课堂表现维度评价)
总结	教师总结本节课所学内容, 留课后作业。		教师点评, 鼓励
课后	布置感想文作业: “我的价值观”, 400 字以上。 →用日语讲述中国故事。 (输出)	引导学生思考作为当代大学生, 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	写感想文 (期中、期末评价范围)

（三）教学效果、教学反思及建议

基于“思政切入点—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评价方式”五位一体设计框架，以《高级日语》“日常的思想”一课为实践载体，根据课堂观察、成果反馈、评价数据等，整理以下教学效果、教学反思及建议。

1. 教学效果分析

从三位一体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和评价数据来看，课程思政融合教学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了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的协同推进。

知识传授层面：学生对中日文化双向认知的深度显著提升。通过课前预习资料搜集、课中文化对比讨论及课后思维导图绘制，90%以上的学生能够精准掌握课文核心语言知识，同时结合补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完成中日日常价值观念的对照分析，有效弥补了教材中国元素不足的短板，构建了更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能力培养层面：学生综合能力得到全面锤炼。课堂发表与小组讨论环节中，学生的日语语言输出流畅度、逻辑清晰度较以往明显提升，批判性思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强化。思维导图与感想文撰写任务中，学生自主学习、资料整合及书面表达能力显著进步，小组合作任务也有效提升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问题解决能力。

价值塑造层面：思政育人目标实现潜移默化渗透。通过中日文化对比与文本中的思政元素挖掘，学生的文化自信与跨文化包容意识明显增强，能够理性看待多元文化差异，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在感想文与课堂发言中，多数学生能够结合自身经历表达对“价值观”的理解，社会责任感与人文素养得到培育，实现了“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协同塑造。

2. 教学反思

结合教学实践与效果反馈，本次课程思政教学虽然达成核心目标，但仍存在部分短板，需针对性优化完善。

存在问题：一是学生参与度与成效存在分层差异。少数性格内向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参与度较低，未能充分表达自身观点，导致思政价值引领覆盖不够全面。二是思政元素与语言教学的衔接精准度不足。部分教学环节中，补充的中华文化素材与课文语境契合度有待提升。三是评价体系的思政维度细化不足。现有评价虽涵盖过程性与终结性环节，但对思政元素的评价针对性与科学性有待提升。

改进措施：一是优化分层教学设计，提升全员参与实效。课前针对学生语言基础与认知水平分层布置预习任务，教师对内向学生与薄弱学生进行针对性引导，确保价值引领全覆盖。二是精准衔接思政与语言教学，提升融合自然度。围绕每篇课文主题筛选高度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素材，提前梳理语言知识点、文化要点、思政元素的关联逻辑，避免素材生硬嫁接。三是细化思政评价标准，提升评价科学性。制定分层评价量表，将思政相关任务的评价拆解为“文化认知、跨文化思辨、价值表达、语言输出”四个维度明确评分标准。

3. 教学策略与建议

基于前文教学实践、效果分析及反思结论，结合哈尔滨师范大学办学定位与日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围绕《高级日语》课程思政“五位一体”框架落地提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教师能力方面：一是定期组织日语专业教师参与跨校交流研讨，聚焦日语文本思政元素挖掘、跨文化教学中价值引领等核心议题，提升教师对思政元素的敏感度与挖掘能力。二是组建课程思政教学小组，通过集体研讨梳理每篇课文的语言知识点、文化要点、思政元素关联逻辑，形成标准化教学指引。三是推动教师自我提升，广泛涉猎中日文化、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知识，拓宽思政教学视野，提升跨文化对比教学与价值引导的专业性。

教学实施方面：一是落实分层精准教学，针对性设计预习任务、课堂提问、拓展作业，确保不同层次学生均能参与思政学习。二是创新思政融入形式，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中日文化对比短视频制作等形式，拓宽思政教学路径。三是强化互动式价值引领，课堂讨论中鼓励学生大胆表达对文化差异、价值观念的见解，教师针对争议性话题适时点拨，引导学生自主形成正确价值观。

机制保障方面：一是完善学生评价体系，严格落实前文提出的思政分层评价量表，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全面考量学生知识掌握、能力提升与价值塑造情况。二是构建多元监督反馈机制，通过学生问卷调查、师生座谈会等形式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整改。三是强化教学团队协作，定期开展教学研讨与经验交流，推动课程思政教学从个体探索走向团队共建，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四、结语

本研究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日语专业三年级《高级日语》课程为实践载体，围绕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探究。研究首先论证了《高级日语》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了语言教学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的核心原则。继而构建了课程思政教学整体框架，并以“日常的思想（日常の思想）”一课为例，设计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案，形成了课前自主研习、课中文化研讨、课后反思升华的思政育人闭环。

日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之路，是一个持续探索、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当前，课程思政的融入已初见成效，但如何实现思政元素的精准植入而非生硬嫁接，如何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教学策略，仍是未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愿以本研究为起点，凝聚更多日语教育工作者的力量，共同推动课程思政理念在日语专业教学中落地生

根,培养出更多兼具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复合型日语人才。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2]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3] 许宗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解读[J].外语学刊, 2020(5):7-14.
- [4] 汪帅东.文化自信视阈下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教学实践——以“日本文学史与作品选读”课程为例[J].东北亚外语研究,2022(03):5-15.
- [5] 桂艳玲,陈娟.OBE理念下《基础日语》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探索[J].语言与文化研究,2024(06):130-133.
- [6] 陈安梅.课程思政视域下的“高级日语”教学实践探索[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4(08):63-67.
- [7] 徐淑丹.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多元混合式教学实践——以日文报刊选读课程为例[J].高教学刊,2022(20):124-127.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al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Advanced Japanese” Course

Jinshan Jin¹

¹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chool of Eastern Languages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bedded in “Advanced Japanese”, a core course for third-year Japanese majors. It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Advanced Japanese”, then sorts out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Further, with Lesson 3 “Daily Thoughts (Nichijo no Shiso)” as the specific carrier, the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integration path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ncrete teaching plan featuring the trinity of “knowledge, competence and values”,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exemplary cas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Japanese majors at universities, and to facilita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Japanese teaching.

Keywords: Advanced Japane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practical cases

经济地位与心理适应：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综述

李忻媛¹ 葛蒲² 陈天姿³ 白倩^{4*}

(1.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上海 201620,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3.沈阳医学院医养健康产业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4.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1617)

摘要：本综述聚焦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系统梳理“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传导路径的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进展。研究表明，低收入（尤其是主观感知收入不足）与更高抑郁风险显著相关，抑郁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抑郁在“收入→主观幸福感”路径中可能起关键中介作用，揭示了收入通过引发经济压力和社会比较，提升抑郁风险，进而降低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本综述为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机制及制定精准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出未来研究应采用多波次纵向设计、探索社会支持与家庭因素的调节作用、开发针对性认知干预措施，以更全面揭示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老年人；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中介机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00

1.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与社会挑战。这不仅关乎个体晚年生活质量，也深刻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众多心理健康问题中，抑郁在老年群体中尤为普遍且危害显著。与中青年抑郁不同，老年抑郁常伴随认知功能下降、慢性疾病共病和社会角色丧失，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临床特征。研究显示，2010-2020年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平均流行率达31.74%，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抑郁平均流行率更是高达40.78%^[1]。抑郁引发的情绪低落、认知偏差等问题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成为老年群体幸福体验缺失的核心风险因素^[2]。

在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众多因素中，收入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最直接、最可量化的指标，在老年群体中具有特殊重要性^[3]。与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等其他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相比，收入在老年阶段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可干预性，且直接决定老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程度^[4]。收入不平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核心在于社会比较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当个体在与同龄群体比较中产生收入劣势认知时，会引起自卑感与无力感，这些负面感受会转化为心理压力，从而提升抑郁风险并损害主观幸福感^[5]。

本文在系统梳理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所纳入研究主要来自Web of Science、PubMed、CNKI等数据库，重点关注发表于近二十余年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文献筛选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优先纳入明确测量收入水平（或主观收入感知）、抑郁症状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同时参考具有代表性的纵向研究与跨国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对不同研究的理论解释与经验发现进行整合分析，以呈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与共识。

2.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界定

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是个体根据自设标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进行认知评价与情感体验

作者简介：李忻媛(2006—)，女，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葛蒲(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陈天姿(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白倩(1994—)，女，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评估、老年人健康管理、医疗保障。

通讯作者：白倩

的总和,其核心维度包括生活满意度(认知成分)和情感平衡(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比值,情感成分)^[6]。这一概念具有以下本质特征:一是主观性,即其评定完全依赖于个体自身的内在标准;二是相对稳定性,主要测量的是长期、稳定的情感倾向和认知评价,而非短期情绪波动。研究表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相对稳定的基线水平,除非重大事件(如丧偶,重病)否则不易剧变^[7]。

在老年学研究中,主观幸福感被视为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与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指标^[8]。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随着感知到的剩余时间减少,老年人更倾向于追求情绪意义而非知识获取,因此其主观幸福感更多反映情感满足和社会关系质量。

3. 收入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3.1 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收入通过满足食物、住所、医疗等基本需求,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理解这一关系提供了框架: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增加收入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的实现;而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老年人在生活选择上的自主权会不断增强,进而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改善^[9]。

收入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延伸至社会参与和心理安全。充足收入能覆盖社交活动的基础成本,减少孤独感并提升幸福感,世界幸福报告(2022)的社会连接数据也证实,积极的社交关系与生活满意度高度相关,即使在疫情期间,强社交支持仍能缓冲危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冲击^[10]。此外,收入带来的经济安全感可缓解老年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通过降低慢性心理压力直接正向作用于其情绪体验与生活评价^[11]。

然而,老年期特有的经济脆弱性使绝对收入不足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退休后,收入来源单一且固定,缺乏通过劳动增加收入的能力,而老年期医疗支出和护理需求又大幅增加。Cheruvu 和 Chiyaka (2019) 基于 2011 年美国行为风险因素检测系统(BRFSS)数据发现,在社区居住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量约 24018 人)中,因医疗费用而就医阻碍的受访者,其抑郁症状患病率为 17.8%,而未受限者仅为 5.5%^[12]。与此同时,在经济导向的社会中收入常与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感绑定;低收入的老年人易产生“成为负担”的自我认知,导致自尊降低与无价值感^[13]。Wang 等人(2024)基于五个前瞻性队列研究(覆盖 24 国 50 岁及以上成人)显示,社会不活跃和孤独在低收入引起抑郁风险显著增加的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社会不活跃的中介效应占比 6.12%,孤独的中介效应占比 5.54%^[14]。

3.2 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 Festinger 的社会比较理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不是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还依赖于与参照群体的相对收入比较^[15]。Umar 等人(2014)基于加拿大 45 岁以上人群的代表性样本研究证实,相对收入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绝对个人收入^[16]。Junhong Zhu 等人(2020)针对中国 28 个省份 3590 名老年人的面板数据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结论——相对收入对城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会受到经济不平等、社会保障水平等宏观因素的调节^[17]。

相对收入通过社会比较机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在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这种基于社会比较的心理效应,使得老年人在衡量自身境遇时,会更有针对性地审视特定的经济指标与生活保障——老年群体的参照群体多集中于同龄人,其比较内容聚焦于退休金水平、医疗保障质量及子女经济支持能力等维度^[18]。Kuo 和 Kawachi (2023) 基于美国加州健康访谈调查(CHIS)数据的研究发现,向上收入比较(与更高收入者比较)会诱发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导致健康、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和社会关系等多维度福祉指标下降^[19]。这一发现揭示了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当老年人感知到自身收入处于劣势地位时,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引发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并通过削弱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归属感,最终降低整体生活满意度。

4. 抑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抑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耳其一项针对 257 名老年人的研究显示,抑郁对生活满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73 ($P < 0.001$)^[20];中国一项涉及 1754 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同样证实,抑郁不仅直接显著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beta = -0.11$, $P < 0.001$),还会通过被排斥感产生间接负面影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6.51%。神经生物学研究也为这一影响提供了证据。Pizzagalli 等人(2022)通过脑影像研究发现,抑郁会导致前额叶-边缘系统的情绪调节功能受损,这种神经机制的改变直接削弱了个体对积极奖励的感知力,并强化了负面自参照加工,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21]。

这种负面影响在老年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一方面,老年抑郁的诱因常与晚年特有的多重丧失体验(如退休、丧偶、躯体功能衰退)相关;另一方面,老年期常见的“抑郁-认知”共病现象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抑郁症状加速认知功能的衰退,而这种能力衰退带来的无力感会打击老年人的自信心,从而再度降低主观幸福感。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因配偶去世、子女离家、朋友减少而逐渐缩小,抑郁导致的社交退缩更易演变为社会孤立,缺乏外部支持系统来缓冲抑郁对主观幸福感的损害^[22]。此外,老年抑郁的“躯体化”表现(如慢性疼痛、消化不

良、乏力)常被误认为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导致识别和治疗延迟,使抑郁症状慢性化,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为持久^[23]。

5. 抑郁在老年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综述关注的核心传导机制为“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其中抑郁可能发挥关键中介作用。该路径的理论依据在于:收入(特别是相对收入不足)并非直接决定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引发经济压力与社会比较,提升老年人的抑郁风险,进而由抑郁这一负面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5.1 中介效应的实证证据

多项实证研究为抑郁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Liu 等人(2024)利用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 2017)对其中1136名老年人进行的分析显示,心理资本在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而抑郁则作为心理健康的负面指标参与其中^[24]。这一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得到了验证:一项基于美国5366名健康与退休调查(2006-2010)受访者数据的分析显示,经济压力显著增加抑郁症状,并以此为核心路径负向影响整体心理福祉^[25]。Han 和 Hong (2011)对韩国50岁以上老年人样本使用潜类分析显示经济资产和金融状况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分类因素,且经济压力会通过心理因素(如压力感、抑郁)影响满意度^[26]。

抑郁在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中的中介效应强度并不一致。研究显示,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27]。在收入较低阶段,增加收入能够有效降低抑郁程度;然而,当收入超过中等水平后,继续增加收入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心理压力源:例如,高收入可能伴随更高的工作压力,更强的社会期待以及对财富损失的担忧。

5.2 中介效应的多重路径

抑郁在“收入→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是涉及多重心理与行为机制的复杂过程。

5.2.1 经济压力的累积效应

低收入引发的持续经济压力是触发抑郁的核心机制。经济压力理论指出,收入不足会导致基本需求无法满足,这种物质匮乏状态会引发持续的心理应激反应^[28]。Bierman 等人(2023)的研究显示,经济压力会削弱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心,这些心理资源的丧失是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困扰的重要中介机制^[29]。Srivastava 等人(2021)对印度老年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经济压力还会加剧社会孤立感和无力感,进一步恶化心理健康^[30]。这种压力具有累积性特征:持续的经济困难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使应对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5.2.2 社会参与与社交隔离的行为路径

低收入限制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机会,催化了社交隔离的发生,进而加剧抑郁症状。收入不足使老年人难以负担社交活动的相关费用,也可能因“经济窘迫”产生社交回避行为^[31]。Wang 等人(2024)在24个国家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证实,社会不活跃和孤独在低收入/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50岁以上老年人抑郁的路径中起显著中介作用。其中社会不活跃的中介效应占比6.12%,孤独中介效应占比5.54%^[32],表明低收入老年人更容易因为缺少社会活动和感到孤独而出现抑郁症状。

更为重要的是,社交隔离与抑郁之间存在双向强化关系:低收入引发的社交隔离会增加抑郁风险,而抑郁症状又会进一步减少社交意愿,形成恶性循环。Santini 等人(2020)基于美国全国社会生活、健康与老龄项目(NSHAP)的纵向中介分析发现,社会隔离感通过增加孤独感,进而显著预测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增加^[33]。Cacioppo 等人(2010)一项为期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基线水平的孤独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在5年后抑郁症状的增加,其标准化效应值(β)约为0.35至0.40^[34]。

5.2.3 认知评价与应对方式的调节机制

个体对收入不足的认知评价方式会调节抑郁的中介作用强度。Lazarus 和 Folkman (1984)的压力与应对理论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主观评价决定了压力反应的强度^[35]。若老年人将低收入归因于不可控因素,抑郁风险相对较低;若归因于个人失败,则更易引发抑郁^[36]。此外,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如寻求经济支持、调整开支)的老年人抑郁症状较轻,而采用回避或自责策略的老年人抑郁风险显著升高^[37]。

5.3 中介效应的非线性特征

抑郁在“收入→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强度呈现出非线性特征。Lei 等人(2014)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数据的研究显示,抑郁症状(使用CES-D 10量表)与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负相关,且在低收入(中位数以下)区间,收入增加对抑郁的缓解效应更强;在中位数以上,边际效应几乎平坦^[38]。欧美地区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中介路径的阶段特征。Kahneman 和 Deaton (2010)基于45万美国样本的调查数据发现,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时,收入增长显著提升生活评价和情感主观幸福感;但超过此阈值后,收入增长对情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趋于平缓^[39]。在欧洲地区,一项针对欧盟收入和生活状况调查(EU-SILC)数据的研究显示,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在年度等值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欧元后便不再增长^[40]。从抑郁中介视角来看,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当收入跨越基本需求阈值后,抑郁的主要触发因素从“绝对经济压力”转向“相对剥夺感和

社会比较”，而后者对收入增长的敏感度显著降低。

6. 总结与展望

6.1 主要发现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机制与实证证据，将老年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机制归纳为下方的路径图（如图 1）。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长通过满足基本需求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跨越基本需求阈值后，这一效应迅速衰减，相对收入和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凸显。经济压力（尤其是主观感知的收入不足）与社会比较机制共同作用，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抑郁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收入对抑郁的影响强度超过绝对收入，体现了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在老年心理健康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发现为“幸福悖论”提供了心理机制层面的解释：收入的普遍增长若未能改善个体的相对收入地位，社会比较效应将持续甚至加剧抑郁水平，从而抵消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

而抑郁是“收入→主观幸福感”传导路径中起到核心中介之一。这一中介机制涉及多重心理与行为过程：经济压力的累积效应、基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社交隔离的行为路径，以及认知评价与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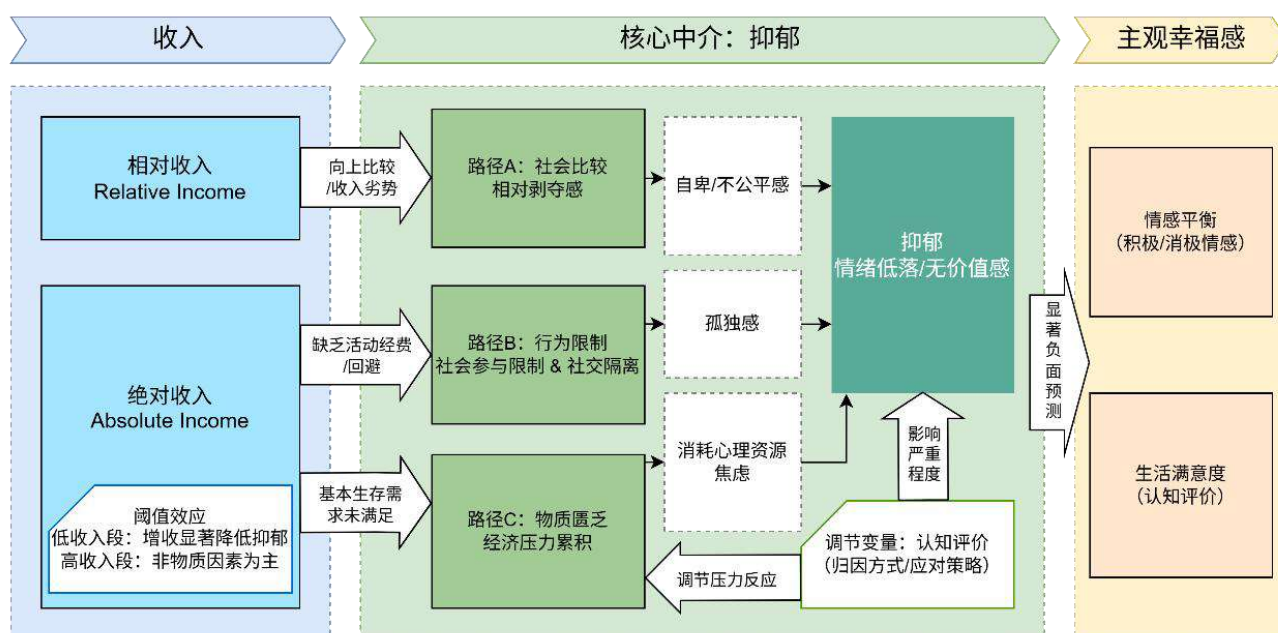


图 1 老年人心理福祉传导机制图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为理解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但仍存在以下局限：

(1) 横断面设计在现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限制了因果关系的确立。虽然部分纵向研究支持了该传导路径，长期动态追踪仍然不足。多波次纵向设计配合交叉滞后模型或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能够更清晰地揭示收入变化对抑郁和主观幸福感的长期影响及其因果方向和动态轨迹。

(2) 现收入与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支持、社区资源）以及老年期特有的家庭因素（如代际关系、居住安排、配偶健康状况、子女赡养能力）的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多层次模型或结构方程模型可用于探索这些因素如何调节“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路径，从而更全面地揭示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机制。

(3) 干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现有理论和实证发现，未来可开发针对主观收入认知的行为干预措施（如认知重构训练），帮助老年人建立合理的社会比较标准，降低相对剥夺感，从而缓解抑郁症状，提升主观幸福感。

6.3 政策启示

基于本综述的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建立分层次的老年经济保障体系具有现实必要性。在保障基本养老金水平的基础上，低收入老年群体需要获得重点关注，确保其收入水平达到基本需求阈值。这对缓解抑郁、提升主观幸福感具有关键作用。养老金标准需要定期评估和调整，以覆盖医疗、护理和基本生活开支的实际需求。

(2) 主观收入感知的干预同样重要。政策制定不应仅聚焦于绝对收入水平，还需通过社区教育、心理健康服务等途径，帮助老年人建立合理的社会比较标准，降低相对剥夺感。社区层面的积极老龄化教育可引导老年人

关注自身生活质量的改善,而非横向收入比较,促进纵向比较(与自己过去比较)和下行比较(关注不如自己者)的积极心理机制。

(3) 老年抑郁的筛查与干预体系需要加强。鉴于抑郁在收入影响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建立早期筛查机制——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显得尤为必要。可及性强、针对性强的心理干预措施,如认知行为疗法、正念训练等,能够降低抑郁水平,阻断“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传导路径。

(4) 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不容忽视。低收入不仅导致物质匮乏,还会减少社会参与机会,加剧社交孤立。政府和社区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社交活动平台,可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连接,对缓解抑郁、提升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促进政策需要考虑其特殊需求:一是无障碍设施建设,确保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能够便利地参与社区活动;二是提供上门服务和线上社交平台,为失能或半失能老年人创造社交机会;三是发展老年志愿服务体系,让健康老年人通过帮助他人获得角色认同和自我价值感,同时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互助支持网络。

(5) 多部门协同的综合干预体系是应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复杂性的必然选择。民政部门负责经济保障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卫生部门负责心理健康筛查与治疗服务,社区组织负责社会参与平台的搭建与运营,教育部门负责积极老龄化教育的推广。各部门形成合力,方能构建有效的老年心理健康支持网络。

7. 结语

本综述系统阐明了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机制,为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理论框架。核心发现表明,抑郁是“收入→主观幸福感”传导路径中的关键中介之一,这一机制涉及经济压力累积、基于社会比较的相对剥夺、社交隔离以及认知评价等多重心理与行为过程。

未来研究应在纵向设计、测量标准化、多因素交互、干预措施开发等方面深入探索,以更全面地揭示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机制。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支持政策虽然必要,但不足以充分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必须将经济保障与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参与促进等措施相结合,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干预体系,才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Zenebe Y, Akele B, W/Selassie M, et al.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depression among old ag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nnal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21, 20(1): 55.
- [2] Fiske A, Wetherell J L, Gatz M.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9, 5(1): 363-389.
- [3] 王雪辉, 彭聪. 老年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生活方式[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20, 13(3): 35-42.
- [4] 胡薇. 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J]. *社会*, 2009, (2): 112-130.
- [5] 孙立平, 孙周, 张翼. 由心至身: 阶层影响身体的社会心理机制[J]. *社会学研究*, 2016, (1): 1-25.
- [6]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34-43.
- [7] Diener E, Lucas R E, Scollon C N. Beyond the hedonic treadmill: Revising the adaptation theory of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6, 61(4): 305-314.
- [8] 杜鹏, 韩文婷. 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 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J]. *The Lancet*, 2022, 400(10362): 1939-2052.
- [9]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50(4): 370.
- [10] Helliwell J F, Layard R, Sachs J D, et al.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3[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23.
- [11] Angelini V, Cavapozzi D, Corazzini L, et al. Do Danes and Italians rate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same way? Using vignettes to correct for individual-specific scale biases[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 76(5): 643-666.
- [12] Cheruvu V K, Chiyaka E T.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who reported medical cost as a barrier to seeking health care: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J]. *BMC Geriatrics*, 2019, 19: 192.
- [13] Portacolone E. Older Americans living alone: The influence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on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018
- [14] Kim J et al. The associatio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activities, and lonelines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ults aged 50 years and older across 24 countries: findings from fiv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J]. *The Lancet Healthy Longevity*, 2024

- [15]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J]. *Human relations*, 1954, 7(2): 117-140.
- [16] Umar M. A. Boodoo, Rafael Gomez, Morley Gunderson. Relative income, absolute income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older adults: do retirees differ from the non-retired?[J].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2014, 45(4): 281-299.
- [17] Junhong Zhu, Changyong Liang, Jeffery Lucas, Wenjuan Cheng, Zhaoyang Zhao.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a Panel Survey[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1): 4786.
- [18] Knell M, Stix H. Reference Groups and Pensioners' Subjective Economic Well-Being in Europ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31(2): 509-536.
- [19] Kuo C T, Kawachi I.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human flourishing: how do upward income comparisons affect health,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23, 77(10): 656-662.
- [20] Başçillar M, Karakaya C. Subjective health complain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er adults: the predictive role of geriatric depression[J]. *Psychogeriatrics*, 2025, 25(1): e13230.
- [21] Pizzagalli D A, Roberts A C. Prefrontal cortex and depression[J].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22, 47(1): 225-246.
- [22] Blazer D G. Depression in late life: review and commentary[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2003, 58(3): M249-M265.
- [23] Wang Y, Li J, Wang Y, et al.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oldest-old depression disorder[J]. *Chinese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isorders*, 2024, 7(3): 214-217.
- [24] Liu X, Wang Z, Chen C. Effects of incom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elderly: Complete mediation roles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J]. *Quality in Ageing and Older Adults*, 2024.
- [25] Wilkinson, L. R. (2016). Financial strain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1(4), 745-754.
- [26] Han, C. K., & Hong, S. I. (2011). Asse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patterns among Korean older adults: Latent class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73(3), 209-235.
- [27] Li C, Ning G, Wang L, Chen F. More income, less depression? Revisiting the nonlinear and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mental health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 [28]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Lorenz, F. O., Conger, K. J., Simons, R. L., Whitbeck, L. B., Huck, S., & Melby, J. N. (1990). Linking economic hardship to marital quality and instabi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3), 643 – 656.
- [29] Bierman A, Upenieks L, Lee Y, Harmon M.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strain f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older adults: examining the explanatory role of multiple components of the self-concept[J].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2023, <https://doi.org/10.1177/23780231231197034>.
- [30] Srivastava S, Purkayastha N, Chaurasia H, Muhammad T.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older adults in India: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J]. *BMC Psychiatry*, 2021, 21: 179.
- [31] Feng Z, Cramm J M, Jin C, et al.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Chinese older people[J]. *SSM - Population Health*, 2020, 11: 100636.
- [32] Wang Y, Liu M, Yang F, et al. The associatio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activities, and lonelines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ults aged 50 years and older across 24 countries: findings from fiv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J]. *The Lancet Healthy Longevity*, 2024, 5(9): e618.
- [33] Santini ZI, Jose PE, Cornwell EY, et al. Social disconnectedness, perceived isolation,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older Americans (NSHAP):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analysis[J]. *Lancet Public Health* 2020; 5: e62 – 70.
- [34] Cacioppo J T, Hawkley L C, Thisted R A. Perceived social isolation makes me sad: 5-year cross-lagged analyses of loneli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in the Chicago Health, Aging, and Social Relations Study[J]. *Psychology and Aging*, 2010, 25(2): 453-463.
- [35] Lazarus R S, Folkman 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M].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36] Pudrovskaya T, Schieman S, Pearlin LI, et al. The sense of mastery as a mediator and moderator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hardship and health in late life[J].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005, 17(5): 634-660.

[37] Holahan CJ, Moos RH, Holahan CK, et al. Stress generation, avoidance cop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10-year model[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73(4): 658-666.

[38] Lei X, Sun X, Strauss J,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ES among the mid-aged and elderl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national base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 120: 224-232.

[39] Kahneman D, Deaton A.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38): 16489-16493.

[40] Simon Röck, Gottfried Tappeiner & Janette Walde. 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Sati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ith Income at the Aggregate Level in Europe.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25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Xin-ai Li¹, Pu Ge², Tianzi Chen³, Qian Bai^{4*}

(¹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²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³ School of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Industry, Shenyang Medical College, Liaoning, China; ⁴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Abstract: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among older adults,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ing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progress of the "income → depression → subjective well-being" pathway.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low income—particularly perceived subjective income inadequacy—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depression, while depressive symptom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WB. Depression likely serves as a crucial mediator in the link between income and SWB, revealing a mechanism where income triggers financial stress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reby increasing depression risk and subsequently reducing overall well-being. This review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 health mechanisms of the elderly and formulating precise interventions.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loy multi-wave longitudinal designs,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factors, and develop targeted cognitive interventions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uncover the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Keywords: Older adults; Income; Depress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Mediating mechanism

环境权入宪的必要性、规范建构与路径选择

杨天朗¹ 潘坤鹏¹

(1.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 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权利载体, 其宪法地位的确认是新时代依宪治国与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宪法环境保护条款呈现国家目标化倾向, 缺乏基本权利属性的规范表达, 引发系列治理困境。环境权以生态环境本身的质量与完整性为核心客体, 与生存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区别, 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结合我国宪法实践, 环境权入宪应在公民基本权利章节增设明确条款, 构建完整保障体系, 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根本法支撑。

关键词: 环境权; 宪法基本权利; 生态文明; 权利区分; 入宪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19

一、引言

2018年“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标志我国生态治理进入宪法规范引领阶段, 《宪法》第26条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 但未明确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地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已从附属利益上升为核心权益诉求。环境权入宪并非简单增设条款, 而是通过宪法规范重构, 实现生态利益从国家目标向公民权利的转化, 解决环境治理中权利保障不足、权力约束乏力等根本问题。

二、环境权未明确入宪的现实困境

(一) 宪法规定的权利属性缺失

我国宪法环境保护规范集中于第9条与第26条, 均属国家目标条款, 侧重设定国家义务, 未赋予公民权利^[1]。这种义务主导、权利缺位的结构, 导致公民面临环境侵害时难以直接依据宪法主张救济, 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作用受限, 国家义务缺乏权利主体监督, 环境保护实践中易出现重政策、轻权利的偏差。

(二) 权利保障的碎片化与冲突化

环境权益的跨领域特征与部门法分散规制存在天然矛盾, 当前我国环境权益保护分散于环境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 形成诸法共治但权责不清的局面。环境侵权纠纷中, 受害者常面临私法救济不足、公法救济不畅的困境, 且环境权益与发展权、私有财产权的冲突缺乏宪法层面协调机制, 导致权利保护失衡。

(三) 风险社会的环境治理需求适配不足

现代社会环境风险呈现不确定性、跨区域性、不可逆性特征, 传统损害填补型权利保障模式难以适应需求。新时代环境权天然地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 进而具备了与西方传统的环境权概念完全不同的理论内涵, 即公民享有优美生态环境及在其中生活。^[2]风险社会中的环境权需要兼具“防御权”与“受益权”双重属性, 既防范国家与私主体的环境侵害, 又要求国家提供积极的风险预防与环境改善措施。我国现有宪法规范缺乏对风险预防的明确规定, 国家环境风险规制缺乏宪法层面的权力边界与义务约束, 环境权的核心价值取向已从免于侵害转向积极享有优美生态环境, 这种价值转向要求宪法规范从被动防御向主动保障转型, 而我国现有规范体系尚未完成这一转变。

三、环境权的规范内涵与外延界定

作者简介: 杨天朗(2005—),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

潘坤鹏(2007—),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宪法与行政法。

通讯作者: 杨天朗

（一）环境权的核心内涵

我国宪法中通过设定国家保护与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义务，实质上是保护和改善具有公共性的生态环境利益，将生态环境利益上升为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并通过宪法规范对其进行保护。^[3]而环境权的核心内涵可界定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在健康、平衡的生态环境中生活、发展的权利，以及要求国家、社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权利。其内涵具有三个维度。

一是权利主体多元性。环境权的主体包括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个体主体即公民，享有清洁空气、洁净水、安宁环境等具体环境权益；集体主体包括社会组织、特定区域共同体，甚至延伸至未来世代。环境权的个体享用性与集体生成性并不矛盾，个体对环境的独立享用是其成为基本权利的基础，而集体行动则是权利实现的保障。

二是权利内容复合性。环境权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内容。实体性权利包括享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生态景观权等具体权益；程序性权利包括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环境司法救济权等。比较法研究发现，实体性与程序性权利的结合是环境权实现的关键，部分国家通过实体权利宣告与程序权利保障的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权利保障体系。

三是权利属性双重性。环境权既具有自由权的防御属性，要求国家与私主体不得侵害公民的环境权益；又具有社会权的受益属性，要求国家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这种双重属性是环境权区别于传统基本权利的重要特征，需要宪法规范同时设定国家的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

（二）环境权与生存权、健康权的规范区分

作为人权的环境权不仅是一项个体性权利，更是一项集体性权利。环境权的集体性表现在它被视为人类的整体性权利，具有自得性。^[4]环境权与生存权、健康权虽存在关联性，但在核心客体、权利功能、价值指向三个维度具有本质区别，构成独立的规范价值。

核心客体不同。生存权的核心客体是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聚焦生存与否的基础需求，具体包括温饱、住房、基本生活保障等维持生命存续的必要要素，仅关注人类生存的底线物质条件，不涉及环境本身的质量与完整性。健康权的核心客体是人体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侧重防范对人体健康的直接侵害，无论是环境污染、侵权行为还是其他外部因素，只要直接损害人体生理机能或心理状态，均属健康权的保护范畴，其核心指向是人的身体与心理机能不受侵害。环境权的核心客体是生态环境本身的质量与完整性，不仅包括环境对人体健康的保障，更涵盖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自然景观的优美性、环境要素的可持续性等多元价值，其保护对象延伸至生态环境自身的存续与优化。

权利功能不同。生存权是底线保障型权利，功能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底线，防止因缺乏基本生活条件而丧失人的尊严，其作用机制是兜底保障，仅在公民生存面临威胁时启动救济，不涉及更高层次的环境利益诉求。健康权是损害防范型权利，功能在于防范各类直接侵害人体健康的行为，防范与救济的范围仅局限于人体健康受损的情形，无法涵盖生态环境恶化但未直接损害健康的情形，如景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权是综合保障型权利，功能呈现多元复合性：既具有防御功能，防范国家与私主体的环境侵害；又具有受益功能，要求国家积极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还具有程序功能，保障公民参与环境决策、获取环境信息，其作用机制贯穿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全链条，覆盖从环境质量维持到生态利益增进的全维度需求。

价值指向不同。生存权的价值指向是人的生存尊严，核心是解决有尊严地生存问题，强调人类作为主体的生命存续价值，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调和，仅关注人类内部的生存公平。健康权的价值指向是人的身心健康，核心是解决健康地生存问题，聚焦人类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福祉，虽与环境相关，但仅将环境视为保障健康的工具性要素，未赋予环境独立价值。环境权的价值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核心是实现可持续地生存与发展，既包括当代人对优美生态环境的享有权，也包括未来世代的环境利益；既关注人的发展需求，也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既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也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互惠共生，其价值指向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三）环境权的外延边界

从权利内容看，环境权包括实体性权利，如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土壤安全权等；程序性权利，如环境公益诉讼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集体性权利，如区域环境权益、代际环境权益等；从权利主体看，包括全体公民、法人、非法人等。

四、环境权入宪的具体路径

（一）宪法条款的具体设计

建议在第38条后增加1款。设置第38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权的内容和行使由法律规定。”^[5]

（二）与现有宪法规范的体系衔接

环境权入宪需与现有规范形成有机整体：一是与国家目标条款衔接，明确国家目标实现以保障环境权为核心；

二是与人权条款衔接,明确环境权是人权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与其他基本权利衔接,通过比例原则协调权利冲突。

(三) 入宪后的实施机制构建

环境权入宪的最终成效依赖于完善的实施机制,应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层面构建保障体系。

立法具体化机制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依据宪法环境权条款,完善环境法律体系。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明确环境权的具体内容、行使方式与救济路径;二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整合分散的环境法律规范,建立统一的环境权保障制度;三是完善相关部门法,在民法、行政法、刑法中增设环境权保护的配套条款。

行政保障机制上,强化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建立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与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健全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保障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是环境权实现的重要保障,应通过宪法规范强化行政机关的环境义务。

司法救济机制上,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允许环保社会组织、检察机关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环境侵权的特殊诉讼规则,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降低权利救济的难度。

五、结论

环境权入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宪法价值体系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当前环境权未明确入宪导致的规范缺失、保障碎片化等问题,已成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瓶颈。环境权作为独立基本权利,与生存权、健康权在核心客体、权利功能、价值指向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价值。环境权入宪后通过立法具体化、行政保障与司法救济机制构建,确保环境权从宪法规范转化为公民实际权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法支撑,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

参考文献:

- [1] 张婉婷. 作为新兴权利的环境权证成为宪法权利的条件和限度[J]. 人权, 2025, (04): 165-182.
- [2] 秦天宝. 论新时代的中国环境权概念[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2, 28(03): 5-19.
- [3] 朱谦. 环境公共利益的宪法确认及其保护路径选择[J]. 中州学刊, 2019, (08): 47-54.
- [4] 唐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下环境权的规范表达[J]. 社会科学, 2025, (06): 138-149.
- [5] 吕忠梅. 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J]. 法学杂志, 2018, 39(01): 23-40.

The Necessity, Normative Construction and Path Sel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Tianlang Yang¹, Kunpeng Pan¹

¹Nanjing Tech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right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modernizing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uses in China's Constitution tend to be national goal-oriented, lack normative expressions with the attribute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thus trigger a series of governance dilemmas. With the qua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self as its core object, environmental right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right to subsistence and the right to health, and have independent normative value. In light of China'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should involve adding explicit clauses in the chapter on citizens' fundamental rights,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protection system, and providing fundamental legal support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right;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al righ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stinction of rights; path to constitutionalization

历史保护与中心城市复兴：以费城协会山项目为例（1957-1964）

姚佳星¹

(1.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中心城市的普遍衰退，美国城市更新模式逐步从联邦主导的“大规模清除重建”转向市场导向。费城协会山项目即是这一转型期的关键例证，它在埃德蒙·培根的规划下，通过创建多部门协作的历史街区更新组织模式，成功修复了 18 世纪的历史建筑，并引入现代建筑实现了新旧融合。该项目成功吸引中产阶级回流、提升了区域经济与税收基础，被视为历史街区复兴的典范，但其依赖市场与精英驱动的路径也导致了原低收入居民的流离失所，引发了社会公平的争议与历史保护理念的矛盾。尽管如此，协会山项目仍突破了“保护与拆除”的二元对立，为全球后工业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中心城市复兴；历史保护；费城协会山项目；埃德蒙·培根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对中心城市（Central Cities）^①衰败，美国联邦政府相继出台《1949 年住房法》与《1954 年住房法》，推动城市更新从早期以“大规模清除重建”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向强调修缮与历史保护。在此背景下，由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主导的费城协会山项目（Society Hill Project）^②，成为全美首个将历史保护与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城市更新实践，标志着“保护性更新”^③的兴起。协会山项目是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成果多见于士绅化、社区变迁与规划创新等方面^④，但现有研究多将其视为独立的保护案例，未能将其充分置于二战后美国中心城市衰败与复兴的整体历史框架中加以审视，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当代城市更新目标的示范价值。为此，本文基于前者研究成果及部分原始资料试图对此进行补充，以期抛砖引玉，共谋佳篇。

一、协会山的起源与历史沿革

协会山得名于 1682 年在此成立的自由商贸协会（Free Society of Traders）。1681 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授予威廉·潘恩（William Penn）特许状，建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次年，自由商贸协会在协会山成立，并获得

作者简介：姚佳星（2000- ），女，山西省大同市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① 中心城市并非一种城市类型，也不仅仅是具备中心性特征的某些大城市，而是与郊区（Suburbs）相对的概念，用以指称在大都市区内发挥中心作用的城市。（参见李文硕：《二战后美国的“城市危机”：一个概念的生成、阐释与应用》，《世界历史》2024 年第 5 期。）

^② 本论文采用“协会山”作为“Society Hill”之地名译法，其对应项目“Society Hill Project”相应译为“协会山项目”。该译名依据是：该地名源于 1682 年该地区建立的“商人自由协会”（Free Society of Traders），其英文名中的“Society”特指这一特定历史机构，而非现代汉语中广义的“社会”概念。采用“协会山”的译法更能准确反映其历史渊源，避免因词义泛化造成误解。

^③ 保护性更新指在延续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通过保留、整治与更新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区域基础设施、公共配套与环境品质，实现历史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协同的城市更新模式。其核心在于平衡“保护”与“更新”的双重目标，区别于一般以拆除重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参见刘娟：《城市历史街区保护性更新规划探析——以太原市南华门历史街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10 年。）

^④ 国外学者如格雷戈里（Gregory L. Heller, *Imagining Philadelphia: Edmund Bac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尼尔（Neil Smith,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45, No. 4, 1979, pp. 538-548; 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等，对协会山项目规划理念落实过程与具体举措、资本驱动本质与社会空间排斥效应等问题均有详细论述；国内缺少以协会山项目为个案的研究，但顾方哲（顾方哲：《公众参与、社区组织与建筑遗产保护：波士顿贝肯山历史街区的社区营造》，《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第 43—47 页。）、李文硕（李文硕：《绅士化运动：中心城市复兴的可行路径——以纽约市苏荷区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第 30—39 页。）等对贝肯山、苏荷区的研究成果都很有影响力与参考性。

约 100 英亩土地兴建住宅^①，人们通常将这些住宅称为“协会住宅”。虽然 1723 年协会破产，“协会山”这一名称却沿用至今。

18 世纪，协会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这里是富商、官员和神职人员的聚集地，他们兴建起众多乔治亚风格的优雅宅邸，彰显出殖民地贵族的审美追求。同时，手工业者与工人则在该区的联排住宅中居住、工作。随着人口增长，社区功能日趋完善。1745 年，沿着南第 2 街排布的“新市场”（New Market）建成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后于 1804 年在最北端增建兼具乔治亚与联邦风格的总店（The Head House），强化了区域商业活力。宗教宽容政策促使各种教派在此建立教堂，包括希腊复兴风格与乔治亚风格的教堂，体现了社区的宗教多元与精英文化认同。社区生活亦兼具世俗性与公共性。社区有数不清的小酒馆和旅店，约 1759 年建造的“烦恼之人酒馆”（Man Full of Trouble Tavern）是费城最古老酒馆建筑，其兼具旅馆的私密性住宿功能与公共酒馆的规模，吸引了众多工人、水手和其他海滨劳动者，后于 1965 年被修复为博物馆向游客开放。宾夕法尼亚医院（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的创立则体现了对公共健康的关注。由于街道卫生恶劣且医疗资源匮乏，殖民地居民的医疗救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1751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创立了北美第一所公立医院，这不仅标志着殖民地医疗体系的突破，其乔治亚风格的东翼建筑也反映了费城精英对理性与秩序的追求。

然而，19 世纪末，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协会山迅速衰败，沦为“贫民窟”社区。1870 年建成的码头街市场（Dock Street Market）曾随配套设施陆续建成而繁荣，但因建筑破败且不适应现代货运需求，最终成为区域交通瓶颈与城市衰败的象征。同时，交通技术革新（1890 年代费城有轨电车系统整合、无轨电车技术引入与统一票价及免费换乘制度确立）打破了通勤限制，促使协会山的大量中产阶级与富裕家庭西迁至新兴郊区。随着原居民外流，住房投资萎缩，许多独户宅邸被改建为多户住宅或廉租公寓，贫穷白人与黑人劳工大量涌入，居住密度激增，且许多住宅缺乏现代管道与电力等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持续恶化。

二战后，费城经济结构向后工业转型，制造业岗位急剧流失，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1957 至 1970 年间，费城流失了 75% 的制造业岗位；70 年代末，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已超越制造业。^②在此期间，协会山人口减少超 50%，住房单元减少 18%，空置率达 13.2%。^③公共空间的衰败更具象征性：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沦为流浪汉与边缘群体的聚集地，甚至因声名狼藉而被警方暂时关闭。《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甚至给协会山贴上了“寒酸”的标签。^④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指出：“流浪汉与堕落者并未毁掉一个充满活力且受珍视的公园，也未赶走体面的使用者，他们只是搬进了被遗弃之地并盘踞下来。”^⑤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兴衰，至 20 世纪中期，协会山已从城市核心区沦为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地带，陷入衰败谷底，面临被彻底改造的命运。

二、埃德蒙·培根的协会山项目与复兴策略

小说家纳撒尼尔·伯特（Nathaniel Burt）在分析“费城文艺复兴”时指出：“协会山的复兴……只是费城百年沉睡的巨大拼图中的一块，它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⑥的确，协会山通过历史保护与现代开发的结合，不仅在费城整体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美国城市更新树立了典范。这一成就，是在总规划师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前瞻性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多部门有效协作实现的。

埃德蒙·培根关于协会山的规划理念根植于“城市是有机生命体”的核心认知。他将城市比作会成长、受伤和愈合的生命体，主张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持续的治疗和培育”，而非“截肢”。^⑦《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① Russell F. Weigley and Nicholas B. Wainwright, eds., *Philadelphia: A 300-Year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2, p.19.

^② Roger D. Simon, *Philadelphia: A Brief History*, Mansfield: Pennsylvani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17, p. 89.

^③ 关于这一现象可参见 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④ Roger D. Simon, *Philadelphia: A Brief History*, Mansfield: Pennsylvani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17, p. 81.

^⑤ Valerie Sue Halverson,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in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6, p. 89.

^⑥ Nathaniel Burt, *The Perennial Philadelphians*, London: Dent and Son, 1963, p.539.

^⑦ Gregory L.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8.

Forum) 将此更新方法命名为“费城疗法”(Philadelphia Cure)。^①1948年, 培根提出协会山应“重生”为充满活力的社区, 而非静态的博物馆。他认为, “居住于历史悠久的建筑中”这一特质极具吸引力。^②因此, 最佳方案是吸引中产阶级迁入, 由其自主修复历史住宅, 并将修复成本转移至私营部门, 以此遏制郊区化趋势。

为达到这一目的, 1949年培根执掌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Philadelphia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后, 开创性地将历史保护理念融入城市更新实践。而制度保障是这一实践中实现多部门协作的基础。《1949年住房法》(Housing Act of 1949)以联邦资金推动贫民窟清理和土地再开发, 但培根涉及历史建筑的重建计划难以获得联邦资金的援助, 导致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社区面临拆除的风险。《1954年住房法》(Housing Act of 1954)的出台标志着联邦政府政策的转向, 它将联邦资助范围从“拆除”扩展至“修缮”, 并规定政府承担历史建筑修缮费用的三分之二, 同时鼓励私营企业自愿参与土地修复。^③培根充分利用这一政策为协会山项目争取了合法性支持。

此外, 规划委员会聘请建筑师尤金·H·克拉伯(Eugene H.Klaber)设计了多部门协作的组织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是创建一个“有限股息公司”(limited dividend corporation)作为协会山项目的私人开发商, 从而在政府引导下引入市场机制与私人资本。^④这一设计构成了“多部门协作的历史街区更新组织模式”的雏形。费城市长理查森·迪尔沃思(Richardson Dilworth)上任后, 采纳此方案, 并认为由商界领袖发起成立的公私合营组织“大费城运动”(The Greater Philadelphia Movement, 后来演变为旧费城发展公司), 是承担“有限股息公司”职能的首选主体。

1958年, 《华盛顿广场重建计划》(The Washington Square Redevelopment Plan)获批, 该计划将相关区域分为东区(即协会山)和西区。华盛顿广场东区(Washington Square East)的更新区域被划分为多个单元分批启动^⑤。同年, 费城重建局在获得对华盛顿广场东区的联邦规划拨款后, 确定了协会山“以修缮为主”的更新原则, 强调“应尽一切努力保护这片独特区域留存的所有历史遗迹, 避免大规模拆除”^⑥。

旧费城发展公司(Old Philadelph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是践行多部门协作的组织模式的重要载体。1956年起, 它与费城重建局积极争取联邦资金, 以“码头街市场地块具备开发为现代住宅的潜力”为主要卖点。1957年底, 联邦城市更新管理局(Federal Urban Renewal Administration)为协会山项目拨款1110万美元^⑦。1960年, 旧费城发展公司被指定为协会山区域内房产的唯一重建开发商, 其不直接募集资金, 而是“营造能自发吸引私人投资的环境”^⑧。费城重建局将荒废或空置的房产移交至旧费城发展公司, 后者在对空置房屋完成征收后, 转售给具备修缮能力的购房者, 并附加限制性修复协议。这一模式通过公私合作有效突破资金限制、整合资源, 推动协会山历史保护与市场开发的有机结合。^⑨

码头街市场搬迁计划是该模式的关键实践。1954年, “大费城运动”以建设现代化市场、提升城市商业竞争力为由, 提出搬迁被其批评为“占用黄金改造用地的有害设施”的码头街市场食品配送中心(Dock Street Food

^① Francesca Russello Ammon, “Picturing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Photographs as Planning Knowledge in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8, p. 4.

^② Gregory L.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20.

^③ 李艳玲: 《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106页。

^④ Gregory L.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21.

^⑤ 华盛顿广场东区城市更新区共分四个单元, 其中1号单元与2号单元具有代表性。1958年, 重建局批准了华盛顿广场东区1号单元城市更新计划(Washington Square East Unit 1 Urban Renewal Plan), 于次年正式启动, 重点开发了码头街市场等地块, 广泛采用“先拆除后现代重建”的更新方式。1960年, 重建局批准华盛顿广场东区第2单元城市更新计划(Washington Square East Unit 2 Urban Renewal Plan), 于1961年启动, 该单元以住宅和公共机构用地为主, 被视为“费城疗法”的典范。

^⑥ Jon C. Teaford, *The Rough Road to Renaissance: Urban Revitalization in America, 1940-1985*,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1.

^⑦ Cyril B. Roseman,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 Study of Decision Process in Philadelphia,”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p. 121.

^⑧ Madeline L. Cohen, “Postwar City Planning in Philadelphia: Edmund N. Bacon and the Design of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1, p. 451.

^⑨ Gregory L.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22.

Distribution Center)。①培根提议在码头街市场原址建造现代塔楼，作为对区域内历史建筑的功能补充。为此，市议会拨款逾 250 万美元用于土地征用，费城重建局负责收购原码头街市场地块，“大费城运动”则与相关方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码头街市场搬迁计划通过市政机构、公私合营组织与私营企业的三方协作，为华盛顿广场东区的再开发创造了空地。

莱肯多夫·贝聿铭(Leckendorf Pei)在协会山塔(Society Hill Tower)的建造中，进一步构建了服务于“新旧融合”理念的多部门协作的组织模式。1958 年，旧费城发展公司为原码头街市场地块寻找开发商，贝聿铭与开发商韦伯·纳普公司(Webb and Knapp)合作提出的设计方案获批，培根评价其为对“基本城市规划问题的绝妙解决方案”②。在后续项目推进中，因出现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担保的抵押贷款不足以支撑项目继续进行、协会山塔实际建造成本远超预期等问题，美国铝业公司(Alumium Company of America)作为垄断企业介入成为最终开发商，显示了大型垄断企业在投资巨大、工期较长的更新工程中，其能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发挥关键作用。正如美国铝业公司执行副总裁利昂·希克曼(Leon Hickman)所言：“城市更新只有在公共和私人机构愿意携手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团队合作下才能取得成功。”③在外观设计上，1962 年建造的三座 31 层高的塔楼采用窄体与大面积玻璃，以提供极佳视野。在空间布局上，联排住宅群则围绕中央停车场布局，配套设置开放空间与街边停车位，采用弗兰德式砌砖工艺、拱形门廊等兼具历史元素与现代风格的设计，在塔楼与历史砖砌房之间形成过渡，实现了培根所称的“新与旧”的融合。④

精英阶层的参与为协会山更新注入了文化资本与社会动员力量，形成多主体协作中的补充维度。1954 年，N. W. 艾尔父子(N. W. Ayer & Son)总裁巴顿联合华盛顿广场周边的商界人士，通过华盛顿广场协会(Washington Square Association)推动该广场的翻新与美化工程，这一实践体现了精英阶层与市民自发组织协同参与公共空间治理的合作模式。1956 年迪尔沃思市长上任后，以私人身份在华盛顿广场购置了一栋 18 世纪房屋，将其改造成三层半红砖的乔治亚风格住宅，镶嵌白色饰边后与家人一同搬入。此做法打破了协会山“贫民窟”的刻板印象，带动精英群体效仿，形成私人修复浪潮。1960 年，“大费城运动”联合主席 C. 贾里德·英格索尔(C. Jared Ingersolls)购买了被认定为“费城现存最完好的未修复的殖民时期城市住宅”的戴维斯-莱诺克斯住宅(Davis-Lenox House)。修复工程既遵循历史委员会对建筑外观的规范要求，系统性复原了乔治亚式建筑的主体结构与原始大理石台阶、彩绘线脚等外部构件，又精准还原了 18 世纪黄松木地板与印花壁纸等室内元素，仅增设现代浴室与供暖系统，体现了“新旧融合”的开发理念。

然而，协会山的历史保护过程并非毫无争议。首先，在新建建筑风格取向上，设计顾问委员会(由培根等人组成)制定了以恢复殖民风貌为导向，但规定新建联排建筑必须采用现代风格的标准，以避免与历史建筑混淆，这引发了与主张采用殖民风格的历史保护主义者(包括费城历史委员会、“大费城运动”等)及部分居民的反对。最终，重建局坚持按贝聿铭的现代风格方案推进。此外，在历史建筑处置问题上，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E. Peterson)批评重建局存因维修失职而随意拆除建筑的情况，他在 1963 年更直指该局对米切尔住宅(Mitchell House)的处置违背保护原则：“本应更换卷起的锡屋顶部分，重建局……只是把它拆掉了，”⑤这一做法导致住宅长期暴露自然环境中，最终被拆除。培根虽承认这种方法不完美，但强调协会山“一些旧建筑被拆除，另一些被保护和修复”的做法是平衡的需要。”⑥

① Cyril B. Roseman,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Downtown Redevelopment: A Study of Decision Process in Philadelphia,"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p. 82.

② Gregory L. 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28.

③ Valerie Sue Halverson Pace,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in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1976, p. 131.

④ 爱德华·罗宾斯·鲁道夫·埃尔-库利：《塑造城市——历史·理论·城市设计》，熊国平、曹康、王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第 150 页。

⑤ Valerie Sue Halverson Pace,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in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1976, p. 198.

⑥ Gregory L. 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33.

除了建筑风格与处置方式的直接分歧,协会山项目更深层次的争议围绕士绅化与社会公平展开。尽管项目因吸引中产阶级回流、恢复社区活力被誉为“士绅化”典范^①,但批评者指其本质是“黑人驱逐”,将公共资源用于补贴富人,导致非裔等少数族裔居民流离失所。1958年,协会山居民在听证会上批评社区再开发计划缺乏中等租金住房,是为“富裕人群打造聚集区”。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即便约33%的原住民通过修复自有房屋得以留居,协会山的非裔人口比例从20%骤降至6%。^②培根承认修复造成了居民搬迁和社区结构破坏,但坚持修复比维持低收入居民居住状况更重要。^③反对者则认为这牺牲了社区原有的多元特色与小商业生态:“翻新前的协会山是一个有趣且极具特色的小社区,社区中有一家中式洗衣店、一家意大利杂货店,还有一些小商铺,可惜这些店铺在整治过程中都消失了。”^④这些矛盾反映出历史保护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持续角力。

为化解争议,相关部门建立了制度化协作机制,以确保修复工作符合历史保护要求。1963年,费城历史委员会与旧费城发展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规定后者出售认证房屋前须经前者审核设计方案。历史委员会制定了详细的历史建筑修复技术规范,并设立了建筑部件回收处,重建局鼓励协会山业主依据技术规范修复自有建筑,旧费城发展公司则提供费城排屋建筑信息与合格建筑师名单支持。这一体系使协会山一批重要历史建筑得以成功修复。同时,联邦立法也为化解矛盾提供了经济基础。1965年,国会通过《住房与城市发展法》(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Act of 1965)为老旧住房(尤其是低收入社区)修缮提供低息贷款,费城重建局借此收购业主不愿修复的房产,形成由市、州与联邦三级政府共同承担收购房产与重点地标的修复成本,其余修复资金由私人承担的公私合作资金结构。通过建立从审核程序、技术规范、信息支持到资金保障的完整体系,该制度在尊重专业权威与纳入保护诉求的同时,有效缓解了更新成本与公平性批评,从而系统性地降低了项目实施的现实阻力。

三、协会山项目对中心城市复兴的意义

协会山作为费城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协会山项目对中心城市复兴意义重大,最直观的体现是,其通过融合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开发方式,保留了城市中心区的历史肌理。费城历史委员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进行认证,为购房者制定严格的房屋修复规范,并提供设计指导。精英群体纷纷购置协会山18世纪的殖民风格住宅进行修复,例如迪尔沃思市长迁居协会山并改建乔治亚风格住宅的举措,不仅打破了该区“贫民窟”的刻板印象,更带动了私人修复浪潮。C.贾里德·英格索尔对戴维斯-莱诺克斯住宅的改造,既完整保留了1784年的乔治亚风格的主体结构与室内木制品,又融入现代设施,体现出“新旧融合”的更新理念。通过将历史建筑改造再利用为现代城市空间的策略,协会山不仅有效保护了历史肌理、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更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协会山通过区域清除重建、现代建筑填充的开发方式,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生活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贝聿铭设计的协会山塔楼取代了原有码头街市场,社区内还配建了小型联排住宅群;无论高层开发还是低层开发,均将衰败或用途不兼容的场地改造为现代建筑用地。曾破败萧条、经济停滞的协会山,经修复与重建后,文化与商业配套设施不断完善:20世纪70年代,协会山已配备儿童游乐公园、老年人座椅休息区,及连接街道与公园的步行绿道;该区域采用的富兰克林街灯,其中的四方形玻璃结构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参照殖民地时期的街道照明技术改进而成。富兰克林街灯兼具照明实用性与时代审美性,承载了深厚历史文化价值。费城最古老的酒馆建筑——“烦恼之人酒馆”(Man Full of Trouble Tavern),于1965年由威廉·F·克瑙尔基金会(Wilhelm F. Knauer Foundation)修复并改作博物馆开放,这一过程正是历史保护的实践体现。始建于1751年的宾夕法尼亚医院(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其乔治亚风格的东翼建筑以对称立面与釉面砖墙成为兼具历史价值

^① Roger D. Simon, *Philadelphia: A Brief History*, Mansfield: Pennsylvani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17, p. 87.

^② Charles William Lawrence, "New Neighbors In Old Neighborhoods: Explaining the Role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ocio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Gentrification,"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0, p. 46.

^③ Gregory L. 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33.

^④ Gregory L. 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p. 134.

与医疗功能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医院进一步扩建,在保护其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完善了医疗与生活服务体系,实现了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医疗需求的结合。

正如埃德蒙·培根于1966年普林斯顿会议(Princeton Conference)上所言:“我们即将打破郊区理想生活模式,回归市中心的居住趋势将加速发展,其速度远超预期。”^①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将市中心重新定义为居住、商业与文化功能复合的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协会山项目被视为费城中心城市复兴的关键实践。斯蒂芬妮·R·赖伯格(Stephanie R. Ryberg)高度评价该项目,称其借助联邦城市更新资金,成为“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保护范例”,并以“用青霉素而非手术清除贫民窟”的渐进式更新策略,体现了城市规划委员会“将新建筑与旧建筑结合;在适当处进行修复;保留现有社区机构作为重点”的规划理念。^②尤金妮·拉德纳·伯奇(Eugenie Ladner Birch)进一步指出,协会山项目融合城市更新和历史保护,证明通过传统的区划措施以及规划师与保护主义者的协作,可有效借助更新权力与资金修复社区,从而为历史街区复兴提供重要范例。^③

然而,协会山并非费城唯一的复兴街区,其保护与更新策略还激励了邻近的春园(Spring Garden)社区。协会山通过吸引中产阶级回流显著增加了人口——从1960年的3378人增至1970年的4841人,并在20世纪80年代1980年代实现翻番^④——带动房价中位数于1980年升至17.5万美元,自有住房价格达到城市平均水平的七倍以上,^⑤进而推动房产税总额从更新前的45.4万美元飙升至1974年的247万美元,增幅达444%。^⑥这一由人口增长、房价上升与税收增强构成的良性循环,为春园社区的转型提供借鉴。春园社区借鉴协会山的保护与更新策略,将1968年被描述为“吸毒者、酗酒者及纵火犯盘踞”的衰败社区,转变为住宅价值显著提升的繁荣社区。1984年,春园市民协会前会长自豪地宣称:“春园正在崛起。所有政府住房项目都只是在消耗税收资金,而我们春园所做的,是重振税收基础。”得益于春园社区的联排住宅十年间增值500%^⑦,这一宣称得到切实的印证。春园社区的保护与更新策略不仅实现了“重振税收基础”的目标,更从实践层面为“历史保护导向的复兴模式促进中心城市复兴”的主张提供了支持。

协会山项目作为早期“士绅化”的典范,其严密的补贴机制与公私合作模式对其他城市更新项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协会山项目通过大费城运动和旧费城发展公司等机构推动政府补贴政策,使私人市场经营者能以低风险参与修复重建。这种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共与私营开发机构、商业集团及国际开发资本结成的联盟模式,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型市区重建计划的参照原型,例如巴尔的摩港的劳斯商场、旧金山渔人码头、悉尼达令港及伦敦码头区的重建计划。^⑧这些欧美城市的更新实践,不仅延续了协会山项目“政府引导、市场参与、集团协同”的核心逻辑,更证明其模式突破了地域与文化边界,成为全球城市从“衰败修复”向“活力重塑”转型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践范式。

结 语

协会山的保护与复兴历程,是二战后美国中心城市在普遍衰退背景下,探索历史保护与城市更新相结合的典范。规划领导者埃德蒙·培根并未遵循传统“拆除—重建”的更新模式,也未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构建混合功能社区,而是探索出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将城市复兴与历史保护有机结合的路径。

^① Valerie Sue Halverson Pace,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in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6, p. 135.

^② Stephanie R. Ryberg, “Historic Preservation’s Urban Renewal Roots: Preservation and Planning in Midcentury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39, No. 2(2012), p. 208.

^③ Eugenie L. Birch and Douglas Roby, “The Planner and the Preservationist: An Uneasy Allia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50, No. 2(1984), p. 198.

^④ Alexander Garvin, *The American City: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 216.

^⑤ 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93.

^⑥ Alexander Garvin, *The American City: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 216.

^⑦ Jon C. Teaford, *The Rough Road to Renaissance: Urban Revitalization in America, 1940-1985*,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⑧ (英) 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李晖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81页。

培根在协会山项目中所践行的“一半现代，一半历史，既向前看又向后看”^①的独特价值观，深刻体现了其对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性思考。他强调，城市更新不应是通过“由旧变新”塑造时代感，而是应通过一个渐变的适应过程，将新的城市空间整合到历史肌理中，延续建筑的地方特质，促进城市建筑持续适应时代需求。这一理念超越了“保护与拆除”的二元对立模式，揭示出保护历史文化与追求效率、经济等现代价值理念并非相互冲突，而是可以互相促进。^②在实践中，凭借与市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及多方协调能力，培根成功推动公共部门、私营机构与社会力量协作，建立起多部门协作的历史街区更新组织模式。协会山项目因而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融合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复、现代建筑的填充、局部区域的清除与重建以及文化与商业设施的完善，成功吸引中产阶级回流。

最终，这片区域从“被遗忘的昔日辉煌社区”蜕变为费城“历史风貌宜人，街道尺度友好”的著名的居住社区与观光地，成功塑造出“与历史共存”的特色社区。协会山的转型表明，历史保护完全能够成为驱动城市复兴的核心引擎，其为全球后工业城市如何通过历史街区焕新来激活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成功范本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Roger D. Simon, *Philadelphia: A Brief History*, Mansfield: Pennsylvani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17.
- [2] Valerie Sue Halverson,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Urban Renewal in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6.
- [3] Nathaniel Burt, *The Perennial Philadelphians*, London: Dent and Son, 1963.
- [4] Gregory L. Heller, Ed Bacon: Planning, Politics, and the Building of Moder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
- [5] Francesca Russello Ammon, "Picturing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Photographs as Planning Knowledge in Society Hill,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8
- [6] Madeline L. Cohen, "Postwar City Planning in Philadelphia: Edmund N. Bacon and the Design of Washington Square Eas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1.
- [7] 李艳玲:《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与内城改造》,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 [8] 爱德华·罗宾斯·鲁道夫·埃尔·库利:《塑造城市——历史·理论·城市设计》,熊国平、曹康、王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 [9] (英) 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李晔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Historic Preservation and Central City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adelphia Society Hill Project (1957-1964)

Yao Jia Xing¹

¹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Post-World War II, as U.S. central cities declined, urban renewal shifted from a federal "large-scale clearance" model to market-oriented strategies. The Philadelphia Society Hill Project exemplifies this transition. Spearheaded by planner Edmund Bacon, it pioneered a multi-sector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for historic district renewal. The project integrated restored 18th-century architecture with modern infill, successfully blending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This approach spurred middle-class reinvestment, enhanced the local economy and tax base, and was heralded as a revitalization model. However, its market-reliant, elite-led process displaced low-income residents, igniting debates on social equity and preservation ethics. Ultimately, Society Hill moved beyond the "preservation versus demolition" dichotomy, providing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rejuvenating historic districts in global post-industrial cities.

Keywords: Central City Revitalization; Historic Preservation; Philadelphia Society Hill Project; Edmund Bacon

^① Stephanie R. Ryberg, "Historic Preservation's Urban Renewal Roots: Preservation and Planning in Midcentury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39, No. 2(2012), pp. 193-213.

^② Stephanie R. Ryberg, "Historic Preservation's Urban Renewal Roots: Preservation and Planning in Midcentury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39, No. 2(2012), pp. 193-213.

文化外交视角下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策略研究

郭春雨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本文从文化外交的视角出发, 以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为研究对象, 系统探讨了法国在这一领域的策略。研究发现, 法国通过打击非法文物贩运、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以及教育培训等多元化策略, 积极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 本文还分析了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在塑造法国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提升其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 以及增进与合作国家友好关系方面的深远意义。通过这些合作, 法国不仅传播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还展示了其对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坚持。然而, 法国在该领域也面临一些挑战。本文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建议, 以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文化外交; 文化遗产保护; 国际合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0

引言

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近年来, 世界各国逐渐开始认识到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积极通过语言、艺术等多种形式进行文化外交, 旨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并提升国际影响力。放眼世界, 法国作为最早将文化输出纳入官方外交手段的国家之一, 通过其不断发展完善的文化外交策略,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增强了法国文化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成为目前世界公认的文化大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各国家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法国文化遗产因其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保存良好而闻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是法国文化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略与路径日益成熟。本文将借助文化外交的视角, 探讨其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的策略和效果, 并为其发展提出建议, 以期为其他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理论框架

1.1 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由拉尔夫·特纳提出, 是指“国际政治中运用文化影响的特殊政策工具”, 而如今的“文化外交”是“为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 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 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 是国家使用其文化资源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它涉及文化传播、交流和沟通, 是外交政策与文化政策的一部分, 旨在传播价值观、增强其文化软实力、塑造并提升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法国, 文化外交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太阳王”——路易十四不仅在法国范围内赞助艺术创作, 也在意大利的摩德纳等地实行津贴制, 为文学创作提供资助。拿破仑曾在埃及设立埃及科学院, 用以推广法国国家价值观, 如当时《人权宣言》赞颂的自由与平等思想, 是法国通过文化外交手段实现其殖民目标的有利例证。法国第五共和国成立后, 戴高乐总统高度重视外交自主, 文化软实力是法国外交发展中绝对不容小觑的一大支柱, 大力推广法语是其首要目标。1983年, 法国外交部出台“对外文化政策”文件, 强调对外文化政策应当致力于传播代表全世界的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价值, 同时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互惠性, 政策围绕三大方向展开: 促进法语传播和法语圈扩展, 确保法国在全球通信网络中的优势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合作。

1993年, 法国提出“文化例外”原则, 强调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应仅被视为商业商品来对待, 文化有其独特性,

作者简介: 郭春雨(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化、法语语言文学。

通讯作者: 郭春雨

承载着国家的身份、价值和多样性，它应该得到特殊保护，避免国际市场的统一性和商业化所侵蚀。之后，法国又提出“文化多样性”原则，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在该宣言基础上，2005年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文化多样性”原则强调尊重和保护不同文化特征和身份的重要性，以使多种文化能够共存并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

法国外交部长和文化部长于2013年7月15日联合在《费加罗报》发表《21世纪文化外交展望》，强调文化对于法国的重要性，“没有文化，法国就无法取得伟大的成就”，文化是法国主要优势之一。该文章重申法国始终坚持“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原则，并针对当时世界形势提出新的文化外交发展路径，包括支持文化和创意产业、加强国际教育网络、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数字化等。

总而言之，文化外交在法国对外政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重塑法国国家形象、提高法国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维护法国国际地位、扩大法国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2 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过去历史的见证，也是各国家或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一公约对文化遗产进行了详细的定义。根据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包括：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然而，1972年提出的文化遗产概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仅涉及物质层面的文化遗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的定义进行了扩展和补充。根据这一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被各社区、群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自此，文化遗产的概念得到完善，不再局限于物质形式的遗产，还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公约提升了全球范围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重视，世界遗产名录也因此更加丰富多样。

截至2024年，法国共有52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有44处属于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遗产大国。法国文化遗产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已经确立“国家遗产”这一概念，并设立历史遗址相关行政体系。1958年，法国首次正式成立文化部，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开始系统推行文化政策，在文化部下设遗产司，专门负责管理文物与历史古迹的保护修缮事务，遗产保护与修复工作始终是法国文化部工作优先项之一。此外，法国是世界上首个颁布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国家。自1837年9月29日法令开始按重要性对古建筑进行分类保护，法国持续性更新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如《保护历史古迹法》《文化财产流转法》《预防考古法》等。2004年，法国颁布《遗产法典》，该法典是过往已出台的遗产相关法律法规精华的汇总与升华，由此，法国文化遗产法得以完善。

法国不仅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还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在这一领域，法国的国际合作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法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些考古学校和代表团，如1897年在德黑兰和1922年在喀布尔设立的考古代表团，这些早期的举措为后来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目前，法国外交部与80多个国家，尤其是位于非洲、中东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建立了广泛的文化遗产相关科学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项目不仅包括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还涵盖了文化遗产修复、管理和培训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合作，法国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国际合作项目凸显了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是其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各国合作，法国不仅展示了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业实力和影响力，还推动了其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与交流等，增强与这些国家的文化联系，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2 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策略

2.1 打击非法文物贩运

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的首要策略是打击非法文物贩运。为此，法国签署了两项关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1970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物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公约》和1995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二十世纪中叶，文物的非法贩运是继毒品和武器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贩运活动。随着非法文物贸易形成全球化网络，任何单一国家的独立努力已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迫切需要展开广泛的国际合作来解决问题。因此，1970年公约应运而生，它是打击文物非法贩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书。

该公约主要围绕“预防措施”、“归还规定”和“国际合作”三大支柱展开。“预防措施”是指条约签署国必须通过库存管理、进出口认证、贸易监督等措施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同时也需要对犯罪行为实施刑事或行政制裁，以及

对公众公布文物相关信息并进行相关教育活动。在法国，文物的出口受国家法规的约束，意欲出口的文物需要获得法国的授权和欧盟授权。文化部的遗产司定期组织教育与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比如通过媒体宣传追回文物等。

“归还规定”指公约要求所有主权国家必须相互协助追回被盗文化财产，并采取适当措施扣押并归还公约生效后进口的任何被盗文化财产。同时，公约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加强签署国之间的联系，提供援助与合作，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1970年公约的第7条与第12条对国家间合作打击文物贩卖做出相应规定：采取与本国立法相一致的必要措施防止本国领土内的博物馆及类似机构获取来源于另一缔约国并于本公约在有关国家生效后非法出口的文物；本公约缔约国应尊重由其负责国际关系的领土内的文物，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禁止并防止在这些领土内非法进出口文物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

此外，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旨在为文物的返还和归还方面制订共同的、最低限度的法律规范。它对1970年公约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如公约第3条规定了被盗文物返还请求的时效性：任何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应自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占有人的身份之时起，在三年期限内提出；并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时起五十年以内提出。

自签署这两项公约以来，法国一直积极参与打击非法文物贩运国际合作。2010年1月，法国海关在巴黎北站发现一名英国公民携带了12件前哥伦布时期的文物。后经卢浮宫专家鉴定，其中8件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且未经埃及政府授权严禁出口的埃及文物。结合国家海关情报和调查局（DNRED）提供的相关信息，国家海关司法局（SNDJ）认定此行为构成非法流通文物行为，应依据《海关法》第215条、第419条和第414条予以处罚，成功破获从埃及经法国贩运文物的犯罪网络。该罪犯于2014年被判处罚款并没收涉案文物。2017年3月，埃及驻巴黎大使馆正式请求法国归还这些文物，法方遵守以上公约，将文物归还给埃及。

2.2 技术援助

在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策略中，技术援助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合作形式不仅展示了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技术援助整体由法国文化部负责，涵盖多个政府下属部门、政府负责的组织与民间组织。主要机构包括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院（INRAP）、法国国家遗产学院（INP）、法国历史古迹研究实验室（LRMH）、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C2RMF）、法国远东学院（EFEO）以及法国专业技能国际合作署（EF）等。这些机构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而复杂的技术援助体系。

根据法国专业技能国际合作署，一个负责设计和实施包含文化遗产等在内的国际技术合作项目的公共机构，法国提供的技术援助主要涉及三个层面：遗产保护和修复、艺术与遗产推广、文化场所管理。在遗产保护和修复方面，法国提供的相关技术包括遗产清查、建筑技术诊断、建筑工地监测等。在艺术和遗产推广方面，法国致力于援建博物馆，以及推广博物馆学，帮助制定和完善文化政策，并支持相关文化和创意产业项目发展。在文化场所管理方面，法国协助制定相关法规，调整场所人员组织架构与职位设置，并帮助对员工进行培训等。

自2019年起，法国与突尼斯进行合作，实施为其五年的3000遗产（Patrimoine 3000）项目。该项目对突尼斯具有旅游和文化潜力的地区的约15个公共历史建筑进行修复和重建，并建立历史建筑特许权制度，以支持突尼斯历史建筑的保护，提升其文化遗产价值；同时修复迦太基博物馆，建立文化遗产清单数据收集、处理和管理系统。为实现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法方驻突尼斯团队汇集多方面专业人员，包括行政人员、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经济学家等。此外，整个项目团队与法国文化部的文化遗产相关专家进行密切合作，以获取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支持。在合作中，项目团队密切关注各方动态，确保其提供支持的持久性。

2020年至2023年，法国文化部、法国开发署、法国专业技能国际合作署与喀麦隆文化部携手推动雅温得国家博物馆现代化项目进程。该项目旨在加强博物馆在保存、管理和推广藏品方面的能力，优化展览编排，丰富展出类型，吸引更多观众，同时与国际博物馆标准接轨，加入国际博物馆合作网络。法方协助对博物馆进行空间改造，改善藏品的保护和展示机制，并指导制定和实施更加科学与现代的博物馆管理体系。通过这些措施，有效提高雅温得国家博物馆专业度，促进该博物馆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为当地经济增长做贡献。

通过这些国际合作项目，法国不仅展示了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卓越技术，也通过国际合作促进了各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2.3 资金支持与教育培训

在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策略中，资金支持与教育培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的多个组织和部门为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和部门主要由外交部和文化部统筹，其中最为活跃的

是法国开发署（AFD），它是“代表法国政府执行发展援助和国际团结政策的金融机构”，致力于战胜贫困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法国海外领土、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区。法国开发署通过提供贷款的形式，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2017年，法国开发署在中国提供的首个文化遗产类贷款项目成功落地。山西省政府的祁县古城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示范项目通过了法国开发署董事会的最终评审，获得了7000万欧元的贷款。该贷款主要用于祁县古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古建筑修缮等工程。这一项目不仅展示了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技术优势，也为中法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树立了典范。

然而，仅依靠法国一国之力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法国于2017年发起建立了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基金（ALIPH基金会），旨在保护世界范围内冲突和后冲突地区处于危机状况的文化遗产。自2017年成立以来，ALIPH已在四大洲约30个国家支持了近150个项目，如修复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叙利亚拉卡市博物馆等。2020年贝鲁特爆炸事件后，ALIPH为修复苏尔索克博物馆提供资金，用于为被毁坏的屋顶和窗户设置遮挡。

在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法国也深刻认识到教育培训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法国文化部以及其它文化遗产相关机构，如卢浮宫、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等，会定期举办面向国际学员的专业培训课程，涵盖文物修复、博物馆管理、遗产法等多个领域。同时它们也会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学术交流和联合培养项目。2007年，在法国文化部和外交部的财政支持以及法国夏约学院的师资支持下，遗产职业培训中心成立，该中心是区域性的，覆盖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三个国家。2016年12月，法国文化部与柬埔寨文化与美术部签署有关开展涵盖文化遗产和预防性考古领域的法柬专业知识、交流和培训项目的协议。通过这些合作与培训，法国帮助各国培养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业人才，进一步巩固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基础。

3 文化外交视角下的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

3.1 国际合作中的积极影响

首先，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表现出的积极姿态，体现了其作为文化大国的责任感和担当。法国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项目中，法国向世界各国展示了其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和开发理念与思路，比如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文物保存技术等。通过这些行动，法国充分向世界各国展示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巩固其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而且，法国也借由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向外输出自身文化与思想理念等，有效提升法国的文化影响力。此外，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和交流，法国也能汲取他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宝贵经验和先进技术，这不仅有助于推动自身技术的创新与升级，还进一步提升了法国的文化软实力。

其次，法国主动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是其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的体现。通过打击文物非法贩运、为其他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援助及教育协助，法国不仅有效推动了其他国家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而且也展示出法国对各个国家的文化独特性与价值的尊重与认可。

最后，法国通过与不同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进行合作，增进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基于文化的合作模式与传统的政治或经济驱动的外交策略不同，它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不具有竞争性或者威胁性的互动，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不容易产生摩擦，为双方提供交流平台，传递和平与友好的信息，更有利于在两国之间信任和理解建立，从而为政治对话创造良好的氛围，有效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为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2 国际合作中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法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领域的积极参与虽然为其带来众多益处，但合作中遇到的各类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尽管法国政府积极筹集资金并提供支持，许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期投资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项目，资金短缺常常限制了这些项目的规模。其次，专业人才的短缺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在水下考古和高级文物修复等某些高专业性领域中，专家非常稀缺，这种人才匮乏不仅限制了合作项目的种类和规模，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项目的顺利进展。

另一大挑战是政治与安全问题，例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局势不稳定地区，持续的战争与混乱状况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也使得许多合作项目无法顺利进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如政府更迭等，也会导致已启动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中断甚至完全停止，严重影响项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此外，国际合作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多国参与的项目往往会产生复杂的利益协调和沟通问题，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法规和文化政策的差异也可能导致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障碍，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提高国际合作效果,法国应该改善管理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项目的机构实践,以提升机构内部管理效率。增强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项目与东道国机构间的沟通协调,以提高项目执行的灵活性和效率。此外,应根据战略利益需要明确优先关注区域,如马格里布地区、中东地区、非洲之角以及中亚等地区,集中资源,开展更多合作项目。最后,加强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合作,联合东道国一同寻求更多资金支持,以确保项目顺利进行。通过实施这些策略,法国不仅能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挑战,还可以加强与合作国的友好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增强其文化影响力,促进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法国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不仅是其文化外交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中的不二典范。通过不断调整完善合作策略,法国不仅巩固了其文化大国、强国的国家形象,提升其文化软实力与影响力,还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贡献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未来,随着合作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可以预见法国将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这一崇高的事业中来,共同为保护和传承世界文化遗产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 [1] 郭玉军,王岩.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沿革、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J].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1):71-97.
- [2] 姜铃川.新时代中国文化外交研究[D].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9.
- [3] 教莹.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及发展前景分析[J].故宫学刊,2013(1):362-370.
- [4] 金露.游走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和关系[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36-43.
- [5] 齐政文.法国“博物馆外交”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 [6] 王吉英,孙纯.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文化外交的“守”与“攻”[J].公共外交季刊,2019(4):95-101,127.
- [7] 王璇.法国文化政策下的文化遗产保护[J].财政监督,2013(27):65-67.
- [8] 杨炼.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法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道[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1):121-130.
- [9] 张嘉资.法国文化外交:历史、特点及启示[J].黑河学刊,2018(4):83-87.
- [10] 张金岭.法国文化外交实践及其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4):155-163.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for French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plomacy

Chunyu Guo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es of France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ranc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glob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rough diversified strategies, including combating the illicit trafficking of cultural property, providing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implement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such cooperation shapes France's image as a cultural superpower, enhances its soft power, and fosters friendly bilateral relations.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France disseminates its cultural values whil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cultural diversity. However, the nation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funding gaps and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these obstacles, 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other nations seeking to integrate heritage protection into their diplomatic frameworks.

Key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元代基层社会的日常防盗机制

周立新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元代作为多民族统一的大一统王朝, 其日常防盗机制以“预防为先”为核心, 构建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双重防控体系。文章基于《元典章》《至正条格》等典章制度、元人文集及域外游记史料, 系统考察元代日常防盗的两大核心机制: 一是以巡捕弓手为主体、覆盖城乡水陆的巡警制度, 通过驻防布局、日夜轮值、跨区域联防及基层参与形成流动性防控网络; 二是针对特殊场所、群体及流动人口的盘查与监控机制, 借助“行老”情报网络、户籍路引核验、船舶户籍化管理等实现精准管控。研究表明, 元代防盗机制呈现出差异化治理、官民协同的特征, 体现了多民族国家社会治理的务实性与灵活性。

关键词: 元代; 防盗机制; 巡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9

元人刘敏中认为, “县令, 下之极, 民之至密者也。”^[1] 本文的基层社会, 主要指司(录事司)、县一级行政单位。《元史·兵志》言, “夫岂其制之不善哉, 盖法久必弊, 古今之势然也。”^[2] 元代设置了完善的防盗机制, 但切实发挥机制作用的关键在于专职捕盗的县尉、巡检、弓手, 这些捕盗官吏的日常治安活动, 使得元代防盗机制落在实处。

前学主要从社会治安制度, 县尉、巡检等专职捕盗官等方面入手研究。爱宕松男论述录事司时, 以警察权归纳其捕盗、维持治安职能。^[3] 任崇岳指出元代地方治安措施之一是诸路府所辖州县设县尉司、巡检司、捕盗所, 机构中设置巡军弓手。^[4] 李治安讨论了县尉的捕盗和司法职责、县尉捕盗的弊端, 以及朝廷对县尉的督责赏罚情况。^[5] 薛岳讨论了元代县尉的设置、职掌、选任管理、与同僚的关系。^[6] 王翠柏指出弓手制度作为宋金控制基层社会的统治经验被元朝继承, 弓手主要职能是巡捕, 内容包括巡夜禁、巡捕盗贼、监视基层民众动向等。^[7] 韩清友将元代捕盗体系总结为“主要由巡尉专职捕盗, 州判、录判兼职捕盗, 镇守官捕盗, 社长、主首、邻人等协同捕盗组成, 捕盗呈现相对专职化, 官、军、民结合的特点。”^[8] 王帝元逐级考察了元代各级官府的防盗捕盗职能。^[9] 以上著述多着眼于整体制度层面的正式机制与专职捕盗人员研究, 其不足之处, 是对防盗机制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关注不够, 本文重点关注元代的日常防盗机制运作情况。一是巡警, 侧重宏观、流动性的控制; 二是盘查与监控, 是对巡警职责的细化, 主要是对社会中固定地点、人群的重要防控。

一、巡警制度

治盗机构及人员的日常职责便是四处巡警, 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张养浩认为, “诘盗非难, 而警盗为难。警盗非艰, 而使民不为盗尤难, 盖天下之事, 先其几为之则有余, 后其几为之则艰苦而无益。夫盗之发也, 恒出不虞, 知者防于未然。其防之之术, 则在广耳目, 严巡逻, 戒饮博, 禁游聚。或旬或月, 即命尉行境以恐惧之。夫盗犹鼠也, 尉犹捕鼠之狸也。勤于出, 鼠必伏而不动; 狸怠出, 则鼠必兴矣。彼为尉者, 与其劳于已然, 孰若警于未发之为愈?”^[10] 止盗之道在于预防, 预防之术在于, 一, 广设耳目, 如命基层社长、主首、里正、警迹人等充任监视职事; 二, 严巡逻; 三, 戒饮酒、赌博, 禁止游行、聚众。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对基层社会进行重点管控。

元人常将县尉与盗贼分别比作猫、鼠。如上文, 张养浩格外突出县尉巡警之责, 以尉比作狸猫, 以盗比作鼠, 县尉若勤勉巡逻, 则鼠盗庶几不敢有所动作。元人何中也作诗譬喻, “官能捕贼如捕鼠, 直捣狡穴不一全。”^[11]

中统五年(1264), 元廷规定了巡捕弓手的驻防地点, “随州、府驿路, 置巡马及马步弓手(验民户多寡,

作者简介: 周立新(1999—), 男, 河南南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元史。

通讯作者: 周立新

定立额数),除本管头目外,本处长官兼充提控官……州县城子相离远去处,其间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以上者,设巡防弓手,合用器械,必须备足,令本县长官提控。若不及二十户者,依数差补。若无村店去处,或五七十里创立聚落店舍,亦须要及二十户数。其巡军另设,不在户数之内。关津渡口必当设置店舍、弓手去处,不在五七十里之限。若沿边州县及相去远去处,从行省就便定夺。”^[12]可见其驻防范围覆盖了都市、乡村、水路交通线路等处,元廷还给予地方便宜设置之权,机制相当完善。

这一巡警制度要求巡捕者日夜均须巡逻。据《马可波罗行纪》,世祖时的杭州城巡警严密:

大汗有命,诸桥之上,泰半遣人日夜看守。每桥十人,分为两班,夜间五人,日间五人,轮流看守。每桥置木梆一具,大锣一具,及日夜识时之沙漏一具。夜中第一时过,看守者中之一人击梆、锣一下,邻近诸户知为一时,二时以后则击二下,由是每逾一时多击一下,看守者终夜不眠。日出之后,重由第一时击起,每时加增,与夜间同。^[13]

杭州作为繁华都市,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元廷于杭州设有严密的治安和时间管理体系,桥梁上有专人日夜轮值看守,每座桥上则配备标准化的传声及计时装备。《元典章》则记载了夜禁之法,“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有公事急速、丧病、产育,不在此限。违者答二十七下,有官者答一下,准赎元宝钞一贯。”^[12]1693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宽弛江南地区夜间灯光之禁。^[12]1904马可波罗记录了杭州此前数年的夜禁情况,“有一部分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息,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拘捕,翌晨送至法庭。”^[13]362《朴通事》记载了一则华北地区犯夜禁被关押的案例,“又一个小厮半夜起来,煤场里推煤去时节,被巡夜的拿着,冷铺里监着。”^[14]小厮半夜去煤场推煤,同样被巡夜人拘捕关押。

若在乡里僻远之地,巡尉往往难以深入、遍及,官府的控制力便相当薄弱。如至元十年(1273),顺州年丰以南耕地中发生一则盗案,顺州上报申辩案件的特殊性:

照得被盗去处即系迥野,不同应设巡防地面。若蒙责罚,实缘虚负……省部相度:依准所申。合下,仰照验,更为遍下合属,行移邻境,将作过正贼须要根捉得获送官,依理施行。^[12]1729

案发地点在荒野偏僻之地,并非官府原则上应设立常规巡防之地,若追究当地官员失职之罪,显然并不合理,中书省兵刑部亦认可此论。此案例说明了若干问题。其一,元代法律具体执行时对官员的问责还是讲求权责对等原则的,官员的责任范围应与其被赋予的资源和管辖区域性质相匹配。元廷相当务实、灵活,在本案中,裁决并未僵化、强硬地要求发案必究,而是视实情而界定责任。其二,从官僚体系的运行而言,此案例反映上下级尚可通过公文充分交流案情,避免地方具体执行的官员遭受不公处罚,从而消极怠工,阳奉阴违。其三,此文书明确区分“设巡防地面”和“迥野”两种不同治理空间,元廷往往对“设巡防地面”的控制力更强,故而对此处的治安责任要求相应更高,对“迥野”的控制则相对薄弱,因此责任划分上可更灵活一些。其四,中央固然通情达理地免去地方官吏之责罚,但此事并未解决,因此其要求顺州方面向相邻州县发送公文,并力缉捕盗贼。一则体现出中央层面对法律权威和治安秩序的维护决心,二则体现出元代捕盗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虽则此类僻远地颇为棘手,官府的权力触角不易覆盖之,元廷也并非毫无办法,其往往发动基层精英及民众参与防盗,以求基层宁静。大德七年,山东道廉访司上呈防盗计策,“随处地境宽远,弓手数少,不能遍历巡警,致有游手好闲、弃本逐末、懒惰之徒,乘此饥年,纠合为盗。若令所在官司每社长立保甲,此等之人出入动作,常切递相觉察,无使为非,如有违犯,罪及保甲,亦为防盗之一端也。”^[12]1697乡里村社的社长亦是防盗的主体之一,主要作为官府巡警的补充,从而实现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盗贼往往藏匿于僻远处的特殊地形中,故而捕盗官吏又须格外留意。刘因在其友耶律伯坚的遗爱碑文中追述了一则治盗案例。至元年间,耶律伯坚任清苑县尹时,“县西南卫村多古斥堠沟堑,时伏盗其间,公为墮其高,堙其下,而夺其穴焉,盗于是息。”^[15]清苑县中废弃的军事工事成为盗贼天然的隐蔽场所和据点,县尹则采用摧毁特殊地形的方法令盗贼失去屏障,彻底使其失去立足之地,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盗患。至元二十三年(1286),一则断例指出江南地区山林中寺观常常藏匿盗贼,“如今江南地面山林里,人烟稀少,寺观多有,贼人聚集作闹去处生发”。^[16]元廷的对策是恩威并施,试图将宗教人员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令其承担起防盗线人的责任。

司县巡尉的巡警须讲求专业,并深谙盗贼行为、心理模式。《吏学指南》载有一则写给基层巡尉的操作手册:

盗行时日,巡尉须知,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初一、初二、初三、初五、初七、冬年节日,其余畏月明不行也;及风、阴、烟、雾、芦苇、蒿荒、黄昏,味爽,假此之便也。捕盗抗拒败走,不得手去披领,先拿其骏发踏背立地,不得时膝胸前,七手五把,反伤主人兵吏性命,切要防之。

^[17]

此手册显然是来自一线经验的总结，其重点强调了盗贼犯罪在时间、环境上的规律，并教授了捕盗的实战技巧。首先，盗贼作案往往有时间偏好。鉴于彼时夜间照明不易，故而盗贼常选择在一个月的下旬至次月上旬月光昏暗的夜晚动手，并避开月明之夜；重大节日时，百姓则往往疏于防范，故更易得手。其次，盗贼往往会利用自然环境掩藏身影。如利用风、阴、烟、雾等恶劣天气来掩盖行踪和声响，依靠芦苇、蒿荒等复杂地形作为掩护、逃脱的路径，选择光线昏暗、人烟稀少的黄昏、味爽时刻作案。最后，手册教授了抓捕的实战技巧，重点在于有效捕获盗贼，并保护自身安全。在抓捕盗贼时，若其反抗并败退逃走，倘若无法直接通过擒拿其衣领将其制服，应先揪其头发，并用脚踩住其背部使其伏地，如此则贼人无从借力反击。假如未能及时制服，应以膝击其胸口，并发挥团队精神，一拥而上，将其捆绑。此上策略，主要是防范盗贼反抗时伤及官兵性命。

以上为宁平治世的常态机制，但也常常出现意外情况，如若某地发生地震、饥荒、兵燹等天灾人祸，则往往盗贼四起，尤难靖平。此时，有识者一般建议元廷一面赈济灾民，一面责令巡检人员加强巡警。至元八年（1271）左右，王恽上书《为蝗旱救治事状》，其中一条是加强巡防。于京师附近，“令所在弓兵早暮兼为巡防，以备疏虞”^[18]；于地方，增设巡检使，并令乡里社长一并维护治安，“今蝗旱如此，百姓嗷嗷，切虑迫于饥寒，盗贼多有，不无惊扰。宜约量随路紧要地面，添设巡检使，镇遏巡防，以备不虞。及村保设置鼓面，遇有警急，互相应和。”^[18]

二、盘查与监控机制

本节主要讨论捕盗官在司县场域中如何精准地监控、盘查各类具备潜在不稳定性的场所及群体，从而使得官府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每个角落。

司县捕盗官发挥微观权力的方式首先是密切监控特殊场所及群体。赵素《为政九要》载，“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房、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告报，无不知也。”^[17]¹⁵² 据此，司县官员到任后，即须密切探访当地诸事，并在各类场所设立“行老”，即行业头目或线人，以此建立情报网络，体察基层三教九流的实情。

另外，《为政九要》还详细记载了司县之中亟需监控的社会群体、职业和场所。“停闲、窝家、沽屠、破落户、酒肆、茶房、浴室、兑房、妓馆、旅店、勾栏、庵舍、军旅卒屋、水手场屋、罢役弓手、庙宇贫子、打爻穷汉，若识此徒，万无一失，民自然安矣。”^[17]¹⁴⁸ 以上所列，以群体论，或为社会边缘群体，如无业游民、屠夫、寺庙中的穷人、占卜乞讨的穷汉等，或为可能心中充斥怨气，有潜在危险的破落户、被罢免弓手，或为窝藏罪犯人家；以场所论，或为鱼龙混杂之地，如酒肆、茶房、浴室、妓院、勾栏；或为财货聚集之所，如兑房、旅店；或为特殊场所，如寺庙庵舍、兵营、水手屋等。以上群体，极易因贫、因怨而转为强、窃盗贼，这些场所则或因酒、色，或因财帛，或因其汇集人众，而极易生出事端，招惹盗贼。若司县官员能识别并重点监控这些群体和场所，则本地盗贼难兴，治安无虞。因此，赵素建议司县禁治相关群体及行为。一是易于成为盗贼或窝藏盗贼的群体，如“司县破落户、泼底官，往往造盐、酒、曲，宰杀牛马，开兑房，窝藏盗贼，横赛神社，配散酒食，不畏国法。严威禁治，久而自息。”^[17]¹⁴⁹ 司县中的破落户及腐败官吏常常勾结，不畏国法，从事非法制盐、酿酒、制曲、宰杀牛马、开设兑房等活动，且又往往窝藏盗贼，鱼肉乡里，扰乱并引导民间祭祀。故而必须用雷霆手段严厉禁治。二是容易诱发为盗的行为，“司县约束赌博钱物，煞归、拔牌、打破、买鬼、双陆、象棋、樗蒲、握槊、开兑房。帮闲子弟破坏良家、穷极为盗也，禁之可矣。”^[17]¹⁴⁹ 司县官员要约束涉及赌博的娱乐游戏及赌场，并监控、禁止易沦为盗贼的无业游民对良民的破坏。

《为政九要》还建议巡尉重点监控、巡查迷信活动。“巡尉觉察行坛、大仙、佛牙舍利，妄作光明庙宇，师巫托诈鬼神，夜聚晓散，扇惑人户，惹叛乱，生啸聚，连累平人亦遭杀害，禁约则可。”^[17]¹⁴⁹ 此类借助神鬼宗教以聚众者，容易引发治安事件，故须密切监控、防禁，不使事态扩大化。

其次是严查户籍、路引等身份证明。一是因为元廷主要以编户齐民的方式管控基层社会；二是基层社会混居着各类群体，以治安视角来看，设置身份证明显然是利好行政效率、便于管控社会的；三是因为基层社会多为熟人社会，若有生面孔，可通过盘查身份，快速验明良害。胡祇遹上呈治盗方针，其中一条便是针对常居百姓的身份证明。他认为息盗之策在于“无不业之人，无外来浮脚之户，无不识姓名客寄、不成户单丁之人。”^[19] 其想法具有代表性，并非个例，上文《为政九要》所引即可佐证。元廷设计的诸色户计制度更是明确无疑的编户齐民手段，其作用之一便是令百姓不得随意流动。

对朝廷而言，对定居者的管控已然不易，流动者更是难以管控的麻烦。作为编户齐民的补充和延伸，官府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证明极为重视，无论水陆地区，均须置于朝廷视线之中。中统五年（1264），一则圣旨条画规定了通行证制度，包括适用对象、申请流程、旅途查验、违法处罚等内容：

诸斡脱、商贾，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若公引限满，其

公事未毕，依所在倒给。如管民、管军官并其余诸投下人员，若无上司文面勾唤，欲往他处勾当，亦听以次人于本处官司告给文引。经过天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每上下半月。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12]1695

本条主要针对与皇室、贵族关系匪浅的官商及普通商贾，也适用于一切旅行者。其一，所有需要长途旅行的人，都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并获得官方发放的公凭、文引（即通行证）^[20]，在旅途中的关卡、渡口和旅店均需接受查验。其二，旅店有查验客人身份之责任，有定期上报官府的义务。官府讲求以民治民，于民间广设耳目、爪牙，将查验身份的责任转移给旅店经营者，扩大了国家权力的监控网络。其三，无证者不得住宿，违者将受处罚，但处罚较轻，以警戒为主。其四，本条反映了元代文书行政体系及人身控制体系的精密化。就其程序而言，从申请、担保、发放、沿途查验、住宿登记及监控，到惩罚，相当完备。

沿江、沿海之水路亦然。元廷通过对各类船舶及相关人员的严密监控，切断盗贼利用船只进行犯罪和流窜的途径，实现对水路的有效控制。至元三年（1266），中书省批准一则法令，主要内容如下：

沿江上下捕鱼船只，令所在巡捕官司及河泊所等官，官为见数，明白附籍，编号印烙，开写采鱼人居住去处、乡贯、姓名，互相保识，许听采捕。但有失过盗贼，以凭按照……各处站船，令提调站赤官员，将所管应有各色船只，于船头板上，明白大字书写各站名号。每遇递送，定立往迳程限，过期不还，即将梢水人等，严行治罪。站官失于铃束，或容情故纵者，许各处提调站赤正官，依上断决，以示关防……各处官设写船埠头，令里正、社长、主首保住近江河有税产无过入户承充。凡遇写货船只，须要办验买船契据，知识船主住籍去处、梢水人等来历，因依询问客旅往来处所，验其官给文引，船主、埠头保识明白，方许承揽。附写文历，每旬具报所属官司，如遇失过盗贼，以凭稽考……处囚之际，各贼供报，将伊所乘行盗船只，时常变卖，转行别买船只，撑驾为盗。今后凡遇出卖船只，须凭所在保识牙埠人等，明白具状，称说出卖缘由，是否新旧，赴官告给公据，方许召主成交。买主要将契据赴务投税。违者，准私卖田宅匿税法断定论。[16]101

据此则法令，有四点认识。第一，官府对捕鱼船只施行户籍化管理。首先是将船只登记造册；继而对其编号、烙印以作身份标识，这相当于今日的牌照；最后详细记录渔民身份信息，并对其实行责任连坐制，要求其互相担保。此举将流动性强、难以监控的渔船转化成可明确辨识的水上户籍，从而令捕盗官有效排查嫌疑人或知情人。第二，官府对驿站船只实行责任制管控。首先，与渔船一样，站船亦须明示身份，以防冒充或私用。其次，规定往返时限，严惩逾期不归的船员。最后，如官员玩忽职守或纵容违规，由上级提调官处罚之。此条重在保证驿传系统的效率和纪律，以防公器私用乃至沦为犯罪工具。第三，官府对商船及船只中介要求文引凭证。其中，作为中介的埠头，其充任条件与社长相似，由里正、社长等人作担保，由有产、无过失的可靠人户担任。船只交易时则须种种审核，埠头需要查验船只产权证明、船主和船员的身份来历、客商文引，并记录在案，按时上报官府。第四，官府研究了水上盗贼的行动规律，要求船只交易必须经官府公证，且买主必须持契据去税务部门纳税。同时，严惩违反者，将动产性质的船比附为不动产的田宅，其旨或在于杜绝黑市交易及销赃。

整条法令环环相扣，基本囊括水路上各类船只。展现出元廷是如何通过登记、标识、担保、稽查、公证、纳税等手段，并借助基层精英的力量，以民治民，从而将船舶管理纳入防盗体系。

伊本·白图泰至正年间的游记证明了此法令属实且延续至元末：

中国的律例是一只舡克如要出海，船舶管理率其录事登船，将同船出发的弓箭手、仆役和水手一一登记，才准拔锚出发。该船归来时，他们再行上船，根据原登记名册查对人数，如有不符惟船主是问，船主对此必须提出证据，以证明其死亡或潜逃等事，否则予以法办。核对完毕，由船主将船上大小货物据实申报，以后才许下船。官吏对所申报货物巡视检查，如发现隐藏不报者，全舡克所载货物一概充公。^[21]

据此，繁华港口的船舶管理还需要录事司参与，且官府对身份信息管控严密，但讲求程序与证据。

三、结语

元代防盗机制形成了“中央——行省——州县”的层级化管理体系：中央制定统一规范（如巡捕弓手设置、路引制度），行省拥有因地制宜的便宜处置权，司县捕盗官吏负责具体执行，基层社长、行老、店户等承担辅助监控职责。在治理策略上，元代针对“设巡防地面”与“迥野”的差异，采取差异化管控模式。核心区域通过严密巡警、夜禁制度实现全方位防控，僻远地带则依赖基层参与与跨区域联防联控来弥补官方力量的不足，体现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治理的务实性。同时，机制强调“官民协同”，既以官府为主导，又充分调动基层精英与民众的力量，形成“广耳目、严巡逻”的防控网络，实现了行政权力与基层社会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 ^[1] [元]刘敏中.送霍巡检彦深之无棣序.中庵集[M].四库本.
- ^[2] [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38.
- ^[3] (日) 爱宕松男.元代的录事司[A].刘俊文主编,索介然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五代宋元[C].北京:中华书局,1993:613-614.
- ^[4] 任崇岳.元代治安制度述论[J].中州学刊,1994,(01):125-129.
- ^[5] 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6] 薛磊.元代县尉述论[J].史学月刊,2011,(12):29-35.
- ^[7] 王翠柏.元代弓手制度初探[J].中国史研究,2017,(01):127-145.
- ^[8] 韩清友.元代司法程序研究[D].武汉大学,2019:50.
- ^[9] 王帝元.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代汉地防盗、捕盗与罚盗研究[D].内蒙古大学,2025.13-18.
- ^[10] [元]张养浩.牧民忠告[A].杨讷点校.吏学指南(外三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296.
- ^[11] [元]何中.送朱县尉之官赣城.知非堂稿[M].四库本.
- ^[12]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2011:1693.
- ^[13] (意) 马可波罗(Polo, M.).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62.
- ^[14] 王必成发行.朴通事谚解[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290.
- ^[15] [元]刘因.清苑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先生文集[M].四库本.
- ^[16]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M].首尔:Humanist出版集团,2007:102.
- ^[17] [元]赵素.为政九要[A].杨讷点校.吏学指南(外三种)[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48-149.
- ^[18] [元]王恽.为蝗旱救治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M].四库本.
- ^[19] [元]胡祇通.吏治杂条.紫山大全集[M].四库本.
- ^[20] 黄时鉴点校.元代法律资料辑存[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223.
- ^[21]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校订本)[M].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544.

Daily Theft Prevention Mechanisms in Grassroots Society of the Yuan Dynasty

Zhou Lixi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Abstract: As a unified multi-ethnic dynasty, the Yuan Dynasty prioritized "prevention first" in its daily theft prevention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a dual macro-micr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historical sources such as the Yuan Dianzhang, Zhengzhi Tiaoge, literary collections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foreign travel record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wo core mechanisms for daily theft preven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first, the patrol system centered on patrol archers, cover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land and water routes, which formed a dynamic prevention network through strategic deployment, day and night rotation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second, the inspection and surveillance mechanisms targeting specific locations, groups, and mobile populations, utilizing the intelligence network of "hanglao," verific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ravel permit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based management of vessels to achieve precise contro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theft prevention mechanisms of the Yuan Dynasty exhibite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and official-civilian collaboration, reflecting both the pragmatism and flexibil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a multi-ethnic state, as well as exposing the imbalance in control between core regions and remote areas under the vast territory of the dynas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theft prevention mechanisms; patrol system

“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审视、现实挑战 与实践路径

滕瑞 刘衡宇

(锦州医科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投资于人”的核心目标是以民生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核心是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配置财政与公共资源,推动民生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审视其价值,当前,“投资于人”在实践推进中面临区域城乡资源分配失衡、供给结构与民生需求存在错配、区域政策碎片化、评估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亟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协同联动机制、健全评估保障闭环的优化路径,将“投资于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为实现民生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 投资于人; 民生高质量发展; 价值审视

基金项目: 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5 年度大学生职业规划课题“以加强共青团青年统战工作赋能各界青年建功立业”(25ZSY05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4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1]”标志着这一理念从理论构想上升为具体政策部署。

“投资于人”以人民为中心,将财政与公共资源投向人的生育、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全生命周期需求,直接回应民生“急难愁盼”,与民生改善的目标相契合。

“投资于人”,也就是以“人”为投资对象。这里的“人”既是具体的人、群体的人,也指抽象的人民;这里的“投资”既是具体的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也是广泛意义上的资源配置^[2]。从一般意义上看,“投资于人”基本内涵在于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而进行资源配置。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期,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与产业升级需求形成尖锐对冲,民生领域呈现出从基本保障向品质提升、从生存需求向发展需求的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投资于人”作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民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日益凸显。对此,着重探讨“投资于人”如何民生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审视

民生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投资于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通过资金投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就业、健康、权益等多维度的政策协同,破解民生难题,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一) 理论价值: 丰富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3], (文献 3) 强调民生改善不是被动的“福利施舍”,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投资于人”突破了传统民生建设中“兜底保障”的单一价值取向,将民生改善与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紧密结合,把资源投入聚焦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育幼等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首先,“投资于人”拓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形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

作者简介: 滕 瑞(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通讯作者: 刘衡宇

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投资于人”将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具体政策实践,以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供给为抓手、以人力资本能力提升和发展赋能为递进式路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具象化的实践依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认知。其次,深化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统一。“投资于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抓手,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做大蛋糕提供人才支撑;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分好蛋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资源精准投放破解民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体系。“投资于人”立足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发展模式,强调“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推动二者的良性互动与有机协同,使“物”的服务效能提升与“人”的发展需求适应^[5]。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 实践价值: 推动民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6]。“投资于人”是我国发展理念的一次重大转向。一方面,“投资于人”意味着从侧重手段到侧重目的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投资未来,为新时代民生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首先,激活内需潜力,筑牢民生发展的经济根基。民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经济支撑,在生产端,“投资于人”对教育、技能培训的持续投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人才支撑;在消费端,不仅为民生事业的长效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保障,更为推动民生改善工作具备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其次,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福祉供给的品质成色。“投资于人”以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为导向,精准补齐教育、健康、社保等领域的供给短板,让民生福祉更具普惠性与可及性。在教育领域,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让更多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7];在社保领域,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不断完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扩面,让不同群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再次,应对人口转型,拓宽民生发展的可持续路径。“投资于人”通过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质量转变,为应对人口转型、保障民生持续改善提供了有效路径。最后,夯实竞争根基,强化民生发展的安全保障。全球竞争的核心是人才与人力资本的竞争,“投资于人”通过培育高素质人才队伍、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为民生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保障。我国以“投资于人”为抓手,加大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投入,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体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不仅能抵御全球经济波动对民生的冲击,更能为民生领域的持续投入提供稳定保障,让民生高质量发展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稳步推进。

二、“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8],也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攻坚阶段。“投资于人”作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在实践推进过程中,既面临传统发展模式惯性的制约,也遭遇资源配置、供给适配、政策协同等层面的现实梗阻,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影响“投资于人”的成效转化。

(一) 区域城乡失衡: 发展机会的不均等

民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实现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发展成果全民共富,目前,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日益成为制约“投资于人”战略实施的关键障碍^[9]。首先,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破解。区域城乡失衡本质上体现的是发展机会的不均等^[10]一方面,城市居民能够便捷地享受优质教育,人力资本提升的渠道更多、空间更大;而农村居民受限于教育资源的匮乏,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缓慢,难以进入高技术、高收入的就业领域,只能集中于传统农业或低技能服务业。另一方面,城乡间的人才流动呈现单向流出特征,农村优质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制约了农村民生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失衡问题突出。在基础教育领域,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实训设备陈旧、师资力量薄弱,县域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差距显著;医疗与养老资源更向大城市集聚,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缺且服务能力薄弱。这种失衡导致“投资于人”的红利难以精准触达弱势群体,加剧民生发展的不平衡性。最后,投入结构存在“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部分地方仍惯性偏好基建等“投资于物”的短期显性项目,对教育、技能培训、心理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效益认识不足,导致“投资于人”的财政投入占比虽逐年提升,但整体规模与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同时,在资金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资源竞争关系,进一步挤压了民生领域的投入空间,影响投入的可持续性。

(二) 供给结构错配: 民生需求与服务供给的脱节

民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而当前“投资于人”的实践推进中,民生服务供给体

系未能及时跟上居民需求的结构性升级,供需脱节问题成为制约民生质量提升的关键阻碍。首先,供给层次错配。当前民生服务供给资源投入集中于基本养老、基础医疗、义务教育等生存保障领域,对高品质、个性化的发展型需求供给不足这种供给层次的滞后,导致“投资于人”的资源投入难以转化为居民获得感的提升。其次,供给内容错配。一方面,技能培训供给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脱节。当前我国正加快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但部分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仍聚焦于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难以匹配产业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制约了“投资于人”对经济增长的赋能效应。另一方面,养老育幼服务供给与人口结构转型需求脱节。面对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特征,居民对普惠性托育服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激增,但当前供给体系中,机构养老占比偏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缺,难以满足家庭多样化的养育与养老需求。最后,供给主体错配。政府单一供给与多元需求的不匹配民生服务供给长期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差异化、个性化的民生需求。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具有普惠性、兜底性的优势,但也存在灵活性不足、效率偏低的问题,无法覆盖居民多样化的品质需求。

(三) 制度协同不足:政策碎片化的制约

“投资于人”是一个涉及财政、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多部门协同的系统工程^[1],需要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政策协同发力。但当前政策体系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割裂了“投资于人”的全链条逻辑,成为制约民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梗阻。首先,跨部门政策衔接不畅,政策合力难以形成。“投资于人”涉及部门较广,各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基于自身职能范围推进工作,缺乏统筹规划与协同联动,导致政策之间出现断层,使得“投资于人”的各项举措难以形成闭环。其次,跨层级政策执行偏差,政策红利逐级衰减。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导致政策在基层落地时出现变形走样。一方面,中央层面出台的“投资于人”相关政策多为原则性、方向性要求,地方政府在落实过程中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但部分地区存在政策解读不到位、配套措施不完善的问题,使得政策难以精准落地;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受财政压力、政绩考核导向等因素影响,对“投资于人”这类见效慢、周期长的民生工程重视不足,导致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逐级衰减。最后,跨区域政策标准不一,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缺位。我国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投资于人”相关政策的区域标准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发展权益,制约了民生高质量发展的普惠性,使得“投资于人”的红利难以覆盖到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加剧了民生发展的区域不平衡。

(四) 评估保障缺位:政策实效与发展韧性的制约

“投资于人”的效益具有长期性、隐性特征,不同于“投资于物”的短期显性成效,而当前缺乏科学健全的效果评估体系,难以精准衡量不同项目的社会回报率,导致资源优化配置缺乏科学依据。首先,评估体系不完善,政策实效衡量缺乏科学标准。一方面,评估指标存在“重显性、轻隐性”偏差,多聚焦财政投入规模、设施建设数量等易量化指标,对人力资本提升的核心成效缺乏系统量化评估;另一方面,评估维度存在“重短期、轻长期”局限,“投资于人”效益释放周期长,短周期评估易让地方政府产生急功近利倾向,偏好投入见效快的项目,影响战略持续推进。其次,长效保障机制不健全,发展韧性面临多重压力。一是财政投入长效保障缺失,部分地方受经济波动、土地财政收紧等影响,存在“重当前、轻长远”倾向,民生投入稳定性不足;二是风险应对机制不完善,面对人口老龄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性,风险缓冲能力薄弱,民生高质量发展缺乏安全屏障;三是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缺失,社会资本参与门槛高、激励不足,单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多元需求,限制供给灵活性。最后,评估与保障的脱节,加剧政策执行的偏差。科学的评估体系是优化政策、完善保障的重要依据,但当前评估与保障之间存在明显脱节,评估结果难以有效转化为政策调整的依据和财政投入的导向。部分地区的政策评估流于形式,评估结果未向社会公开,导致政策执行中的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

三、“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 优化资源配置机制,破解区域城乡失衡难题

以资源均衡配置为核心,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桎梏,重塑“投资于人”的资源投放逻辑,推动发展机会均等化。一是建立倾斜性资源配置机制,强化财政投入的精准性与导向性。一方面,重点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倾斜,聚焦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农村养老设施建设等短板领域,通过县域医共体建设、农村普惠养老服务网络搭建等举措,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另一方面,“投资于人”着眼于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12],破除“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将人力资本投资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核心指标,明确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占比底线,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源向人力资本领域集聚,缓解“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资源竞争矛盾。二是

构建人力资本双向流动机制,破解农村人才流失困境。完善农村人才激励政策,通过提高基层岗位薪酬待遇、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吸引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等回流乡村;同时,建立城市优质人才对口支援农村机制,推动城市教师、医护人员、技术骨干等定期到农村服务,带动农村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形成“城乡互补、双向赋能”的人力资本流动格局。

(二)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民生供需精准适配

“投资于人”有助于缓解供需结构错配^[13],推动民生服务从“普惠兜底”向“品质适配”升级。首先,“投资于人”有助于缓解供需结构错配。一是分层分类优化供给层次,对接多元化需求升级。在巩固基本养老、基础医疗、义务教育等生存型民生供给的基础上,加大对发展型、品质型民生服务的投入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投资于人”要求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确保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落实“投资于人”要求,要加大对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供多样化的就业创业服务。二是构建需求导向的供给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建立民生需求常态化调研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民意调研等方式,实时捕捉居民需求变化与产业发展趋势,推动技能培训内容、公共服务项目等动态更新。针对人口老龄化需求,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结构,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新建小区配套强制标准,提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占比。三是培育多元供给主体,丰富供给模式。降低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民生领域的准入门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育幼、医疗等领域服务供给;同时,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的激励与监管机制,明确服务质量标准,推动民办机构提升服务品质,形成的多元供给格局。

(三) 构建协同联动机制,破解政策碎片化困境

以系统协同为抓手,打破部门壁垒、层级梗阻与区域界限,提升“投资于人”政策的综合效能。一是建立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形成政策合力。成立由政府牵头、涵盖教育、人社、卫健、民政、财政等部门的“投资于人”专项协调小组,建立常态化沟通会商、联合调研与政策联动机制。二是优化政策传导与执行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建立中央政策解读与地方配套的联动机制,中央层面出台政策时同步发布实施指南,地方政府需在规定的时限内制定差异化实施细则,同时通过专题培训、线上答疑等方式提升基层政策执行能力,对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时纠正,对因财政压力、客观条件限制导致的执行困难,通过中央专项补助、政策弹性调整等方式予以支持,避免选择性执行问题。三是推进区域政策标准统一与制度衔接,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国统筹,简化跨区域转移接续流程,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覆盖、报销标准一体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的额外限制,建立以居住证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确保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益,畅通劳动力自由流动渠道。

(四) 健全评估保障闭环,强化政策实效与发展韧性

以科学评估为引领、长效保障为支撑,为“投资于人”持续推进提供坚实支撑。一是构建全维度科学评估体系,精准衡量政策实效。一方面,优化评估指标体系,打破“重显性、轻隐性”“重短期、轻长期”的导向偏差,在财政投入规模、设施建设数量等显性指标基础上,增设人力资本核心成效指标,另一方面,创新评估方式,建立政策效益长期追踪数据库,对教育、健康等领域的投资效益进行跨周期评估,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提升评估的客观性与专业性。二是完善多元长效保障机制,增强发展韧性。在财政保障方面,建立“投资于人”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相关投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刚性安排,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缓解经济波动对民生投入的冲击;在风险应对方面,建立人口结构转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性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社保基金储备与调剂制度,加大基层医疗应急能力建设与养老服务应急保障投入,提升风险缓冲能力。三是建立评估与政策优化的联动机制,形成闭环管理。将评估结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核心体系,对评估成效显著的地区与部门予以表彰激励,对低效、无效项目及时调整建立评估结果公开与反馈机制,定期向社会公布“投资于人”政策实施成效,广泛吸纳公众意见,持续提升“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

四、结论

“投资于人”作为新时代民生建设的核心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成果。“投资于人”赋能民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在“十五五”期间,实施百万亿“投资于人”,全方位加大社会投资,对推动民生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意义深远^[14],在当前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投资于人”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5:16.
- [2] 黄群慧.以“投资于人”推动“十五五”经济新供需平衡[J/OL].东南学术,1-7[2025-12-28].
- [3] 唐任伍.“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发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渊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24):74-83.
- [4] 陈景华,杨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形成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5,27(06):91-106.
- [5] 王赞新.以“投资于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N].光明日报,2025-03-13.
- [6] 刘文珍,杨翠.物质、人与制度三维现代化视野下西藏人口、人心、人才工作研究[J].西藏发展论坛,2025,(05):75-82.
- [7] 朱峻质,黄明理.“投资于人”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群众,2025,(09):26-27.
- [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 2025-10-29.
- [9] 马燕来.以财政支出优化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J].中国投资(中英文),2025,(ZA):68-70.
- [10] 肖楚楚,彭志远.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证分析[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5,9(05):42-49.
- [11] 代家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投资于人”: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J/OL].理论建设,1-9[2025-12-29].
- [12] 孙存良, 张飞雪.深刻理解和把握“投资于人”的丰富意蕴和实践要求[N].光明日报, 2025-10-21 (6) .
- [13] 黄群慧,王岭.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5,45(09):69-81+206+2.
- [14] 迟福林,陈薇.民生大国建设的历史成就、时代要求与实践路径[J].经济体制改革,2025,(06):15-24.

Value Examina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Investing in People" to Empower High-Qu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Teng Rui, Liu Hengyu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Province)

Abstract: The core goal of "Investing in People" is to suppor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ts essence lies in allocating financial and public resources around people's full-life-cycle needs, promoting a positive cycle between high-qu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examines its value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Currently, the practice of "Investing in People"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unbalance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regions,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structur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needs,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policies, and an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It is urgent to adopt optimized path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advanc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linkage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closed-loop evaluation and guarantee system. By integrating "Investing in People"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Keywords: Investing in People; High-Qu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Value Examination

明朝“大一统”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演进

崔华青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明朝作为承元启清的关键王朝,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它以“大一统”为核心, 继承元朝“华夷一统”遗产, 通过疆域治理、文化融通、经济联通的多元实践, 构建起“疆域一体、文化同源、经济共生”的多元一体格局。实践中, 明朝迁都北京、设羁縻卫所、推改土归流强化疆域整合; 以儒学创新普及、儒释道融合、伊儒会通深化文化交融; 依托茶马贸易、朝贡体系与全国统一市场搭建经济共生网络,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这一治理实践既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 为清朝多民族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更有力回应了“新清史”“内亚史观”等错误论调。其经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边疆治理、强化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提供了深厚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 明朝; 大一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元一体; 文化融通; 边疆治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255

一. 引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是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与历代王朝治理实践持续积淀的历史成果。从秦汉“大一统”理念奠基到元朝疆域整合的突破性进展, 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在传承中不断革新,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演进积累了深厚历史经验。明朝作为承接元朝大一统遗产的关键王朝, 并未简单承袭, 而是以主动的制度创新与治理完善, 为清代以来的中国始终能保持统一形态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①,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更深层次发展, 成为其从“自在”向“自觉”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

政治上, 明朝创造性构建了行省、土司与羁縻卫所并行的多元治理体系, 行省制度强化中央对中原及内地边疆的垂直管辖, 保障国家治理的统一性; 土司制度尊重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治理传统, 用“以夷治夷”实现柔性纳入; 羁縻卫所则通过册封、朝贡联结北方、西北游牧区域, 三者互补协同, 以“因俗而治”打破中原与边疆的政治壁垒, 形成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经济层面, 屯田开发既解决了边疆戍守的物资补给, 又推动中原农耕技术向边疆传播, 促进了边疆经济开发; 茶马互市、边境贸易则搭建起资源流通桥梁, 中原的丝绸、茶叶与边疆的畜牧产品、矿产形成互补互通, 强化了各民族的经济依存关系。文化交融则呈现鲜明双向性, 儒家文化通过官学推广、地方教化等渠道向边疆渗透, “大一统”、“和而不同”等理念成为多民族共同的价值基础; 同时, 边疆民族的生产技艺、艺术形式、习俗信仰也向中原传播, 各民族文化在互鉴中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内涵。

诚然, 明代后期受封建制度内在僵化、官僚体系低效以及全球变局下应对能力不足的影响, 其多民族治理成效受到制约, 未能完全破解边疆治理与民族整合的长期难题, 但这并不否定其历史价值。明朝的治理实践既继承了前代“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 又以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 为后世边疆治理和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二. 明朝“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一) 思想根基: “大一统”理念的继承与革新

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②, 历经先秦诸子的理论奠基、汉唐的实践发展, 至元朝形成“华夷一统”的政治格局。明朝建立后, 统治者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需求进行理论革新,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引。

朱元璋即位后, 明确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在《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宣称“汉唐宋之迭兴, 以至于元, 皆能混一寰宇, 绍正大统, 以承天休”^③, 将元朝纳入中国历史的正统谱系, 这一举措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辨”的狭隘认知, 为“华夷一家”的治理理念奠定了政治基础。明成祖朱棣进一步提出“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④的口号, 将“大一统”从单纯的疆域统一升华为包含民族平等、文化包容的共同体理念。

作者简介: 崔华青 (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学

^①狄鸿旭:《疆域一体与文化融通: 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稳固壮大的重要特征》, 贵州民族研究, 2025, 46(01): 68-75

^②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2523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③李修生:《全元文》卷一五二三, 118页,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④《明太宗实录》卷三十, 533页, 台北, 史语所校印本, 1962

明朝“大一统”思想的革新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在天下观上，突破“中原中心”的地理局限，将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南边疆等纳入“天下”范畴，构建“京师—内地—边疆”的空间治理体系；其二，在华夷观上，从“华夷之防”转向“华夷无间”，朱元璋提出“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我赤子”^①，强调各民族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其三，在治理观上，融合“王道”与“霸道”，形成“以德怀之、以威服之”的双重治理逻辑，既注重道德教化，又强化军事威慑，实现“威德兼施”的治理目标。

（二）文化内核：“和合”思想与多元认同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②“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明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内核。朱元璋强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③，明初即设立“僧录司”“道录司”统管全国宗教事务，同时规定儒士可参与宗教典籍的校勘与阐释，形成“儒主政、释道辅化”的格局。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组织儒臣与高僧共同编纂《禅林宝训》，将儒家“仁政”“孝悌”思想融入佛教教义；永乐年间编纂的《道藏》，特意收录儒家《大学衍义》等典籍，实现三教义理的互释互通。这种制度设计打破了三教壁垒，科举出身的官员需解释道基本教义以应对边疆治理（如与西藏宗教领袖沟通），僧道则需恪守儒家伦理以获得官方认可，最终形成“以儒为骨、释道为翼”的文化共同体基础。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以文化包容凝聚社会共识，这一思想贯穿于明朝治理实践的全过程，推动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

在文化认同构建上，明朝形成了“主脉引领、多元共生”的格局。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脉，通过科举制度、学校教育向全国推广，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明朝在西南土司地区建立官营120所、书院49所，在广西创设社学232所^④，通过儒家教化培育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同时，明朝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推行“因俗而治”的文化政策，如在西藏尊崇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允许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形成了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局面。

（三）政治正当性：正统观的重构与共同体认同

明朝统治者通过重构正统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政治正当性。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虽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⑤的口号，但这并非狭隘的民族复仇，而是动员民众反抗元朝暴政的策略性表述。明朝建立后迅速完成正统叙事的战略转向，摒弃临时性的族群动员话语，确立“天命所归”的核心叙事框架。朱元璋在登基诏书中明确宣称“帝王之兴，必承天命，将政权合法性从‘复汉’转向‘混一寰宇、安抚万民’的共同体责任，提出“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莫不臣服”^⑥的治理愿景。这种转向在制度层面体现为对多元族群的包容政策：对蒙古、色目等族群“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在科举、仕宦中一视同仁；对西南边疆民族推行土司制度，既承认其地方治理权，又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谱系，实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⑦的柔性整合。

这种正统观的重构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避免了历史断裂，维护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将“大一统”作为正统性的核心标准，强化了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正如邓云所言，明朝通过“天命—正统”的谱系建构，巧妙转化了元朝遗留的多元民族格局，既未否定元朝统治下形成的多民族共存现状，又将其整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资源，通过“正统合法性”的赋予，让各民族群体都能在大明天下的框架内找到身份归属。这种重构后的正统观，既延续了华夏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核心理念，又回应了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思想根基^⑧。

三、疆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基础与治理实践

（一）疆域整合：从“混一寰宇”到“疆域一体”

元朝“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⑨，奠定中国疆域基本格局，并开创行省制度为大一统国家的行政架构奠定了基础，但蒙古贵族的“四等人制”存在鲜明的民族歧视色彩，未能形成有效的多民族整合机制。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⑩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通过军事统一与制度创新，一方面继承元朝“大一统”的政治遗产，将疆域范围稳定在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1048页，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② 殷晓元、张如意：《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0(02):65-72.

^③ 姚士观：《明太祖文集》卷十，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

^④ 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402页，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731页，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⑦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1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⑧ 邓云：《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明朝“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05):114-125.

^⑨ 宋濂，等：《元史》卷五八《地理志》，1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⑩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8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长城以内、青藏高原以东、南海以北的核心区域；另一方面通过制度革新，构建起“行省—土司—羁縻卫所”三位一体的多元治理体系，打破了元朝的民族隔离政策，实现了“因俗而治”与中央集权的有机统一，推动“疆域一体”深度整合，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基础。

在北方边疆，明朝采取“军事防御和政治招抚”双重策略。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天子戍边”决心强化对北方边疆控制，形成“以北京为中心，辐射蒙古高原”的治理格局。同时，通过册封鞑靼、瓦剌部首领为“顺义王”“顺宁王”等，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实现“以贡促融”。俺答封贡后，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格局。

在西南边疆，明朝进行重大行政建制创新。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布政使司，结束贵州分隶四川、湖广、云南的历史，正式建省。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中央对西南地区管辖，更促进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明朝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同时逐步推进改土归流，至明末共设土司近 1300 家，改土归流 90 余家，为清朝彻底推行改土归流奠定基础。

在东北与西藏地区，明朝创新治理模式实现有效管辖。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及百余卫所，任命当地族群首领为官员，通过“诰敕、印信、袭衣”等信物确立隶属关系，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纳入中国疆域^①。西藏推行“多封众建”政策，册封阐化王、护教王等五王及三大法王，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强化中央对西藏的行政管辖。^②

（二）治理创新：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理体系

明朝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文化传统，构建多元化边疆治理体系，体现“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整合提供制度保障。

在治理模式上，明朝形成“羁縻卫所制—土司制度—流官治理”的梯度体系。东北、北方等民族聚居区实行羁縻卫所制，保留当地民族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通过册封首领实现间接管辖；在西南边疆，明朝并未强行移植中原的州县制度，而是在土司制度基础上创新治理模式，不仅承认当地土著酋长的世袭权力，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习俗，还针对性地认可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承袭土官的传统。明初贵州彝族女首领奢香夫人在丈夫遇害后，便得以合法承袭宣慰使职位，她还因维护边疆稳定、开通龙场九驿的功绩，被朱元璋册封为“顺德夫人”。同时，明朝还通过规范土司承袭流程、要求土司履行朝贡与征调义务等方式，将其纳入中央管控体系，更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儒学读书方可承袭职位，以文教之力推动儒家文化在边疆的传播，实现了“在差异中凝聚共识”的治理目标；内地与边疆过渡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实现流官直接治理，推动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

在治理手段上，明朝注重“柔性治理”与“刚性控制”结合。柔性治理方面，通过朝贡贸易、茶马互市等经济手段强化边疆与内地联系，西南茶马贸易“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③，成为民族交融重要纽带。刚性控制方面，通过设置卫所、修建长城、移民屯田等方式强化边疆军事防御与人口整合，明初向云南调兵 25 万人，加上家属约七八十万人，大规模军事移民改变西南人口结构，促进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

（三）生境共建：人口流动与区域融合

人口流动是推动“华夷一体”的重要动力，明朝通过政府组织移民与民间自发迁徙，形成多民族交错杂居格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境基础。明初，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屯田活动。北方从山西、塞外蒙古等地迁徙军民充实北平；南方通过“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组织军民向西南迁徙，《明实录》《明史》记载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间明朝组织移民达 18 次。明中后期，“嘉靖年间，由于四川饥荒，流民入境者络绎不绝，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④，受人口增长与土地矛盾影响，大量内地人口自发向边疆迁徙。

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多方面融合效应。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随移民浪潮传入边疆，而边疆独特的畜牧经验与作物品种也反向流入内地，逐渐形成农牧互补、农商共生的良性经济格局。文化层面的交融同样深刻，移民携带的儒家文化理念、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边疆各民族的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浸润，孕育出兼具多元特质的区域文化形态。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更打破了传统的族群边界，通婚联姻、商贸往来等民间互动日益频繁，各民族在朝夕相处中加深理解、凝聚情感，逐渐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紧密依存关系。

四、文化融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与认同塑造

（一）儒家思想的创新与普及：文化认同的主脉引领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在明朝得到创新发展与广泛普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主脉之一。明朝初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确立儒家思想官方地位；明中期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对程朱理学进行革新，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使儒家思想更具实践性与包容性。

明朝的教育体系分为中央教育（太学、国子监）与地方教育（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其中卫学与社学是向边疆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平台。卫学设立于卫所所在地，主要面向卫所士兵及其子弟，同时允许边疆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社学设立于乡村、土司地区，面向普通民众，“凡府州县乡村，令有司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7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西域三》，857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194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庞思纯，徐华健：《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通过教育体系构建,推动儒家思想向边疆与民间普及。中央设立国子监,接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洪武二十三年(1390)“云南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罗罗生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各赐钞锭^①。地方建立府学、州学、县学三级官学体系,在边疆地区广设社学、书院,规定“土官应袭,三十以下者得入学习礼,不由儒学者不得起送承袭”^②,将儒家教育与土司承袭挂钩,强化儒家文化传播。

儒家思想普及也带来了深刻认同效应,边疆民族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大一统”“忠君爱国”等价值观念,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士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文化纽带,云南地区“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川埒矣”^③,展现儒家文化对边疆的教化作用。

(二) 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 共同体精神的丰富内涵

明朝突破单一文化局限,推动儒释道三教融合、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会通,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儒释道三教融合在明朝达到顶峰。朱元璋强调“三教之立,其所济给之理一”,成化帝亲绘《一团和气图》喻示三教合流;晚明林兆恩创立“三一教”,对三教融合进行理论建构^④。三教融合深入民间,关帝信仰融合儒家忠义、佛教慈悲、道教神威,成为各民族共同信仰符号,传播至蒙古、西藏等地区,成为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⑤。

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同样是明朝文化融通的重要表现。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向蒙古传播,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盟,“佛法主要是代替萨满杀生祭祀,化血海为乳海,并使蒙古不再抢掠汉族、藏族”^⑥;西南地区,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云南大理“八大碗”菜式源于中原,十二生肖观念传入贵州后融入地方文化。

在宗教文化层面,明朝实行“包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允许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促进了各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即黄教在明朝得到扶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始于明朝,藏传佛教的寺庙建筑、宗教仪式传入中原,与汉传佛教融合;伊斯兰教在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中广泛传播,明朝在西安、北京等地修建清真寺,允许穆斯林自由传教,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深度融合,穆斯林学者以儒解经,吸收儒家“仁义”“忠孝”思想,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的主张,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教义、习俗与中原文化相互包容,形成“伊儒会通”局面;道教在明朝达到鼎盛,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成为中原道教文化的代表,同时道教的养生理念、武术技艺传入边疆,影响了边疆民族的生活方式,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茶山瑶至迟在明代开始信仰道教中的符篆派,主张“以善化道,符水治病”,信奉道教诸神,同时又保留了本族固有的原始宗教,佛教、儒教的一些观念以附属形式偶尔出现在瑶族的道经中,形成瑶族特有的宗教信仰,至今保留着做功德、回村龙等仪式^⑦。

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会通也进一步拓展共同体文化视野。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文化交流;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天文、历法等知识,与儒家思想相互激荡,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⑧。

(三) 民间文化的繁荣: 共同体认同的社会基础

明朝民间文化繁荣,推动共同体认同向基层社会渗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奠定广泛社会基础。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通俗文学、民间艺术蓬勃发展,《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经典文学作品流传广泛,不仅在汉族地区家喻户晓,更传播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这些民间文学作品蕴含“大一统”“忠义”“家国情怀”等价值观念,通过故事传播潜移默化塑造各民族认同。《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忠义精神,《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坚韧不拔精神,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民间艺术如戏曲、说唱等成为文化传播重要载体,在边疆地区演出中融入中原文化元素,促进文化认同形成。

民间信仰传播也强化共同体认同。除关帝信仰外,观音信仰、妈祖信仰等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妈祖信仰从福建传播至台湾地区、海南及东南亚地区,成为沿海各民族共同信仰;观音信仰在西藏、蒙古地区与藏传佛教融合,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这些民间信仰蕴含的“向善”“和谐”“团结”等价值追求,强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共鸣。

五. 经济互通: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保障与交往动力

(一) 经济网络的构建: 从区域经济到全国统一市场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三, 3040页, 台北, 史语所校印本, 1962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十, 584页, 台北, 史语所校印本, 1962

^③ 谢肇淛:《滇略》,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④ 韩星:《儒道佛之间:三国至清末历代朝廷处理三教关系的模式特征-经验》,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02):5-13.

^⑤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⑥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

^⑦ 奉恒高,等:《茶山瑶历史与文化》, 318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⑧ 潘岳,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255页,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2023

明朝在实现疆域统一后,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搭建起“内地—边疆—域外”互联互通的经济网络,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了物质根基。

在国内经济网络构建上,明朝实施了三大核心举措:一是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按亩征银,打破实物税桎梏,解放劳动力,刺激农产品商品化,助推商品经济兴起;二是强化交通建设,修复大运河、完善驿传制度,打通南北商品流通通道,形成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三是规范货币体系,确立白银主导货币地位,形成“银钱兼用”制度,消除货币流通壁垒,保障跨区域商品交换顺畅。这些举措促成了区域分工互补的统一市场,中原及江南地区是粮食、丝绸、茶叶、瓷器等农产品与高端手工业品主产区;边疆地区供应马匹、毛皮、药材等特色产品;沿海地区则作为内外市场枢纽,出口国内商品,进口海外香料、白银等物资。

为保障商品流通,明朝建立了多元化贸易渠道:以朝贡贸易维系边疆及域外政治经济联系;在边境开设马市、茶市等官方互市;民间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最终形成“中原依赖边疆畜牧产品,边疆依赖中原农工产品”的共生格局。这种经济深度依存,既强化了区域物质联系,也增进了民族交流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二) 茶马贸易:边疆经济融合的典范

茶马贸易作为明朝边疆治理的重要经济手段,其核心是通过茶叶与马匹的贸易,满足中原王朝的军事需求和边疆民族的生活需求,同时强化民族间的经济依赖与政治认同^①,在促进西南、西北边疆与内地经济融合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纽带。

茶叶是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而马匹是明朝军队的重要战略物资,“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明朝为垄断茶马贸易,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在西北、西南边疆设立了秦州茶马司、河州茶马司、洮州茶马司、雅州茶马司等,负责茶叶收购、马匹征集与贸易管理,建立起严密的茶马贸易制度,垄断茶叶生产与流通,通过“以茶易马”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既满足军事需求,又强化经济联系。西南地区茶马贸易尤为繁荣,川藏、滇藏茶马古道成为重要贸易通道,“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②。

明朝的茶马贸易分为“官市”与“民市”,官市由政府主导,规定“上马给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严禁私人交易;民市则在官市之外,允许民间商人进行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茶马互市的推行,不仅满足了明朝的军事需求,更促进了区域间的资源配置与市场互通。例如,西北的茶马互市中,中原的茶叶、丝绸、铁器通过茶马司传入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地区,边疆的马匹、皮毛、药材传入中原;西南的茶马互市中,四川、云南的茶叶传入西藏,西藏的马匹、酥油、藏香传入内地。

除茶马贸易外,明朝还在边疆地区设立“互市场所”,如北方的宣大互市、辽东互市,允许中原与边疆民族进行全面的商品贸易。宣大互市(即宣化、大同两地)是北方最大的互市场所,“每年互市,官民贸易,络绎不绝”,中原的粮食、布匹、瓷器、茶叶与蒙古的马匹、皮毛、盐碱等商品在此交易,形成了跨区域的市场网络。辽东互市则连接中原与东北地区,女真族的人参、貂皮、海东青与中原的铁器、农具、丝绸等商品的贸易,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

茶马贸易与互市场所的设立,使中原与边疆形成了互补的经济格局,各民族在商品交换中形成了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政治认同。明朝通过控制茶叶流通,“以茶驭番”,使边疆少数民族“得茶则生,不得则死”,从而强化对边疆的控制,实现“内充军实,外驭诸番”的治理目标^③。蒙古部落通过互市获得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对明朝的经济依赖逐渐增强,客观上减少了边境冲突;西藏通过茶马贸易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促进了藏汉民族的融合。这种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 朝贡贸易与海外贸易:经济融合的拓展与延伸

朝贡贸易是明朝官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形式,既具有政治属性,又具有经济功能,在促进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强化了边疆地区与中央的联系。明朝推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对前来朝贡的国家与民族给予丰厚赏赐,吸引周边少数民族首领频繁入贡。蒙古、西藏、西南土司等边疆民族通过朝贡,获得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确立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朝贡贸易中的“回赐”与“贡品”交换,实质是中央与边疆的经济互补,强化了“华夷一体”的经济联系。

海外贸易的发展拓展了经济融合的范围。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船队携带大量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进行贸易,换回香料、宝石、药材等特产。尽管明朝后期实行海禁政策,但民间海外贸易并未中断,沿海商人通过走私、互市等方式与海外进行贸易,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局面。

海外贸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意义深远。贸易往来推动沿海地区形成广州、泉州、宁波等核心港口城市,这些城市既是商品集散的枢纽,更成为连接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纽带,加速了区域间的资源流通与产业互补,让沿海经济与内地发展深度绑定、协同共进。与此同时,海外贸易的开拓过程也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沿

^① 陈盈诺、霍维洮:《从茶马贸易看明代西南边疆治理》,《民族学论丛》,2024,(04):56-65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19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40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海各民族民众在应对航行风险、拓展贸易渠道的过程中,逐渐培育出“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这种在实践中凝聚的向心力,进一步夯实了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同时丝绸、瓷器、茶叶等承载着中华文明特质的商品,随贸易航线走向世界,既向海外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精湛技艺,也让中华民族在文化输出中深化了自身认同,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为共同体的精神建构注入持久动力。

六.明朝“大一统”共同体实践的历史脉络及接续

明朝“大一统”的治理实践,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而是深度嵌入中华民族数千年“多元一体”演进的历史长河,上承元朝“华夷混一”的政治遗产,下启清朝多民族国家的鼎盛格局,其历史脉络与传承价值,需置于元明清三朝的连续演进中方能明晰。从疆域治理到文化认同,从制度设计到民族交融,明朝以务实创新的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与发展铺就了关键路径,其影响既贯穿于有明一代,更深刻塑造了后世王朝的治理范式。

①

元朝首次实现了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中原内地与边疆远域的全面统合,打破了传统“华夷之防”的地理与观念壁垒。但元朝“内政不修,善政难行”,未能找到适配农牧二元格局的治理路径,仅存世不足百年便土崩瓦解。明朝立国后,并未割裂与元朝的历史联结,而是以“天命所归”的正统叙事,承认元朝的历史地位,主动继承其疆域遗产与“华夷一统”理念。在疆域治理上,明朝沿用元朝的行省制度框架,创新发展羁縻卫所、土司制度,将黑龙江流域、西藏地区、西南边疆等纳入有效管辖,延续了“天下一家”的治理格局;在文化政策上,明朝重拾儒家文化主脉,同时兼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信仰,继承了元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这种对前代遗产的批判性继承,避免了历史断裂,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连续性。

明朝的治理实践,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的历史链条。在疆域整合上,明朝迁都北京“天子戍边”,强化了对北方农牧区域的统摄,为清朝定都北京、巩固北方边疆提供了政治地理范本;其在西南推行的改土归流,虽未彻底完成,但“土流共治”的过渡模式与实践经验,为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扫清了障碍,使西南边疆彻底融入中央集权体系。在民族政策上,明朝“华夷一家”“因俗而治”的理念,被清朝直接承袭并发展,康熙皇帝所言“中外一家”、雍正皇帝强调“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②,正是对明朝治理思想的延续与升华;清朝继续对西藏“多封众建”的政策,亦脱胎于明朝对藏区的册封体系,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在文化认同上,明朝普及儒学、推动多元文化交融的实践,使儒家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清朝沿用科举制度、尊崇儒家正统,延续了这一文化整合路径,康熙皇帝六次遣官拜祭明孝陵、手书“治隆唐宋”,既彰显了对明朝正统地位的承认,也印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明朝的治理实践,更以扎实的历史事实,回应了后世“新清史”“内亚史观”等错误论调的虚妄。“新清史”将清朝解构为“中亚帝国”,割裂其与中国历史的联系;“内亚史观”刻意对立农牧文明,否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③。而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创新农牧区域统合模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清晰展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元朝“华夷一统”到明朝“天下一家”,再到清朝“中外一家”,三朝一脉相承的“大一统”追求,证明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不存在所谓“汉族中国”与“内亚帝国”的对立。明朝通过迁都、屯田、互市、教化等一系列举措,使农耕与游牧区域深度联结、各民族文化相互浸润,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关系,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历史写照。

结语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经孕育、萌芽、形成等过程,在新时代得到不断强化与升华。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从自觉到更大自觉的逻辑演进过程,深刻体现了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④明朝“大一统”实践蕴含的治理智慧,历经数百年传承,至今仍具深刻的借鉴价值。其“因俗而治”的柔性治理策略,既尊重民族差异又强化中央集权,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范本,既不可强求一律,也不可放任自流,唯有在尊重差异中强化共同性,方能实现长治久安。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从明朝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坚持“多元一体”的治理理念,既保护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又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让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焕发更旺盛的生命力。“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深叶茂,让中华文明在连续性、包容性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1] 狄鸿旭.疆域一体与文化融通: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稳固壮大的重要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2025,46(01):68-75.
-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4] 明太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 [5] 明太祖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① 田澍:《承前启后:明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06):50-55.

② 《清实录》第八册《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十三,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历史研究,2022,(03):22-32.

④ 马冬梅,李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8):12-18.

- [6] 殷晓元,张如意.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0(02):65-72.
- [7] 姚士观.明太祖文集[M].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
- [8] 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 [9]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0] 邓云.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明朝“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05):114-125..
- [11]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4] 庞思纯,徐华健.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 [15] 明世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 [16] 谢肇淛.滇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 [17] 韩星.儒道佛之间:三国至清末历代朝廷处理三教关系的模式·特征·经验[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02):5-13.
- [18]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9]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 [20] 奉恒高,等.茶山瑶历史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 [21] 潘岳,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
- [22] 陈盈诺,霍维洮.从茶马贸易看明代西南边疆治理[J].民族学论丛,2024,(04):56-65.
- [23]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4] 田澍.承前启后:明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J].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06):50-55.
- [25] 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6]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历史研究,2022,(03):22-32.
- [27] 马冬梅,李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8):12-18.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Dynasty's "Great Unification"

Cui Huaq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The Ming Dynasty, as a key dynasty that inherited the Yuan Dynasty and initiated the Qing Dynasty, has a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takes "great unity" as its core, inherits the legacy of the Yuan Dynasty's "unification of Han Chinese and ethnic minorities", and constructs a diversifie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erritorial unity, cultural homogeneity, and economic symbiosis" through diversified practices of territorial governanc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connectivity. In practice, the Ming Dynasty relocated its capital to Beijing, established border defense stations, and strengthened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b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Tugui Riv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tegrat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deepen cult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Building an economic symbiotic network based on tea horse trade, tribute system, an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nurturing the embryonic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governance practice not only consolidated the unity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ulti-ethnic pattern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responded more strongly to erroneous arguments such as the "New Qing History" and "Inner Asian Historical View". Its experience has provided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improving border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the Ming dynasty; Unific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iverse integ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Border governance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的政府债务观研究

张光先¹杨柳依²

(1.广州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63, 2.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政府债务理论的重要起源。本文重点探讨了该学派几位代表人物的政府债务理论, 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古典学派普遍持有“债务悲观论”这一共识, 即对政府债务的态度较为负面。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支出缺乏生产性, 会抑制经济增长; 二是古典学派中大部分认为债务融资在国家经济中并未发挥关键作用; 三是古典学派认为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储蓄和投资自动实现平衡, 借贷并非必要的平衡调节工具。本文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这些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归纳了不同代表人物的政府债务观, 并对其思想进行初步评价。通过理论的比较与反思, 本文尝试揭示其在历史背景下的内在逻辑及演变过程, 以期为当代财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 古典学派; 政府债务; 非生产性; 政府筹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26

1.引言

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现代公共财政的起点。在此之前, 政府债务实际上是英国君主的私人信贷^[1]。随着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 政府债务逐渐转变为公共债务, 由代表全国公民的议会承诺使用特定税收收入中的一部分来偿还。这一筹资制度在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同时, 降低了公共借贷的成本。随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全球性战争, 特别是长达20多年的拿破仑战争, 英国的公共债务迅速膨胀。数据显示, 英国的公共债务从1691年的310万英镑上升到1819年的84400万英镑。直到19世纪40年代, 因战争导致的债务(主要用于军事支出)始终占公共支出的80%以上。即便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 名义公共债务几乎没有减少, 1913年这一数额仍为71100万英镑, 然而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降至26%^①。这表明, 英国并未实际偿还大量债务, 而是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来显著降低了公共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这一现象与古典学派中的“债务悲观论”和及其预期的财政或经济危机大爆发的后果背道而驰。

古典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提出了各自关于政府债务的见解。他们普遍持有一种谨慎甚至悲观的立场, 认为政府债务会削弱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例如, 斯密将政府的非生产性角色置于批评的中心, 而李嘉图认为政府通过借贷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因为理性的个人会预期到未来的税收负担。然而, 这些理论在当时被用来解释英国的财政困境时, 似乎没有完全预见到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债务比率的自然下降。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使得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希腊马其顿大学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勒弗特里斯·楚尔菲蒂斯(Lefteris Tsoulfidis)指出,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先进的政府债务理论, 但是这些理论常常被简要提及, 相较于价值论或分配论, 它们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 斯密对国家非生产性角色的定位以及李嘉图等价性假说等理论, 常作为公共财政或经济类书籍的开篇而一笔带过。楚尔菲蒂斯认为,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政府债务的见解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应当得到更深入的探讨^[2]。

作者简介: 张光先(1982—),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财政政策;
杨柳依(1991—),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地方债与绿色金融。

通讯作者: 杨柳依

基于此,本文以英国公共债务的历史发展为背景,深入探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政府债务的观点及其现代意义。本文首先回顾英国政府债务从私人借贷向公共债务的转变过程,以及这一转变对英国财政制度的深远影响。随后,本文将详细分析古典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的主要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家非生产性角色定位、李嘉图等价性假说以及马尔萨斯和穆勒对债务的批判性看法。最后,通过理论的比较与反思,本文尝试揭示其在历史背景下的内在逻辑及演变过程,以期为当代财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2. 英国古典政治学派的政府债务观分析

2.1 亚当·斯密的政府债务观

在重商主义时期,英国政府通过监管、公共企业和征税来控制经济市场。重商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公共债务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损害。因为债务只是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就像“从右手转到左手一样,”如果身体能够得到必需的食物,只要食物分配得当,身体就不会被削弱”^[3]。然而,亚当斯密对此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未来赎回债务所带来的税收压力,将导致国内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最终损害国内的生产者和经济活力^②。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写道:欧洲各国的巨额债务积累过程几乎是一样的,公众长期承受债务负担,久而久之,国家甚至可能因此而破产^[4]。这一观点反映了斯密对政府债务的深刻忧虑。他认为,债务不仅会导致国内经济的不稳定,还可能引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严重威胁。

因此,斯密主张通过税收等手段将政府债务降至为零,借此“解放公共收入”,不再用于偿还债务。他在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英国当时的税收体系,提出了具体的税收建议,说明哪些税种的增加是公正的,且对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损害最小。然而,斯密也承认,政府通常“不愿意”,也“不能”采取这些措施。政府由于害怕得罪民众,尤其是在战争时期,避免大幅度增税,因为过高的税收会导致人民对战争的反感。

斯密还提到,通过借贷方式,政府可以在仅作少量税收调整的情况下为战争筹集资金,这比大幅度增税更为温和。然而,他对政府未能建立足够的沉淀基金感到遗憾,认为应在平时时期通过财政手段迅速减少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他强调,如果战争支出完全依赖当年的收入,税收的负担将不会持续超过战争的时间,但事实往往是通过借债来延缓这一负担。斯密认为,战争时期的债务虽能暂时维持私人经济的运作,但一旦战争结束,过度的债务和相应的征税负担会抑制私人资本的积累,进而阻碍国家财富的增长。他还指出,依赖税收而非债务为战争提供资金有一个附加的好处,即战争的持续时间可能会缩短,因为民众更容易感受到战争的经济压力,从而促使政府尽快结束战争。

斯密特别强调了公共债务对土地和资本的负面影响,认为这些资源将因承担债务偿付的税收负担而遭受破坏,导致农业、贸易和制造业的全面衰退。他引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共和国、以及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债务危机案例,借此说明债务如何削弱国家实力。针对英国的公共债务问题,斯密建议增加土地税、印花税、关税和消费税,并将这些税种扩展到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以加快筹集资金迅速偿还债务。然而,斯密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殖民地征收更高税收将面临极大的政治阻力,这使他对英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抱有相当悲观的态度,他认为,如果英国无法解决债务问题,那么继续维持对殖民帝国的幻想将是毫无意义的。

斯密的这些观点不仅是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也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在讨论公共债务和税收问题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的观点预示了公共财政政策中可能出现的债务陷阱,并强调了平衡债务与税收的重要性。

2.2 大卫·李嘉图的政府债务观

斯密是从大量的历史观察中得到他个人的理论见解,但大卫·李嘉图的方法却完全不同。李嘉图以其严谨的理论逻辑见称,较少关注现实情况,更多依赖逻辑推理来论证经济理论。是作为分配和增长理论发展的先驱,1772年出生的李嘉图对公共债务的反感甚至超过了斯密。李嘉图主张战争应该完全通过税收筹资,并极力倡导通过征收一次性资本税(即对国家财产的一次性征税)来完全赎回现有公债。为了论证他在公共债务辩论中的激进立场,李嘉图借助了他的两项核心理论。首先,他认为现行的筹资制度下,偿还债务所需的税收会损害资源在生产过程

中的有效分配。特别是,严重依赖间接税或仅对部分生产者的利润征税,会扭曲相对价格,从而使英国经济偏离其“自然平衡”状态,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李嘉图通过其在分配理论背景下对税收归宿的经济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

李嘉图认为,一个规模尽可能小、没有公共债务的政府最有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人民福利。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写道:“资本的积累是国家财富的基础,只有在资本得以自由增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能得以持续”^[5]。他坚信公共债务的负担会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大量的税收将减少私人部门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从而抑制经济活动。

李嘉图主张,完全赎回公共债务不仅对土地和资本所有者有利,也同样有助于工人阶级。他指出,工人阶级将立即受益于更高的实际工资,这主要是由于间接税的减少以及对土地租金和利润减免带来的更多投资,从而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在他的分析中,税收通过扭曲市场价格和减少资本的有效运用,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李嘉图认为:“任何额外的税收都会导致资本的积累放缓,因为税收会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剩余资本”。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偿还公共债务,持续的高额债务会通过高额税收损害国内资本的增长,这将导致国内资本流向国外,从而减少国内的投资和生产力。他特别担心税收负担会促使资本外流,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的停滞,同时也阻碍外国资本的流入。他认为:“资本在追求最高利润率的同时流向那些税收负担较轻的国家,因此国内的过度税收会导致资本的逃离”^[5]。这将带来两种负面后果:(1)国内经济增长显著下降;(2)由于生产要素的不流动性,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部分群体如土地所有者和非移民工人的福利反而可能会相对提高。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布坎南在讨论政府债务与税收的关系时,将巴罗在其著作《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中提出的税收与债务融资等价的观点的起源归于李嘉图。根据巴罗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代际利他、一次性税收等),如果公众具有理性预期,那么无论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还是直接增税进行融资,最终的经济影响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债务融资所引发的赤字将会导致未来的税收上升,而理性公众会预见到这一点,并通过调整当前的消费来减轻未来税负带来的影响^[6]。布坎南将这一理论称为“李嘉图等价性假说”,但事实上,这一假说的思想并非直接源于李嘉图。虽然李嘉图确实认为政府债务和税收的负担可以相互替代,但他也指出,在现实中,公众并不总是理性行事。李嘉图意识到,许多情况下公众会被持有公共债务的“财富幻觉”所迷惑,进而未能充分考虑未来的税收负担^[7]。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写道:“如果一个人被要求每年支付100英镑的税款,而不是一次性支付2000英镑的税款,他很少会理智地认为这两者的价值是等同的。因为他不愿为了未来而进行更多的储蓄”。此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等价性假说提出了进一步批评,认为即便假设公众理性,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因素(如信贷约束、非代际利他行为等)使得债务与税收的效应并不等价^[8]。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债务融资可以通过增加支出和刺激需求来促进经济复苏,而简单的税收提高可能会抑制私人消费,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9]。

因此,李嘉图明确反对巴罗等价性假说的严格版本,尤其是在政府债务与税收对公众行为影响的差异上。李嘉图主张,基于债务的融资方式会对国家资本产生更大的破坏,因为公众在面对年度税收与一次性税款时,往往不能理性地权衡其真实价值。他认为贷款制度比等量的重税制度对国家资本的侵蚀更为严重,因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倾向于通过税收而非债务来为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尤其是在战争期间^③。

李嘉图的政府债务观为我们提供了严谨的逻辑框架,尤其是在理性预期和资本积累方面。然而,在应对现代复杂的经济问题时,其观点仍需与现代理论相结合,找到更为平衡的政策选择。

2.2 大卫·李嘉图的政府债务观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经历了一场严重而漫长的经济萧条。曾为政府军事服务的大批劳动力重返私人劳动力市场,正如李嘉图所预测的那样,这为地主、企业家和商人提供了以较低成本雇佣劳动力的机会。然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从这一时期的经济现实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他在实际的经济衰退背景下,部分反对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公共债务的普遍看法。马尔萨斯在原则上同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即高额

的公共债务及为偿还债务而必然征收的高额税收对整个经济,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具有负面影响。然而,他强烈反对李嘉图主张的通过大规模征收资本税在三年内彻底消除英国公共债务的计划。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会给劳工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会对整个英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马尔萨斯的反对立场部分源于他对“萨伊定律”的质疑。萨伊定律主张“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即生产所产生的收入足以购买所有生产的商品^[10]。然而,马尔萨斯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有效需求的作用。他认为,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上的供需并不会像萨伊所说的那样自动平衡,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这种萧条实际上揭示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长期不平衡,尤其是在军事需求下降后。

在马尔萨斯看来,1815年战争结束后,劳动力市场上的大量劳动力释放以及军事装备需求的减少导致了有效需求的显著下降^[11]。国民产品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的高额战争开支终结后,私人需求并未迅速增长来填补这一空缺。正如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写道:“生产受到了决定性的制约……国家的资本和收入的减少,使得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工人们的生产也不能确保获得足够的利润”^[11]。

因此,马尔萨斯坚信,李嘉图主张的通过大规模资本税迅速赎回公共债务的计划将会加剧英国经济的困境。他认为,资本家、地主和中产阶级作为公共债权人,不可能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来缩小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而债务赎回带来的国民产品的新分配将进一步扩大这一差距。马尔萨斯强调,社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富裕,反而会陷入更深的贫困^[11]。

马尔萨斯的这一论点与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忧虑相呼应,他补充并修正了古典经济学派中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乐观预期。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的是,他虽然认同公共债务的潜在危害,但他反对通过大规模资本税来迅速清偿债务的方式,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需求进一步下滑,进而加剧经济困境。马尔萨斯的理论为后来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管理的政策提供了早期的理论支持,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公共支出刺激需求的做法^{[8][9]}。

2.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观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府债务理论。穆勒出生于1806年,到1848年发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时,他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英国国债负担随着经济增长在不断减轻。穆勒对公共债务的看法与亚当·斯密的判断并无太大不同。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七章关于国家债务的内容中,穆勒指出:“如果从政府贷款中获取的资本是用于生产或注定要用于生产的资金,那么公共债务融资将导致恶果”^[12]。

穆勒认为,利用资本税从政府贷款中抽取的资本“相当于从劳动阶级的工资中抽取金额”。但与斯密甚至李嘉图不同,穆勒严格反对在资本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公共债务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因为他认为政府支出通常是非生产性的。穆勒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情况:

1. 外国资本,“世界普遍积累的溢物”,这是可以用于债务融资的资金来源之一。

2. 国内资本,“除非这种投资方式对它开放,否则它根本就不会被保存下来,或者在被保存下来后,会被浪费在非生产性企业中,或者被送到外国去寻找就业机会。”

3. 利润率下降:“当积累的进展使利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低于这个程度,就会停止资本的增加,或者把全部新积累送到国外去;政府每年可以拦截这些新积累,而不影响劳动阶层的就业或工资。”

穆勒认为,从以上三个来源获得的资本将构成公共债务融资的“极限”。国家是否超过了这个限度,可以通过一个指数来诊断:“这既是一个确定的指标,也是一个明显的指标。政府是否通过其贷款业务提高了利率?……当他们确实提高了利率,就像他们在法国战争期间以最特别的程度所做的那样,这就正面证明了政府是生产性投资的普通渠道的资本竞争者”^[12]。

在穆勒定义的限度内的贷款,“除了支付利息外,当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损失,甚至可能对劳动阶级有利”,因为它本来会离开国家的资金在军事部门创造就业。当在“限额”内的债务融资和通过增税完全覆盖战争(或紧急)开支之间进行选择时,穆勒建议“一个国家的审慎应该支配着与个人的审慎相同的行为;立即接

受容易承受的尽可能多的匮乏，只有当任何进一步的负担会使他们过于痛苦或残废时，才通过抵押他们的未来收入来提供剩余的费用。”

尽管穆勒承认经济增长本身能够减轻债务负担，但他与斯密一样，对赎回债务的问题仍然持肯定态度。他权衡了支持或反对“通过普遍缴款或通过剩余收入逐步”偿还国债的两种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般捐款只是一种财产税，那么有可能一举消灭国债。除此之外，“唯一既公正又可行的消除或减少国债的方式是通过盈余收入的方式”^[12]。穆勒驳斥了这样的论点：与其为此目的提高税收，不如让钱“在人民的口袋里生根发芽”。人们很可能把留在口袋里的一部分钱存起来，“但他们极不可能把全部钱存起来：而如果通过征税，用于偿还债务，全部钱就会被保存下来，并成为生产力”^[12]。这与后来凯恩斯主义在储蓄方面的思想相似，但在偿还债务方面则有所不同。穆勒建议，“在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国家”，由此增加的收入“宁可通过减税来处理，也不要通过清偿债务来处理，只要还有任何非常令人反感的税款”。甚至在这点之外，明智的做法是“通过试验性地减少这些税收来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直到发现在某一点上可以在对贡献者的压力最小的情况下增加一定数量的收入”^④。

穆勒对“一定数量的国债是可取的，而且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作为对社会中较贫穷或较缺乏经验的部分的储蓄的投资”这一论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投资于政府基金的唯一好处是国家担保，但这将建立在强制征税的基础上。穆勒建议建立一个“影响全国的国家存款和贴现银行”。该机构的费用将由存款和商业、土地或其他证券的贷款之间的利率差来支付。这样一个机构“将使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保险公司，为社会上靠财产利益生活的那部分人提供保险，防止他们因那些可能需要倾家荡产的人的破产而失去财产的风险”。

穆勒的政府债务观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对公共债务的警惕态度，又加入了更多的理性分析，特别是在债务融资限度和资本使用方面。他强调，政府应当慎重使用债务融资，并优先通过盈余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确保债务负担不会过重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这一立场展现了穆勒对财政政策的审慎态度，并为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3. 评价与总结

尽管政府负债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现实问题，涉及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它始终是经济学理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债务问题愈加严峻，这使得重新审视历史理论更具现实意义^{[13][14]}。基于此，本文对西方经济学中古典学派的政府债务观进行讨论和挖掘，借以讨论古典学派中政府债务理论的发展和演进脉络。对债务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洞见历史长河中纷繁复杂的政府债务问题及本源所在，还可以管中窥豹，理解不同学派的独特观点以供后世参考。总体而言，古典学派中对待政府债务的态度较为悲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倡导的债务有益论形成鲜明对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公共债务问题上基本达成一些共识：公共债务通常源于战争等紧急情况，这是对经济资源的浪费。但即使在平时时期，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同样视政府债务为有害的，不可持续的。究其原因，或许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用以解释。

首先，古典学派认为，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虽然政府支出旨在履行必要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通常无法或者不应该由私人部门承担，但这种支出耗费了已创造的社会财富，从而被视为非生产性。

其次，对于英国而言，公共债务的增长多与战争相关，政府为这些非生产性目的借贷占用了资本，这些资本本可用于私人投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除马尔萨斯外，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未能充分理解税收和债务融资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古典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是自发建立的，无需外部调控。因此，借贷用于公共支出在他们看来削弱了经济积累的能力，损害了财富的创造。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盛行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的理念，也对古典学派的债务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古典学派推崇小政府的意识形态，使其对政府借贷持更为保守的态度。

18世纪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盛行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理念，支持小规模政府与自由市场的意识

形态对古典学派的债务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历史角度分析,古典学派有关政府债务的讨论并未引发大规模的财政或经济危机,这主要归因于19世纪前后西方国家盛行的个人主义文化。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各国普遍保持了良好的主权信誉。尽管一些国家的债务比率较高,但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通常能够得到迅速清偿。此外,财富的快速积累进一步增强了各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因为私营经济在当时高效运作,且受到政府干预较少。直到今天,民主国家仍然主导全球政治体系,受宪法和公众监督的约束,各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上也愈加审慎^{[15][16]}。

总的来看,古典学派对政府债务的悲观态度反映了他们对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经济自我调节的坚定信念。在19世纪,这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各国更加重视财政审慎和债务管理。然而,随着现代经济复杂性的增加,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政府债务问题愈发显得多样化和深远^{[17][18]}。当前各国在应对公共债务时,既要汲取古典学派的历史经验,又需结合实际经济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正如一些学者指出,适度的政府债务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非阻碍^{[19][20]}。因此,重新审视古典学派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经济背景,也为当前全球债务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在全球债务不断攀升的今天,各国如何在平衡短期需求与长期可持续性之间找到最优路径,将继续考验现代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智慧。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 Mitchell& Deane (1962)。

②在斯密反对政府债务之前,大卫休谟及提出了政府债务有害论的论断。他在1752年首次出版的政治论文《论政府信用》中对英国的公共债务问题提出这样的论调:“要么国家必须摧毁公共信用,要么公共信用将会摧毁国家”。休谟认为,公共债务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事实上,休谟的这种论调是对国家安全的财政必需和由负债融资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之间联系的一种思考。我们这里暂不具体讨论休谟的政府债务观。

③关于李嘉图对公共债务的看法来自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以及他在1820年出版的《筹资制度》。

④这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拉弗曲线的想法的起源。

参考文献:

- [1] Ellefson, A.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 Ware,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J]. Teaching History: A Journal of Methods, 1992, 17(2): 81-82. DOI: <https://doi.org/10.33043/TH.17.2.81-82>.
- [2] Tsoulfidis, L.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public deb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07, 54(1): 1-12.
- [3] Melon, J. F. A Political Essay upon Commerce [M]. Dublin: Philip Crampton, 1738.
- [4]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drew Skinner, Books I-III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original ed. 1776].
- [5]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1817.
- [6] Barro, R. J.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1095-1117.
- [7] Blaug, M.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 [8]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1936.
- [9] Blanchard, O., & Perotti, R. An Empir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anges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es on Outpu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117(4), 1329-1368.
- [10] 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Crapelet.1803.
- [11]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2nd ed., 2 vols., ed. by P. James [M].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original ed.1803].
- [12] 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V, Chapter VII: Of a National Debt [EB/OL].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Access: http://oll.libertyfund.org/?option=com_staticxt&staticfile=show.php%3Ftitle=243&chapter=7243&layout=html&Itemid=27, Retrieved 5 Nov. 2012.

[13] IMF. Global Debt Database [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2.

[14] OECD. Sovereign Borrowing Outlook 2021 [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15] Lindseth, P. Power and Legitimacy: Reconciling 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 Pavlov, V., Haskel, J. Government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A Long-Run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6.

[17] Furceri, D., Zdzienicka, A. The Effects of Public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dvanced Economies [R]. IMF Working Paper, 2013.

[18] Arcand, J. L., Berkes, E., & Panizza, U. Too Much Fin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5, 20(2): 105-148. DOI: <https://doi.org/10.1007/s10887-015-9115-2>.

[19] Blanchard, O.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4): 1197-1229. DOI: 10.1257/aer.109.4.1197

[20] Reinhart, C. M., & Rogoff, K. S.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2): 573-578. DOI: 10.1257/aer.100.2.573

Research on the View of Government Debt in the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Zhang Guangxian¹, Yang Liuyi²

(¹ School of Accounting,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China; ² 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School is wide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modern government debt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 debt theories of several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is school, including Adam Smith, David Ricardo, Thomas Malthus, and John Stuart Mill. The Classical School generally held a consensus of "debt pessimism," reflecting a predominant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government deb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perspective are: first, classical economist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lacked productivity and would hinder economic growth; second, most classical economists argued that debt financing did not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rd, the Classical School believed that market mechanisms could achieve equilibrium through savings and investment, making borrowing an unnecessary balancing too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theor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ummarizes the government debt views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s, and provides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ir ideas. Through theoretical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se theories with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fiscal policy.

Keywords: Classical School; Government Debt; Non-productivity; Government Financing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重庆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唐梦秋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文章基于2016—2022年重庆市18个区县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依然稳健;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影响乡村振兴;第三,金融发展水平发挥调节作用;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促进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建议,以推动乡村振兴。

关键词: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3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三农”领域正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明确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2023年与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繁荣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和普惠金融两者的结合,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涉农小微企业等群体的金融可得性和满意度,有利于扩大正规金融服务在“三农”领域的覆盖面,促进乡村振兴。

二、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旨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对助力贫困人口积累财富和积累资产并建立信用具有重要作用^[1]。个人信用能够作为金融服务的抵押物,弥补农民抵押物不足的问题,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包容性发展^[2]。然而,包容性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凸显了其在缓解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关键作用^[3]。2016年,由中国政府主办的G20杭州峰会上,制定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了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该原则强调了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术界关注到了“数字排斥”问题,指出需要确保金融科技的创新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并防范金融风险,以实现金融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4]。

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促进作用。首先,黄倩等(2021)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农户提供更低交易成本的创业资金,提高农村地区创业发生概率^[5]。与此同时,申云等(2022)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金融素质和风险管理能力,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6]。鲁钊阳等(2023)认为通过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来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7]。李麦收等(2024)表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做好乡村数字政务服务顶层

作者简介:唐梦秋(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管理。

通讯作者:唐梦秋

设计、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等方面持续推动乡村振兴^[8]。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文章拟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并实证检验，进而揭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水平、城乡差距和金融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机制，最后剖析其对不同人力资本地区的异质效应，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原则，选取了 2016-2022 年重庆市 18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有 126 个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6-2022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统计局网站和统计公报。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主体，用 RR 来表示，本文借鉴徐雪,王永瑜等学者研究方法^[9]，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出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表 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方向
乡村振兴指数	产业兴旺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正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正
		农业劳动生产率	正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正
		农药、化肥施用量	正
	生态宜居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正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正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正
		卫生厕所普及率	正
		农村绿化率	正
	乡风文明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正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正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正
		有线电视覆盖率	正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	正
	治理有效	乡村文化站数量	正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正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正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正
	生活富裕	农民人均纯收入	正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正
		城乡居民收入比	正
		农村贫困发生率	负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负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正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正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正
村庄道路硬化率	正
人均道路面积	正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正

2.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F),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6-2022年)》,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一级维度分别为覆盖广度(IF1)、使用深度(IF2)和数字化程度(IF3)。

3. 控制变量

(1) 财政支农力度(FSA): 通过农林水务支出与财政总支出比值测度。(2) 产业结构(IS): 用二、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3) 城镇化水平(UL): 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值度量。(4) 对外开放水平(OUL): 通过进出口总额衡量。(5) 农业生产条件(APC): 用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相除表示。

(三) 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在模型选择过程中, 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验证上文提出的假设, 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RR_i = \alpha_0 + \alpha_1 IF_i + \alpha_2 Control_i + \mu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i 表示省份, RR_i 为乡村振兴, IF_i 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Control_i$ 为控制变量集, 包含财政支农力度(FSA)、产业结构(IS)、城镇化水平(UL)、对外开放水平(OUL)和农业生产条件(APC), α_0 为常数项, α_1 和 α_2 为变量系数,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ε_i 表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温忠麟等^[10]的逐步回归方法, 分别将经济发展水平(ED)和城乡收入差距(IG)作为中介变量测算, 构建回归中介模型, 具体如下式所示:

$$RR_i = \alpha_0 + \alpha_1 IF_i + \alpha_2 Control_i + \mu_i + \varepsilon_i \quad (2)$$

$$M_i = \beta_0 + \beta_1 IF_i + \beta_2 Control_i + \mu_i + \varepsilon_i \quad (3)$$

$$RR_i = \gamma_0 + \gamma_1 IF_i + \gamma_2 M_i + \gamma_3 Control_i + \mu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其中, M_i 为中介变量, 可以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 其他与式(1)相同。

3. 调节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考察所选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在式(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数字普惠金融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IF * FDL$, 得到:

$$RR_i = \alpha_0 + \alpha_1 IF_i + \alpha_2 FDL_i + \alpha_3 IF_i \times FDL_i + \alpha_4 Control_i + \mu_i + \varepsilon_i \quad (5)$$

其中, FDL_i 是调节变量, 其他与式(1)相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采用了个体固定效应来进行回归。如表 2 所示, 输出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代表未引入控制变量和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 以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所有的回归模型均采用了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对回归结果进行观察可以发现,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无控制变量	模型(2) 控制变量
IF	0.6172*** (11.0216)	0.5220*** (5.8413)
控制变量	NO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_cons	0.1452*** (4.5751)	-0.7812 (-0.9254)
F	121.4762	44.5178
r2_a	0.4573	0.4734
N	126.0000	126.0000

注: ***, **, * 分别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从上文可以得知,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振兴。为进一步确认模型回归结果稳健性,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3 所示: 第一, 替换被解释变量。通过将乡村振兴(RR)替换为乡村振兴的二级指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4940、0.5878、0.5825、0.5882 和 0.4451, 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表 3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产业兴旺	模型(2) 生态宜居	模型(3) 乡风文明	模型(4) 治理有效	模型(5) 生活富裕
IF	0.4940*** (5.2138)	0.5878*** (5.1258)	0.5825*** (5.8913)	0.5882*** (5.8390)	0.4451*** (5.578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5515 (-0.4074)	-0.5309 (-0.5527)	-1.7278** (-2.1555)	-0.4243 (-0.3550)	-0.5792 (-0.7554)
F	23.1890	37.2128	38.5716	34.9811	25.4349
r2_a	0.4047	0.4222	0.4609	0.4136	0.4312
N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三)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或许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这一情况, 本文采用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检验方法。结果表 5 所示, 滞后一二期的回归系数均通过 1% 水平上显著, 这意味着滞后一二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表明该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滞后一期	模型(2) 滞后二期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0.4524*** (5.1343)	
解释变量滞后二期		0.4724*** (10.6313)
控制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_cons	-1.1249 (-1.4600)	-0.1417 (-0.1880)
F	20.8329	54.6917
r2_a	0.3688	0.3545
N	108.0000	90.0000

(四) 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 6 所示, 模型 (1) 是基准回归, 模型 (2) 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其回归系数为 0.6208, 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带动经济发展水平。模型 (3) 中,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经济发展水平这一中介变量后, 结果依然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系数由 0.5220 下降到 0.3717,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表 6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RR	模型(2) ED	模型(3) RR	模型(4) IG	模型(5) RR
IF	0.5220*** (5.8413)	0.6208*** (3.6087)	0.3717*** (3.9182)	-0.2113*** (-4.0019)	0.3226*** (3.6882)
ED			0.2421** (2.2567)		
IG					-0.9440*** (-3.09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7812 (-0.9254)	-1.8049 (-1.5799)	-0.3443 (-0.3745)	2.6253*** (4.7182)	1.6971 (1.3284)
F	44.5178	33.0745	63.8973	96.0986	35.7357
r2_a	0.4734	0.5498	0.4991	0.5826	0.5228
N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模型 (4) 表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其回归系数为 0.2113, 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且显著为负,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面效应。在模型 (5) 中, 加入中介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且显著为正, 说明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一中介变量。

(五) 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为了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服务水平的交互项,并在回归前对二者进行中心化处理。

表 7 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乡村振兴 (RR)	乡村振兴 (RR)	乡村振兴 (RR)
IF	0.5220*** (5.8413)	0.4522*** (4.2755)	0.2472* (1.9476)
FDL		0.0368 (1.5787)	0.1688** (2.2848)
IF*FDL			-0.1624* (-2.058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_cons	-0.7812 (-0.9254)	-0.6195 (-0.7518)	0.0083 (0.0089)
F	44.5178	38.2561	75.0513
r2_a	0.4734	0.4814	0.4992
N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交互项的系数分别在 10%、5%以及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服务水平的交互项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关系,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正向关系可能会转变为负向关系。

(六) 异质效应分析

本文选用《重庆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公布的“各地区受教育程度的 15 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按照中位数分为“高”与“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并据此进行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检验。

表 8 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	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
IF	0.5775*** (9.3011)	0.3306*** (9.3610)
控制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_cons	-0.5178 (-0.5119)	0.1638 (0.0990)
F	42.7316	713.5529
r2_a	0.4024	0.5663
N	63.0000	63.0000

结果表 8 所示, 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越强, 这些城市拥有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能过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 从而更好的服务于乡村振兴; 而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 居民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欠缺金融知识和互联网技能, 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效率。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不仅在短期内产生积极效应, 从长远看也将持续为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and 全面振兴提供动力和保障。本文提出以下管理建议。第一, 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农村宽带升级、数字电视普及、5G 基站建设等, 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二, 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服务并加强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实施农村教师的专门培养计划, 办好乡村教育, 逐步缩小城乡间的教育水平差距, 确保乡村教育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第三, 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 做到因地制宜, 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当前数字化时代, 以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并扩大覆盖面。

参考文献:

- [1] Klapper 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cross population groups in India[J].IUP Journal of Bank Management,2012,11(1):97-111
- [2] Maurer N . Effects of Cashless Economy Policy on Financial Inclusion in Nigeria : An Exploratory Study[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172: 49-56.
- [3] Jin D . The Inclusive Finance Have Effects on Alleviating Poverty [J] .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7, (3): 233-242.
- [4] 董玉峰, 赵晓明. 负责任的数字普惠金融: 缘起、内涵与构建[J]. 南方金融, 2018, (01) : 50-56.
- [5] 黄倩, 朱鸿志, 苏慧媛.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8):85-102.
- [6] 申云, 李京蓉.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1(01):105-117.
- [7] 鲁钊阳, 杜雨潼.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3, (03):47-56.
- [8] 李麦收, 高星.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机理、现实困境和推进路径[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4, (09):34-41.
- [9] 徐雪, 王永瑜.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05):64-83.
- [10]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5):731-745.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ongqing

Tang Mengqi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Using panel data from 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Chongqing over 2016–2022,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fixed-effects,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models. The findings show: (1)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ignificantly boosts rural revitalization, a result robust to endogeneity and stability tests; (2) it operates through the mediating chann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3)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xerts a moderating effect; and (4) the impact is heterogeneous — stronger where human-capital endowments are high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to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Chongq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Mediating Effect; Moderating Effect

资源经济视角下石林全域旅游的目标与实现路径研究

郭家乐 周迎香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基于资源经济视角, 系统探究石林县全域旅游发展的目标体系与实践路径。石林以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为核心, 整合彝族撒尼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及多样生态旅游资源, 但经多年开发面临产品结构单一、空间发展失衡、品牌形象老化、遗产保护与体验需求冲突、政策与市场协同不足五大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 结合资源经济学逻辑, 提出石林全域旅游发展目标应构建观光、研学、休闲三位一体的多元协同产品体系、优化全域空间布局、创新世界遗产与民族文化的双IP传播模式重塑品牌形象、建立分区管控与科技赋能的保护利用机制、健全政策市场协同机制。为实现上述目标, 提出以智慧旅游平台活化资源、创新利益联结模式、突破行政壁垒与资源碎片化瓶颈、深化产业融合打造品牌的技术、机制、政策、模式四位一体实现路径。石林全域旅游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型”向“产业驱动型”转型, 其经验可为全国同类资源型地区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协同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全域旅游; 资源经济; 石林彝族自治县; 旅游资源开发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资助 (国家级, 项目编号 202410673072) 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41

引言

石林, 是世界喀斯特地貌的精华所在, 是阿诗玛的故乡。石林县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旅游资源禀赋优渥, 是全国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县(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3月考察云南指出, “云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 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要积极探索利益共享机制, 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大力推进全景石林、全域旅游, 不仅关乎一片区域的利益, 更关乎云南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局,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 对于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但是, 石林县在开发旅游资源和执行文旅融合政策中, 存在四方面问题: 政策本身统筹不足、专项与配套政策不完善等; 执行主体职能部门联动弱、资源整合与产品优势不足; 客体受传统观念影响参与率低; 外部面临资金、产品竞争力等阻碍^[1], 具体到石林县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与旅游名片“石林风景区”, 在其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各景区发展不平衡、各项服务及收费制度有待调整、喀斯特地貌科学知识有待加强、竞争能力有限、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五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云南生态地位重要, 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为石林全域旅游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与根本遵循。石林全域旅游的核心在于以资源经济理念为引领, 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与保护策略, 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云南文旅名片与喀斯特世界遗产地, 石林的全域旅游建设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 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传承彝族文化、守护喀斯特生态的关键举措, 对全国同类资源型地区实现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石林全域旅游资源禀赋与分布

作者简介: 郭家乐(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周迎香(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消费社会学, 旅游社会学。

(本文两位作者贡献相同, 不分先后, 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郭家乐

“全域旅游”概念起源于地方行政层面规划用语，厉新建等人首次提出要从“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等角度推进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的基本框架^[3]。2016年初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正式提出我国旅游业需要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同年公布了首批262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使“全域旅游”理念纳入为国家顶层设计中指导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全域旅游”作为一个结合社会经济现实背景和旅游发展现实问题的理念及实践框架，是“将一个区域整体作为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建设，是一种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4]，核心特征在于，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引导、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全域旅游”之“全”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意在摆脱各种桎梏束缚，更为广泛的获取社会资源，走出单一景点旅游老模式，最大程度地发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5]。这就涉及到对区域内资源的识别和分类，尤为重要是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旅游生产力增长的潜力所在”^[6]的旅游资源开发和连结。旅游资源可以广泛概括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参照Ritchie和Crouch^[7]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模型，在旅游资源禀赋和利用效率上需要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环境五大维度，核心资源与吸引物可以包括自然要素、文化要素、人造要素。

石林是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集聚地。作为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地质公园之一的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面积365.7平方千米，规模宏大、类型多样、演化历史复杂。在2022年入选了全球首批100个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认证的地质遗产地，在科学和美学价值上都是世界最具魅力的地质奇观旅游胜地之一。石林的地质资源分布呈现明显的集群特征，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区域：大小石林核心区、乃古石林片区以及长湖-蓑衣山片区，为科学考察研究等提供了多样化的价值。同时，石林是云南省首家“中国天然氧吧”，近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平均值达97.3%，氧离子浓度极高，近3年平均达到2372个/立方厘米，峰值更是高达16809.2个/立方厘米^①，从气候上来看，石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6.3℃，全年63.3%的日期体感温度都处在15-25℃的舒适范围内^②，提供超长的舒适游览期和对人体健康有益的优越生态也是石林全域旅游中优越的自然禀赋。

根据《中共石林县委志》记载，石林县（原路南县）是云南重要的革命游击根据地，圭山革命游击根据地和洪山区革命游击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石林的早期活动和革命斗争历史使得目前石林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构成了石林全域旅游中红色教育和精神传承的重要部分。为纪念1948年由朱家璧将军领导的“圭山起义”及滇黔桂边区革命武装斗争而建立的圭山革命纪念馆等革命遗址作为石林红色资源的主要载体，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另外，石林县是以撒尼支系为主的彝族聚居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人文风情具有魅力，被誉为“歌舞之乡”“摔跤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阿诗玛为代表的彝族文化内涵丰富。石林彝族物质文化包含饮食、民族服饰、民居建筑、劳动工具等内容；非物质文化则包括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包含语言文学、宗教信仰、歌舞艺术等。其中非遗资源密集，拥有《阿诗玛》、撒尼大三弦舞、撒尼刺绣、彝族摔跤4项国家级非遗和120项各级非遗项目在当下，石林风景区内《阿诗玛》实景演出以及撒尼歌舞互动节目广受游客好评。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石林民族文化资源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格局特点，在全县范围内均有分布，相对集中于乡村聚落和特定节庆场所。

在石林县全域旅游发展中，体育运动资源是重要的产业融合要素，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一方面积极承办全国原野射箭公开赛、竞走锦标赛等专业化赛事，另一方面培育发展“摔跤之乡”、“斗牛之乡”等地方特色体育文化品牌。同时石林具有的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比如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可开展攀岩、徒步等现代户外运动项目。石林县的研学教育资源以世界地质遗产、民族文化和生态系统为基础，具有跨学科、多主题的特点。彝族撒尼人的语言文学、歌舞艺术、手工技艺、社会结构等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是文化研学的重要素材。石林喀斯特生态系统及其脆弱性特征，为开展生态教育、环境伦理教

^① 石林县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资料 <http://www.chinastoneforest.com/public/protal/zh-CHT/detail-124-33509.html>（2025年3月）

^② 石林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资料 <http://cms.shilin.com.cn/detail-80-33489.html>（2025年2月）

育提供了重要场所和环境教育的典型案例。石林的革命历史遗址、人物事迹和红色文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可与思想品德教育、历史教育相结合作为红色教育资源。石林研学教育资源还具有知识密集和价值延展的特点,可带动教育服务、教材开发、师资培训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持续性的经济收益。

石林县的旅游资源禀赋具有多元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特征,以世界自然遗产喀斯特地貌等自然要素为核心吸引力,整合彝族撒尼文化、红色历史资源等文化要素,以及节庆、活动等人造开发要素形成多产业融合的综合旅游目的地。但是在全域开发模式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与解决。

2. 石林全域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石林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与资源价值链延伸不足

在当前石林地区的旅游开发中,“大小石林”依然以喀斯特地貌核心资源构成绝对吸引力,景区为了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也进行了旅游开发的创新尝试,如在近两年与科技公司联手打造的夜游项目裸眼 3D 光影秀,引入喀斯特地质研学、民族村寨体验项目,并开发了石林冰雪海洋世界这类“飞地型”主题公园。在相对外围的乃古石林景区主打开发花海和季节性景观项目,长湖景区尝试打造露营、户外活动基地项目。但是,这些新开发的夜游、研学、露营等项目,并没有充分发挥对核心资源的配套支撑作用,也未能与“大小石林”有效衔接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最终使得游客仍局限于“石林就只是看石头”,未能通过配套项目有效延长停留时间、提升游客消费意愿,核心资源的辐射带动潜力未被充分释放。在旅游新业态融合方面,石林冰雪海洋世界作为“飞地型”项目,虽然带来了一定客流量,但其现代主题公园的属性与石林世界自然遗产的文化和自然基调存在明显的割裂感,不仅难以形成融合效应,反而显得有些突兀。景区在文化资源开发上,依然单一依赖“阿诗玛”这一 IP,表现形式也多为预设好的表演和雕像。游客难以接触到鲜活的撒尼人日常生活和文化,总体而言就是缺乏文化沉浸感。

2.2 石林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和空间资源配置失衡

长期以来,石林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与游客旺盛的旅游消费需求相比严重滞后,非团体以及乘坐公共交通的游客到达乃古石林、长湖、圭山等外围景区的极为不便,旅游专线与接驳服务的不足导致石林旅游开发在全域空间上的可进入性失衡,后果直接表现为:第一,外围景区发展受限,由于客源不足,住宿、餐饮、购物、民俗体验活动等配套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第二,核心景区承载压力过高,大量游客集中在核心区域,生态环境负荷增加,景区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成本加重,与此同时景区客流拥堵与游客等候时长过长的现象,游客的体验感与印象下降,影响满意度与二次游览。这与全域旅游要求“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等角度推进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的基本框架是不匹配的,造成旅游要素供给和使用的低效率。此外,缺乏针对游客的特色餐饮街区、精品酒店、民宿集群和夜间消费场所。绝大多数游客直奔核心景区,很少在县城停留,使得县城难以发挥全域旅游的综合服务中心功能。石林虽然与近年来游客需求相匹配的布局开发了数个民族村寨体验旅游项目,但各个民族村寨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科学的规划、品牌和营销,并且包括头部村落五棵樹村和糯黑村也存在资金投入分散、基础设施较为简单、文化挖掘不深等问题,也未能形成一条有吸引力的“石林撒尼文化风情带”乡村旅游线路。

2.3 石林品牌资产老化与资源经济价值转化低效

石林最宝贵的品牌资产是“阿诗玛”和“世界自然遗产”,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围绕着这两张景区名片开发了众多产业,为石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但是其在消费者心中已形成强烈的刻板印象,似乎石林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静态的观光地。如今,这种品牌形象在吸引受到上世纪《阿诗玛》电影影响的中老年游客首次观光上可能依然有效,但在争夺追求个性体验,并且是消费主力的年轻人及重复游客时,这种印象反而成为了一种心理障碍。虽然官方也在抖音、小红书等主流平台加大宣发的力度,但宣发的深度却不足,不少内容仅为将传统风光片在新平台进行播放,或是生硬地套用网红化模板,缺乏能够承载石林景区独特性、能引发游客情感共鸣与文化沉浸感的宣传内容与策略。此外,石林的品牌叙事没有将新开发的夜游、研学、村寨体验等零散项目,整合

进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线中,导致游客接收到的也是碎片化的信息,从而很难拼凑出一个丰满立体的新石林目的地形象,这对石林的新业态发展与品牌转型发展均是一大挑战。

2.4 石林保护要求与游客体验需求的矛盾

独特自然现象具有不可再生性与开发后果的不可逆性、不可替代的环境舒适性,被纳入经济决策框架时应充分考虑“存在价值”^[14]。石林生态与遗产保护工作是重中之重。2008年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昆明市石林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但是,长期以来这套严格的保护模式在守护石林的同时,也暴露出遗产地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普遍性矛盾。这种矛盾源于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内在逻辑,尚未与保护导向下的资源利用规则、以及当前游客消费需求与市场环境的变化形成有效适配。景区开发陷入两难困境。出于对喀斯特地貌的保护,游客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铺设的步行游览栈道上,客观上牺牲了游览的探索性与互动性。全域旅游是一种旅游目的地新形态新品牌,提供全过程体验产品,全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对于游客而言,全域旅游是一种新的目的地形态,是一种新的旅游生活方式^[13]。石林作为自然奇观,本应充满自然亲和力和生命力,但在体验上似乎变成了“露天地质博物馆”,游客与景观之间也难以建立情感上深度的交互。

2.5 石林在政策与市场协同下的资源配置效率不足

在当前的石林全域旅游开发利用中,面临政策统筹不足与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石林对于能够提升全域旅游品质的文化IP的深度开发、从业人员旅游技能的培训、全域性的数字服务平台建设、以及针对新兴业态的精准营销宣传等专项资金投入不足且分散。对于外围景点和新兴的乡村旅游业态,缺乏持续性的资本引入、土地配套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使得社会资本在评估风险与收益后投资意愿不高、意愿不强,导致全域旅游发展所需的资源在空间上配置失衡。石林在政策与市场的协同上衔接不够紧密,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存在滞后性和灵活性不足的问题,难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完善本身已制约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政府对资源分配的过度干预,进一步降低了配置效率,还造成了资源浪费。公开资料显示^①,石林风景名胜区旅游标准化管理领导小组自2011年成立后再未根据政策与市场需求进行调整与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石林地区尚未建立起一个能够引导资源跨区域、跨产业、跨主体高效流动的机制,全域旅游资源难以形成合力。

3. 资源经济视角下石林全域旅游发展的目标

资源经济学是关于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中经济因素和经济问题以及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兰德尔在《资源经济学:一种经济方法》中强调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独特经济属性,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前提是经济稀缺性^[11]。当一种资源不再是“免费的礼物”,而是需要权衡其不同用途的成本和收益时,它就成为了一个经济学问题。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许多过去看似无限的环境资源和自然服务都变得更为稀缺。全域旅游的发展依赖于区域内的资源禀赋,同时是对资源的非消耗性利用,通过将区域内资源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转化为旅游资源以获得经济价值,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3.1 石林需构建多元协同的旅游产品体系

当前石林旅游存在产品结构单一与文化资源转化不足的核心矛盾,应以资源价值链延伸为导向,供给端主动作为,在门票方面,推出景区“一票游多日”“一票全域旅游”“一票免交通”等优惠政策,降低游客出游成本,多部门、多村落协同打造民族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打造优化一系列适应消费者新情感、物质需求的产品。构建观光、研学、休闲三位一体的产品矩阵,逐步实现景区从依赖门票经济向综合收益的结构性转变。具体可建立喀斯特地貌研学基地,联合科研机构开发适应不同年龄段的研学课程。在传统村落布局活态文化体验区,将非遗技艺和音乐舞蹈转化为游客可深度参与的生产性保护项目。优化业态融合模式,将目前已开发的“旅游+康养”“旅游+农业”等跨界产品不断细化,改进宣传引流方式、优化游览线路、开发亲民新产品,并且将此类新业态产品纳入到滇中城市群旅游总体规划,利用好自然资源和 policy 资源优势,努力打造以康养度假、城乡旅居为特色的现

^①石林风景名胜区旅游标准化管理领导小组结构图资料 <http://cms.shilin.com.cn/detail-490-30571.html>

代旅游产业集聚区，力争成为国际一流康养度假区^①。通过打造多元协同的旅游产品体系，丰富优质文旅供给，也为市场注入新活力，形成景区多元收益格局。

3.2 石林需创新品牌营销模式

品牌形象固化与传播效能不足导致石林在年轻消费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减弱。因此石林需要完成从传统资源导向到价值导向的传播模式转型，通过构建数字化传播体系、创新宣传内容生产机制、完善营销效果评估机制三个方面实现品牌重塑。石林应系统打造“世界遗产+民族文化”的双IP内容传播体系，邀请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人士，参与短视频的创作与讲解。通过动画演示、实地拍摄等方式，深入浅出地介绍喀斯特地貌的形成过程、演化历史以及其中蕴含的地质科学原理，并注重挖掘石林地区彝族撒尼人的民族文化内涵，以阿诗玛传说为蓝本，创作一系列富有情感共鸣的短视频故事，并且可以利用互动式写作模式，建立话题写作激励机制，提升双IP内容的知名度和共鸣感；构建营销投入产出模型，实现传播效果的量化评估与动态优化，使得营销资源能够精准配置、传播效果可以持续提升。应对和解决游客提出的建议和评价是石林品牌营销水平提升的重要方面，针对众多游客反映的讲解不专业、乱收费、导览不清晰、服务态度差等总结的一个“乱”字，石林应科学培训重塑规范化讲解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并且在景区基础设施上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3.3 石林应优化全域旅游空间布局

全域旅游强调全域统筹，需要推动资源经济从点式开发转向全域协调发展。由此石林需要构建有序的交通廊道，科学合理规划线路，链接核心与外围景区的旅游空间体系，通过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强化县域服务功能、建立客流疏导机制、突出外围景区“旅游+”特色产业，实现石林空间布局优化。具体应规划建设环状旅游公路网络，开通高频次景区接驳专线；在县城优化布局旅游集散中心和特色消费街区，增强过夜接待能力；推行外围景区优惠票价机制，通过价格杠杆调节时空客流分布，提升全域空间利用效率。

3.4 石林应探索遗产保护与利用平衡机制

石林景区保护刚性约束与体验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亟需建立可持续的遗产利用模式。石林应创新分区管控加科技赋能的协同机制，通过景区容量精细计算、体验空间拓展、数字化技术应用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均衡。具体需进一步优化核心区预约准入制度，科学设定环境承载力阈值；在缓冲区开发生态友好型体验项目，将撒尼文化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打破传统游客的静态体验，加强社交属性，可以打造“撒尼非遗工坊”“撒尼人对歌”“撒尼文化剧本杀”等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产品和网络爆款；开发AR增强现实导览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延伸体验维度，实现遗产价值的创新性转化。

3.5 石林需完善政策市场协同的资源优化配置

政策资源配置失衡与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制约着石林全域旅游的整体效能。这需要石林以“目标引领、协同发力”为原则，通过改革破除传统的资源配置和协作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三大核心目标体系并依托关键路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第一，是建立以多元协同的治理架构为核心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的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石林县乡村三级联动，明确文旅、发改、自然资源、乡村振兴等多部门权责边界，从而在政策制定、项目审批、资源调配、利益分配全链条联合推进，提升治理效能；第二，是打造高效适配石林县情的资源配置模式，石林应充分考察本县近年各类资源状况，对可开发地区和产业精准施政、给予资金扶持，并通过高校研究和企业科学开发让村落资源、劳动力转化为旅游发展要素，兼顾资源价值转化和民生改善；第三，是构建多方共建共享的发展生态，石林应通过健全评价体系、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使社区居民持续受益、提升游客体验，最终形成“人人参与旅游、人人分享红利”的良性循环，增强石林全域旅游可持续性与包容性。

^①参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的意见
https://www.yn.gov.cn/zwgk/zfxgkpt/fdzdgnr/zcwj/zdkgwjyjf/202308/t20230825_284705.html

4. 资源经济视角下石林全域旅游的实现路径

4.1 构建智慧旅游生态系统，以科技驱动资源增值

未来石林全域旅游中，通过将数智化技术深度融入旅游资源管理，能够促进旅游体验提升与服务优化。当前，石林正构建“数字石林”新生态，政府与云数广电传媒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共建“数字+文化”融合的智慧景区生态，引入MR/AR互动体验与虚拟数字人等项目，沉浸式球幕影院项目《飞越石林》借助技术手段提升游客体验的科技感与互动性^①。进一步推进虚拟现实（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自然景观、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旅游产品，可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旅游体验附加值。同时，鼓励开发数字文旅IP与线上服务平台，打破物理时空限制，实现旅游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弹性配置。

4.2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整合区域旅游资源

石林全域旅游需要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的持续动力，通过建立多主体协同、多资源整合与多利益共享的新型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突破旅游发展中的行政壁垒与资源碎片化问题，从而提升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整体效能。

要施行新型治理机制，首先需明确各协同主体部门的权责。在县一级，应由县委牵头，统筹文旅、发改、自然资源、乡村振兴、财政、交通等部门，负责全域旅游规划编制、政策制定、资金统筹、跨区域协调及监管考核工作；在乡一级，应承担辖区内资源清查、项目对接、政策落地推进等职责，并协调村级单位与市场主体的项目合作对接工作；在村一级，应负责对本村土地、民宿、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进行梳理整合、收集村民意愿、进行有关矛盾调解及保障基础服务。其次应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每月召开县级协同治理推进研讨会，该会议由县委召集，各部门、乡级代表、市场主体代表、村集体负责人、科研机构专家参会，通报项目进展、协调解决审批卡点、旅游资源开发冲突等问题，并且在每季度开展现场办公会，权责部门直奔项目一线破解实际难题。此外应推行涉旅项目“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一站式服务制度，具体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全域旅游专项窗口，整合发改、自然资源、环保、文旅等部门审批事项，对于投资规模小、不涉及核心资源占用、生态环境影响可忽略的简单项目15个工作日内办结，复杂项目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批意见。通过以上措施将有效压缩石林推进全域旅游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涉旅营商环境，有效提升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利用能力。

4.3 完善政策引导与激励体系，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针对性、激励性与系统性的政策措施能够为石林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有助于有效引导旅游资源优化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促进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规模化提升。石林县已经有政策创新的尝试，2025年5月发布的《石林县2025年促进旅居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旅居者福利、产业扶持、服务优化等方面推出15条具体举措，为旅居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此外，石林县还出台了《石林县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围绕打造三百亿级文旅产业目标，明确2025-2027年的目标任务，将拓展城乡空间、盘活闲置资产、完善从业管理、摸清客群需求、丰富产品供给等6大重点任务细化分解，为产业发展提供长远规划。政策创新的综合效应目前已经初步显现。未来应该进一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

4.4 创新旅游价值实现路径，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模式创新是石林全域旅游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能够推动石林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型、“单一观光”向“全域体验”的升级、“景区旅游”向“旅居生活”延展，全方位提升石林旅游资源的经济附加值。石林可以通过设计“旅游+”与“+旅游”双向融合的产业生态机制，引导旅游与农业、文化、康养、体育等业态跨界联动，培育复合型旅游产品。构建覆盖不同场景、不同年龄段的旅居业态体系，推动旅游从观光消费向旅居生活转型。同时，进一步建立区域公共品牌培育与推广机制，通过统一标识、质量标准 and 营销宣传，提升“石林旅游”整体形象与附加值，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结构升级。

通过以政策创新为前提，机制创新为保障，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为抓手的协同实施链条，石林全域旅游有望

^① 参见“中国网”新闻：“丝路星秀·光影嘉年华”即将开幕 政企协同推进“数字石林”建设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union.china.com.cn/txt/2025-10/16/content_43251063.shtml

形成资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产业发达的良性发展格局。从资源经济视角看,这一综合性实现路径将有效促进石林旅游资源要素的合理化配置和旅游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升级,以及旅游经济效益的多元提升,为同类地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范式。

参考文献:

- [1] 资春花. 石林县文旅融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云南师范大学, 2023.
- [2] 林幼斌. 云南石林风景区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8, (04): 186-187.
- [3] 厉新建, 张凌云, 崔莉. 全域旅游: 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理念创新——以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2013, 28(03): 130-134.
- [4] 杨振之. 全域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J]. 旅游学刊, 2016, 31(12): 1-3.
- [5] 马波. 旅游场域的扩张: 边界与政策含义[J]. 旅游学刊, 2016, 31(09): 17-20.
- [6] 郭来喜, 吴必虎, 刘锋, 等. 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与类型评价[J]. 地理学报, 2000, (03): 294-301.
- [7] Ritchie J, Crouch G. The Competitive Destination: A Sustainable Tourism Perspective[M]. Wallingford, UK: CABI Publishing, 2003.
- [8] 胡晓莺. 提升云南石林旅游产业的对策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9] 谷树忠. 资源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与思维 [J]. 资源科学, 1998, (01): 18-24.
- [10] 成金华, 吴巧生. 资源经济学的优势及课程建设 [J]. 资源·产业, 2001, (07): 43-44.
- [11] 兰德尔. 资源经济学[M]. 施以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12] 查爱苹, 邱洁威. 国外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研究述评[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 (02): 183-190.
- [13] 石培华. 如何认识与理解“全域旅游” [J]. 西部大开发, 2016, (11): 102-104.
- [14] Krutilla J V. Conservation Reconsidere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4): 777-786.

Research on the Ob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in the Stone Forest from a Resource Economics Perspective

Guo Jiale, Zhou Yingxiang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economic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objective system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comprehensiv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Shilin County. With the Karst World Natural Heritage as its core, Shilin integrates ethnic cultural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the Yi Sani culture, and diverse ec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s. However,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faces five core challenges: a singular product structure, imbalanced spatial development, an aging brand image, conflicts betwee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experiential demands, and insufficient synergy between policy and market forc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guided by the logic of resource economic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for Shilin's comprehensive tourism should encompass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and synergistic product system integrating sightseeing, research-based learning, and leisure; optimizing the overall spatial layout; innovating a dual-IP communication model center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and ethnic culture to reshape the brand image; establishing a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mechanism featuring zoning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policy and market.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a four-pronged implementation pathway encompassing technology, mechanisms, policies, and models is proposed. This pathway involves mobilizing resources through smart tourism platforms, innovating benefit-sharing models, overcoming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resources, and deepen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build the br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hilin's all-for-one tourism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resource-dependent" type to an "industry-driven" type. Its experience can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imilar resource-based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in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prehensive tourism; resource economics; Shilin Yi Autonomous County;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隋华峰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一公司, 湖北 潜江 433121)

摘要: 本文探讨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内在关系, 揭示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加强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企业凝聚力、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以及将企业文化与战略目标结合等方面的具体作用。研究表明,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提升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还能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推动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和一致性。本文为进一步深化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结合, 提出了相关的实践建议。

关键词: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国有企业; 企业文化; 核心价值观; 凝聚力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5

一、引言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国有企业不仅涉及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性行业, 还在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占有重要份额。然而,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及全球化的推进, 国有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包括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管理创新的迫切需要等^[1]。与此同时, 国家深化改革、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推进, 也使得如何推动国有企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与升级, 成为了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在国有企业中的核心工作之一, 旨在通过党组织的领导, 促进企业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在新时代,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还要发挥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2]。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能够加强员工的政治觉悟, 增强集体主义精神, 并引导企业持续向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发展。通过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能够提高党组织的领导力, 使其在企业管理和文化塑造中发挥出积极的推动作用^[3]。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 它凝聚了企业的价值观、使命、愿景和核心精神, 是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塑造企业独特的品牌形象, 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加剧的今天, 企业文化成为了企业与外部市场竞争的“无形资产”。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如何在现代化管理中不断创新企业文化, 已成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本论文旨在探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推动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 分析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形成、传承与创新中的具体作用与机制。

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

2.1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概念及发展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指在党的领导下, 运用思想政治理论、政策和组织手段, 通过党组织的力量, 加强对企业、组织或社会成员思想、行为和价值观的引导与教育, 从而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个层面得以贯彻和

作者简介: 隋华峰 (1998—), 男, 学士, 助理政工师。

通讯作者: 隋华峰

落实。这项工作不仅关注思想层面的引导，也涉及到政治层面的领导、社会行为层面的规范以及文化层面的塑造。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良好职业素养和高度责任感的员工，推动企业或组织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6]。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也在实践中逐步演进。如表 1 所示，其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时期（1921-1949 年），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以党的基本理论和革命斗争的目标为指导，主要任务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及士兵中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提升革命队伍的战斗力。此时期的党建工作主要聚焦于解决政治思想问题。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78 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集中在党政领导与企业组织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这一时期，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侧重于加强对国家建设的思想引导，培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性，尤其在新社会体制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1978-2000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逐渐从单一的政治思想教育转变为多维度的综合管理，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觉悟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结合。通过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建工作在现代化管理中日益重要。

第四阶段是现代化建设与新时代阶段（2000 年至今），在新时代，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注重创新与转型，强调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特别是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结合，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党的领导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及文化建设的互动。

表 1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发展阶段的简要对比

发展阶段	时间范围	主要特点	主要任务
革命战争时期	1921-1949 年	强调思想引导和政治觉悟	增强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	1949-1978 年	聚焦意识形态统一与国家建设思想引领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教育
改革开放时期	1978-2000 年	转型为综合管理，经济建设与思想工作结合	党组织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新时代阶段	2000 年至今	创新与转型，党建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	党建引领社会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

2.2 企业文化的内涵与构成

企业文化是指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并逐渐稳定下来的企业精神、价值观、行为规范、管理理念等，它代表着一个企业的独特特征，是企业内部成员共享的信仰、价值、习惯和文化表达。企业文化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员工行为以及企业的对外形象，它不仅是企业的重要竞争力之一，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企业文化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行为规范，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企业的核心理念和经营哲学。它包含了员工的思维方式、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外部客户对企业的认知和感受^[2]。企业文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企业内部，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企业的外部形象和市场竞争能力。

企业文化的构成一般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体现了企业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信仰和原则，决定了企业的行为规范和决策标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为所有管理活动提供了方向和动力。其次是企业的使命与愿景，它们表明了企业的存在目的和发展方向。企业的使命代表了企业存在的价值，愿景则是企业未来发展的蓝图。一个清晰的使命和愿景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方向，使得全体员工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5]。

此外，企业的行为规范与管理理念是企业文化中实际操作的部分，它涉及到员工的行为准则、公司内部

管理体制、工作流程以及如何对待客户等方面。管理理念往往是企业文化得以实际执行的体现，反映了企业对待员工、客户及社会的态度。企业的组织氛围与工作环境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员工之间的互动、公司领导的管理方式以及企业对员工的关怀等方面。良好的企业氛围能够促进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最后，企业的品牌文化与社会责任感与企业文化紧密相关，它指的是企业通过品牌传播所体现出的独特文化特征[4]。品牌文化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结合，企业越来越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将企业文化建设与社会责任感紧密结合。企业文化的构成如表 2 所示。

表 2 企业文化的构成

组成部分	内容描述
核心价值观	企业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信仰和原则，体现企业行为规范和决策标准。
使命与愿景	企业的存在目的和未来发展方向，指引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行为规范与管理理念	企业对员工行为的要求、管理体制及工作流程，体现企业如何实际运作和对待外部。
组织氛围与工作环境	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互动、企业管理风格以及员工福利等，形成企业文化的氛围。
品牌文化与社会责任感	企业通过品牌传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

三、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分析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国有企业中不仅是党组织履行政治责任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落实者，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建设、规范员工行为、增强凝聚力等多方面的工作，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形成、创新与深化（见表 3）。

3.1 提升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灵魂，是指导企业行为、决策和发展的根本准则。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如党课、座谈会、理论宣讲等，向员工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诚信与责任等精神。这些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企业文化的基础，而且为员工的日常行为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3]。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还能够通过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这些教育和引导，员工能够更好地理解企业的价值观，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

3.2 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with 意识形态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能够强化员工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提升其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在国有企业中，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关注员工的政治思想，还通过广泛的教育活动，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企业文化观念。

此外，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还通过强化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不仅体现在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上，还体现在如何通过企业文化引导员工的行为和决策。党组织通过组织员工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企业文化的相关内容，推动企业文化的深入发展。

3.3 促进企业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不仅仅是理念和价值观的塑造，更需要在员工中形成高度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

感，进而推动企业文化的深入落实。

党组织通过党支部、团委等组织形式，定期开展集体活动、文体活动和志愿服务等，不仅增进了员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提升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这些活动中，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组织和引导，使员工对企业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同^[4]，强化了企业文化在员工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力。

此外，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还通过树立榜样作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员工中树立正确的行为典范。通过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党员在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党员们通过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带动其他员工向他们学习^[5]，从而在全体员工中形成正向的企业文化氛围。

3.4 推动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关注现有企业文化的传承，还积极推动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企业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党组织通过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企业在理念、管理方式、工作作风等方面实现创新。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定期组织干部培训、企业文化讨论会等方式，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中来。党组织还通过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创新企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通过这种创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提升了企业文化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还推动了企业文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持续发展。例如，在现代企业中，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通过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结合，推动企业文化的创新传播。通过建立企业文化的数字化平台、社交媒体等途径，党组织可以更便捷地将企业文化传递给员工，使其更加具有时代感和吸引力，提升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3.5 推动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的结合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将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在国有企业中，党建工作往往承担着对企业战略方向的引导作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企业明确发展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并通过文化引导员工共同向着这些目标努力。

表 3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总结

作用方向	具体表现
提升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通过党组织开展学习活动，向员工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企业价值观，增强行为规范。
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引导	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员工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企业文化观念和行为规范。
促进企业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通过党组织活动增进员工交流与合作，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增强企业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
推动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	党组织推动企业文化的创新，通过组织讨论、培训等形式，鼓励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推动文化适应时代需求。
推动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结合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企业明确战略目标，确保企业文化与战略目标一致，增强员工对企业战略的认同与执行力。

党组织通过强化对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确保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能够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推动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追求卓越，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理解企业的战略目标，并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提升企业的执行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结论

本论文通过探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是推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党组织的引领，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帮助企业形成明确的核心价值观，提升员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促进了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还有效地推动了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使企业文化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其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在加强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组织通过深入的理论教育、组织活动和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强化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使其不仅理解企业文化的内容，还能够将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得到了增强。再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组织形式和活动的多样化，增强了企业的内在凝聚力。党组织在促进员工交流、提高团队协作精神、强化集体主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企业文化在员工心中的渗透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最后，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了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的紧密结合，确保了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通过党组织对战略目标的明确引导和对员工的文化教育，企业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文化上的统一性和创新性。

总体而言，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对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企业文化得以创新和传承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持续推动其与企业文化的融合，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 [1]邹潇潇.党建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J].现代企业,2020,(12):128-129.
- [2]吕梦迪.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赋能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J].现代企业文化,2025,(14):26-28.
- [3]张志凯.如何提升煤矿企业党建工作水平[J].现代企业文化,2024,(28):118-120.
- [4]姜绘.企业党建与文化建设协同发展的有效策略探讨[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13):184+186.
- [5]甘露.发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助力国有企业文化建设[J].南方企业家,2018,(03):190+192.
- [6]傅林旺.探析党建工作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J].四川水泥,2020,(04):283.

The Role of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Work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ui Huafeng

(No. 1 Drilling Company, Sinopec Oilfield Service Jiangnan Company, Qianjiang, Hubei 43312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work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analyz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building and enterprise culture, the paper reveals the specific roles that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work play in shaping the core values of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employe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ing corporate cohesion, promoting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ligning enterprise culture with strategic goa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work are not only key factors in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orporate culture but also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y help enterprises maintain the innov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their culture while undergoing rapid development. The paper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work with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and political work;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 culture; core values; cohesion; cultural innovation

贸易便利化视角下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的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

马思雨·马存军¹ 李婉瑶¹ 姚宇冉¹ 宋科娟¹ 张雅洁²

(1.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2.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RCEP生效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合作潜力持续释放。2020年中国对东盟中药出口额达11.355亿美元,2018年东盟已占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药出口量的54%,成为中药国际化的核心市场。但贸易便利化水平不足成为制约合作深化的关键瓶颈。本文基于贸易便利化核心维度(海关与边境管理、基础保障与物流运输、金融与电子商务、政府管理与监管规制),结合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的现实实践,系统分析当前贸易发展中面临的通关效率、物流配套、标准衔接、文化认知等困境,进而提出针对性突破路径,为推动中国-东盟中药贸易高质量发展、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中国-东盟;中药贸易;发展困境;突破路径

基金项目:哈尔滨金融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的交响:中医药发展的多维透视与创新路径探析——基于多源数据的实证研究”(G20251024506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2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中医药作为中国特色优势产业,不仅是“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载体,更是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的双重纽带,在“一带一路”与RCEP框架下具有显著战略意义。中国与东盟在中药贸易领域具备坚实合作基础,东盟多国常年位列中国中药材及饮片、保健品、植物提取物前十大出口市场,双方在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上形成天然互补。2010-2020年中国对东盟中药出口额从4.276亿美元增长至11.35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0.26%,展现出强劲韧性。

贸易便利化作为降低贸易成本、提升流通效率的关键抓手,直接影响中药贸易的发展质量。中药产品对运输、贮存条件要求严苛,而东盟部分国家存在物流设施薄弱、海关程序繁琐等问题,导致贸易摩擦成本增加。RCEP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为中药贸易搭建了更开放的合作平台,但贸易便利化水平不足仍成为制约合作深化的核心障碍,亟需通过系统性举措破解发展梗阻。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围绕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的核心议题,采用多元学术方法展开系统探讨,形成了针对性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围绕中医药对外贸易的发展机制,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计量方法展开系统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学界一方面通过战略分析工具从宏观层面梳理中医药产业的比较优势与外部发展环境,揭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潜在机遇与现实约束;另一方面,广泛引入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医药贸易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拓展型贸易引力模型通过纳入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变量,用以测算中医药产品的出口潜力;面板数据回归、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则被用于构建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并验证通关效率、物流条件及制度环境对贸易绩效的影响机制。此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被用于刻画中医药贸易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而工具变量等计量技术的引入,有助于

作者简介:马思雨·马存军(2005—),女,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李婉瑶(2005—),女,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姚宇冉(2004—),女,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宋科娟(2004—),女,哈尔滨金融学院本科在读;

张雅洁(2005—),女,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本科在读。

通讯作者:马思雨·马存军

缓解内生性问题、提高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总体来看,多种方法的交叉运用为中医药贸易问题的系统分析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在研究结论方面,相关文献逐步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其一,贸易便利化被普遍视为推动中医药出口增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通关管理优化、物流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的推进,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贸易效率。其二,中医药贸易呈现出优势与约束并存的特征:一方面,中医药在慢性病防治与整体调理方面具有独特疗效和资源禀赋优势;另一方面,质量标准不统一、信息管理与国际认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对其国际化进程形成制约。此外,多项研究指出,地理距离与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医药贸易的发展。其三,在优化路径层面,现有研究强调应通过强化贸易网络联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质量控制与标准体系,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医药传承,推动中医药贸易实现协同化与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发展现状及贸易便利化基础

2.1 贸易发展现状

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规模持续增长且结构特征鲜明,出口产品以中药材及饮片、植物提取物为主,两类产品出口额占比年均达 80% 以上,2020 年贸易额突破 11 亿美元,较 2010 年增长 165.6%,其中植物提取物出口增速最快,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核心动力。从市场分布来看,贸易伙伴呈现集中化与差异化特征,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为核心贸易伙伴,常年占据中国中药出口前十大市场。

新加坡凭借贸易便利化优势成为区域中转枢纽,马来西亚、泰国依托人口基数与市场需求形成稳定消费群体,而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贸易规模较小但增长潜力显著。RCEP 生效后,区域内关税减免覆盖 90%-95% 税目产品,中国对东盟部分中药产品关税逐步降至零,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降低了中药产品原产地认定门槛,为产业链整合与贸易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贸易格局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2.2 贸易便利化发展基础

在海关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开展“单一窗口”试点,推进通关流程简化与信息共享,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已实现部分中药产品“无纸化”通关,通关效率显著提升。物流与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中老铁路、中越铁路等交通干线为中药运输提供支撑,部分国家仓储配套设施升级,为中药保鲜存储创造了基础条件。

政策与机制保障不断强化,中国与东盟签订多项中医药合作备忘录,《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 年)》等政策文件,为双边中药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基础,推动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三、贸易便利化视角下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的核心困境

3.1 海关边境管理梗阻

海关与边境管理层面的梗阻成为制约贸易效率的首要因素。东盟各国药品监管规则差异显著,检测方法与指标不统一,部分国家对中药的重金属、农药残留检测标准严于国际标准,如马来西亚对含重金属的中药材实施严格管控,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同时,部分国家存在非常规支付、通关时间长等问题,越南、菲律宾等国海关程序繁琐,中药产品平均通关时间较普通货物长 30% 以上,信息透明度不足导致企业难以提前预判通关风险。

此外,RCEP 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衔接不畅,中药产品多为复方或加工制品,成分来源复杂,原产地认定难度大,企业对规则理解与应用能力不足,未能充分享受关税优惠,进一步加剧了通关环节的贸易成本。

3.2 物流基础设施短板

基础保障与物流运输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贸易阻碍。老挝、柬埔寨等国家港口、铁路设施薄弱,跨境运输效率低,物流配套能力难以满足中药产品对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的要求。中药专属物流体系缺失,温湿度控制、保鲜技术不足,易导致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变色、霉烂等变质现象,影响中药疗效与贸易质量。

物流信息共享不足,货物追踪与查询机制不健全,运输时效性难以保障,增加了贸易风险与运营成本。这种物流配套的不均衡性与专属服务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双边贸易的规模化发展,成为中药贸易拓展的重要瓶颈。

3.3 金融电商支撑不足

金融与电子商务层面的支撑不足限制了贸易活力的释放。部分东盟国家金融基础设施薄弱，跨境支付与融资服务便利化水平低，中小中药企业面临融资难、支付结算成本高的问题，制约了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电子商务应用深度不足，缺乏专业化的中药贸易线上平台，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难以满足企业数字化贸易的发展需求。

金融服务覆盖不均衡，部分国家金融服务可及性差，进一步加剧了中小微企业的贸易融资困境。这种支撑体系的不完善与服务覆盖的不足，抑制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影响了中药贸易的整体发展动能。

3.4 监管标准衔接不畅

政府管理与监管规制的不协调成为贸易深化的制度障碍。中药质量标准与国际衔接不足，部分国家不认可中国中药标准，注册门槛高，导致许多优势中药产品难以进入当地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中药配方、技术专利侵权风险较高，维权成本高，挫伤了企业创新与贸易积极性。

政策透明度与协同性不足，各国贸易政策调整频繁，缺乏统一的沟通机制，企业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增加了贸易的不确定性与合规成本。标准体系的不统一与政策协同的缺失，成为制约中药贸易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制度障碍。

3.5 文化认知壁垒制约

文化与认知层面的差异进一步制约市场拓展。东盟部分国家对中药疗效、理论认知存在偏差，中医药文化传播不足，未能形成广泛的市场认同。语言与专业人才匮乏，小语种翻译人才短缺，跨文化沟通障碍突出，影响了产品推广与贸易合作的深度开展。

在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背景下，当地消费习惯与医疗理念差异较大，中药市场接受度有待提升。文化认知的偏差与专业人才的短板，共同构成了中药贸易拓展的非制度性障碍，需要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逐步破解。

四、贸易便利化视角下中国与东盟中药贸易的突破路径

4.1 优化海关边境管理

优化海关与边境管理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核心抓手。中国与东盟应进一步推进海关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区域海关政务公开系统与联合监管机制，推广“单一窗口”“无纸化”通关模式，提高海关操作的透明度与效率。针对中药产品特性，协商制定专属检测规范，统一检验检疫标准与流程，减少因标准差异导致的贸易摩擦。

深化原产地规则应用，简化认定流程，开展企业规则培训，推广自我认证系统，帮助企业充分利用 RCEP 区域累积规则，降低原产地认定门槛，最大化享受关税优惠，从通关环节破解贸易效率瓶颈。

4.2 完善物流基础设施

完善物流与基础设施建设是破解贸易物流瓶颈的关键举措。中国与东盟应加强跨境物流基础设施合作，共建港口、铁路通道，改善老挝、柬埔寨等薄弱地区的物流配套，构建覆盖区域的物流运输网络。针对中药产品对运输条件的特殊要求，打造专项物流服务体系，研发专业保鲜运输设备，建立全程溯源与温湿度监控机制，保障产品运输质量。

搭建区域物流信息平台，实现货物追踪、运力调配、需求对接一体化，提升物流信息共享水平与运输时效性，降低物流成本与贸易风险，为中药贸易提供稳定的物流保障。

4.3 强化金融电商支撑

强化金融与电商支撑为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应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推广联合支付系统，设立中药贸易专项融资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针对性融资支持，降低融资门槛与结算成本。搭建专业化中药贸易电商平台，整合供需信息，开展线上展示、洽谈与交易，实现“无纸化”通关对接，拓宽贸易合作渠道。

推进数字贸易便利化，简化电子单据审核流程，构建安全高效的跨境电商监管体系，助力企业拓展数字化贸易新模式，通过金融与电商的协同发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4.4 健全监管标准体系

健全监管与标准体系是夯实贸易制度基础的重要保障。中国应主导或参与区域中药质量标准制定,推进标准国际化衔接,互认检测结果,提高中药产品的国际认可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建立跨境维权机制,打击侵权行为,完善中药专利保护规则,保障企业创新成果。

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协同性,建立常态化政策沟通机制,及时通报规则调整,签订专项贸易协定,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与制度保障,通过规则协同破解贸易制度障碍。

4.5 深化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

深化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是破解认知壁垒的长远之策。应依托海外中医药中心、学术交流、新媒体平台等多元载体,推广中医养生理念与疗效案例,增进东盟国家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开展“以医带药”合作,共建中医诊所、诊疗中心,通过临床实践强化中药疗效认可,带动产品贸易发展。

联合培养复合型人才,聚焦中药贸易、小语种翻译、跨文化沟通能力,建立校企合作培养机制,为贸易合作提供人才支撑,破解跨文化沟通障碍,从文化与人才层面为中药贸易拓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谭清立,伍绮敏.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及优化策略——基于SWOT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23,40(01):18-21.DOI:10.14055/j.cnki.33-1056/f.2023.01.002.
- [2] 程云洁,龚桂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药材贸易网络关系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J].新疆财经,2024,(01):68-80.DOI:10.16716/j.cnki.65-1030/f.2024.01.007.
- [3] 左媛媛,孙永林,赵少钦,等.中医药海外中心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创新与实践[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01):1-6.DOI:10.20060/j.cnki.ISSN1009-3222.2024.0001.
- [4] 谭备战,荆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融入东南亚发展的困境与应对路径——以马来西亚为例[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02):99-103.DOI:10.20060/j.cnki.ISSN1009-3222.2024.0099.
- [5] 赵红霞,郑宗媛,匡国静.RCEP背景下我国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研究——以医疗器械产品为例[J].中国商论,2025,34(08):60-64.DOI:10.19699/j.cnki.issn2096-0298.2025.08.060.
- [6] 丁春玲.RCEP背景下我国药品出口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1,(17):94-96.
- [7] 张季风.RCEP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机遇、挑战与趋势[J].东北亚论坛,2021,30(04):69-81+127-128.DOI:10.13654/j.cnki.naf.2021.04.005.
- [8] 付秀梅,陈睿姝.“双循环”背景下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中药出口贸易影响[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75-88.DOI:10.16497/j.cnki.1672-335X.202202007.
- [9] 舒燕.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药出口贸易格局的演变和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21,40(11):68-72.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Pathway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 Trade Facilitation Perspective

Ma Siyu · Ma Cunjun¹, Li Wanyao¹, Yao Yuran¹, Song Kejuan¹, Zhang Yajie²

(¹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²Pujiang Colleg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he potential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has been continuously unleashed. In 2020, China's TCM exports to ASEAN reached 1.1355 billion US dollars, and as early as 2018, ASEAN accounted for 54% of China's TCM exports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merging as a core market for TCM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the inadequat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bottleneck hindering the deepening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core dimensions of trade facilitation—including customs and border management, basic support and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finance and e-commerce,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dilemmas in TCM trade development, such as inefficient customs clearance, inadequate logistics support, disconnected standards, and cultural cognitive barriers, by integrating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China-ASEAN TCM trade. Furthermore, targeted breakthrough pathway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TCM trade and deepening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Keywords: Trade Facilitation; China-ASE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rade; Development Dilemmas; Breakthrough Pathways

生猪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黄小莞 熊怡萱 孙佳怡 沈洋洋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生猪产业是中国农业重要支柱产业, 重大动物疫病频发威胁产业安全与公共卫生, 养殖场户的疫情报告行为直接影响防控效果。本研究基于四川省6市6县(区)28乡(镇)500份养殖场户调查数据, 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 从个体、生产、认知、环境4类15个变量探究其对养殖场户报告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 养殖场户整体上报意愿较高, 但存在迟报、瞒报现象; 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变量显著提升上报意愿, 养殖经验等变量则显著抑制该意愿, 防疫效果认知正向作用显著;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养殖收入对上报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 且稳健性检验与基准模型结论一致。研究指出, 提升防疫认知、完善补偿激励、优化上报机制、强化差异化政策支持, 是提高重大动物疫病报告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 生猪养殖场户; 重大动物疫病; 报告意愿; Logistic回归; 四川省

基金项目: 四川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嵌入性视角下生猪养殖户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为的动态决策研究”(项目编号: S2025106261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6

一、引言

生猪产业作为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保障肉类供给、稳定市场价格与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与“菜篮子”工程深入推进, 猪肉作为城乡居民膳食结构中的核心品类, 其供应的稳定性直接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的和谐稳定。2024年, 全国猪肉产量约占肉类总产量的60%, 人均消费量占四大肉类的57.9%, 反映出其在肉类消费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然而, 近年来重大动物疫病频发, 严重威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非洲猪瘟(ASF)为例, 截至2021年7月, 我国已确诊非洲猪瘟病例192起, 约120万头生猪被扑杀, 对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1000亿元人民币, 间接影响波及屠宰、流通、消费等产业链环节^[1-2]。ASF还推高了猪肉价格, 何雯霞等^[3]研究表明, 非洲猪瘟爆发15个月, 生猪价格和猪肉零售价净增长率分别达到266%和184%, 对食品价格稳定和居民生活成本造成显著压力。此外, 动物疫病不仅导致直接经济损失, 还可能通过人畜共患病威胁公共卫生安全。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资料表明, 1415种人类疾病中, 有61%属于人畜共患病, 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 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4]。ASF对猪的致死率接近100%, 但目前却缺乏针对性的有效疫苗, 防控仍主要依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及时的疫情报告^[5-6]。因此, 系统构建高效的生猪重大疫病防控体系, 已成为提升我国生猪产业韧性、保障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

疫病报告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系统工作的基础性环节。而重大动物疫病具有高传染性和快速传播特性, 一旦失控, 可能引发供应链中断、市场波动及公共卫生危机, 因此做好及时的疫情报告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也明确要求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发现动物染疫或疑似染疫时, 须立即向农业行政部门报告。然而, 实际政策执行中却存在养殖户报告意愿不足的问题, 当疫情发生时, 部分养

作者简介: 黄小莞(2003—),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熊怡萱(2006—),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孙佳怡(2005—),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沈洋洋(2000—), 女,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管理。

通讯作者: 黄小莞

殖场户可能存在侥幸心理,选择隐瞒疫情^[7]。闫振宇等^[8]研究发现,部分养殖户因经济利益驱动而隐瞒疫情,导致疫情扩散范围扩大,防控难度增加。刘玮和李艳玲^[9]分析表明,养殖户因担忧扑杀带来的经济损失或对补贴政策信任不足,常选择隐瞒疫情,削弱防控体系的响应效率。因此,养殖场户作为生猪养殖和疫病防控的第一线,其报告行为和防控措施的执行效果对防控体系的成效起着决定性作用^[10]。

国内学术界对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宏微观分析框架。宏观层面,研究多聚焦于动物溯源管理^[11-12]、疫病防控政策设计^[13]、官方兽医体系规范化^[14]、应急机制优化^[15]以及防控策略的经济效益评估^[16],为制度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支撑;微观层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养殖户的防疫行为作用机理^[17]、疫病对产业和经济的影响^[18]、防控措施采纳行为^[19]及补偿政策效果^[1]。尽管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养殖户行为,但对疫情主动报告行为仍关注较少,相关实证研究也较为有限,尤其在报告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群体差异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及时报告疫情对阻断疫病扩散、降低公共卫生风险的重大意义本研究以养殖户疫情报告行为为切入点,运用四川省6个县(区)28个乡(镇)的入户调查资料,以生猪养殖场户为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分析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完善我国生猪疫病防控政策、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

生猪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行为,本质上是养殖主体在自身条件、外部环境和风险考量下做出的选择,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本文结合COM-B模型、计划行为理论(TPB)与前景理论,从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内在决策逻辑和风险权衡角度,梳理养殖户重大疫病报告意愿的形成机理,三类理论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能更全面地解释这一复杂行为。COM-B模型核心是“能力-机会-动机”的相互作用^[20],刚好对应养殖主体报告时“能不能报、有没有条件报、想不想报”的实际问题;计划行为理论聚焦“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的传导过程^[21],契合养殖户从认知疫情上报价值到最终决定是否上报的心理路径;前景理论则关注不确定性下的风险决策^[22],能很好地解释养殖户在“上报可能面临的损失与收益”之间的权衡逻辑。

从行为发生的基础来看,养殖场户能不能主动报告疫情,首先得有相应的能力,再加上外部提供的机会,最后还要有内在的动机。能力方面,年龄大的养殖户通常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对疫病风险的敏感度和上报流程的熟悉度更高;受教育程度高一些的养殖户,理解政策要求、解读疫情信息的能力更强^[23],这些都为上报行为奠定基础。另外,参加过专业培训、养殖经验丰富的养殖户,识别疫情的准确性和上报操作的熟练度会更有保障^[24],理论上也更具备主动报告的条件。机会方面,愿意在防疫上多投入费用的养殖户,本身就对疫病防控比较重视,自然更倾向于通过正规上报渠道获取专业支持;和专家交流多的养殖户,能得到更精准的技术指导,减少上报后的顾虑;政府防控力度越严,相关的制度保障和流程支持越完善,养殖户上报时的阻碍也会少些;而合理的扑杀补助政策,能减轻养殖户上报后可能面临的经济损失^[1]。动机则是主动上报的核心,只有养殖户真正明白上报疫情对阻断疫病扩散、减少自身和行业损失的重要性,才会有主动上报的意愿;同时,不同养殖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养殖户,通常更愿意通过规范上报来规避后续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

再看决策过程和风险权衡,养殖户最终是否愿意上报,还要经过内心的综合考量。按照计划行为理论的逻辑,养殖户对上报疫情的看法很关键,如果觉得上报有价值、能带来好处,就会形成积极的态度;而政府的政策要求、行业内其他养殖户的普遍做法,以及专家的建议,会形成一种无形的规范,让养殖户觉得“应该上报”;如果养殖户自身能力足够,外部条件也支持,就会觉得“上报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这种掌控感会进一步强化上报的想法。从前景理论来看,养殖户做决定时,通常会以“保住现有养殖收益”为底线,衡量上报和瞒报的利弊。大多数情况下,养殖户会更在意可能出现的损失,如瞒报被查处后的处罚、疫情扩散后的更大损失,这些损失带来的感受往往比瞒报可能获得的短期收益更强烈。而养殖规模大小、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过往的养殖经历等,都会影响养殖户对“损失和收益”的判断标准——比如养殖规模大、收入占比高的养殖户,通常更怕疫情扩散带来的毁灭性损失,上报的意愿可能更强;而养殖经验多的养殖户,可能会根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判断风险大小^[25],进而调整上报的选择。此外,外部条件也会影响这种权衡,比如补助政策是否到位、政府防控是否给力,都会改变养殖户对“上报划算与否”的判断。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生猪养殖业是我国畜牧业的核心，其养殖户对重大动物疫病的报告行为是反映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报告实际情况的重要参考依据。四川省作为我国生猪生产的核心区，2023 年生猪出栏量达 6662.7 万头，居全国首位，猪肉产量 697.1 万吨，位列全国第二，产业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同时，四川地貌多样，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涵盖从欠发达西部到相对发达东部的多样化样本，为研究提供了代表性场域。因此，本研究以四川省生猪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重大动物疫病报告意愿及影响因素。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3 年 7 月至 8 月在四川省开展的实地调研。调研区域涵盖乐山市井研县、泸州市叙永县、宜宾市南溪区、广元市昭化区、巴中市巴州区、绵阳市盐亭县等 6 个县（区），涉及 28 个乡镇）。本次调研共获得样本 519 份，经数据清洗与有效性校验后，最终确定有效问卷 500 份，有效率为 96.33%。样本分布见表 1 和表 2。

表 1 样本生猪养殖场户基本情况

变量	类别	样本量	比例/%
性别	男	417	83.40
	女	83	16.6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9	27.80
	初中	217	43.40
	高中/中专	89	17.80
	大专及以上	55	11.00
	45 岁以下	108	21.60
年龄	45-49 岁	91	18.20
	49-52 岁	92	18.40
	52-57 岁	118	23.60
	57 岁以上	91	18.20
	30%及以下	86	17.20
养殖收入占比	30%-70%	167	33.40
	70%-100%	247	49.40
	50 头以下	151	30.20
养殖规模	50-200 头	188	37.60
	200-800 头	75	15.00
	800-1999 头	27	5.40
	2000 头以上	59	11.80
	0 次	65	13.00
上一年政府对养殖场检查次数	1~3 次	229	45.80
	4~10 次	159	31.80
	10 次以上	47	9.40
政府对重大疫病监督管理程度	非常严厉	172	34.40
	较严厉	225	45.00
	一般	82	16.40
	较松	15	3.00
	很松	6	1.20

表 1 显示了生猪养殖户样本的基本特征情况。其中，受访养殖户以男性为主，占样本总量的 83.40%，女性

占 16.60%；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养殖户占 27.80%，初中学历的占 43.40%，高中/中专学历的占 17.80%，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 11.00%；年龄结构偏向中老年，45 岁及以上养殖户占比 78.40%，其中 45-49 岁的占 18.20%，52-57 岁的占 23.60%，57 岁以上的占 18.20%；生猪养殖是样本养殖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70%及以上的养殖户占 49.40%，30%-70%的占 33.40%，30%及以下的占 17.20%；养殖规模以中小型为主，82.80%的养殖户年出栏量在 800 头以下，其中 50 头以下的占 30.20%，50-200 头的占 37.60%，200-800 头的占 15.00%，800-1999 头的占 5.40%，2000 头以上的占 11.80%；在政府监管方面，86.00%的养殖户上一年度接受过至少一次检查，其中 1-3 次的占 45.80%，4-10 次的占 31.80%，10 次以上的占 9.40%；79.40%的养殖户认为政府对重大疫病的监管“非常严厉”或“较严厉”，其中非常严厉的占 34.40%，较严厉的占 45.00%，认为一般的占 16.40%，较松的占 3.00%，很松的占 1.20%。总体来看，样本特征与四川省生猪养殖现状相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2 样本生猪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情况统计分析

特征名称	特征描述	样本量	占总体样本比重/%
是否上报	是	345	69.00
	否	155	31.00
报告的时效	立即上报	294	58.80
	根据病情发展势态	186	37.20
	3 天及以上	5	1.00
	迫不得已	15	3.00
本场是否有村防疫员对接	是	462	92.40
	否	38	8.60
向谁及时报告	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355	71.00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41	8.20
	村防疫员	70	14.00
	乡镇或村社	34	6.80

表 2 显示了样本生猪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情况。其中，在是否上报方面，是的有 345 个，占 69.00%，否的有 155 个，占 31.00%；报告的时效方面，立即上报的有 294 个，占 58.80%，根据病情发展势态的有 186 个，占 37.20%，3 天及以上的有 5 个，占 1.00%，迫不得已的有 15 个，占 3.00%；本场是否有村防疫员对接方面，是的有 462 个，占 92.40%，否的有 38 个，占 8.60%；向谁及时报告方面，向农业农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有 355 个，占 71.00%，向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有 41 个，占 8.20%，向村防疫员的有 70 个，占 14.00%，向乡镇或村社的有 34 个，占 6.80%。总体来看，养殖户对重大疫病报告的规范性较高，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及时性和主动性。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生猪养殖场户是否愿意上报重大动物疫情，用调研问卷中的“您是否愿意上报”进行衡量，用“愿意上报=1，不愿意上报=0”来进行测度。

解释变量参照刘军弟等^[20]、王诗谦等^[21]、黄俊克等^[22]等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研究目标，本文从个体特征、生产特征、认知特征及环境特征四个维度，选取了 15 个具体变量（表 3）。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及风险偏好；生产特征变量涵盖养殖收入占比、养猪经验、养殖规模、防疫费用与专家互动水平；认知特征变量包含是否知道扑杀补助政策及对上报行为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环境特征变量则涉及是否参加过培训、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的防控力度、是否加入生产组织以及扑杀补助对损失的弥补程度。

表 3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是否上报	愿意上报=1，不愿意上报=0	0.698	0.460
	性别	男=1，女=0	0.836	0.371
	年龄	45 岁以下=1，45-49 岁=2，49-52 岁=3，52-57 岁=4，57 岁以上=5	2.981	1.424
个体特征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2.125	0.938
	风险偏好	强风险偏好=1，风险中立=2，弱风险偏好=3	2.008	0.648
	防疫费用	0.15 万以下=1，0.15~0.4 万=2，0.4~0.9 万=3，0.9~2 万=4，2 万及以上=5	2.940	1.425
	养殖收入占比	30%及以下=1；30%-70%=2；70%及以上=3；	2.329	0.747
生产特征	养猪经验	3 年以下=1；3~9 年=2；9~19 年=3；19~29 年=4；29 年及以上=5	2.899	1.142
	养殖规模	50 头以下=1；50-200 头=2；200-800 头=3；800-1999 头=4；2000 头以上=5	2.339	1.282
	专家互动水平	无专家互动=1，低互动=2，中互动=3，高互动=4	2.000	0.875
	是否知道扑杀补助政策	是=1，否=0	0.550	0.498
认知特征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	不重要=1，不太重要=2，一般=3，较重要=4，很重要=5	4.110	0.954
	是否参加过培训	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培训=1，未参加=0	0.827	0.378
	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防控力度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4.105	0.821
环境特征	是否参加生产组织	加入生产组织=1，未加入生产组织=0	0.271	0.445
	扑杀补助弥补损失程度	30%以下=1，30%-45%=2，45%-55%=3，55%-65%=4，65%以上=5	3.197	1.256

（三）模型构建

发生重大疫病生猪养殖场户是否愿意上报属于二元变量，因此文中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P_i = \frac{I}{F(\alpha + \beta X_i) = 1 + e^{-(\alpha + \beta X_i)}} \tag{1}$$

该模型等价于如下对数几率形式：

$$\ln(p_i/1-p_i) = \alpha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cdots + \beta_{15} x_{15i} + \varepsilon_i \tag{2}$$

其中， p_i 为第 i 个养殖场户选择上报的概率； $X_1、X_2\cdots X_{15}$ 为解释变量， α 是截距项、 $\beta_1、\beta_2、\cdots、\beta_{15}$ 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 ε_i 为扰动变量，随机扰动项满足正态分布。本研究使用 StataMP18 软件对数据处理及分析。

（四）模型诊断

本文进行了以下 4 种检验以评估回归模型设定是否正确（表 4）。LinkTest 检验，_hatsq 的 p 值为 0.954 0，表明不能拒绝“模型无设定误差”的原假设（ $p > 0.05$ ），因此模型设定基本合理。拟合优度检验（Hosmer-Lemeshow

检验) 中, p 值为 0.591 3, 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预测概率与实际观测一致 ($p > 0.05$)。计算方差膨胀因子 (最大值为 1.99), 由于 VIF 值很低, 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忽略。模型的 ROC 曲线下的面积 (AUC) 为 0.7436, 表明模型具有区分能力 ($AUC > 0.7$)。

表 4 模型诊断检验

检验类型	统计量/指标	值	判断标准	结论
Linktest 检验	_hatsq 的 p 值	0.954 0	$P > 0.05$ 说明无显著错误	模型设定基本合理
Hosmer-lemeshow 检验	$\chi^2(df=8)$	6.500 0 (0.591 3)	$P > 0.05$ 说明拟合良好	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观测一致
VIF 检验	平均 VIF	1.260 0	$VIF < 5$ 无严重共线性	自变量间无严重共线性问题
AUC-ROC	AUC 值	0.743 6	$AUC > 0.7$ 具有区分能力	模型分类能力良好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回归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养殖场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 (个体特征), 养殖经验、防疫费用、专家互动人数 (生产特征),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 (认知特征), 以及是否参加培训、政府疫病防控程度、扑杀补助损失弥补程度 (环境特征) 均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表 5)。

个体特征中, 年龄与受教育水平均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 即年龄越大、学历越高的养殖场户, 疫病报告意愿越强, 与理论预期一致。性别和风险偏好对报告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原因在于移动互联网普及缩小了男女防疫知识差距, 现代养殖场固定防疫流程也削弱了个人风险偏好的作用空间。

生产特征中, 养殖经验、防疫费用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 专家互动人数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养殖经验系数显著为负, 即养殖年限越长, 养殖场户报告意愿越低, 可能是资深养殖户存在“过度自信偏差”, 认为上报边际收益递减, 进而抗拒无明确回报的新投入。防疫费用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防疫支出越多, 养殖场户报告意愿越强。专家互动人数系数显著为负, 与传统认知相悖, 可能因互动带来的复杂信息引发抉择矛盾, 导致养殖户回避上报。此外, 养殖规模、养殖收入占比等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 或因瞒报法律后果远超经济收益, 弱化了规模与收入的作用。

认知特征中,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在 1%统计水平上极显著且系数为正, 印证了“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水平越高的养殖户, 越清楚上报的重要性及瞒报风险, 报告意愿越强。扑杀补助政策知晓度对报告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核心原因是法律威慑力大于经济激励, 且补助未达养殖户预期, 对报告意愿无实质作用。

环境特征中, 是否参加培训、政府防控程度、扑杀补助损失弥补程度均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参加培训可提升疫情识别能力、强化防疫意识、熟悉上报流程, 进而提高报告意愿; 政府防控越严格, 养殖场户报告意愿越高, 符合政府公信力效应。扑杀补助损失弥补程度系数显著为负, 或因补助未达预期、补偿延迟损耗信任, 且养殖户担忧高补助伴随严苛处罚、政策复杂, 进而选择私下处理疫情。

表 5 生猪养殖场户重大疫病报告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013	-0.001	0.043	0.004
	(0.05)	(-0.00)	(0.15)	(0.01)
年龄	0.044	0.134*	0.166**	0.159*
	(0.59)	(1.66)	(1.98)	(1.86)
受教育水平	0.297***	0.230*	0.254**	0.224*
	(2.60)	(1.92)	(2.02)	(1.72)

风险偏好	0.042 (0.34)	0.127 (0.96)	0.068 (0.49)	0.096 (0.67)
养猪经验		-0.215** (-2.27)	-0.219** (-2.21)	-0.234** (-2.31)
养殖规模		0.161 (1.50)	0.129 (1.15)	0.055 (0.45)
养殖收入占比		-0.206 (-1.42)	-0.159 (-1.05)	-0.139 (-0.89)
防疫费用		0.199** (2.42)	0.183** (2.11)	0.187** (2.10)
专家互动水平		-0.251** (-2.02)	-0.354*** (-2.69)	-0.403*** (-2.96)
是否知道扑杀补助政策			0.369* (1.72)	0.342 (1.52)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			0.625*** (5.83)	0.541*** (4.64)
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防控力度				0.318** (2.28)
是否参加生产组织				0.220 (0.76)
是否参加过培训				0.598** (2.14)
扑杀补助弥补损失程度				-0.228** (-2.5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表示 z 值。下同。

（二）异质性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基层防疫体系完善度、公共防疫资源供给能力和制度环境，可能导致养殖场户在上报意愿上的行为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养殖场户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进行回归（表 6）。根据表 6 可知，在经济发达地区，年龄对上报意愿呈正向影响，在 10% 水平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制度环境更完善，年长养殖场户更容易建立对官方渠道的信任，从而提升上报积极性。养猪经验在发达地区表现为负向影响，在 5% 水平显著，表明经验越丰富的养殖场户越可能依赖自我判断和更完善的市场化防疫服务体系而减少上报。防疫费用在发达地区对上报意愿具有正向作用，在 10% 水平显著，说明可能由于发达地区拥有更完善的补贴制度，在防疫支出增加时，养殖场户更可能通过上报寻求补贴和支持。在欠发达地区，年龄和防疫费用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但专家互动水平在 10% 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上报意愿。这说明在防疫资源不足的地区，养殖场户可能由于过度依赖专家指导，反而削弱了自主决策。无论地区差异如何，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始终在 5% 水平上显著正向作用，表明认知因素对上报行为具有普遍驱动作用。此外，扑杀补助弥补损失程度在发达地区呈现 10% 水平的负向影响，说明在成本较高的地区，养殖场户可能更担心过高的补助不可持续，或扑杀补助无法及时、充分覆盖未来复养的前期投入，为维持生产连续性，避免因扑杀导致的长期停产损失，养殖场户选择隐瞒疫情。

表 6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发达	欠发达
性别	0.254 (0.64)	-0.235 (-0.57)
年龄	0.223* (2.00)	0.111 (0.89)
受教育水平	0.284 (1.35)	0.195 (1.11)
风险偏好	0.076 (0.41)	0.152 (0.58)
养猪经验	-0.360** (-2.73)	-0.052 (-0.33)
养殖规模	0.017 (0.10)	0.195 (0.93)
养殖收入占比	0.007 (0.03)	-0.410 (-1.47)
防疫费用	0.252* (1.98)	0.125 (1.01)
专家互动水平	-0.404* (-2.09)	-0.459* (-2.14)
是否知道扑杀补助政策	0.271 (0.86)	0.442 (1.30)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	0.499** (3.30)	0.635** (2.69)
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防控力度	0.348 (1.71)	0.320 (1.51)
是否参加生产组织	-0.075 (-0.17)	0.438 (1.09)
是否参加过培训	0.703 (1.61)	0.540 (1.38)
扑杀补助弥补损失程度	-0.283* (-2.22)	-0.232 (-1.57)
N	500	500

2. 养殖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

养殖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关系到养殖场户在养殖活动中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政策依赖程度。为此, 本文以养殖收入占比的平均值作为分组标准进行分组回归, 以探究不同收入结构下的行为差异 (表 7)。根据表 7 可知, 在养殖收入占比较低的群体中, 年龄对上报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在 10% 水平显著, 说明兼业养殖场户在逐渐退出非农劳动后, 更倾向于依规上报以获取政策支持。养猪经验在该群体中呈现负向影响, 在 10% 水平显著, 说明收入占比低的养殖场户经验积累有限, 长期养殖中可能目睹小规模疫情自行消退的案例, 导致对疫病危害的认知不足, 认为上报必要性低, 经验积累反而削弱了风险警惕性。防疫费用在低收入占比群体中呈现正向影响, 在 5% 水平显著, 可能的原因为养殖收入占比低的养殖场户养殖收入仅为家庭副业或补充收入, 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当疫情发生导致增加额外防疫投入时, 若主动上报配合防疫能获得政府补贴或技术支持, 抵消部分费用压力, 养殖场户上报意愿更强。在养殖收入占比较高的群体中, 专家互动水平在 5% 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上报意愿, 表明

高收入群体在依赖专家建议时更可能延迟或放弃上报。两类群体在认知变量上的结果一致，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均表现为正向显著，其中高收入占比群体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说明以养殖为主要收入的群体对防疫效果的认知更为敏感。政策因素方面，政府防控力度仅在低收入占比群体中表现为显著正向作用，在 1%水平显著，反映出这类群体更依赖政策支持来降低风险。

表 7 养殖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

变量	养殖收入占比	
	占比高	占比低
性别	-0.145	-0.029
	(-0.36)	(-0.06)
年龄	0.076	0.338*
	(0.69)	(2.34)
受教育水平	0.205	0.252
	(1.25)	(1.21)
风险偏好	0.239	-0.103
	(1.20)	(-0.41)
养猪经验	-0.168	-0.398*
	(-1.21)	(-2.35)
养殖规模	0.243	-0.461
	(1.64)	(-1.72)
养殖收入占比	0.199	0.506
	(0.51)	(1.29)
防疫费用	0.095	0.563**
	(0.88)	(3.00)
专家互动水平	-0.450*	-0.345
	(-2.57)	(-1.40)
是否知道扑杀补助政策	0.290	0.391
	(0.97)	(1.01)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	0.690***	0.458*
	(4.18)	(2.43)
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防控力度	0.021	0.922***
	(0.11)	(3.49)
是否参加生产组织	0.042	0.734
	(0.12)	(1.20)
是否参加过培训	0.726	0.716
	(1.85)	(1.58)
扑杀补助弥补损失程度	-0.153	-0.283
	(-1.26)	(-1.94)
N	500	500

（三）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基准回归的稳健性，首先用 Probit 模型替换 Logit 模型，除回归模型进行替换外，其他条件均一致（表 8）。结果表明，关键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及其影响方向均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模型选择不敏感，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与解释可靠性。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标准误
性别	-0.005	0.172
年龄	0.098*	0.051
受教育水平	0.138*	0.076
风险偏好	0.062	0.084
养猪经验	-0.142**	0.060
养殖规模	0.033	0.070
养殖收入占比	-0.093	0.092
防疫费用	0.106**	0.052
专家互动水平	-0.233***	0.080
是否知道扑杀补助政策	0.192	0.133
上报对防疫效果的认知程度	0.323***	0.068
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防控力度	0.190**	0.082
是否参加生产组织	0.120	0.169
是否参加过培训	0.368**	0.167
扑杀补助弥补损失程度	-0.136***	0.053
Constant	-1.567***	0.557
LR statistic	85.66	—
Prob.(LR statistic)	0.0000	—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整体来看，四川省生猪养殖场户在重大疫病报告上的意愿处于较高层次，但部分养殖户仍存在延迟上报或瞒报的情况。从样本情况可知，大约 70%的养殖场户称疫情发生时会选择上报，而且多数能做到及时上报，与防疫体系的衔接也较为顺畅；不过，有 30%的养殖场户明确表示不会上报，还有 37%的养殖场户会先自行评估，再确定上报的时间。

养殖场户的四类特征变量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其报告意愿。就个体特征而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会对报告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在生产特征方面，养殖经验越丰富的养殖场户，报告意愿反而越低，防疫方面支出较多的养殖场户，报告意愿更高，而与养殖专家的互动人数则会对报告意愿起到消极作用；从认知特征来讲，养殖场户对上报行为在防疫效果上的认知越深刻，其报告意愿就越强烈；在环境特征上，参与过生猪养殖培训、政府对生猪重大疫病的防控力度较大，都会对报告意愿产生正向推动，而扑杀补助对损失的弥补程度则与报告意愿呈现出反向关系。

不同养殖收入结构与区域背景下的养殖场户在上报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显著异质性。经济发达地区的养殖户，其上报意愿主要受到年龄与防疫认知的正向影响，以及养殖经验、专家互动频次和扑杀补助效能的负向影响；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因素相对集中，主要表现为防疫认知的正向影响与专家互动的负向作用。此外，对于养殖收入占比较高的群体，上报意愿同样受到防疫认知的正向影响与专家互动的负向影响；而在养殖收入占比较低的群体中，年龄、防疫支出、认知水平与政府防控态度均对上报意愿产生正向作用，养殖经验则显著抑制其上报行为。

（二）政策建议

细化宣传内容，提升养殖户防疫风险认知。针对文化程度较低或年龄偏小的养殖户，应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增强其对瞒报法律责任和疫情传播后果的认识。对于养殖经验丰富的群体，可着重讲解新发疫病特征和

典型防控案例,引导其及时调整防疫观念。对所有养殖户,应持续加强对上报行为防控意义的宣传,帮助其认识到疫情信息报告在应急响应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区域差异,完善分类支持政策。不同地区养殖户在上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差异,应结合实际制定分区域的支持策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可探索建立信息化管理机制,提高疫情信息的传递效率,并通过适当激励措施,引导养殖户形成稳定的上报行为模式。在经济基础较弱地区,应加强基层技术人员的指导服务,帮助养殖户熟悉上报流程,并通过财政补贴、物资支持等手段提高其参与防控的积极性。

优化流程设计,提升上报便利性与响应速度。当前部分养殖户面临报告流程复杂、信息反馈滞后的问题,需通过流程再造提升制度可操作性。建议整合现有渠道,简化报告程序,推动信息与防疫力量的有效对接。同时,应建立专业咨询机制,为养殖户提供权威、及时的技术支持,缓解其在报告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惑和顾虑。通过加强部门间的数据共享,也有助于实现多环节联动,提高对异常疫情的识别和应对能力。

健全监督机制,强化激励与约束并举。为提高疫情上报的执行效果,应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完善配套激励措施。一方面,在重点疫区或养殖密集区域,应加强常态化监管,发挥基层组织的监督作用,提升对瞒报行为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应将主动上报行为纳入防疫补贴和补偿政策的评估依据,优化补贴发放的透明度和时效性,增强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奖惩并重的制度体系,引导养殖户形成积极主动的防疫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 [1] 王子权,王琼,刘玉梅等.扑杀补助对养殖户非洲猪瘟防控行为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2,(07):97-112.
- [2] 田志敏,孙俊娜,张骏,等.新一轮“猪周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畜牧杂志,2023,59(12):365-369.
- [3] 何雯霞,熊涛,尚燕.重大突发疫病对我国肉禽产业链市场价格的影响研究——以非洲猪瘟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43(02):318-327.
- [4] 常帅,刘嘉,叶静,陈焕春,曹胜波.新发展理念视阈下的我国畜禽疫病防控[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02):145-151.
- [5] 朱增勇,李梦希,张学彪.非洲猪瘟对中国生猪市场和产业发展影响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19,35(18):205-210.
- [6] Guinat C, Wall B, Dixon L, et al. English pig farmers' knowledge and behaviour towards African swine fever suspicion and reporting[J]. PLoS One, 2016, 11(9): e0161431.
- [7] Penrith M L, Vosloo W, Jori F, et al.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eradication in Africa[J]. Virus research, 2013, 173(1): 228-246.
- [8]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养殖农户报告动物疫情行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地区养殖农户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03):185-191.
- [9] 刘玮,李艳玲.基于 TPB 框架的养殖户认知对禽流感疫情上报意愿的影响[J].中国家禽,2020,42(03):68-74.
- [10] 王建华,邓远远,刁寒钰.农业生产者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逻辑与可为路径[J].农村经济,2018,(10):105-110.DOI:10.26957/j.cnki.cn51-1029/f.2018.10.016.
- [11] 司瑞石,谭永风,刘明月.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理论逻辑、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5,(03):110-126.
- [12] 林挺,李鹏程,浦华,等.非洲猪瘟对东南亚生猪产业的影响及启示[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24,26(01):9-17.
- [13] 韩振,胡向东,石自忠.中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政策及优化策略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03):11-17.
- [14] 张文娟.畜牧场兽医体系建设与疫病防控探索[J].棉花学报,2023,35(06):524.
- [15] 陈祥建,戴世刚.生猪屠宰检疫全流程规范与监管体系优化探索[J].农业知识,2025,(03):83-86.
- [16] 王宏梅,孙毅.缓解生猪市场波动的政府调控机制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0,(05):123-128.
- [17] 于超,张园园,孙世民.规模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山东省 509 家规模养猪场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27(04):632-643.
- [18] 刘婷婷,应瑞瑶,周力.非洲猪瘟对中国生猪产业链的经济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分割视角[J].农村经济,2020,(09):19-26.

- [19] 周勋章,李广东,孟宪华,等.非洲猪瘟背景下养猪户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08):316-324.
- [20] Michie S, Van Stralen M M, West R. The behaviour change wheel: a new method for characterising and designing behaviour change interventions[J]. Implementation science, 2011, 6(1): 42.
- [2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 [22]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M]//Handbook of the fundamentals of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Part I. 2013: 99-127.
- [23] 刘芳,袁艳云,张莎莎,等.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中国生猪养殖户生产恢复行为研究——基于 21 个省份受灾养殖户的调研[J].农业技术经济,2024,(03):35-51.
- [24] 王欢,赵鑫,沈洋洋.政府规制对生猪养殖户生物安全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04):65-77.
- [25] 刘明月,陆迁,张淑霞.不同模式养殖户禽流感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363 份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02):22-28.
- [26] 刘军弟,王凯,季晨.养猪户防疫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09,(04):74-81.
- [27] 王诗谦,徐祖祥,越镜文.养殖户参与防疫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与装备,2021,(08):65-66+69.
- [28] 黄俊克,张丽君,张跃华.生猪养殖户动物疫情报告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畜牧与兽医,2020,52(05):117-122.

Analysis on Willingness of Pig Farmers to Report Major Epidemic Diseas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uang Xiaoyuan, Xiong Yixuan, Sun Jiayi, Shen Yangy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he pig industry is a vital pillar industry of China's agriculture. Frequent outbreaks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pose a severe threat to the industry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and the epidemic reporting behavior of farmers and breeding households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sed on a survey dataset of 500 farmers and breeding households covering 28 towns in 6 counties (districts) across 6 c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study employed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15 variables categorized into four dimensions—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on the farmers' and breeding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report epidem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willingness to report is relatively high among the surveyed subjects, yet delays and concealment in reporting still exist. Variables such as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report, while factors like breeding experience have a notable inhibitory effect; the percep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effectiveness consistently plays a positive role. The impact of varying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reeding income on reporting willingness pres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baseline model.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major animal disease reporting lies in raising farmers' awaren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mproving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optimizing the report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Keywords: Pig Farmers; Major Animal Epidemics; Reporting Willingness; Logistic Regression; Sichuan Province

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为例

魏茹蓉

(南宁市第十中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推动下, 生成式 AI 凭借其内容生成、数据分析、效率提升等核心优势, 逐渐渗透到人力资源管理各核心模块, 为招聘与绩效评估工作注入新活力。本文以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为研究焦点, 结合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系统剖析其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算法偏见与公平性缺失、技术适配与落地难题、人才能力与管理模式不匹配等核心困境。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技术赋能理论, 从数据治理、算法优化、技术适配、人才培养、制度保障五个维度, 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 为企业规范、高效应用生成式 AI 赋能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升级。

关键词: 生成式 AI; 人力资源管理; 招聘模块; 绩效评估模块; 应用困境; 优化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9

一、引言

随着 ChatGPT、Midjourney 等生成式 AI 工具的快速迭代与普及,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进入深度发展阶段。生成式 AI 区别于传统分析型 AI, 具备自主生成文本、图像、数据模型等内容的能力, 能够有效解决人力资源管理中流程繁琐、效率低下、主观偏差等痛点。在招聘模块, 生成式 AI 可自动生成招聘文案、筛选简历、开展智能面试; 在绩效评估模块, 能实现绩效数据的实时采集、多维分析与评估报告生成, 大幅降低人力成本, 提升管理效率。

当前, 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尝试引入生成式 AI 工具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流程, 如谷歌、微软等跨国企业已将生成式 AI 应用于校园招聘的简历初筛与绩效指标的动态调整。然而, 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受技术成熟度、数据质量、伦理规范、管理模式等多重因素制约, 在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暴露出诸多现实困境, 如算法偏见导致的招聘不公、数据泄露引发的隐私风险、评估标准量化不足造成的结果偏差等,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生成式 AI 的规模化、规范化应用。

本文立足生成式 AI 技术特性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需求, 以招聘与绩效评估两大核心模块为切入点, 梳理其应用场景与现状, 深入剖析应用困境的成因与表现, 构建科学可行的优化路径体系。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理论体系, 更能为企业规避技术应用风险、最大化发挥生成式 AI 赋能价值提供实践指导, 对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成式 AI 在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的应用现状与核心场景

(一) 应用现状

近年来, 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渗透率持续提升, 据相关行业报告显示, 2025 年全球超 60% 的企业已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至少一种生成式 AI 工具, 其中招聘与绩效评估是应用最广泛的两大模块。在招聘场景, 生成式 AI 的应用已覆盖招聘全流程, 从招聘需求分析、文案生成到简历筛选、面试邀约、候选人评估, 形成了全链条智能化支撑; 在绩效评估场景, 生成式 AI 打破了传统人工评估的时空限制, 实现了绩效数据的实时追踪、多维度分析与个性化评估报告生成, 推动绩效评估从“结果导向”向“过程+结果导向”转型。

但从应用效果来看,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的应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大型跨国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凭借充足的资金投入、完善的技术架构与专业的人才团队,能够实现生成式 AI 与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深度融合,应用效果显著;而中小企业受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制约,多停留在浅层应用阶段,多以单一工具替代人工重复性工作,未能实现技术与管理流程的系统性整合,应用价值难以充分发挥。

(二) 核心应用场景

在招聘模块,生成式 AI 的核心应用场景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招聘文案智能生成,根据企业招聘需求、岗位特性与企业文化,自动生成适配招聘网站、社交媒体、校园招聘等不同渠道的招聘文案,同时可优化文案语言表达,提升岗位吸引力。二是简历智能筛选与初筛,通过构建岗位胜任力模型,自动识别简历中的关键信息,快速筛选出符合岗位要求的候选人,剔除不合格简历,大幅降低 HR 初筛工作量。三是智能面试与候选人评估,通过 AI 面试机器人开展线上面试,自动记录面试内容、分析候选人语言表达、逻辑思维等能力,生成面试评估报告,为 HR 决策提供参考,同时实现面试过程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在绩效评估模块,生成式 AI 的核心应用场景主要包括绩效指标动态优化、绩效数据整合分析与评估报告生成。基于企业战略目标与岗位特性,生成式 AI 可自动拆解绩效指标,动态调整指标权重,确保绩效指标与企业发展需求相匹配;通过整合企业内部 ERP 系统、CRM 系统等多渠道数据,实时采集员工工作成果、工作态度、团队协作等维度数据,实现绩效数据的全面分析;结合评估标准与数据结果,自动生成个性化绩效评估报告,同时为员工提供针对性的绩效改进建议,提升绩效评估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三、生成式 AI 在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的应用困境

(一) 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凸显

数据是生成式 AI 应用的核心基础,而人力资源管理涉及大量员工与候选人的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信息、学历背景、工作经历、薪酬数据、健康状况等,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成为首要困境。一方面,生成式 AI 工具多依赖云端存储与数据共享,若企业数据加密技术不完善、访问权限管理不严格,易引发数据泄露、篡改等安全问题,侵犯个人隐私;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为追求应用效果,过度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甚至将候选人的非职业相关信息纳入评估范围,违背伦理规范与相关法律法规,引发法律纠纷与品牌声誉风险。此外,生成式 AI 的“黑箱特性”导致数据处理过程不透明,若数据来源存在偏差或被恶意操控,难以追溯责任,进一步加剧了伦理风险。

(二) 算法偏见与公平性缺失

算法偏见是生成式 AI 在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应用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直接影响管理工作的公平性。生成式 AI 的算法模型依赖训练数据构建,若训练数据存在历史偏见,如过往招聘中对性别、年龄、地域、学历的歧视性数据,算法会自动学习并放大这种偏见,导致招聘过程中出现性别歧视、年龄限制等隐性不公现象,排除合格候选人;在绩效评估中,算法可能对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员工设置差异化评估标准,或过度依赖量化数据而忽视定性指标,导致评估结果偏向特定群体,挫伤员工积极性。此外,算法模型的不透明性使得偏见难以被及时发现与纠正,进一步固化了管理不公,影响企业人才吸引力与团队稳定性。

(三) 技术适配与落地应用难题

生成式 AI 技术与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适配性不足,导致落地应用困难。一方面,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组织架构与企业文化存在差异,而市面上多数生成式 AI 工具为通用型产品,缺乏针对性定制化能力,难以完全适配企业个性化需求,如部分工具无法与企业现有 HR 系统、ERP 系统实现数据互通,导致数据孤岛问题,影响应用效果。另一方面,生成式 AI 技术的应用需要完善的技术基础设施支撑,包括稳定的网络环境、充足的算力资源与标准化的数据体系,而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基础设施薄弱、数据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难以满足生成式 AI 的应用需求。同时,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部分企业引入的 AI 工具很快面临功能滞后问题,增加了技术应用成本。

(四) 人才能力与管理模式不匹配

生成式 AI 的深度应用对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 HR 具备数据分析、算法理解、技术操作等复合型能力,而当前多数 HR 仍停留在传统人事管理思维,缺乏相关技术知识与技能,难以有效运用生成式 AI 工具开展工作,甚至对 AI 工具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技术落地。此外,生成式 AI 的应用推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从“人工主导”向“AI 辅助+人工决策”转型,而部分企业未能及时调整管理流程与权责划分,仍沿用传统

管理模式,导致 AI 工具与管理流程脱节,如过度依赖 AI 评估结果而忽视人工审核的重要性,或未明确 AI 与 HR 的权责边界,出现问题后相互推诿,影响管理效率。

(五) 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不完善

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是新兴事物,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导致应用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目前,我国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针对人力资源管理场景的专项法规较少,对于 AI 招聘中的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评估结果有效性等问题缺乏明确界定,企业在应用过程中易陷入法律灰色地带。同时,企业内部也缺乏配套的管理制度,如 AI 工具使用规范、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算法审核机制等,导致生成式 AI 的应用缺乏约束,随意性较大,进一步加剧了应用风险。

四、生成式 AI 在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的优化路径

(一) 构建全流程数据治理体系,防范安全与伦理风险

以数据安全与伦理合规为核心,构建全流程数据治理体系。一是强化数据安全,采用加密存储、访问权限分级管控、数据脱敏等技术手段,保护员工与候选人的个人敏感信息,同时建立数据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数据安全检测与漏洞修复,防范数据泄露风险。二是规范数据采集与使用流程,严格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仅采集与招聘、绩效评估相关的必要信息,明确数据使用范围与期限,杜绝过度采集与滥用。三是建立伦理审核机制,成立由 HR、技术人员、法务人员组成的伦理审核小组,对生成式 AI 工具的应用场景、算法模型、数据处理过程进行全程审核,及时发现并纠正伦理问题,确保技术应用符合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

(二) 优化算法模型,保障应用公平性

从数据源头、算法设计、结果审核三方面入手,破解算法偏见问题。一是优化训练数据,构建多元化、无偏见的训练数据集,剔除存在歧视性的历史数据,同时定期更新训练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从源头减少算法偏见。二是提升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选择可解释性强的算法模型,对算法的决策逻辑、指标权重等进行公开,便于 HR 与候选人理解评估结果;同时建立算法偏见监测机制,定期对算法结果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并修正偏见。三是完善人工审核机制,明确 AI 评估结果仅作为参考,HR 需对 AI 筛选的候选人、生成的绩效评估报告进行人工复核,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评估结果,确保招聘与绩效评估的公平性。

(三) 推进技术定制化适配,破解落地难题

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推进生成式 AI 技术的定制化适配与基础设施升级。一是中小企业可优先选择轻量化、可定制的 AI 工具,或与技术服务商合作,根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现有系统架构,开展个性化功能开发,实现 AI 工具与现有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流程融合,打破数据孤岛。二是加大技术基础设施投入,完善网络环境、算力资源与数据标准化体系,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对人力资源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为生成式 AI 的应用提供支撑。三是建立技术迭代机制,定期评估 AI 工具的应用效果与功能适配性,及时跟进技术更新迭代,根据企业发展需求优化 AI 工具功能,确保技术应用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四) 加强人才培养,优化管理模式

提升人力资源团队的复合型能力,推动管理模式转型升级。一是开展针对性培训,围绕生成式 AI 工具操作、数据分析、算法基础、伦理合规等内容,对 HR 进行系统培训,同时引入技术型人才充实人力资源团队,构建“HR+技术”的复合型团队。二是转变管理思维,引导 HR 从传统人事管理向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转型,树立“AI 辅助+人工决策”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 AI 在效率提升、数据支撑方面的优势,同时强化 HR 在战略规划、人文关怀、复杂决策方面的核心作用。三是优化管理流程与权责划分,明确 AI 工具与 HR 的权责边界,建立“AI 预处理—人工审核—结果反馈—模型优化”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技术与管理流程深度融合。

(五) 完善法律法规与内部制度,强化制度保障

构建“外部法规+内部制度”的双重保障体系,规范生成式 AI 的应用。一方面,呼吁相关部门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应用的专项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评估结果法律效力等核心问题,为企业应用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同时加强执法监督,对违法违规应用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倒逼企业规范应用。另一方面,企业需建立健全内部配套制度,包括 AI 工具使用规范、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算法审核机制、绩效评估标准等,明确 AI 应用的流程、责任与考核办法,将伦理合规要求纳入制度体系,实现生成式 AI 应用的制度化、

规范化管理。

五、结论

生成式 AI 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招聘与绩效评估模块带来了效率提升、精准化升级的新机遇，但其在应用过程中面临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算法偏见、技术适配不足、人才能力不匹配、制度不完善等多重困境，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企业、行业与政府协同发力。企业作为应用主体，需从数据治理、算法优化、技术适配、人才培养、制度建设五个维度构建优化路径，实现生成式 AI 与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深度融合；行业需加强自律，推动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的制定；政府需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引导，为生成式 AI 的规范应用营造良好环境。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生成式 AI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将更加规模化、规范化，不仅能进一步提升招聘与绩效评估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更能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向智能化、战略化方向转型，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重要支撑。后续研究可结合具体行业、企业规模，深入探讨生成式 AI 应用的差异化路径，同时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完善优化策略，丰富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金华, 王晨. 生成式 AI 在企业招聘中的应用风险与防控策略[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4(05): 45-54.
- [2] 张剑, 刘畅. 人工智能赋能绩效评估: 困境、机理与路径[J]. 管理世界, 2023(12): 189-200.
- [3] 陈劲, 吴刚.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 AI 应用研究[J]. 科研管理, 2024, 45(03): 123-131.
- [4] 王通讯. 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发展: 挑战与机遇[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23.
- [5] 刘昕. 生成式 AI 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重构与影响[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4(01): 23-32.
- [6] 赵曙明. 数字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与创新[J]. 管理世界, 2022(08): 178-187.
- [7] Brown, K., & Davis, R. Algorithmic Bias in Performance Appraisal: A Framework for Mitigation[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23, 33(4): 100987.

The Application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Generative AI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Recruit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

Wei Rurong

(Nanning No.10 Middle School, Nanning, Guangxi 530000)

Abstract: Driven by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enerative AI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core module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its core advantages such as content generation, data analysis,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recruit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cruit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ules for research, combines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Generative AI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dilemmas it face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such as data security and ethical risks, algorithm bias fairness absence, technology fit and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talent capability and management mode mismatch. Based 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technology enabling theo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paths from five dimensions data governance, algorithm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fit,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enterprises to standardize and efficiently apply Generative AI to empow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precis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I;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cruitment modu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ule; Application dilemma; Optimization path

会展经济赋能下广西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探索 ——基于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分析

季彪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 广西凭借区位优势, 实现会展经济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本文分析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国际会展活动对广西旅游产业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 会展经济短期通过“事件带动效应”刺激旅游客流和消费; 长期通过“品牌塑造效应”和“产业联动效应”助力旅游形象重塑、基础设施升级、产品优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东盟因素为核心枢纽, 影响会展主题、规模及旅游市场结构、合作模式与发展方向。面对区域竞争和产业融合挑战, 广西应加强“会展+旅游”顶层设计, 打造跨境会展旅游产品, 推进数字技术与智慧运营, 构建区域合作网络, 将短期消费高峰转化为长期发展动力, 贡献“广西经验”。

关键词: 会展经济; 旅游产业发展; 中国—东盟博览会; 广西; 产业融合; 区域协同合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8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 RCEP 实施, 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达到新高度。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既陆地相邻又隔海相望的省区, 已从西南边境末梢转型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 面临发展机遇和产业升级挑战。在消费升级、旅游竞争加剧和可持续发展压力下, 广西旅游产业需寻找新引擎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 以东博会为首的区域性会展活动在广西蓬勃发展, 会展经济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新增长点。会展活动与旅游产业天然契合, 能汇聚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直接拉动旅游相关要素, 提升举办地知名度和基础设施, 为旅游产业注入动力。在东盟框架下, 会展经济如何具体影响广西旅游产业? 其作用机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路径如何? 探究这些问题对广西优化“会展+旅游”策略和提升开放水平有现实意义, 也为其他边境省区提供借鉴。

二、理论探析: 会展与旅游的互动融合内在机理

会展产业与旅游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中两个联系紧密且相互促进的重要业态。从理论层面深入梳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理解广西相关实践发展的基础所在。

(一) 会展对旅游的拉动效应: 从直接刺激到间接赋能

会展活动对旅游产业的影响全面而多层次。首先, 直接经济拉动效应显著, 参展客商和观众形成高消费商务旅游群体, 其住宿、餐饮、交通、观光等需求直接贡献旅游收入。其次, 形象塑造与品牌提升效应深远, 大型国际会展通过媒体传播提高举办地国际曝光, 转变潜在游客认知, 从会展地延伸为旅游目的地。再次, 设施与环境催化效应夯实硬件基础, 为举办高端会展, 升级交通、新建会展中心和酒店, 优化公共服务,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游客体验。最后, 产业关联与优化效应推动创新, 会展汇聚新理念、技术和业态, 激发旅游企业开发商务考察、主题参观等新产品, 促进产业向复合型体验模式转型。

(二) 旅游对会展的支撑作用: 基础保障与吸引力来源

作者简介: 季彪(1996—),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与跨境合作。

通讯作者: 季彪

反过来,发达完善的旅游产业也是会展经济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保障。完善的旅游接待设施、便捷高效的内外交通网络、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资源、专业过硬的会展服务人才队伍,以及友好安全的城市环境,都是吸引会展主办方选择举办地以及参会者积极参与会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富有独特魅力的旅游目的地,其自身所具备的吸引力也能成为吸引会展活动落地的重要“加分项”。

(三) 东盟因素的融入:地缘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影响变量

将“东盟”这一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赋予了本研究独特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内涵。东盟不仅是广西最主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更是广西会展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和关键合作维度。以东盟为导向的各类会展活动,其参与主体、讨论议题、展示内容等都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合作的大脉络之中。这使得会展活动对旅游产业的影响超越了常规的经济层面,进一步延伸到跨境旅游政策协调、文化旅游交流、区域旅游线路共同建设等更深层次的合作领域。东盟因素的存在,使得广西“会展-旅游”的互动发展上升到了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高度。

三、实证分析:会展经济驱动广西旅游发展的多元呈现

广西的发展实践生动地展现了在区域合作框架下会展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大力量。自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来,广西逐步构建起以东博会为最高层级,涵盖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文化旅游论坛、广西国际旅游博览会等在内的多层次、宽领域会展体系。

(一) 直接拉动与短期经济效应:客流与消费的“集中爆发”现象

每一届东博会举办期间,南宁乃至广西的主要旅游城市都会迎来明显的客流高峰。数十万名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政要、商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观众齐聚广西,这对航空、高铁等跨区域交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南宁吴圩国际机场在会展期间的客流量多次创下历史新高。南宁市的高星级酒店在会展期间的入住率普遍能够达到95%以上,酒店房价也会相应有所上涨。餐饮、零售、娱乐等相关行业都能分享到这一“事件经济”带来的发展红利。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东博会及其相关配套活动对广西第三产业,特别是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显著。这种“集中爆发”式的效应,不仅为广西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检验并提升了城市的应急接待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

(二) 品牌塑造与形象提升效应:从“南宁渠道”到旅游特色名片

东博会的连续成功举办,使得“南宁渠道”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象征。通过全球媒体的持续报道和宣传,“广西南宁”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现代时尚、充满活力的国际区域中心城市形象不断得到强化。这种品牌效应对于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是潜移默化且具有长期性的。许多原本对广西认知模糊的国际游客,尤其是来自东盟各国的客商,通过参与东博会亲身感受到了广西的发展活力与独特魅力,进而转变为日后到广西休闲度假的游客。广西旅游的整体形象也从过去单一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自然景观印象,丰富拓展为“既有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又具备国际化发展活力”的复合型旅游目的地形象。

(三) 设施升级与空间优化效应:重塑旅游发展硬件环境

为了支撑东博会等各类国际盛会的顺利举办,广西特别是南宁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经过多次扩容升级,已经成为南宁市的城市地标性建筑和重要的旅游参观点。南宁吴圩国际机场T2航站楼的投入使用、多条国际航线的加密运营、通往东盟国家的公路网络的日益完善,极大地改善了广西的国际交通可达性。城市地铁网络的建设、主要街道和旅游景区的国际化改造、一大批高端酒店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入驻,全面提升了城市的旅游舒适度和出行便利性。这些因会展活动而催生的“硬件”设施提升,其受益群体不仅包括会展参与者,还涵盖了全体市民和广大游客,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持久而广泛。

(四) 产品创新与市场拓展效应:聚焦东盟的特色化发展路径

以东盟为主题的会展活动深刻影响了广西旅游产品的开发方向和市场结构布局。在产品层面,催生出了“会展+边境旅游”“会展+民族文化体验”“中国—东盟特色商品购物旅游”等一系列新型旅游产品。例如,依托东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东兴口岸跨境旅游等项目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and 政策支持。针对东盟客商的商务考察线路、广西特色产业参观线路等专业旅游产品也应运而生。在市场层面,东盟国家一直稳居广西入境旅游市场的首位。会展活动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公务、商务客源,还通过举办东盟风情周等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激发了普通民众的跨境旅游意愿。广西与东盟国家互为主要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格局日益稳固,双向旅游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活跃。

四、核心动力与关键枢纽:东盟因素的深度赋能作用

在广西“会展驱动旅游”的发展模式中,东盟并非仅仅是外部发展背景,而是内在的核心动力源泉和关键枢纽。

(一) 会展主题与规模能级的主导者

广西最具影响力的会展品牌,几乎都与“东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东博会作为国家级、国际性的重要盛会,其主题始终紧紧围绕中国—东盟合作的最新重点领域,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合作等。这一主题定位,决定了参会者在地域上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东盟国家参会人员占比高)、在专业领域上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以及在参与目的上具有明确的合作导向性。这使得由此产生的旅游需求,如商务考察、产业对接等,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行业特征,为广西发展精准化的会展旅游服务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方向。

(二) 市场互通与政策协调的推动者

以会展活动为重要平台,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旅游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相关企业得以开展高频次、多层次的官民互动对话。中国—东盟文化旅游论坛等重要机制,为双方直接商讨签证便利化、跨境旅游线路推广、旅游安全合作、服务质量标准互认等实质性议题提供了契机。这些对话所取得的成果,逐步转化为更加便利的跨境旅游政策环境,有效降低了两地游客往来的制度性成本,从长远来看,为双方旅游市场的互通互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文化共鸣与情感联结的深化者

会展活动不仅仅是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舞台。在东博会的框架下,举办的文化旅游展、艺术演出、美食节等各类活动,为广西民众与东盟游客提供了深度体验彼此文化的机会。这种基于文化理解和情感认同而建立起来的联结,是维系和不断扩大旅游市场的深层纽带。当旅游被赋予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丰富内涵时,其发展便具备了更强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五、挑战审视:融合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困境

尽管广西在会展经济驱动旅游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这一发展模式在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挑战:

第一,“峰谷效应”问题依然突出。大型会展举办期间,各类资源供应紧张,而会展结束后,部分专门为会展建设或配置的设施利用率不足,这一矛盾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旅游收益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产业融合深度不够。“会展”与“旅游”在行政管理体制、市场推广策略、产品设计开发、数据统计核算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现象,未能完全实现规划同步推进、资源共享共用、营销一体化运作的理想状态。

第三,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且创新滞后。针对会展客商群体开发的深度体验式、个性化旅游产品相对匮乏,大多停留在常规的景点观光和购物层面,未能充分挖掘广西丰富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特色鲜明的产业资源等潜在优势。

第四,区域竞争日益加剧且人才短板明显。国内多个省市,如海南、云南、广东等,以及东盟国家自身,如

泰国、新加坡等，都在大力发展会展旅游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广西既精通国际会展运作规则，又熟悉旅游管理业务和跨文化交流技巧的复合型人才相对短缺，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五，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大型会展活动带来的集中性客流，对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积极践行绿色会展、智慧旅游的先进理念，实现经济收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是广西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要课题。

六、战略路径：迈向“会展 - 旅游”深度融合的发展新征程

为了有效应对各类挑战，最大限度地释放会展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驱动潜力，广西需要采取以下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建立由省级层面统一统筹协调的“会展 - 旅游”融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专门负责统筹规划相关工作。编制专项发展规划，推动实现会展场馆的高效利用、客源市场的相互输送、宣传推广的协同联动、数据资源的共享共用。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对会展旅游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给予鼓励和支持，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第二，打造“永不落幕的东博会”旅游产品体系。深化商务旅游发展，针对不同行业的参会者，精心设计精细化的产业考察线路、投资环境探访线路、商贸对接延伸旅游线路等；大力开发主题旅游产品，将东博会的年度主题延伸为年度旅游推广主题，打造如“东盟数字之旅”“绿色生态廊道探访”等具有特色的主题旅游线路；做强跨境旅游产业，充分利用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的相关政策优势，与东盟国家共同设计并推出更多享受免签、落地签等便利政策的跨境多日游环线产品；激活城市休闲旅游与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南宁、桂林、北海等主要会展举办城市的都市风情、夜间经济、博物馆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项目，延长会展客商在广西的停留时间，提高旅游消费额度。

第三，深化数字赋能与智慧化管理。加快建设统一的“智慧会展 - 旅游”大数据平台，通过对客源特征、消费偏好、流动轨迹等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精准营销推广和客流预警管理。积极推广线上展会模式与“云旅游”体验服务，不断拓展线上线下融合（OMO）的服务模式，有效缓解“峰谷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旅游产业的平稳发展。

第四，构建紧密协同的区域旅游合作圈。主动发起倡议并积极推动建立“中国（广西）—东盟会展旅游城市联盟”，在联合宣传推广、专业人才培养、旅游危机协同处理、行业标准共建等方面开展常态化的合作交流。将广西在“会展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转化为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网络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第五，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与培育专业队伍。制定绿色会展与可持续旅游的相关标准规范，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布展方式、数字化的会务办理模式以及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加强与高校、职业院校的合作，建立定向培养机制，重点培养会展策划、国际旅游管理、小语种服务、数字营销等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七、结论

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进程中，广西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重要的平台资源，正在生动演绎着“以会为媒，以展促游”的发展实践。研究表明，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核心的会展经济，通过直接的经济拉动、深远的品牌塑造、坚实的设施升级以及创新的产品引导等多种机制，强有力地推动着广西旅游产业在规模上不断扩张、在质量上不断实现变革与提升。其中，东盟因素已经内化为这一驱动模式的核心基因，深刻决定了其发展的主题方向、实施路径与整体格局。

然而，要将会展活动带来的“瞬时高峰”真正转化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高原”，广西仍然需要在深化产业融合程度、创新旅游产品供给、拓展区域协同合作范围、推进数字转型与绿色发展进程以及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战略攻坚。展望未来，广西应当更加自觉地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与RCEP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将自身打造成为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南宁渠道”，更是文化交流、民心相通、体验共享的“旅游枢纽”。这不仅是广西旅游产业自身实现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也为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通过积

极参与重大区域合作实现产业升级与兴边富民目标, 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广西方案”。其成功的发展经验, 有望在中国—东盟乃至“一带一路”更广阔的合作舞台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岑树田.广西与其他省市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比较研究[J].广西经济,2014,(07):49-51.
- [2]张磊,黄志勇.“南宁渠道”的性质、功能作用与成功经验[J].东南亚纵横,2014,(12):3-15.
- [3]梁广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区域能源发展之路[J].广西城镇建设,2007,(06):21-23.
- [4]郭峦.产业融合趋势下城市会展旅游产业集群的培育——以南宁市为例[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4):32-35.DOI:10.13624/j.cnki.jgupss.2011.04.020.
- [5]马宗福.会展旅游产品成长动力研究[D].广西大学,2008.

Strategic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s Tourism Industry Empowered by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a-ASEAN Cooperation Framework

Ji Biao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a-ASE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uangxi leverages i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conom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vents, represented by the China-ASEAN Expo, on Guangxi's tourism industry.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short term, th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conomy stimulates tourist flows and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event-driven effect"; in the long term, it aids in reshaping the tourism image, upgrading infrastructure, optimizing products, and moderniz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through the "brand-building effect" and the "industry-linkage effect." The ASEAN factor serves as a core hub, influenci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themes, scales,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ourism market, cooperation model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acing challenges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Guangxi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 tourism," create cross-border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tourism products,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mart operations, build a reg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transform short-term consumption peaks into long-term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contribute the "Guangxi Experience."

Keyword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economy;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China-ASEAN Expo; Guangxi; industrial integration; regional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科技文化融合背景下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建设研究

唐勳¹, 张羽涵¹, 孟钰婷¹, 葛蒲³, 张卓^{1*}

(1.西安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2.西安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3.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 在科技和文化紧密结合的国家策略环境下, 陕西作为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省份, 其红色旅游的发展逐渐从“依靠资源推动”向“注重内在品质提高”转变。方法: 从整理和剖析现有的有关学术书籍、政策资料等方面, 对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构建的理论依据、历史演变过程、当前研究成果和欠缺之处、政策环境以及行业发展态势等进行探讨; 深入到研究对象所在区域或相关实际应用场景, 对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构建在实际操作中的现实状况、存在的具体难题、利益相关方的行为特点、实际运行规则以及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 挑选与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构建有关的成功事例、失败事例或具有典型性的事例, 从对红色文化旅游具体举措、实施流程、效果与问题等进行深入分析的角度, 研究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构建在特定情形下的实践方式、关键影响要素、经验教训以及可复制推广的规则等。结果: 全面整理陕西红色文化旅游的资源条件和发展情况, 分析科技与文化结合在提升旅游感受、让红色资源活跃起来、传承红色精神等方面的主要作用。通过研究了解到, 目前陕西红色旅游存在科技运用不够深入、文化阐释不够完整、体验方式比较单一等状况。结论: 从技术支持、内容革新、行业交融、品牌打造方面, 给出打造沉浸感受系统、数字资源集合、跨领域产品及地区协作规则等办法, 用来提高内在质量和传播效果, 帮助陕西区域红色文化旅游持续良好发展。

关键词: 科技文化融合; 陕西红色文化旅游; 内涵建设; 沉浸式体验; 数字化赋能

基金项目: 西安医学院 2025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编号: S202511840108X); 西安医学院 2025 年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课题 (编号: 2025CCJG-15); 2025 年陕西省体育局常规课题 (编号: 2025132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84

前言

红色文化旅游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1]。陕西作为中国革命重要发源地之一, 拥有延安革命纪念地、西安事变纪念馆等丰富红色资源, 其红色旅游发展起步早、基础好, 已形成产业规模与品牌效应。传统“参观游览+讲解”这一难以满足现代游客对于深度体验、情感共鸣以及文化认知等多方面需求的模式, 在科技与文化不断融合成为推动红色旅游升级的重要突破口的大背景下, 因大数据、VR、AR、AI 等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并将革命历史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体验以深化文化内涵与教育功能的技术的出现而面临变革。基于上述变革,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如《陕西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和《关于推进旅游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明确提出的促进科技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含量与创新水平的要求, 这将为陕西红色文化旅游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方向指引。

作者简介: 唐 勳(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张羽涵(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统计学;
孟钰婷(2006—),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葛 蒲(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唐勳和张羽涵为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张 卓

1 科技文化融合背景下陕西红色文化旅游的现状审视与问题诊断

1.1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为内涵建设奠基，但科技应用浅层，未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陕西，这个作为中国革命重要发祥地的地方，因其红色文化资源所具备的既鲜明又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厚重性以及独特且能让人清晰辨识地域特征的辨识度，还有包含了革命遗址、纪念场馆、革命文物、革命精神等多个不同维度的内容，从而在科技与文化相互融合的背景之下，为红色旅游的内涵建设提供了像上天特别赐予的那样得天独厚的素材支撑，而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延安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红色精神 IP，它们所承载的不只是中国革命从充满艰难的阶段一步步走向胜利的那些珍贵的历史记忆，更是将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求真务实这些核心价值理念进行了凝练，成为了红色旅游内涵建设的核心内核与精神根基所在^[2]。

据陕西省文物基本数据（2024 版），全省共公布两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141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77 处；可移动革命文物 41226 件（套）。全省共有各类革命纪念馆 76 座，有依托革命文物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3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10 处。国家公布的两批 37 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中，陕西涉及川陕、陕甘、长征（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宁四个片区，10 个市的 68 个县（市、区）列入。陕西延安获批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革命文物类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3]。数量在全国处于靠前位置，为红色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资源方面的基础。

近些年来，陕西各个地方渐渐认识到科技助力的重要意义，开始试着把 VR/AR、大数据、多媒体等科技方法运用到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呈现当中，不过总体上还存在科技运用处于较浅层次、文化内在意义挖掘不够的状况，普遍落入“看重形式、轻视内涵”的错误认知里，大多数科技运用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展示层面，没有和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深入结合、协同发展^[4]。在陕西红色旅游的场景里，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方面，VR/AR 体验项目面临着内容单薄以及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像部分革命旧址所提供的 VR 体验，只是将历史图片进行简单拼接，或者做一些基础的场景模拟，而严重缺乏对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革命人物精神特质的深度还原，并且 AR 导览大多也仅仅局限于显示文物名称、年代这类基础信息，没有办法把历史细节和革命精神内核串联起来，这种浅层化的应用，不但不能让游客以沉浸式的方式去感受红色文化当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也难以引发游客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触动，相反，还很容易让游客形成“科技堆砌”“形式大于内容”的负面印象，进而对陕西红色旅游的品牌公信力和核心竞争力造成损害。

1.2 科技应用初起，体验渐丰，但文化解读零碎，红色精神传播缺乏系统

随着科技文化融合趋势的推进，陕西部分红色旅游景区已开始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尝试突破传统旅游模式的局限，丰富游客的体验形式。在沉浸式体验方面，延安红街推出的《延安延安》沉浸式演艺项目，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历史片段转化为沉浸式剧情，让游客通过场景互动，直观感受革命历史的艰辛与壮烈，该项目自 2022 年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 200 万人次，成为延安红色旅游的新亮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构建“数字照金”平台，通过 3D 建模技术还原历史风貌，游客可通过 APP 云参观革命旧址并查阅文物背景，实现红色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传播^[5]。但是其在文化挖掘与传播上存在碎片化问题，难形成完整认知体系。一是历史解读停留在事件层面，缺乏对背景、人物情感、精神内涵的挖掘，如讲解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仅介绍开垦过程，未深入解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及当代价值，游客仅知零散历史片段，无法整体认知红色精神；二是传播缺乏系统设计，不同景区、项目文化内容无关联，如延安革命旧址与照金革命根据地未构建“从照金到延安”的历史叙事体系，游客难形成完整红色历史认知。

1.3 政策支持加强，产业环境优化，但产业协同不足，科技文化融合缺乏合力

为在科技与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推动方面营造良好政策环境，陕西省政府及相关部门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在《陕西日报》发布“陕西红色旅游活力迸发”一文中提及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支持景区运用 VR、AR、AI 等技术去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以及建设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库，还设立专项扶持资金以鼓励景区与科技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展开合作来推动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同时在区域协同层面，陕西联合甘肃、宁夏等省（区）

发起“西北革命红色旅游联盟”以推动跨区域红色旅游资源整合与科技共享，并且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与各地级市区、各单位共同进行“陕西红色资源数字地图平台”的开发工作以实现区域内红色旅游资源的互联互通。然而，多方主体协同不足制约着融合进程^[6]。一是政府部门协同不足，文旅、科技、教育等部门政策衔接不畅、资源分配不均，如文旅部门侧重产品开发、科技部门侧重技术研发，缺乏常态化沟通机制，导致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旅游产品；二是景区与科技企业合作深度不足，多为“项目外包”模式，缺乏长期合作与技术迭代机制，如某景区 2021 年建成的 VR 项目因未及时更新，技术落后导致游客参与度下降；三是高校与产业联动薄弱，高校科研优势未与景区、企业需求有效对接，科研成果缺乏应用场景，产业发展难题难以获得科研支持，分散化发展模式难以形成整体合力。

1.4 市场需求升级，体验形式单一，内涵建设亟待加强以满足多元需求。

当前，旅游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与市场结构的持续分化，正驱动着红色旅游需求内核的显著升级，这就对陕西红色旅游的内在建设有了更高的标准。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 20 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与此同时，红色旅游景区及场馆等建设提速。近年来，全国重点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300 个，历史类博物馆、纪念馆 1644 家，历史类纪念馆累计推出主题展览 1.5 万个^[7]。游客在红色旅游方面对文化相关的额外价值需求也在提高，像对红色相关的文化创意商品、红色题材的特色饮食、红色主题的研究学习课程等附带产品的需求有明显增长。市场需求出现这样的改变，促使陕西红色旅游的供给侧不得不赶快推动科技和文化的融合进程，依靠内在品质的打造来增强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数据，2024 年《延安保育院》《红秀延安》《再回延安》共演出 2202 场，接待游客 83.76 万人次；《二虎守长安》实景剧演出 1085 场，接待游客 63 万人次；《1212 西安事变》实景剧演出 1731 场，接待游客 72 万人次；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仅 2025 年国庆首日接待游客便突破 2.5 万人次^[8]。这充分显示传统式“走马观花”的游览方式和导游输出式的历史讲解，难以满足他们对红色文化深入探究的需求。目前新生代群体对数字技术、高新技术领域更为熟悉，对能沉浸其中、有互动性、体现个人特色的旅游体验存在着更高的期望值。

2 科技文化融合背景下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建设的路径

2.1 问题导向与路径框架：构建“四维一体”的内涵建设体系

针对上述论述诊断出的科技运用表面化、文化阐释零散化、体验方式简单化以及产业协作不够这四个主要问题，本文给出了一条以“技术助力、内容革新、模式融合、品牌打造”为关键的“四个方面结合”的内在建设办法。这个办法体系想要有计划地跳出现在的难题，达成从“依靠资源”到“增强内在”的本质性改变。每条办法和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都有紧密联系，它们的逻辑关联和主要措施如下表 1 所示：

2.2 技术赋能：构建“科技+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体系

把技术方面的新创造当作关键，让 VR、AR、人工智能、全息投影这类当下的科技和红色文化好好地结合在一起，打造能让人有亲身感受的体系，加强情感上的相互呼应和对文化的体会。一是开发“场景化”沉浸式项目，结合延安窑洞生活、照金游击战争等红色场景，用 VR 技术 1:1 还原虚拟场景，让游客通过角色扮演参与历史事件，如“模拟延安文艺座谈会”中与虚拟革命前辈互动。二是运用 AR 实现“虚实结合”体验，在革命旧址、文物展品上叠加数字信息，如扫描延安枣园窑洞门牌号查看动态生活场景，扫描旧公文包触发革命故事动画，让静态文物“活”起来^[9]。三是运用人工智能提供“定制化”服务，依据大量数据剖析游客特点来制定游览路线和讲解内容，像为年轻人群体推荐研究学习项目、为老年人群体推荐回忆唤醒项目；研发人工智能红色讲解人员，借助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实时互动解答疑问，增强体验的适配性。

2.3 内容创新：打造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库与叙事体系

打造“整体化”数字资源集合，归集红色文物、文字材料、口头历史等资源，运用 3D 扫描、清晰拍摄的方式完成文物的数字化模型构建、文字材料的转录，创建“文物—历史—精神”多个层级的数据库，达成全省范围

的相互连通,游客能通过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查询和浏览。搭建“主题化”叙述系统,围绕“延安精神”“照金精神”等主要主题,结合旅游景区的特色规划有差别的内容,像延安景区以“革命圣地·精神传承”为重点,照金景区着重体现“陕甘边根据地·初心使命”;采用互动式纪录片、数字漫画等技术手段,把历史转变为鲜活的故事,提升吸引力。将红色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结合秦腔、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红色+非遗”数字项目,例如AR秦腔演出、3D打印红色剪纸作品,实现共同传播。最终实现以红色文化要素为重点,借助数字化方式归拢资源、重新构建叙述,增强文化底蕴。

2.4 业态融合:开发跨界融合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

打破业态边界,推动红色旅游与研学、文创、康养、数字经济融合,拓展内涵与外延。一是发展“科技+红色”研学旅游,针对青少年设计“体验-学习-实践”课程,如“重走长征路”VR课程、“红色科技创客”课程,引导学生用3D建模、编程设计红色科技作品;建设数字化研学基地,配备智能设备与虚拟实验室。二是开发“红色+文创”数字产品,设计科技感文创,如“红色记忆”智能手账、“延安精神”AR明信片;开发革命文物3D模型、红色数字画作等数字藏品,用区块链保障唯一性,吸引年轻群体。三是打造“红色+康养”产品,结合生态资源推出复合型体验,如南泥湾“农耕+红色教育+康养”项目,游客参与模拟开垦、住窑洞民宿;照金“红色研学+户外拓展”项目,设置定向越野、野外生存训练。此外,搭建“陕西红色旅游数字平台”,整合预约、导览、电商等功能,实现“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线上复购”闭环^[10]。

表1 四维一体内涵建设路径图

诊断出的核心问题	对应的建设路径	路径下的核心举措
科技应用浅层化 (重形式轻内涵,技术与文化、教育功能脱节)	技术赋能:构建“科技+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体系	在通过开发将角色扮演与历史互动进行融合的“场景化”VR/AR项目的进程之中,运用能够让静态文物以“虚实结合”的创新形式“活”起来的AR技术,并且引入旨在打造个性化服务与智能讲解功能的AI,以此来推动项目在互动性与智能化层面的全面提升。
文化解读碎片化 (历史叙事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地域文化融合)	内容创新:打造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库与叙事体系	通过促进资源互联互通的“一体化”数字资源库以及将用于串联历史事件与精神内核的“主题化”叙事体系加以构建的方式,推动红色文化与非遗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
体验形式单一化 (同质化严重,缺乏参与式、分众化产品)	业态融合:开发跨界融合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	推动“科技和红色”的研究学习旅游,规划有互动性的课程。研发“红色与文创”的数字化物品,像增强现实的明信片、数字化的收藏物品。构建“红色加康养”“红色加拓展”的综合型体验物品。
产业协同不足 (政产学研用脱节,缺乏长效机制)	品牌塑造:构建区域协同的红色旅游品牌传播体系	借助数字平台搭建传播体系,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内容。加强“西北红色旅游联盟”这类地区合作机制。同时打造特色标志(像卡通造型、数字推理游戏),增强品牌的吸引力。

2.5 品牌塑造:构建区域协同的红色旅游品牌传播体系

以品牌建设为抓手,通过科技赋能传播、区域协同、特色IP,提升品牌影响力。一是运用数字媒体打造传播矩阵,借助短视频、社交、直播平台,制作“VR云游延安”直播、“红色陕西”数字纪录片,用大数据精准推送内容,吸引年轻群体。二是强化区域协同,依托“西北红色旅游联盟”,联合甘、宁打造“西北红色走廊”品

牌,设计跨区域线路如“照金—延安—庆阳”溯源线,统一标识、共享资源、联合举办“西北红色文化科技节”。三是打造特色IP,设计“延小安”等卡通形象。

3 科技文化融合背景下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建设的保障措施

3.1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制度保障

政策是内涵建设的基础,需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制定专项扶持政策,聚焦数字化资源库、沉浸式体验项目等重点领域,出台补贴、税收减免、用地优惠政策,设立“陕西红色文化科技融合基金”,支持政企校合作研发与成果转化;二是健全标准规范,制定《陕西红色旅游科技应用规范》等文件,明确技术、内容及安全标准,避免科技应用娱乐化,同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从融合度、文化深度、游客满意度等维度考核;三是加强政策协同,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问题,推动与西北红色旅游联盟省份的跨区域政策对接,实现资源共享^[1]。

3.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人才是核心支撑,需构建多层次队伍:一是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联合高校企业设立“红色文化科技融合专业方向”,定期举办培训班,提升景区及企业人员VR/AR应用、数字化运营能力;二是引进高端人才,制订计划吸引红色文化研究、数字研发等领域人才,提供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支持,组建专家智库提供指导;三是提升基层人才素质,加强讲解员、研学导师等培训,开展服务技能大赛,以赛促学,提升服务质量。

3.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障项目实施

资金是项目落地关键,需构建多元投入机制:一是加大政府投入,将内涵建设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并逐年增额,重点支持公益性项目,同时争取国家专项资金;二是引导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特许经营吸引资本投入沉浸式场馆、数字平台等项目,搭建投融资平台,推动金融机构开发专项信贷产品;三是鼓励市场主体投入,引导景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创新项目给予奖励,形成政企社联动的投入格局^[12]。

4 结语

在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内涵建设,既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陕西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弘扬革命精神、助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陕西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梳理,剖析了当前在科技应用、文化解读、体验形式、产业协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业态融合、品牌塑造四个维度提出内涵建设路径,同时配套完善政策支持、加强人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强化风险防控等保障措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涵建设体系。

陕西红色文化旅游的内在打造是一项整体工作,离不开政府、景点、科技公司、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红色文化发掘的不断加深,陕西红色旅游得一直推进科技和文化的结合,既不能掉进“看重技术轻视文化”的表面化陷阱,也得避免“固守传统拒绝创新”的保守想法,始终把红色文化的核心精神当作根本,把科技作为助力工具,不断让旅游感受更丰富、文化内在更深入、品牌影响力更大,让红色旅游切实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课堂”、带动地区发展的“新动力”。

本次研究对陕西红色文化旅游的内涵构建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但不足之处任然存在,比如没有对实际的例子做深入的实际分析,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道路研究得不够等。接下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具体的例子,通过到实地去调研、对数据进行分析等方法,检验内涵构建途径的可操作性和效果,并且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特点,去探寻更有针对性的不同发展策略,给陕西红色文化旅游的内涵建设提供更精确的理论帮助和实践指导,帮助陕西在全国红色旅游发展中一直起到榜样作用,为红色文化的创造性改变和创新性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参考文献:

- [1]岳海静,武雅娇.数字化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职旅游专业的价值和有效路径[J].现代商业,2025,(21):19-21.
- [2]甘语,杨慕芝,莫惠淋,陈艳,庞荣敏.河池市山水旅游的“三色”宣传策略探析[J].中国市场,2025,(30):21-24.

- [3]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基本数据 (2024 版)[EB/OL]. (2024-06-04)[2026-01-22].
https://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tjxx/202406/t20240604_2332011.html.
- [4]陈万儒.昌都市红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西藏发展论坛,2025,(05):52-60.
- [5]王晶晶,方美清,史淑晴,张叶青.基于红色文化传承的乡村旅游景观设计——以盐城市楚九村为例[J].城市建筑,2025,22(19):58-62+85.
- [6]钟韵,张可辉.海南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路径探究[J].新西部,2025,(09):175-180.
- [7]连婉廷,洪晓楠.拓宽红色文旅价值链[N].经济日报, 2024-9-28(05).
- [8]李卫.陕西红色旅游活力迸发[N]. 陕西日报, 2025-06-03(10).
- [9]张迪.红色基因文化育人对甘肃省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中国军转民,2025,(18):175-177.
- [10]王倩,叶巧艳.历史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践策略——以宁德市寿宁县为例[J].智慧农业导刊,2025,5(18):88-91+96.
- [11]张虎.红色文化符号在特色小镇景观设计中的运用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25,16(09):127-130.
- [12]王丽莉,刘卫铭.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价值共创与实现路径[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7(05):67-71.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haanxi Red Cult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Xu Tang¹, Yuhan Zhang², Yuting Meng¹, Pu Ge³, Zhuo Zhang^{1*}

(¹School of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²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³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Shaanxi, as a major province rich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s fac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demand of its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resource-driven* to *connotation-enhanced*. **Methods:** 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existing academic works, policy docu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policy background and industry trends of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haanxi's red cultural tourism. Through in-depth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the locations of research objects or relevant practical scenarios, it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specific existing problem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stakeholders, practical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haanxi's red cultural tourism. By selecting successful, failed or representative cases related to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haanxi's red cultural tourism, and conduct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practices,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effects and problems of red 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actical modes,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s well as replicable and promotable rules of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Shaanxi's red cultural tourism in specific contexts. **Result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Shaanxi's red cultural tourism, and analyzes the core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enriching tourism experience, activating red resources and inheriting the red spiri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urrent red tourism in Shaanxi has such problems as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fragmente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single form of experience. **Conclus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content innovation,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ath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system, a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cross-border products and a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the connotation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facilita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tourism in Shaanxi.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Shaanxi Red Cultural Tourism;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 Digital Empowerment

简·坎皮恩传记电影的创伤叙事与身份建构

陈矿¹ 孟杨¹

(1.成都大学 影视与动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简·坎皮恩 (Jane Campion) 执导的《天使与我同桌》讲述了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精神创伤与自我救赎的历程, 影片颠覆了传统传记电影的“伟人神话”模式, 开创了以“创伤-创作”为核心的女性生命叙事范式, 体现了传记电影一次重要的类型突破。从三重中介实践来剖析传记电影, 文本层面将传记文学作品嵌入影像建立叙事权威; 身体层面呈现从规训客体到书写主体的转变; 叙事层面通过时空结构与话语建构经验整合。影片不仅是讲述故事, 更演示了创伤经验如何通过创作行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叙事。这一过程超越了传统传记片的纪念功能, 指向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身份建构与疗愈潜能。坎皮恩的影像实践为处理创伤、性别与创作关系的女性传记叙事提供了独特的美学方案与伦理立场。简·坎皮恩的作品始终贯穿着自觉的女性主义立场, 她透过电影深入揭示女性在社会规训、家庭结构及心理层面所承受的压迫与困境。坎皮恩的影片中, 着力表现女性如何逐步觉醒、反抗, 进而夺回对自我的掌控。《天使与我同桌》在传记电影谱系中呈现出独特面貌: 它放弃对传主公共成就的线性颂扬, 转而潜入新西兰作家珍妮特·弗雷姆充满创伤与创造的内在精神世界。这一转向不仅标志着导演简·坎皮恩对传统传记范式的突破, 更在理论层面引出一个核心问题: 电影如何将“无法言说”的创伤体验转化为可被感知、创造性自我建构的叙事? 本文认为, 坎皮恩通过建构一套精密的“叙事中介”系统回应了这一挑战。影片并非简单地再现弗雷姆从精神崩溃到文学认可的历程, 而是通过文本 (文学话语的嵌入)、身体 (从被规训到书写的转变) 与电影叙事本身 (时空与视角的重构) 的三重中介实践, 动态演示了创伤经验如何被艺术创作重新组织、赋予意义, 从而完成主体身份的艰难确立。这一“创伤-创作”的转化机制, 不仅为理解女性艺术家的生命叙事提供了关键路径, 也拓展了传记电影处理边缘经验、探索内在性的美学可能。

关键词: 简·坎皮恩; 传记电影; 女性故事; 创伤叙事

基金项目: 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课题“符号学视角下简·坎皮恩电影的叙事审美研究” (项目编号: AXYJ(WH)-2025-02);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人格心理学视角下当代传记电影研究” (项目编号: XLYXW2025019); 成都大学 2024—2026 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影视文学跨学科教学策略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 cdjgb202423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27

一、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创伤-创作”与叙事的中介性

“创伤-创作”是对个人或集体创伤经历进行表达、转化和反思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是创伤的再现, 更是一种疗愈与意义重建的过程。简·坎皮恩在《天使与我同桌》中对创伤叙事的中介性表达, 构建了创伤体验、创作者阐述与观众感知的缓冲地带, 既避免了创伤再现的直接冲击, 又实现了创伤意义的深度传递。这种中介性通过多维度展开, 依托叙事形式的艺术转化, 借力传记主人公的创作实践, 使创伤叙事成为连接个人伤痛与身份觉醒的桥梁。

(一) “创伤-创作”作为传记电影的亚类型

“创伤”最早是病理学术语, 人们将其定义为外部力量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后来“创伤”的研究领域逐渐延伸至心理与精神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后, 创伤理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如今, 创伤理论已发展成为涵盖心理

作者简介: 陈矿(1980—),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文学、比较文学与艺术美学;

孟杨(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影视编导。

学、文学批评、电影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领域^[180]。“创伤-创作”模式不同于旨在激发共鸣的苦难叙事，它是将创伤视为一种颠覆主体性、瓦解主观性的心理现实，将创作理解为应对、整合并转化这一现实的核心实践。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呈现两者之间动态的生产性关系：创伤是创作最深层的驱动力与原料，而创作则是对创伤进行的象征性程序化工作，是重建主体性的仪式。坎皮恩的电影多次触及创伤主题，包括童年创伤、性暴力、精神创伤等，且往往通过女性角色的视角展开。

在《天使与我同桌》中，这一创伤模式得以彻底贯彻。影片开端就详述了珍妮特充满否定性体验的早年生活：家庭贫困、重男轻女、相貌自卑、至亲死亡、社会适应差。这些累积性压力最终导致她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并在精神病院接受了长达八年的电击治疗。影片并未将这段经历处理为需要必须跨越的黑暗章节，而是如学者凯西·卡鲁斯所言，将其表现为一种“未被认领的经验”，一种持续侵扰其存在的心理实施^[2]。然而，影片平行展示了另一种线索：她对语言的早熟敏感、在困顿中坚持写作习惯、以及在绝望境地仍不忘内省与观察。正是这种将内在痛苦不断转化为文字的努力，使她最终免于精神瓦解，并为其日后的文学世界奠定了独特的精神基调与情感意象。因此，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对一个“创作发生学”过程的追踪，它追问：一个破碎的我，如何通过叙事行为，将自己重新编织起来。

（二）“叙事中介性”作为电影的核心

“中介性”在此是指电影并非被动反映现实的透明窗口，而是主动进行意义生产的媒介。“中介性”在坎皮恩电影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创伤通过某种媒介形式进行间接呈现；另一方面指创伤经历通过艺术创作过程实现转化，成为主体重建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中介。在“创伤-创作”框架下电影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用视听语言，呈现“无法言说”的创作内在体验，以及静默发生的、秘密的创作心理过程。坎皮恩的解决方案是，让电影自身成为一种强大的叙事中介。这意味着，电影不只是讲述珍妮特的故事，它通过其形式策略如旁白的使用、身体影像的呈现、时空结构的安排，来“表演”或“模拟”从创伤到叙事的转化工作。

电影形式与影片主题从而构成了深刻的同构关系。正如学者艾莉森·布斯在讨论传记电影时指出，电影的再现有其自身的“修辞”，它通过选择强调和结构来塑造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3]。在《天使与我同桌》中，这种“修辞”完全服务于展示叙事的建构性与疗愈功能，珍妮特的精神病院经历和电击治疗没有直接展现，而是通过她的写作、表情和行为变化来暗示。影片邀请观众目睹并体验，一个被社会话语所定义和禁锢的生命，通过夺取来行使自己的叙事权，最终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创造者。因此，分析这部影片，就必须细致拆解其作为“中介”的各类形式手段。

二、文本中的中介：旁白、引言与场景

坎皮恩在电影《天使与我同桌》中实现叙事中介最显著的特点，是直接让珍妮特·弗雷姆的文学作品“闯入”电影中，成为架构视听体验的骨架。这超越了传统画外音作为心理补充的功能，建立了一种文本与影像之间主导性的对话关系，从而在电影中重建了作家的叙事权威。

（一）文学旁白的叙事权威性

创伤的核心特征在于碎片化、非自愿复现难以用日常语言言说，而影片的旁白恰巧成为这种不可言说创伤的翻译器。影片中的大量旁白都是以珍妮特第一人称叙述的，但旁白的来源严格限定为她已经出版的自传、小说片段或是诗歌。例如，在描绘她童年悲惨的家庭生活的场景时，响起的是自传《到实岛去》中充满文学性的回顾“我们家的房子闻起来是悲伤的^[4]”这不是即时的内心活动，而是经过岁月沉淀和艺术加工后的回溯性叙述。这种策略产生了双重中介效果，它让观众直接聆听了成熟作家珍妮特的声音，一种冷静、清晰同时富有比喻的文学力量，这与其在画面中经常表现的自卑和笨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张力，提前预示了她最终的命运——不是被苦难吞噬而是用语言去驾驭苦难。

旁白与画面有着多种复杂的关系，有时是印证，画面演示旁白所叙述的内容。但更多时候是升华与阐释，比如画面展示的是珍妮特在精神病院劳作的痛苦画面而旁白却是赋予诗意的观察和哲学的沉思。这将观众的感知从对事件的关注转向了对记忆的重塑。旁白变成了一种过滤器或是转化机，它中介了观众对影片的接收，迫使我们以珍妮特文学思维的视角去理解她的生活。叙事权威由此从可观的历史记录转移到了主观传记主手中。

（二）印文与影像的互文性建构

印文（珍妮特·弗雷姆的文学作品、自传文本）与影响的互文性建构是简·坎皮恩实现创伤叙事“中介性”表达的核心策略。这种互文性并非简单的文字注解影像或影像印证文字，而是通过双向阐述破解不可言说的表达困境。影像聚焦于创伤场景的视觉痕迹——精神病院的白色病房、束缚性的医疗设备、珍妮特沉默紧绷的肢体语言，这些具象化画面为创伤提供了“可感知的空间在场”；而印文（以旁白、文字字幕形式呈现）则深入创伤的精神内核，如“语言被电击击碎，碎片在纸上重新拼接”这类文字，将生理痛苦转化为认知层面的隐喻，填补了影像无法触及的内心体验。这种“视觉场景+文字内核”的互文结构，使创伤记忆有具象化的真实感，保留了精神层面的深度，避免了影像直露再现的暴力性或文字表达的抽象化，形成“可见的场景”与“可感的痛苦”相互印证的立体叙事，让观众“看到”创伤的痕迹，又“理解”创伤的本质。

印文与影像的互文性建构是《天使与我同桌》创伤叙事的核心支撑，它通过双重锚定实现了创伤记忆的立体呈现，通过动态转化可视化了创作创伤的疗愈过程，通过伦理平衡完成了创伤叙事的双重见证。创伤的有效传递并非依赖单一形式的冲击，而是通过多媒介的协同阐释，在真实与伦理、感性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最终实现创伤意义的深度传递与自我重构。

（三）电影中构建的“写作声景”

传统电影理论长期以视觉为核心，而声景理论的介入彻底打破了这一格局。米歇尔·西翁曾提出“听觉对象”的概念，强调声音并非视觉的附属，而是具有独立表意功能的叙事单元。声景通过环境音、动作声与人生的层次组合，构建出视觉无法覆盖的“感知空间”^[5]。创伤的特征是“碎片化记忆、不可言说的感情、身体化的应激反应”而声景恰好通过其多感官性、心理外化性与空间建构性，成为创伤叙事的理想表达杂体，在《天使与我同桌》的“写作声景”中，这种关联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声景的断裂性与叠加性可以模拟创伤记忆的特征。在《天使与我同桌》中，珍妮特在精神病院中的写作声景以笔尖摩擦声、仪器的滴答声叠加模糊的人声，声音层次时而清楚时而混乱。当创伤记忆闪回时，仪器声和人声会突然放大，盖过写作声，以此来模拟创伤体验对创作过程的侵入。当珍妮特沉溺于写作时，笔尖声则为主导，其他声音逐渐弱化，体现创伤暂时被压制的状态。这种声景的断裂与叠加，精准还原了创伤记忆时而复现、时而隐匿的非连续性特征，比视觉更能传递创伤对认知的扰乱。

三、身体的中介：规训、症状与抵抗的可见性

在“创伤-创作”的转化中，身体是无法规避的战场。创伤深刻烙印与身体，而创作最初也源于身体的行动。在简·坎皮恩的创伤叙事体系中，身体并非单纯的生理载体，而是连接创伤体验、权力规训与自我抵抗的核心中介。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以“身体规训”为核心，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手段将权力渗透至身体的日常行为之中；而创伤理论则指出，创伤记忆会铭刻于身体表层与深层感知，形成无法被语言完全言说的“身体症状”^[6]。《天使与我同桌》极富洞察力地呈现了珍妮特的身体如何从被社会权力规训与诊断的客体，逐步转变成一个进行表达与抵抗的主体。简·坎皮恩塑造的女性不再局限于被动接受的姿态，而是通过主动实践来表现女性主体性。对女性身体的展示不同于主流电影的塑造方式。《天使与我同桌》中对珍妮特身体的呈现，是在一片蓝色大海中裸泳的身体。珍妮特绝对不是传统意义或者说符合男性审美的性感女性。导演通过诗意唯美的画面，将珍妮特的自然之美呈现出来，是对女性身体的承认和赞美。这种对身体规训的反抗，为简·坎皮恩的女性主义电影实践增添了新维度^[7]。

（一）被规训与诊断的身体

身体规训的核心逻辑是权力通过标准化、监控化、惩罚性手段，将身体塑造为“驯服、有用、可管理”的对象^[8]。在《天使与我同桌》的创伤叙事中，被规训并非简单的权力压迫，而是通过珍妮特的身体行为、感知模式、空间活动与话语潜力的系统性改造得以具像化。影片的前半部分，珍妮特的身体始终处于被他者凝视与制度规训之下。视觉构图不断强调她的出现是不合时宜。重男轻女的家庭始终使她处于边缘位置，在学校她不得偷钱买糖来讨好同学。通过对她牙齿和笨拙姿态的特写，放大了社会目光赋予她的“缺陷”。正如米歇尔·福柯关于“规训权力”中的论述，身体被置于一种“标准化判断”的凝视中，任何偏离都将被标识与纠正^[9]。

这种规训在精神病院达到顶峰，电击治疗场景是影片中身体叙事的高潮。坎皮恩并没有展示身体受虐的惨状，而是通过刺耳的设备启动声，悲惨的鸣叫与恐惧的双眼咬合的牙关搭配碎片化的剪辑，让观众从感官上体验那种

身体主动性被彻底剥脱的感受。诊断书上的精神分裂症则是一份权威的文本规训，它用医学话语重新定义了她的存在，将她的痛苦简化为一个病理标签，其身体由此被彻底客体化为一个需要治疗的病例。

（二）作为创伤症状的身体症状

坎皮恩通过珍妮特的身体中介，构建了创伤叙事的可见性平衡。通过规训症状的身体呈现，揭示了创伤与权力的暴力本质；通过抵抗性的身体实践，展现了创伤疗愈的可能路径。在精神病院的场景中，珍妮特的身体始终处于一种紧绷与僵化的状态：她的肩膀向内收缩，双臂紧贴身体两侧，坐姿僵硬如雕塑，肢体动作被压缩至最小范围。这种身体姿态并非自然反应，而是权力规训下的应激性症状。精神病院通过药物控制、行为监控与空间禁闭，剥夺了身体的自主运动权，迫使身体屈服于规训的标准化要求。当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检查时，珍妮特的身体呈现出“被动接受”的姿态，头部微微低垂，眼神回避，肌肉的紧绷与肢体的僵硬形成鲜明反差，暴露了权力对身体的压制，将创伤带来的恐惧与无助铭刻于身体动作之中。坎皮恩通过特写镜头捕捉珍妮特手指的细微颤抖——当她触摸纸笔时，手指的颤抖从轻微到剧烈，再到逐渐平复，这一身体动作的变化，恰恰是创伤未被整合的直接症状，也是权力规训在身体上留下的可见痕迹。

（三）身体抵抗的可见性

抵抗的可见性是身体作为创伤中介的主动纬度，是身体对压迫的反抗，是自我意识通过身体实践呈现的显性表达。在《天使与我同桌》中，被规训权力试图将珍妮特的身体改造为驯服、可管理、无主体的客体，但她并未陷入彻底的被动臣服，而是以身体为核心战场，通过写作行为完成了一场身体对抗权力的隐形革命，让原本被规训压制的、不可见的自我意识，转化为可被观众感知的身体实践，实现了身体从规训到抵抗的转换。

写作行为中的身体姿态，是珍妮特最核心的抵抗性媒介。在精神病院的角落，珍妮特蜷缩在床沿，以一种近乎“隐秘”的姿态进行写作，她的身体微微前倾，目光专注凝视着纸面，手指紧握笔杆，仿佛将全身的力量都聚集于笔尖。这一身体姿态与她在规训场景中的僵化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前倾的身体打破了“被动接受”的姿态，紧握笔杆的手指展现出自主的意志，聚焦于纸面的目光则象征着对内心世界的坚守。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核心是“剥夺身体的自主空间”，而珍妮特的写作姿态，恰恰是在规训空间中开辟出的“身体自留地”。她通过身体的蜷缩与专注，将外部的规训空间隔绝在外，构建出一个属于自我的创作空间。创伤的修复，最终需要回归身体本身，通过身体的感知复苏与实践抵抗，实现自我与创伤的和解。

四、叙事的中介：时间、空间与话语疗愈性重构

在《天使与我同桌》的创伤叙事中，时间、空间与话语作为叙事中介，并非单纯的叙事构成要素，而是承载创伤转化与疗愈功能的关键载体。坎皮恩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艺术重构，打破了创伤记忆的碎片化困境，为珍妮特的创伤疗愈与身份构建搭建了一条系统性路径。这种重构遵循创伤理论中的“叙事整合是疗愈核心”的基本主张，也契合传记电影“真实再现与艺术转化平衡”的创作理论，实现了创伤、创作与疗愈的契合。

（一）时间中介——创伤记忆的秩序化重构与创作转化

创伤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时间感知的紊乱”，创伤记忆以非自愿闪回的方式打破线性时间的秩序，是主体陷入“过去创伤与当下体验的纠缠”。坎皮恩通过时间中介的疗愈性重构，将珍妮特碎片化的创伤记忆转化为有序的创作叙事。影片并未采用传统传记电影的线性时间叙事，而是以“创伤节点—创作回应—意义生成”为逻辑，重构了珍妮特的人生时间线。如童年时期频繁的遭受否定、青年时期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强制治疗、成年后在创作中寻求认同的关键事件，并非按照时间线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创伤场景与创作创景的交叉剪辑形成时间对话。当影像呈现精神病院电击治疗的创伤场景时，穿插成年珍妮特在书桌前书写的画面，旁白响起她的文字“那些黑暗的时刻，最终成为我文字的光源”。这种时间重构让过去的创伤与当下的创作形成互文，保留了创伤记忆的真实性，通过创作行为赋予创伤时间以意义，使紊乱的时间感知重新获得秩序。

同时，时间中介的疗愈性体现在创伤记忆的可控制上。影片通过珍妮特在自传与文学作品中重新编排自己的人生时间，重点书写创伤后的创作历程，弱化创伤事件的暴力性细节，强化“创伤—创作—成长”的时间逻辑。这种对时间的主动掌控，呼应了创伤疗愈的关键在于“重新获得对记忆的掌控感”，而时间中介的重构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路径，让创伤记忆不再以非自愿闪回的方式侵扰当下，而是成为创作与自我成长的养分。

（二）空间中介——规训场域的突破与疗愈空间的建构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权力通过空间划分实现对身体的控制，而创伤的发生与疗愈往往与特定空间绑定^[1]。《天使与我同桌》中，空间作为叙事中介，通过“规训空间的解构”与“疗愈空间的建构”，推动珍妮特从“被禁锢的规训客体”转化为“自主的创作主体”。完成创伤疗愈的空间实践。

精神病院作为典型的“规训空间”，以白色墙壁、封闭病房、监控设施构建了“全景敞视”的权力网络，珍妮特的身体在此被限制、被观察、被改造。但坎皮恩并未将其塑造成纯粹的压迫空间，而是通过创作行为建构起“微观疗愈空间”。珍妮特在病房角落搭建的写作角落，以床铺、墙壁为屏障，形成与规训权力相对隔离的“私人领域”。影像中，这个角落常以暖色调光线呈现，与病房整体的冷色调形成对比，成为创伤环境中的“疗愈绿洲”。这种空间建构的中介意义在于，它让珍妮特在规训空间内部开辟出自主领域，通过写作行为实现对空间的“反向占有”，打破了规训权力对空间的绝对垄断。

（三）话语中介——规训标签的解构与创作话语的建构

话语作为权力运作的核心载体，在创伤叙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规训权力通过建构“异常”话语标签压迫主体，而创伤疗愈的本质之一，便是通过重构话语实现对压迫的反抗。《天使与我同桌》中，话语作为叙事中介，通过“解构规训话语”与“建构创作话语”的双重实践，推动珍妮特完成从“精神病人”到“写作者”的身份重构，实现创伤的话语疗愈。

精神病院的规训权力通过“诊断话语”对珍妮特进行身份暴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标签将她的行为、表达、思想全部定义为“异常”，剥夺了她的话语权利与身份合法性。影片中，医生的诊断报告、医护人员的指令性语言、病历上的文字记录，共同构成了压迫性的规训话语体系，让珍妮特陷入“失语”状态。而坎皮恩通过创作话语的建构，让珍妮特实现了话语突围：她的诗歌、小说、自传成为“自我话语”的载体，通过文字表达重构对自我的认知。例如，她在作品中写道“我不是疯癫，只是用不同的语言与世界对话”，直接对抗规训话语的标签化定义。这种创作话语的中介意义在于，它让珍妮特重新获得了话语权力，以文学语言替代规训语言，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自定义。

五、结语

简·坎皮恩《天使与我同桌》以“创伤-创作”为核心逻辑，完成了传记电影的类型革新与创伤叙事的美学突破。影片跳出传统传记片“伟人神话”的线性颂扬框架，将叙事重心从传主公共成就转向内在精神世界，通过文本、身体、叙事三重中介的协同运作，回应了创伤“不可言说”的表达难题。文本中介以文学旁白、印文影像互文构建符号化表达，身体中介实现从规训客体到抵抗主体的辩证转化，叙事中介通过时空重构与话语夺权完成经验整合，三者共同搭建起“创伤-创作-身份”的闭环，印证了赫尔曼（Herman）“叙事整合是创伤疗愈核心”的理论主张，为传记电影处理边缘经验提供了全新范式。

作为聚焦女性故事的创伤叙事实践，影片深刻践行女性主义立场，彰显了女性通过创作夺回主体性的力量。影片的核心价值在于拓展了传记电影“从再现到建构”的功能，为女性创伤经验的影像表达提供了伦理温度与学术深度的方案，其“以创作转化创伤、以叙事确立身份”的逻辑，为同类传记电影与女性叙事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与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1] 闫浩.冲突·和解·治愈：成长电影中的创伤叙事[J].新传奇,2025,(20):64-66.
- [2] 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62-63.
- [3] Booth,Alison.How to Make It as a Woman: Collective Biographical History from Victoria to the Present[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78-79.
- [4] [新西兰]珍妮特·弗雷姆:到实岛去 [M]. 吴文全,译.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67-68.
- [5] [法]米歇尔·西翁:声音 [M]. 张艾弓,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39.
- [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元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53-169
- [7] 张慧钰.简·坎皮恩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河南大学,2023.
- [8]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元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93-201.

- [9]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元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01-202.
 [10]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元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60-169.
 [11] 陈矿.阿伦·雷乃电影中的戏剧嵌套和身体表演[J].四川戏剧,2024,(12):102-105.
 [12] 陈矿.巴尔蒂斯的艺术追索与艺术自律下的审美[J].当代美术家,2023,(05):54-59.

Trauma Narrativ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ane Campion's Biographical Films

Chen Kuang¹, Meng Yang²

School of Film, Television and Anim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Jane Campion's *An Angel at My Table* depicts the journey of spiritual trauma and self-redemption of writer Janet Frame. Subverting the "myth of the great man" paradigm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biographical films, the work pioneers a female life narrative model centered on "trauma-creation," marking a significant generic breakthrough in biographical cinema. Analyzing the biographical film through the lens of triple mediatory practices: at the textual level, it embeds biographical literary works into the image to establish narrative authority; at the bodily level, it 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disciplined object to a writing subject; at the narrative level, it achieves experience integration through 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s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Beyond mere storytelling, the film demonstrates how traumatic experience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life narrative with subjective agency through creative practice. This process transcends the commemorativ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biopics, pointing to the identity-constructing and healing potential inherent in narrative itself. Campion's cinematic practice offers a unique aesthetic scheme and ethical stance for female biographical narratives that engage with the intersections of trauma, gender, and creativity. Campion's works have consistently embodied a conscious feminist stance, as she uses cinema to profoundly expose the oppression and predicaments endured by women within social discipline, family structures,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Her films strive to depict how women gradually awaken, resist, and ultimately reclaim control over themselves. *An Angel at My Table* presents a distinctive profile within the genealogy of biographical cinema: abandoning the linear celebration of the subject's public achievements, it instead delves into the inner spiritual world of New Zealand writer Janet Frame—one marked by trauma and creativity. This shift not only signifies Campion's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biographical paradigms but also raises a core theoretical question: How can cinema transform "unspeakable"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to a perceptible, creatively self-constructed narra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ampion responds to this challenge by constructing an elaborate system of "narrative mediation." Rather than simply reproducing Frame's journey from mental breakdown to literary acclaim, the film dynamically demonstrates, through triple mediatory practices—textual (the embedding of literary discourse), bodi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disciplined to writing), and cinematic narrative itsel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ime, space, and perspective)—how traumatic experiences are reorganised and endowed with meaning through artistic cre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arduous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e identity. Thi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uma-creation" not only provides a key pathway for understanding the life narratives of female artists but also expands the aesthetic possibilities of biographical cinema in engaging with marginal experiences and exploring interiority.

Keywords: Jane Campion ;Biographical Film;Female Narrative;Trauma Narrative

元宇宙视域下壮族炮龙节的创新传播策略研究

杨舒帆¹ 刘春仪¹ 韦美茹¹ 胡佳莹^{1*}

(1.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广西宾阳炮龙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仅承载着中国龙文化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内核, 更是壮族民俗节庆体系中具有高度仪式性与情感凝聚力的活态实践。在元宇宙技术架构不断重塑文化感知力与传播范式的当下, 这一传统节日面临着新的传播机遇。本研究从符号学角度出发, 首先解析炮龙节中各类民俗元素的符号意义, 使其通过海报设计进行视觉转化, 进而探讨在元宇宙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炮龙节的创新传播, 让古老民俗在现代科技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虚拟与现实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性传承”向“创新性传承”的范式转型。

关键词: 炮龙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符号; 数字化转译; 元宇宙传播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3KY0385); 202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25JGB298);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510603717); 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310603078); 202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25JGB481); 2025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GXGZJG2025B060); 2025年度南宁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2025JGX002); 2024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4KY037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43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宾阳炮龙节为研究对象, 聚焦其在元宇宙技术背景下的创新传播路径。炮龙节作为起源于宋代、成熟于清末民间的壮族特色民俗活动, 以“炸龙”“开光”等仪式作为核心, 承载着壮族民众祈求丰收、凝聚社群的精神内涵, 是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与文化张力的活态遗产。然而, 其传播长期受制于特定的时空场域与物理参与限制, 难以实现跨地域、可持续的文化遗产与价值扩散。在文化数字化战略下, 元宇宙凭借沉浸式、交互性特征, 为这一民俗的活态传承提供新路径。炮龙节民俗符号(如龙舞的动态形态、炮竹的视觉特征)的元宇宙转译, 既能还原“龙脚”光上身、戴清朝官帽风格头饰的仪式细节, 又能吸引跨地域用户参与, 成为突破传统传播局限的关键。在教育领域, 混合式知识共享模式的研究为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知识传递与创新提供了借鉴。Nonaka 和 Takeuchi 的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内部化(SECI)模型, 旨在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与创造力, 该模型在设计专业学生的应用中显示出积极效果, 为本研究如何实现炮龙节隐形民俗知识的显性化、系统化与再创造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持^[1]。此外, 社交媒体在提升学习自我效能方面的作用也为炮龙节的传播拓展了思路, 研究表明, 社交媒体辅助课程对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有显著积极影响^[2], 这提示我们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增强受众对炮龙节文化的认知与参与度, 进而推动其在元宇宙中的传播。

2. 研究意义

本研究不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方面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也为元宇宙技术与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参照。在实践意义层面, 直面炮龙节在传统传播模式中面临的时空与地域限制, 提出了一套可行的元宇宙转型路径, 为炮龙节这一活态遗产在数字时代找到新的存续方式。其次, 本研究提炼的设计策略与方法可

作者简介: 杨舒帆(2004—), 女,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刘春仪(2003—),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韦美茹(2001—), 女,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胡佳莹(1993—), 女,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艺术设计, 艺术教育学。

以为其他面临类似传承困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可借鉴的范式与案例。在理论意义层面,本研究推动了传播学、设计学与文化遗产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借助符号学理论,剖析了民俗事像如何被系统地解构为文化符号,并在元宇宙这一新场域中进行有效的视觉转译与意义再生。同时,引入 SECI 知识创造模型,为理解隐形民俗知识如何转化为可以被广泛传播和深刻理解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深化我们对于数字环境下文化传播内在机制的认识。

(二)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炮龙节民俗元素在海报设计中的应用与转化,探索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路径。以现代化媒体背景下宾阳炮龙文化的传播策略研究为主线,以宾阳炮龙文化的起源、传播价值作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考察法、文献法、逻辑分类法进行研究,全面、深入地探讨炮龙节民俗元素在海报设计中的转化过程及其艺术价值,促进炮龙文化在快速发展的媒体时代下更快速、更完整的传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深入探究宾阳炮龙节的元宇宙传播价值,一方面可通过解构民俗符号的数字转译规律,为同类民俗节庆的元宇宙传播提供参考,丰富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实践框架;另一方面能以 AR 开光互动、虚拟炸龙等创新形式,吸引年轻一代以“参与者”身份走进民俗——用户可通过移动端 AR 触发虚拟神龙“点睛”仪式,或在元宇宙中组队控制虚拟龙完成“穿巷”动作,这种互动体验能让年轻群体深度感知炮龙节的禳灾祈福内涵,为传承注入数字活力,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弘扬,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三) 文献综述

在数字化语境下,探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炮龙节的创新传播路径,需建立在对其文化价值、当代传承困境与前沿技术范式的系统性梳理之上。该领域的现有研究呈现出从文化基础分析到现实挑战诊断,最终迈向元宇宙范式转型的清晰演进脉络,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起点。

首先,在文化基石层面,研究从历史源流与社会经济维度完成了对炮龙节的价值锚定。有历史学考据揭示了炮龙节源于北宋狄青夜袭昆仑关的传说,关键地指明了炮龙节作为壮汉文化融合产物的本质,奠定了其符号的多元性^[3]。节日最初源于农耕社会祭祀活动,民众通过燃放炮竹、龙腾舞表演等仪式祈求丰收、驱邪护平安,后逐渐演变为渴望丰收、祈愿平安的独具特色民俗文化形态。超越历史源流,根据社会学分析,有研究系统化了炮龙节的文化构成与社会功能,阐明了其作为一个集仪式、精神、制度与物态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如何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经济与文化传承等多重效能^[4]。在当代叙事中,炮龙节的价值进一步升华,有研究论证了炮龙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的独特潜力^[5]。而另一实证研究则揭示了炮龙节已形成显著的“节庆经济”效应,为后续的产业化与数字化开发提供了现实依据^[6]。

这一深厚的文化价值在当代社会中却面临着仪式消解、传承危机与创新乏力的多重现实困境。有田野调查深刻揭示了仪式本真性的消解,指出炮龙节仪式中最神圣与威严的“开光”致辞,被现代噪音所干扰,传统“八音开道”因传承人群萎缩而被简化和替代,仪式的严谨性和文化深度流于表面化和娱乐化^[7]。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了传承生态的危机,核心技艺因传承周期与经济回报的矛盾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8]。在面向公众的传播前端,现有文创实践存在严重的同质化与肤浅化问题^[9]。虽然有研究提出了文化符号学下的 IP 本土化设计路径,但其论述本身也反衬出当前设计转化普遍缺乏深度与系统性,最终导致整体传播模式对年轻群体吸引力不足^[10]。

为应对这些系统性困境,学术探索呈现出从设计改良到元宇宙范式革命的破局前瞻。早期的解决方案多集中于设计学本体的改良,但是这些思路难以突破物理时空与单向传播的根本限制,真正的范式革命源于元宇宙概念的引入。有研究构建了关键的理论框架,指出元宇宙将引发非遗在从独创到众创的创作、从单线到网状的传播、从静态到体验的消费这三大维度的根本性嬗变,为实现数字活态化提供了颠覆性的迭代模式^[11]。该理论框架与前沿的科技艺术探索高度契合,有研究基于波兰国家文化中心的前瞻性工作,深入探讨了元宇宙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创造性潜力,元宇宙的沉浸式多感官体验、实时渲染交互与数据永久连续性,正催生一个全新的艺术表达空间。在此,创作者可以突破物理法则,动态交互的设计允许作品随观众输入实时演变,从而将观众从被动观看转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增强观众与艺术作品的沉浸式互动^[12-13]。这为重构炮龙节的仪式场景、活化其文化符号,构建一个可持续的、由用户共同参与的“数字民俗生态”提供了切实的技术哲学基础。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清晰勾勒出炮龙节从文化价值、现实困境到前沿理论的研究全景。学界正经历一个从分散设计实践向整合性技术范式探索的关键转型。本研究在这一脉络下,致力于将元宇宙的核心特性与炮龙节的具体文化要素和传播痛点进行深度融合,提出系统性的创新传播策略。这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设计学在数字文明中深化内涵与拓展疆域的历史机遇。

二、海报设计中的视觉元素与表现手法

（一）海报设计的基本视觉元素

海报设计中文字、图形和色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作用的。设计师需精准把握元素平衡与比例，让文字清晰易读、图形生动创意、色彩和谐有感染力，实现信息传达与艺术表现的统一，让海报成为连接节日文化与观众感知的视觉桥梁。

文字设计首要保证可读性，字体与炮龙节的整体风格协调，清晰传达活动时间、地点、简介等关键信息；排版上通过巧妙行距、字距设置增强节奏感与视觉舒适度；图形元素承担着营造氛围与传递文化内涵的重要功能，大红灯笼以鲜艳色彩和圆润外形象征吉祥如意，欢庆锣鼓的饱满鼓面与舞动鼓槌传递现场热烈气氛，威严庄重的龙头作为核心视觉焦点，则通过精致的细节刻画和力量感姿态，展现炮龙节神圣而震撼的文化特质；色彩处理突出立体感与层次感，以红色为主色调，搭配金色、黄色等暖色调，契合节日喜庆氛围，强化了整体的视觉张力与情感共鸣。这些元素的系统整合，共同构成炮龙节海报独特的视觉语言与传播效力。

（二）海报设计的构图原则与方法

在炮龙节海报的视觉布局中，对灯笼、锣鼓、人物和炮龙等核心元素的安排，采用了三种设计原则构建画面的秩序与张力。

对称式平衡：将龙头置于海报中心垂直轴线上，两侧对称分布相同数量、形态的灯笼，营造庄重规整的视觉感受。这种构图强化了节庆仪式的庄重感与神圣感，符合传统文化中正平和的审美意蕴。

不对称平衡：在画面一侧密集排列几个大灯笼，另一侧放置一组奋力敲锣打鼓的人物形象，利用元素大小、疏密和视觉重量的差异达成动态平衡，让海报充满活力与灵动性。这种布局避免了绝对对称的刻板，赋予画面生动的节奏感与临场氛围。

对比原则：以体量巨大的龙头作为绝对视觉焦点，较小的灯笼、人物等元素分布周围，突出主次关系，增强视觉冲击力，同时也建立了信息层级，强调了龙头在炮龙节中的核心地位。

需注意的是，海报中的静态视觉元素（如龙头、灯笼）可作为元宇宙场景的“入口”，例如本研究中“炮龙街”APP的AR扫龙逻辑，用户扫描海报中的龙头元素，即可触发元宇宙场景入口，进入虚拟街巷参与“炸龙”互动，同时将海报中的色彩体系同步至元宇宙场景，确保视觉体验的一致性，实现“平面传播—沉浸式体验”的升级。

（三）海报设计中的图形创意与表现

图形创意是炮龙节海报设计的核心支柱，它直接决定了海报的视觉吸引力与文化表现力，是赋予炮龙节海报灵魂与魅力的关键所在。凭借独特的图形创意和表现手法，通过元素的创新性融合与艺术化处理，能让海报更生动有趣，精准抓住观众眼球。在创意构思上，本研究大胆突破常规思维，推动元素创新融合：将炮龙节的龙头与当地代表性建筑元素巧妙结合，让传统民俗文化与地域特色紧密相连，既充分展现炮龙节深厚的文化底蕴，又鲜明凸显地方独特风貌，使观众在视觉层面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具体图形元素方面，大红灯笼以鲜艳色彩和圆润的外形象征吉祥如意；欢庆的锣鼓通过鼓槌的动态轨迹与鼓面的震动感，直观传递出现场的热烈气氛；龙头作为核心视觉焦点，以威严造型、精致细节和充满力量感的姿态彰显神圣庄重，经精心色彩处理后更凸显立体感与层次感。

在图形表现手法上，夸张变形是增强视觉冲击力的关键。对灯笼进行艺术化变形，使其环绕在龙头周围，营造出奇幻而独特的视觉效果。以金色光芒从龙头处向外散发，象征炮龙节的吉祥如意与繁荣景象，照亮周围的灯笼和人物，为整个画面奠定光辉繁荣的基调，光芒线条设计得流畅且富有动感，既强化了节日的神圣氛围，又为画面注入鲜活活力，构建出一个既根植于传统有充满视觉新意的炮龙节形象。

三、“千年炮韵，独舞龙乡”海报设计实践

（一）设计构思与主题确定

在设计“千年炮韵，独舞龙乡”主题海报之际，确立清晰的设计构思与主题方向是首要环节。为确保作品具备应有的文化深度与艺术感染力，设计者必须深入理解炮龙节这一民俗事象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核。为此，设计者开始进行系统性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实地考察宾阳炮龙节现场，沉浸式感受民众的激昂情绪、鞭炮齐鸣的震撼场景与巨龙舞动的磅礴气势。走访炮龙节的发源地，与当地资深的手工艺人面对面交流，聆听他们口口相传的扎龙绝技、舞龙精髓（图1-3），记录下那些世代传承的技艺诀窍与仪式细节。宾阳炮龙活动包含游彩架、

灯酒会、舞炮龙三大环节，其中最吸引观众的是夜晚炸龙活动。当地炸龙是指观众用点燃的特定鞭炮炸街巷中狂舞的龙（如图4）。活动先以神秘的“开光”仪式请神龙下凡，随后龙脚们挥舞巨龙穿梭街巷，民众持续炸龙至仅剩龙头，活动常延续至天亮。这一独特艺术形式展现了当地人民的智慧创造力，成为宝贵的艺术财富。舞炮龙的龙脚着装极具特色：光上身、穿舞龙特制裤，头戴具清朝官帽风格的帽子（如图5）。开光火光照明现场，炸龙场面尤为狂闹，数十条龙穿行街巷（图6），鞭炮烟雾笼罩县城，人山人海的男女老少皆点燃鞭炮扔向龙身，祈求来年平安顺利。

实地调研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构成了本次海报设计理念生成的基础。设计旨在超越对节日表象的简单描绘，致力于对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进行视觉提纯与艺术升华。通过构建富有感染力的视觉画面，引导观众感知千年民俗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活力，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与匠心传承。



图1 龙头制作工艺



图2 炮龙队伍图



图3 炸龙现场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4 炸龙场景



图5 舞龙者(龙脚) 着装



图6 炮龙街头

(图片来源网络)

（二）炮龙节民俗元素的提取与重构

在炮龙节主题海报设计中，对民俗元素的提取与重构是一场艺术的再创作。龙舞（图7），作为炮龙节的灵魂，其灵动矫健、蜿蜒穿梭的身姿被凝练为设计中的核心图形，那舞动的形态宛如夜空中悦动的金色火焰，蕴含着无尽的力量，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鞭炮炸起的烟雾，以金色和白色为主色调，从龙的四周扩散，仿佛一层薄纱轻柔地笼罩着喧嚣与欢乐，营造出如梦似幻的神秘氛围，为整个画面蒙上一层别具韵味的薄纱，打破了实体元素的稳定结构，又为画面注入了强烈的动感与节奏。在元素布局上，高挂街头的红灯笼作为吉祥与团圆的传统符号，安排在海报的边缘或背景中，以温暖的视觉调性烘托整体氛围；锣鼓则通过简洁的线条与规整的圆形勾勒出立体感，将锣鼓放置在龙头的下方，通过位置关联强化元素间的叙事互动；最具张力的人物元素——奋力舞动的舞龙者，通过充满力量的动态姿势，展现出与龙头融为一体的气势，成为传递节日活力与人文精神的关键载体。这些元素兼具独特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是节日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符号意义，体现当地人民文化情怀与价值追求，可转化为强视觉冲击力的符号图腾。

基于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理论，炮龙节的龙形象可解构为 Icon（图像符号）-鞭炮炸龙场景（图8）、Index（指示符号）-驱邪祈福功能（如锣鼓声对应的仪式氛围）、Symbol（象征符号）-民族文化认同的三重维度。这种符号结构为元宇宙场景中的要素转化提供了理论支点：图像符号可通过粒子特效还原炸龙场景的烟雾动态（图8），指示符号可设计为 AR 互动触发点（如扫描海报中锣鼓元素解锁祈福语音），象征符号可融入虚拟龙身的纹样设计（图9），让元宇宙传播既保留文化内核，又具备可参与性。



图 7 龙舞



图 8 鞭炮炸龙



图 9 龙纹样

(图片来源网络)

(三) 传统民俗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的融合

在海报与相关应用设计中,将传统民俗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可以使海报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是实现文化有效传播的关键。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视觉风格的创新上,更延伸至交互逻辑与用户体验的层面。

炮龙节是蕴含深厚民俗文化底蕴的盛大节日,每年吸引众多游客与本地居民共襄盛举。为满足人们在节日期间对特色商品采购、文化体验以及便捷服务的需求,“炮龙街”商城 APP 应运而生(图 10)。本 APP 构建了一个集文化体验、社交互动与便捷消费于一体的数字空间。用户不仅可以在 APP 中选购特色商品,还能通过内置的 AR 扫描功能扫描海报上的龙形图案,解锁优惠并触发互动体验,形成“用户触发 AR 扫龙→解锁优惠券→商城消费→生成社交分享海报”的完整体验闭环。

APP 的 UI 设计充分融入了社交传播机制。用户可以分享自己购买的文创产品或在 APP 中了解到的炮龙节文化知识,也可以在专属的文化社区内交流见解、讲述亲身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激发用户的参与感与感知力,使其成为炮龙节文化的主动传播节点,借助社交网络吸引更多潜在用户,让传统民俗在当代社会关系中焕发新的活力。



图 10 炮龙街 UI 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四、设计作品的展示

(一) 海报设计

本系列海报设计以展现炮龙节的独特魅力与文化活力为核心目标,设计灵感源于炮龙节网络图片,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提炼,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与重组(图 11)。在视觉构图上,海报将炮龙形象作为核心元素,占据中心画面,整体构图紧凑,强化其作为节日灵魂的视觉地位,瞬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在色彩选取上,大量运用鲜艳夺目且极具感染力的红、黄、橙等暖色调,呼应节日热烈吉祥的氛围基调,再加入青、蓝等冷色作为点缀,冷暖的交织与对比避免了画面的单调,使色彩关系更为丰富,也隐喻了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语境下所蕴含的

深厚底蕴与鲜活生命力。通过“千年炮韵，独舞龙乡”这幅作品，希望能让观者直观感受到炮龙节的视觉震撼，了解和喜爱炮龙节这一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感受炮龙之乡的独一无二的文化风情。



图 11 炮龙节系列插画海报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二) 延展设计

在炮龙节的系列延展设计中，设计者开发了一套文化小卡。该设计以寓意吉祥的祝福成语作为核心文本元素，采用环绕式排版，使文字光芒从视觉中心向四周发散。小卡中央以威严的龙头作为绝对主体，周围辅以简洁现代的几何线条来装饰衬托。这种设计既强化了视觉的集中性与现代感，又通过“图与文”的有机结合，将炮龙节蕴含的攘灾祈福、吉祥瑞纳的民俗寓意转化为易于传播且直观的视觉礼物，向民众传递来自炮龙之乡的美好生活祝愿（图 12）。



图 12 炮龙节系列小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三) 色彩搭配

色彩搭配以红色系作为基调，辅以金色和橙色进行点缀，并搭配少量冷色调增强画面层次感和视觉的丰富度。整体色彩在突出节日热烈气氛的同时，还充分考量色彩的对比度、饱和度以及明度等要素。高对比度的色彩组合，如黄与蓝、红与绿，能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而适度降低饱和度，可使画面更具柔和、舒适之感。插画海报采用的配色有 C73 M0 Y97 K0、C10 M100 Y100 K0、C76 M11 Y16 K0、C0 M59 Y94 K0、C0 M36 Y96 K0；UI 设计采用的配色有 #EF5050、#FE3A39、#F2BB47、40%黑；系列小卡采用的配色有 R156 G30 B35、R193 G69 B30、R234 G157 B28、R141 G199 B118、R59 G186 B158。

五、总结

本研究通过插画海报、UI 界面等一系列设计实践，成功将宾阳炮龙节这一千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的视觉语言，在保留其文化内核的同时，探索了传统民俗的现代化表达路径。设计成果表明，通过符号提炼、色彩转译与交互创新，炮龙节的文化魅力得以跨越时空限制，以更直观的方式感染现代受众，为非遗的当代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但本研究多依托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缺乏社会学定量分析、民俗学深度访谈等跨学科研究，对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文化认知与社会影响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不足，难以全面把握炮龙节在当代社会

中的复杂价值与真实意义。未来研究可基于此进行优化,一是重点探索元宇宙技术与炮龙节的深度融合路径,例如开发基于龙头制作工艺的数字孪生建模工具,使用户在虚拟空间中学习扎龙技艺,也可以设计“线下炸龙—线上同步虚拟直播”模式,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将实体龙的动态同步至元宇宙场景,构建“虚实共庆”的参与模式。同时可基于系列小卡等视觉元素开发数字藏品,拓展炮龙节的文创价值与传播边界。二是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将炮龙节与国内外同类民俗节庆进行系统对比,在差异中提炼文化独特性,在共性中寻求可借鉴的传播策略,提升文化识别度与国际影响力,助力炮龙节成长为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 [1] Hu J, Lee J, Yi X. Blended knowledge sharing model in design professional[J]. Sci Rep,2023, 13:16326.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43505-z>
- [2] Hu J, Lai Y, Yi X.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assisted course on learning self-efficacy[J]. Sci Rep,2024, 14:10112.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4-60724-0>
- [3] 游伟民,覃凤余.从宾阳“炮龙节”源于狄青夜袭昆仑关说起[J].广西民族研究,2009,(03):134-137.
- [4] 庄园,谢智学,罗金富.宾阳炮龙节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探析[J].武术研究,2022,7(12):109-111.DOI:10.13293/j.cnki.wskx.009827.
- [5] 肖静,钟金华.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优化路径研究——以广西宾阳炮龙节为例[J].新楚文化,2025,(10):77-79.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5.10.024.
- [6] 翟翠丽,伍广津,周英.中国炮龙狂欢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技,2022,43(02):29-31+34.DOI:10.14038/j.cnki.tykj.2022.02.007.
- [7] 王邦安,王小嫦,赵晟.新时代背景下炮龙节价值与出路的探寻[J].中国民族博览,2021,(15):65-68.
- [8] 陈妍.宾阳炮龙节非遗文化传播研究[D].南宁师范大学,2024.DOI:10.27037/d.cnki.ggxsc.2024.000524.
- [9] 凌婕.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探究——以宾阳炮龙节为例[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9(03):104-107.
- [10] 刘昱豪.文化符号学视域下宾阳炮龙节动漫IP衍生品设计本土化研究[J].天工,2025,(01):54-56.
- [11] 成乔明.元宇宙时代非遗数字活态化的嬗变和迭代模式[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4):69-73+92.
- [12] Kępińska A, Wiśniewski R. Metaverse and its creative potential for visual arts[J].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anae. Folia Sociologica, 2023 (85): 57-75.10.18778/0208-600x.85.04
- [13] Wei L, Xiaoyu C. Immersive Creativity: Redefining Artistic Expression in the Metaverse E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Design, and Metaverse, 2025, 3(1).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Zhuang Cannon

Dragon Festival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Metaverse

Shufan Yang¹, Chunyi Liu¹, Meiru Wei¹, Jiaying Hu^{1*}

(1.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Guangxi Binyang Fire Dragon Festival embodies both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Chinese dragon culture, serving as a vital ritual practice that strengthens social cohesion among the Zhuang community. Amidst the ongoing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by metaverse technologies, this study employs semiotic analysis to decode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festival's folk elements and visually transforms them through poster design. Furthermore, it investigates how digital innovation in the metaverse can revitalize this tradition, facilitating a shift from “protective inheritance” to “innovative inheritance” in both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Keywords: Cannon Dragon Festiv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 Symbols; Digital Translation; Metaverse Communication.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的个人学术应用界面设计研究

曾文昊¹ 刘春仪¹ 潘钰¹ 胡佳莹^{1*}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 在当前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背景下, 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课题申报、论文发表和学术资源管理等一系列复杂任务不仅消耗了大量时间, 也对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构成了挑战。针对现有学术管理工具在协同工作、信息整合、用户界面友好性和交互体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提出了“助研师”APP 的 UI 界面设计方案。该方案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 旨在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工具, 如何赋能并优化学术类应用程序的界面设计流程, 并创建一个集成化、智能化的学术管理平台, 以提升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学术成果的质量。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 深入探讨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学术应用界面设计原则, 视觉元素的应用以及用户需求。通过高保真原型设计, 展示了“助研师”APP 的界面架构、色彩规范、图标设计、LOGO 设计以及 IP 形象设计, 通过界面设计的创新来增强用户交互体验, 满足科研人员对高效、智能化学术管理工具的需求。此外, 本研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助研师”APP 相关的衍生产品设计, 以扩展其在学术界、教育界、产业界以及公众与文化领域的应用和影响力。

关键词: 学术管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 UI 界面设计; 大数据分析;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25JGB298); 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2310603078); 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25JGB481); 2025 年度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GXGZJG2025B060); 2023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2023KY0385); 2025 年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题 (JGY2025257); 2025 年度南宁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 (2025JGX00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42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 学术研究领域正迎来新一轮改革, 科研工作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课题申报的复杂性、发表投稿的繁琐性以及学术资源的分散性大量消耗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也使得学术材料的管理与整合、团队间的协同工作等方面成为了制约科研工作效率的瓶颈。在对高校师生的论文及课题管理进行的调查中, 本研究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学术材料的复杂性迫使研究者频繁切换不同平台以完成不同的学术管理任务。其次, 现有的学术管理工具普遍缺乏协同管理功能, 团队沟通与合作不畅。最后, 许多学术网站或平台操作复杂、数据不互通、功能单一, 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管理的难度。

针对这些问题, 前人虽已进行了诸多探索, 但现有工具在平台切换, 协同沟通和功能集成等方面仍显不足。本研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视角下, 以“助研师”APP 为例, 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的界面设计新模式, 展示一站式个人学术研究管理界面的设计研究。该应用融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 致力于统一管理学术材料、促进科研团队高效协同并整合学术资源, 有效应对当前学术管理中的材料复杂、跨平台操作频繁、协同功能欠缺以及系统互通性差等问题。通过该 APP 的推广和应用, 有望显著提升科研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简介: 曾文昊 (2002—), 男, 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

刘春仪 (2003—),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潘钰 (2001—), 女,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胡佳莹 (1993—), 女,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艺术设计, 艺术教育学。

（二）文献综述

优秀的用户界面与用户体验是决定数字产品成败的关键。出色的界面设计是视觉美学的呈现，也是实现高效人机互动，满足用户视觉感受和使用体验及用户的信息获取需求的核心。然而当前大部分 UI 设计仅停留在简单的界面美术设计和对设计软件的简单应用上，缺乏对布局功能性与合理性的深入思考，未能充分遵循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导致用户在操作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1]。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个人学术界面设计的研究可深度融合知识管理理论与社交媒体辅助学习的实证成果。有研究基于 SECI 模型，构建了混合知识共享活动框架，该框架整合了线上线下学习环境，并引入“Ba”作为知识共享的时空场所，通过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和内部化四个阶段促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效与创造力^[2]。此外，社交媒体辅助教学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基于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将学习自我效能划分为行为效能和能力效能，进一步细分为能力感、努力感、环境感、控制感、兴趣感与信念感六个维度。通过准实验研究验证了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与内容共享机制能够正面影响学生学习自我效能^[3]。这些研究为构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驱动的个人学术界面提供了理论依据，界面设计需兼顾知识转化的动态过程与用户自我效能的心理建构，创建一个高效、智能、个性化的学术环境。

在界面设计的视觉要素方面，色彩设计对用户体验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诺曼的情感化设计理论，本能层次的设计方法能有效捕捉用户直觉反应，通过暖色调、低饱和度等色彩策略激发积极情绪^[4]。有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色彩应用需遵循整体性、严谨性与呼应性原则，确保界面视觉和谐与功能清晰^[5]。此外，视觉元素的系统性整合也备受关注，通过协调色彩、文本、图形等视觉等元素，可以优化人机交互流程应提升信息传播效率^[6]。

在界面结构与秩序感方面，有观点提出界面设计应借鉴传统绘画的“秩序感”原则，构建符合人类视觉认知的布局^[7]。同时，设计需遵循一致性等原则并充分考虑用户习惯，降低认知负荷，提高用户满意度^[8]。用色彩等视觉手段传递情感和引导心理，实现信息的高效传递^[9]。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界面设计自动化与视觉内容生成方面展现出显著潜力。以 Midjourney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绘图工具能够通过文本指令快速生成界面效果图、图标、吉祥物、布局方案等视觉元素，有效提升设计效率并拓展创意边界^[10-11]。在技术路径上，生成对抗网络，深度学习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路径为 UI 设计的自动化提供了系统支持，实现了从视觉元素生成到交互原型构建的全流程辅助，推动设计模式向语义驱动与人机协同方向演进^[12]。在个性化与自适应设计方面，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能力使界面能够动态调整视觉表现与交互逻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的界面^[13]。在教育实践中，人工智能工具被整合进设计课程体系，通过 Midjourney 进行视觉素材创作，结合 DeepSeek 等工具生成界面代码，形成从视觉到交互的完整设计链路，提升学生设计效率与作品完成度^[14]。

基于现有界面设计研究大多聚焦于孤立的视觉元素或通用的交互原则，缺乏“多功能集成”等复杂场景的专门性、系统化设计研究。本研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将相关设计原则与人工智能技术路径应用于“助研师”APP 界面设计并弥补上述缺陷，通过统一的视觉语言、符合认知规律的操作流程和强化协同功能，致力于解决现有学术工具的不足，为科研人员提供真正高效的一站式学术管理解决方案。

二、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梳理适用于学术管理工具界面的核心设计原则，通过对色彩情感、视觉设计、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等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为精准传达“助研师”APP 作为专业科研工具所需的严谨性、可靠性与冷静感，最终确立了以蓝色和白色为核心的主色调方案。蓝色在色彩心理学中被广泛证明能够有效传递专业、冷静与可信赖的情感，而白色背景则能确保内容的可读性和空间感。此色彩方案通过理论指导，支持用户长时间专注工作，同时强化界面的专业性质。

2. 案例研究法

案例一: Airbnb 的简洁导航设计 (图 1)。该应用将住宿、服务和体验重构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平台架构中。通过精心设计的底部导航栏和清晰的图标语义来实现核心功能的直观呈现与快速切换。既不影响用户阅读页面内容, 又保持了页面的完整性。本研究基于此设计理念, 在“助研师”APP 中采用类似的导航结构, 有效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和操作负担, 应对平台切换频繁的问题。

案例二: 亚马逊的信息整合逻辑 (图 2)。该应用是信息整合与个性化推荐的典范。界面布局清晰明了, 在一个商品详情页内有效整合了离散的商品信息和用户行为信息, 极大丰富了信息的维度。本研究借鉴亚马逊的信息整合方法, 打破信息壁垒, 建构知识关联网络, 提升研究人员的探索效率和洞察深度, 有效应对学术管理软件的“功能单一、数据不互通”等难点。



图 1 爱彼迎 APP 首页

(来源: 爱彼迎 APP)



图 2 亚马逊购物 APP 首页

(来源: 亚马逊购物 APP)

3.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高校师生在学术管理中的核心难点, 验证“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用户需求, 通过具体的问题让用户自我暴露痛点, 内容涵盖学术工作平台使用数量、团队协作效率评估、跨平台操作频率等关键维度。通过线上渠道向目标群体发放, 回收有效问卷 217 份, 89.6% 用户需求集中于“一站式管理”与“团队协作”, 为“助研师”APP 的核心功能定位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 界面框架设计

“助研师”APP 是一款专门为高校师生及科研人员量身打造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学术管理工具。其设计理念旨在解决学术管理、合作与资源匹配方面的个人难题, 同时也为高校老师提供副业发展的平台, 降低学生寻求辅导服务时的风险。通过“助研师”APP, 用户可以轻松实现论文管理、投稿记录、课题申请、职称评定、合作协同等任务的高效完成, 让学术之路更加顺畅。“助研师”APP 核心功能模块 (图 3)。



图 3 助研师 APP 主要功能

(来源: 作者自绘)

1. 论文管理助手包括全面的个人学术管理功能 (论文状态跟踪、投稿信息记录, 课题申请等) 与被拒次数和反馈处理功能。

2. 课题管理功能支持课题申请、进度跟踪, 协同工作等多种操作, 同时也提供完善的协同工作功能。

3. 职称评定指南为用户提供职称评定标准、评审材料准备、时间线管理, 智能评估与建议和个人业绩梳理等功能。

4. 导师多元副业机会为高校教师提供辅导、咨询等副业发展机会, 用户也可以在平台上找到合适的副业项目。

5. 学生课外辅导支援提供丰富的辅导资源, 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寻找合适的资源和伙伴。

三、视觉设计实践

（一）色彩与图标规范

主色调：界面采用蓝色(#2A5CAA) 和白色 (#FFFFFF) 作为核心色调。赋予蓝白色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新内涵，蓝色被诠释为智能与可靠性的视觉符号，白色基底确保了交互的专注与高效，共同塑造了一个专业且充满智能感的学术界面形象。

图标系统：TAB 栏采用线面结合设计，选中态蓝渐变强化焦点（图 4）。



图 4 助研师 APP TAB 栏图标

（来源：作者自绘）

金刚区晶白风格图标增强识别度（图 5）。



图 5 助研师 APP 金刚区图标

（来源：作者自绘）

（二）品牌形象设计

助研师的 Logo 将学术帽和一本翻开的书结合在一起，展现了其代表的学术领域的特色。

学术帽作为知识和智慧的象征，在 Logo 中起到了重要的角色。它代表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专业性，同时也展示了助研师对于学术成就的尊重和追求。翻开的书籍则代表学习和知识的积累。书籍是知识的载体，翻开的状态象征着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探索。Logo 整体采用蓝色调，与助研师的界面色调相呼应，蓝色常常与稳重、信赖、智慧和冷静等特质相联系，符合助研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定位（图 6）。

助研师的 IP 形象——小研（图 7），以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形态为基础，融合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科技特质与服务元素。小研头戴学术帽，凸显不断学习和进取的精神。耳朵部分由钢笔和铅笔组成，既体现了知识的积累，又展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创造与逻辑输出的能力。小研的设计将学术传统与智能前沿相结合，在视觉层面上构建出可信赖的智能学术伙伴形象。符合助研师的角色定位，也能在用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为品牌形象传播助力。



图 6 助研师 APP logo 草图与成品

（来源：作者自绘）



图 7 助研师 IP 形象草图

（来源：作者自绘）

（三）UI 设计界面

“助研师”APP 高保真界面视觉设计,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下完成的系统性方案,界面设计围绕学术用户的核心需求展开,各页面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符合学术研究场景需求。

登录页(图 8)采用极简设计风格,突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区域,登录流程便捷安全。底部展示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链接,确保注册流程的规范性。

首页(图 9)作为核心功能区,采用清晰的层级结构展示各项功能。顶部设置搜索功能区,提供热门搜索词引导探索研究方向。主体部分划分五个核心功能模块,采用强识别度的统一图标。中部“资源广场”板块展示不同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配备专业的学科标签和访问数据。底部“导师课题”区域提供专项导师介绍和线上讲座信息,实时显示预约人数,增强用户参与感。

社区页(图 10)采用三栏式导航设计,分类展示学术圈热点内容。页面以卡片形式呈现多个学术话题,每个话题卡片清晰展示互动数据,方便用户快速了解话题热度。页面布局层次分明,信息密度适中,便于用户浏览和参与讨论。

消息页(图 11)采用清晰的功能分区,顶部设置“提醒”和“私信”双标签页。“提醒”页面系统组织了各类社交动态,“私信”页面构建了完整的即时通讯环境。消息页通过层次化的信息架构和直观的视觉设计,满足了科研工作者日常沟通的需求,为学术协作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

个人页(图 12)顶部展示用户基本信息,中部设置账户管理功能和学术活动管理模块。页面通过明确的功能分区和统一的视觉设计,实现复杂功能的清晰呈现,方便用户快速定位。



图 8 登录页



图 9 首页



图 10 社区页



图 11 消息页



图 12 个人页

图 8-图 12 助研师 APP 高保真界面 (来源: 作者自绘)

为具体呈现“助研师”APP 的交互细节和视觉设计,本研究选取部分功能界面作为设计案例(图 13)。



图 13 助研师 APP 部分功能界面设计案例 (来源: 作者自绘)

四、创新价值与验证

本研究的核心创新价值聚焦于“多功能集成”这一特定且复杂的学术研究管理场景，提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学术应用界面设计研究新范式”，构建了一套从理论指导到设计实践，再通过原型进行有效性验证的完整研究闭环。

“助研师”APP集成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学术材料统一管理、科研团队协同合作及学术资源整合，显著减少用户在跨任务切换中的操作步骤与认知中断，为科研人员构建了一个高效、协作且支持知识持续生长的数字工作环境。同时推动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科研人员可以互享研究成果和想法，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性的探索与实践，论证了针对“多功能集成”复杂场景的界面设计必须超越通用原则的简单套用，而应该构建一个以用户需求洞察为驱动、理论为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完整设计范式。研究经过对高校师生论文及课题管理的深入调查，精准识别出现有生态中存在的四大核心难题：学术材料复杂难管理、频繁跨平台操作降低科研效率、团队成员间协同沟通机制匮乏，学术平台在操作逻辑、功能单一和数据互通性上的固有缺陷。

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线上问卷调查和访谈形式，了解到大众对学术管理APP的需求，将理论洞察转化为具体实践，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潜力与界面设计理论，确定了“研助师”APP这一集成化解决方案，以象征专业可靠与冷静的蓝色调和白色调为核心色系，融合学士帽和书本意向的Logo与智能化身IP形象“小研”，建立起高度一致的品牌识别系统，并整合了涵盖导师副业、学生辅导、论文管理、课题管理，职称评定的多功能模块。

“助研师”APP能够切实提升科研人员在信息管理、资源整合和研究协作方面的效率，在深层次上回应了当前学术研究环境中的现实痛点。

展望未来，“助研师”APP应持续优化和升级，致力于构建更开放的学术资源生态系统，接入全球知识库与科研数据库，并增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智能推荐和预测分析功能，以满足科研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随着数字科研环境的持续演进，界面设计作为人机交互的关键枢纽，将愈发重要。未来的研究应持续推动学术支持工具向智能化、个性化和人性化发展，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加高效的科研环境。

参考文献：

- [1] 黄启骏.UI设计的交互性与界面视觉设计研究[J].数字通信世界,2022(09):56-58
- [2] Hu, J., Lee, J. & Yi, X. Blended knowledge sharing model in design professional. Sci Rep 13, 16326 (2023).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43505-z>
- [3] Hu, J., Lai, Y. & Yi, X.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assisted course on learning self-efficacy. Sci Rep 14, 10112 (2024).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4-60724-0>
- [4] 何扬帆.基于用户本能层次APP界面色彩设计方法研究[J].色彩,2023(12):29-31.
- [5] 彭斯礼.UI设计中的色彩应用研究[J].数字通信世界,2022(05):97-99.
- [6] 高海燕.视觉艺术元素融入UI界面设计探究[J].大观,2024(01):30-32.
- [7] 徐萌萌.绘画与设计中的秩序感——兼谈界面设计的教与学[J].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03):18-20.
- [8] 李敏.视觉元素在界面设计中的传达与应用分析[J].大众文艺,2019(11):103-104.
- [9] 国宏宇.色彩情感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作用[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4,4(06):30-32.

- [10] 苏优优.基于人工智能绘图工具辅助的 UI 界面设计应用探析[J].计算机时代,2025,(01):53-57.
- [11] 王蕾.AIGC 绘图工具在 UI 界面设计中的应用探析——以 Midjourney 为例[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3,19(26):108-111.
- [12] 胡名杰.基于 AIGC 的 UI 设计自动化提升效率的技术路径探索[J].丝网印刷,2025,(03):136-138.
- [13] 戴圣轩.人工智能时代下用户界面视觉设计趋势与创新策略研究[J].包装与设计,2025,(01):108-109.
- [14] 朱爽蕾,苏伟.人工智能赋能“界面设计”课程探索[J].印刷与数字媒体技术研究,2025,(S1):78-83.

Exploring Interface Design for Personal Academic Ap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nhao Zeng¹, Chunyi Liu¹, Yu Pan¹, Jiaying Hu^{1*}

(1.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Nanning)

Abstract: Ami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cademic research, researchers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mplex tasks such as project proposal submission, paper publication, and academic resource management not only consume significant time but also reduce work efficiency.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academic management tools in collaborative work,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user-friendly interfaces,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this study leverage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propose a UI design for the “Research Assistant” app. Utilizing AI and big data analytics, this design explores how generative AI, as a novel productivity tool, can enhance and streamline the interface design process for academic applications, thereby creating an integrated and intelligent academic management platform to improve researchers’ efficiency and output quality. The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surveys to investigate the principles of generative AI-supported interface design for academic applications, the use of visual elements, and user needs. Specifically, through high-fidelity prototyping, the app’s interface architecture, color specifications, icons, logo, and IP image are demonstrated, with innovative design enhancing the user experience to meet the demand for efficient and intelligent academic management tool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a range of derivative products to expand the app’s application and impact across academia, education, industry, and public and cultural sectors.

Keywords: Academic managemen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I interface design; Big data analysis; User interactive experience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建构、历史演变与当代设计转译研究

年政旭¹ 吴鑫馨¹ 孙旭¹ 贾涵迪¹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春节图形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体系的核心载体, 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时间意识、原始信仰与伦理观念。本文以索绪尔符号学“能指-所指”理论为核心框架, 结合情感化设计中的记忆符号逻辑, 系统剖析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生成机制、历史演变脉络与当代转译路径。研究发现,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过程呈现“文化内涵提炼—能指系统建构—所指意义锚定—结构方式联结”的完整逻辑链, 其历史演变历经“萌芽—发展—成熟—转型”四个阶段, 当代转译需兼顾感官与行为记忆的双重唤醒。通过分析民间木版年画、剪纸、织绣等载体中的春节图形(如秦琼敬德门神、鱼纹剪纸、“福”字造型等), 揭示符号化与历史演变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价值, 为传统图形符号的现代设计应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春节图形符号; 符号化; 历史演变; 能指与所指; 视觉传达设计; 转译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50

一、春节图形符号化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维度

(一) 符号学框架: 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建构

“视觉识别设计的 历史渊源及对中国的影响和视觉识别设计美的演进因素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索绪尔符号学理论为春节图形符号化研究提供核心分析工具。春节图形符号的“能指系统”表现为具体的视觉形态, 涵盖民间木版年画、剪纸、织绣等物质载体中的人物、动物、植物、汉字四类题材。人物题材中, 陕西凤翔的《坐虎秦琼敬德》年画以夸

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游鱼形态, 成为“连年有余”符号的视觉载体; 汉字题材中, 各种变体“福”字通过笔画的艺术化变形, 形成多样化的能指表达。

“所指系统”则指向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秦琼敬德门神对应避灾驱邪的信仰诉求, 鱼纹剪纸关联子孙繁衍、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 “福”字造型则凝聚着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五福”理念。二者通过标识、象征、谐音、再现四种结构方式建立稳定关联, 如鱼纹通过“鱼”与“余”的谐音实现能指与所指的联结, 构成完整的符号系统。

(二) 文化内涵: 符号化的价值根基

“传统春节是中国人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综合影响的结果, 而传统春节图形符号则是这种结果的外在圆融表达。”春节图形的符号化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内核。从精神价值层面, 承载着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与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 从民俗生活层面, 凝结着岁末祭祀、团圆祈福等生活实践的集体记忆, 如天津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中, 童子抱鱼的造型再现了春节团圆祈福的民俗场景; 从审美范式层面, 延

作者简介: 年政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吴鑫馨(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孙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贾涵迪(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续着对称饱满的构图、鲜明浓烈的色彩等传统艺术特征，如四川绵竹的《天官赐福》年画，以红、黄为主色调，构图对称均衡，彰显传统审美特质。这些文化内涵为符号化提供了丰富的意义来源，确保符号在历史传承中保持文化辨识度。

（三）记忆符号属性：情感共鸣的生成机制

“情感不只来自于感官直觉的激发，更是产生于对岁月的回顾和经历的记忆。”依据情感化设计理论，春节图形符号兼具感官记忆与行为记忆双重属性。感官记忆符号通过视觉（如《富贵牡丹》织绣的艳丽色彩）、触觉（如蔚县剪纸的镂空肌理）等刺激唤醒文化联想；行为记忆符号则依托“贴春联”“剪窗花”等民俗行为强化体验认知，如山东郯城的门笺剪纸，张贴时遵循“头红二绿三黄，四水红，五子登科”的色彩顺序，这种固定的张贴行为成为符号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协同作用，使春节图形符号超越单纯的视觉符号范畴，成为连接个体记忆与集体文化的情感纽带。

二、春节图形符号的历史演变脉络

（一）萌芽期：先秦至秦汉——祭祀为本，符号初现

“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化的多元化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群体都要寻找和保留文化的根脉，“和而不同”，这“不同”恰恰就是此群体之文化区别于他者之处。”以春节图形符号为例，先秦时期，春节图形符号以祭祀场景为核心，处于萌芽状态。当时岁首祭祀是核心民俗，图形符号主要用于记录祭祀行为，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以五人一组拉手舞蹈的造型，记录了先民年终祭祀的场景，成为最早的春节相关人物题材符号。这一时期的动物题材符号多为图腾崇拜的延续，如仰韶文化半坡型彩陶上的鱼纹、商周青铜器上的凤鸟纹，虽未明确指向春节，但为后世春节吉祥图形奠定基础。

秦汉时期，春节图形符号逐渐明确化。随着岁首时间固定（汉武帝太初元年确立正月为岁首），祭祀礼仪规范化，出现了瓦当、青铜器上的吉祥图案与文字符号。瓦当上的“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文字，丝织品上的“延年益寿”纹样，以及画像石上的龙纹、鹿纹，开始承载祈福纳吉的内涵。特别是云气纹与仙人、四神组合的图形，成为春节吉祥符号的重要雏形，如汉代铜洗上的鱼纹，已初步具备“连年有余”的寓意雏形。

（二）发展期：魏晋至隋唐——信仰融合，题材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教思想影响加深，春节图形符号题材进一步拓展。佛教中的莲花纹、忍冬纹融入春节相关装饰，如墓室壁画中的莲花纹样，逐渐成为吉祥寓意的载体。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人日剪彩”的习俗，剪纸符号初现，如剪彩为人形、鸡形张贴于门户，寄托避邪祈福之意。门神符号开始从抽象走向具象，神荼、郁垒的形象在桃符上逐渐固定，成为春节门饰的核心符号。

隋唐时期，春节成为法定假日，图形符号趋向华丽饱满。唐代年画雏形出现，门神画、钟馗画开始流行，如秦琼、尉迟敬德的门神形象逐渐取代神荼、郁垒，成为民间追捧的对象。花卉题材符号兴起，牡丹因象征富贵成为主流，与鸾鸟、仙鹤组合成“富贵长寿”图形，如唐代织绣中的“牡丹鸾鸟纹”。十二生肖符号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型，杨执一墓志上的十二生肖雕刻，为后世春节生肖符号奠定基础。

（三）成熟期：宋元至明清——体系完善，寓意鲜明

宋元时期，春节图形符号体系逐步完善。木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推动年画普及，门神画、灶神画、财神画形成系列，如北宋开封市场上售卖的门神、钟馗画，题材涵盖避邪、祈福、纳财等多重寓意。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谐音吉祥图形，如“马上封侯”（马与猴组合）、“金玉满堂”（金鱼与海棠组合），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联结更加紧密。剪纸艺术成熟，窗花、门笺成为春节必备装饰，题材包括花鸟、人物、文字，如“福”字剪纸开始流行。

明清时期，春节图形符号达到鼎盛，形成“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特征。木版年画产地形成地域特色，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产地的年画，题材丰富、造型精美。门神符号多样化，秦琼敬德、关羽张飞、钟馗等形象并存，如陕西凤翔的《骑马秦琼敬德》年画，造型夸张、色彩浓烈；吉祥组合图形成成熟，如“五福捧寿”（五只蝙蝠围绕寿桃）、“麒麟送子”（麒麟背负童子）、“连年有余”（童子抱鱼）等，成为经典符号。织绣中的“四季富贵”（牡丹与四季花卉组合）、“瓜瓞绵绵”（瓜与蝴蝶组合），剪纸中的“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组合），汉字中的变体“福”字（如倒贴“福”字寓意“福到”），构成完整的春节图形符号体系。

（四）转型期：近现代——功能延续，形式革新

近现代以来，春节图形符号在传承传统内涵的同时，形式与载体发生革新。城市中，年画、剪纸逐渐从手工

制作转向机器生产，题材上保留经典吉祥符号，如门神、“福”字、鱼纹，但造型更简洁。20 世纪后期，春节图形符号融入现代设计，如海报、包装中的春节元素，开始采用现代构图与色彩搭配。

当代社会，春节图形符号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征。数字媒体的发展使符号载体多元化，动态“福”字、电子春联、生肖表情包等应运而生；同时，传统符号被重新解读，如将剪纸鱼纹简化为几何图形应用于品牌设计，门神形象转化为文创产品图案，既延续避邪祈福的核心内涵，又适应现代生活场景。

三、春节图形符号化的生成路径

（一）内涵提炼：从文化基因到符号内核

“在我国，传统装饰图案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春节图形为例，春节图形的符号化始于文化内涵的精准提炼，核心聚焦三个维度：一是时间意识内涵，源于农耕社会的岁时周期，体现为年终祭祀、辞旧迎新的时间自觉，如古代“春牛图”以牛的造型象征春耕伊始，提炼出节气更替的时间内涵；二是信仰内涵，涵盖避灾驱邪、祈福纳吉、子孙繁衍等原始信仰诉求，如钟馗门神年画提炼出驱邪避灾的核心内涵；三是伦理内涵，融合儒释道思想中的仁爱孝悌、和谐共生等道德理念，如《三星图》（福、禄、寿三星）提炼出尊老爱幼、祈福纳祥的伦理追求。这些内涵经过历史积淀，成为春节图形符号化的核心内核。

（二）能指建构：传统元素的视觉固化

能指系统的建构是符号化的关键环节，表现为传统视觉元素的筛选与固化。在造型层面，提取门神的威严造型、鱼纹的简洁曲线、汉字的方正结构等典型特征，如秦琼敬德门神的铜锏、钢鞭武器造型，成为其能指的标志性元素；在色彩层面，确立红色（喜庆）、黄色（尊贵）、金色（吉祥）等具有文化寓意的色彩体系，如春节剪纸多以红色为主色调，象征喜庆吉祥；在载体层面，依托木版年画的线条张力、剪纸的镂空质感、织绣的纹样肌理，形成多元且统一的视觉表达，如苏州桃花坞年画《麒麟送子》以细腻的线条、饱满的色彩，固化为“子孙兴旺”的视觉符号。这种视觉固化使文化内涵获得可感知的外在形态。

（三）意义锚定：所指与能指的稳定联结

意义锚定通过约定俗成的文化惯例，建立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联。一方面，通过谐音手法实现意义转化，如蝙蝠纹与“福”谐音，河北武强年画《五福捧寿》中，五只蝙蝠围绕寿桃的造型，锚定“五福临门”的吉祥意义；另一方面，通过象征手法赋予符号固定内涵，如牡丹纹在织绣作品中常与海棠组合，象征“满堂富贵”，龙纹与凤纹搭配构成“龙凤呈祥”，锚定婚姻美满的意义；此外，通过再现手法还原民俗场景，如年画《灶君》再现了祭祀灶神的民俗活动，直接锚定祈福避祸的文化意义。

四、春节图形符号的当代设计转译策略

（一）形态转译：传统元素的现代重构

形态转译需在保留符号核心特征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创新。造型上，采用简化、夸张、重组等手法，如将陕西凤翔门神年画中秦琼敬德的造型简化为几何线条符号，应用于某品牌春节限定款包装的标识设计，既保留人物的核心轮廓，又适配现代审美；色彩上，传承传统色彩寓意的同时，结合现代色彩搭配规律，如某电商平台的春节首页设计，将传统红色与浅灰色调和，搭配少量金色点缀，既彰显节日氛围，又避免色彩过于浓烈刺眼；构图上，借鉴传统对称饱满的特点，融入现代设计的留白、均衡理念，如某春节主题海报设计，以居中对称的构图放置简化的鱼纹剪纸元素，两侧留白搭配简洁的“连年有余”文字，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审美平衡。

（二）情感转译：多感官记忆的协同唤醒

结合情感化设计理论，实现感官与行为记忆的双重唤醒。在感官体验层面，除视觉符号外，融入触觉（如某春节限定款文具套装，采用模拟剪纸肌理的纸张材质，触摸时能感知镂空纹路与纸张质感）、听觉（如某春节主题 H5 设计，用户点击春联符号时，触发传统鞭炮声与春联诵读声的音效）等多感官元素；在行为体验层面，设计互动式场景，如某社交平台推出的“剪窗花送祝福”互动活动，用户通过手指滑动模拟剪纸动作，生成个性化窗花符号并分享给好友，或某品牌推出的 DIY “福”字红包设计，用户可自行拼接不同字体的“福”字部件，强化对符号的情感认同。

（三）场景转译：跨领域的应用拓展

突破传统应用场景限制，实现多领域的符号延伸。在平面设计领域，应用于节日海报、年货包装、书籍装帧

等,如某坚果品牌的春节包装设计,将传统剪纸中的牡丹、鱼纹符号组合,印于包装表面,搭配镂空的“福”字开窗设计,兼具美观与实用性;在数字媒体领域,转化为APP图标、动态表情包、网页元素等,如某聊天软件推出的春节表情包,将“福”字、春联、门神等符号设计为动态形象,赋予传统符号趣味性;在空间设计领域,应用于室内装饰、公共空间标识等,如某商场的春节装饰设计,将放大的剪纸鱼纹符号悬挂于中庭,搭配红色灯带,营造节日氛围,同时在导视牌设计中融入简化的门笺符号,增强空间的文化氛围。

五、结语

春节图形符号的符号化过程与历史演变相伴相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视觉化、情感化的动态过程。从先秦祭祀场景的简单记录,到明清“图必有意”的成熟体系,再到当代的多元转译,春节图形符号始终坚守避灾祈福、团圆和谐的核心内涵,同时不断调整能指形态以适应时代变迁。其符号化的核心在于通过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建构,实现文化内涵的精准传递与集体记忆的持续延续。

在当代设计语境中,春节图形符号的转译既需坚守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尊重其历史演变规律,确保符号的文化辨识度;又需勇于突破传统形式束缚,通过形态、情感、场景的多维创新,赋予符号现代生命力。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新技术(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在符号创作中的应用,以及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符号表达策略,使春节图形符号成为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当代设计中焕发持久活力。

参考文献:

- [1] 刘绍勇.品牌视觉识别设计美学研究[D].吉林大学,2020.DOI:10.27162/d.cnki.gjlin.2020.000239.
- [2] 童彦婷.图必有意,意必吉祥[D].武汉理工大学,2013.
- [3] 朱镔.消解设计的界限[J].21世纪商业评论,2010,(04):108-109+111-112.
- [4] 杨慧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
- [5] 张来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包装工程,2008,(08):156-158+216.

A study o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design translation of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Zhengxu Nian¹ Xinxin Wu¹ Xu Sun¹ Handi Jia¹

(¹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carrier of the symbolic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embody the time consciousness, primitive beliefs, and ethical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takes Saussure's theory of "signifier-signified" as the core framework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logic of memory symbols in emotive design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ymbolic generation mechan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trajectory, and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path of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ymbol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follows a complete logical chai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extraction – signifier system construction – signified meaning anchoring – structural mode connectio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maturity, and transforma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needs to balance the awakening of sensory and behavioral memories. By analyzing the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such as Qin Qiong and Jingde door gods, fish-patterned papercuts, and "Fu"-shaped decorations)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rriers like folk woodblock paintings, papercuts, and embroidery, the paper reveals the core values of symboliza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design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graphic symbols.

Keywords: Spring Festival graphic symbols; symbol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translation pathways.

乡村美学视域下崇州天府粮仓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的旅游表达

石婷婷¹

(1.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美学为重新审视乡村景观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提供了新视角。崇州作为“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其规模化的油菜景观不仅承载农业生产功能,更成为乡村美学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乡村美学理论,探讨崇州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在旅游表达中的融合机制与实践路径。该视角强调景观的视觉、生态与文化等多维审美价值,使油菜花从生产性景观转化为连接农业、生活与审美体验的纽带。崇州通过整合油菜花海、川西林盘与传统村落,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天府田园风光,推动乡村景观向消费性体验升华,丰富了乡村旅游内涵,促进了产业融合。本文系统总结崇州模式的创新经验,以期为同类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关键词:天府农耕文化;天府粮仓;乡村振兴;乡村美学

基金项目: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一般项目“农业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四川乡村文化资源活化与旅游开发协同机制研究——以崇州天府粮仓文化体验区为例”(项目编号:WHLY2025006);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天府农耕文化研究中心2025年一般项目“从“宝墩稻田”到“天府粮仓”:天府农耕文化起源及历史演进研究”(项目编号:TFNG-202515);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2025年一般项目“第二个结合”视阈下天府农耕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SZ2501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63

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和发掘乡村景观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成为推动乡村文化自信与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崇州作为“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拥有6000余亩优质粮油种植面积,其中油菜景观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表现形式,更成为乡村美学的重要载体。每年春季,金黄的油菜花海与川西林盘、传统村落相映成趣,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天府田园风光,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基于乡村美学理论视角,探讨崇州地区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在旅游表达中的融合机制与实践路径。乡村美学强调乡村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关注乡村景观的视觉美学、生态美学和文化美学等多个维度。在这一视域下,油菜花不再仅仅是经济作物,而是成为连接农业生产、乡村生活和审美体验的纽带,通过旅游表达实现了从生产性景观到消费性景观的价值升华。崇州依托其“天府粮仓”核心区的优势,将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表达方式。这一实践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也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典型范例。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崇州模式的创新做法与实践经验,为同类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一、乡村美学与旅游表达的理论框架

乡村美学是以乡村为场域,研究乡村景观、生产和生活的审美特性及其价值体现的交叉学科。视觉美学强调乡村景观的形式美,包括色彩、线条、形态等视觉元素的有序组合;生态美学关注乡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可持续性,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文化美学则聚焦于乡村地域文化的表达与传承,包括乡土文化、农耕智慧与民俗风情等内涵。在崇州的实践中,油菜景观的规模化种植形成了壮丽的视觉冲击,稻田水系与林盘村落构成了丰富的生态肌理,而与之相伴的酿酒、竹编等乡土工艺则赋予了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

旅游表达是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的过程,其主要实现路径包括:景观表达——通过景观设计强化乡村的视觉吸引力,如崇州油菜花海的大地艺术营造;业态表达——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具体业态产品,如田园火锅、农耕体验等;文化表达——通过节庆、工艺展示等形式呈现乡村文化内涵,如崇州的酒村集市、

作者简介:石婷婷(1985—),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天府农耕文化。

开耕节等农事节庆；体验表达——设计沉浸式体验活动，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互动性。这四种表达方式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乡村美学旅游表达的完整体系。

二、崇州油菜景观的美学特征与资源价值

（一）油菜景观的视觉美学特征

崇州油菜景观最直接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其视觉冲击力上。每年春季，连绵 6000 余亩的金色花海与青瓦白墙的川西民居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天府田园画卷。这种视觉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色彩韵律——油菜花鲜明的黄色与周边植被的绿色、土壤的褐色、天空的蓝色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二是空间肌理——规整的农田与曲折的田埂、错落的林盘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空间关系；三是季相变化——油菜从春季的金色花海到夏季的绿色果荚，再到收获后的黄色秸秆，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景观效果。在崇州隆兴镇梁景村，油菜花田与传统林盘的结合尤为典型。青瓦白墙，若隐若现在满目青翠的阔野桑田间，酒村集市，整齐排列在热闹浪漫的油菜花田间。这种由农田、林盘、村落构成的视觉秩序，不仅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的和谐，也传承了川西平原特有的农耕文明景观格局，成为乡村美学实践的典范。

（二）油菜景观的生态美学价值

崇州油菜景观的生态美学价值体现在其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中。作为“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崇州协同推进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农田整治形成集中连片、形态规整的农业空间，通过理渠成网构建互联互通、循环自净的水系网络。这种生态基础设施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也塑造了良好的乡村生态景观。此外，崇州实践“农业共营制”，推动优质粮油“研产购储加销”全链发展，实现了粮食播面、产量的“四连增”。这种既保障粮食安全又维护生态平衡的农业生产方式，本身即是一种生态美学的体现。在天府粮仓文化生活圈，稻油轮作系统不仅是生产方式，更成为自然教育的活教材，孩子们在田间辨识物种，在星光下聆听蛙鸣，生态种植与生命教育在此无缝嫁接。

（三）油菜景观的文化内涵解读

崇州油菜景观的文化内涵主要是受到天府农耕文化的滋养。首先是与农耕文化的关联，油菜种植是川西平原传统农耕体系的重要组成，承载着丰富的农耕智慧和乡土知识；其次是与地方特色文化的结合，如梁景村将油菜景观与酒文化相结合，打造“天府酒村”品牌，使油菜花田成为酒文化的展示窗口；第三是与非遗文化的融合，如道明竹编、怀远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油菜花旅游季得到更好的传播与体验。在崇州，油菜花已超越一般的农业生产功能，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媒介。如白头镇五星村，原本空心化严重的村庄通过油菜花田与川西林盘风貌的结合，改造闲置农房为精品民宿，引入咖啡馆、花田火锅等业态，年接待游客超 8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 4 万元。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经济收益，更使传统农耕文化在现代语境下获得新的生命力和表达方式。

三、崇州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的旅游表达实践路径

（一）文化融合与场景营造

崇州通过文化融合与场景营造，将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探索出多元发展模式。在隆兴镇梁景村，依托 132 口百年老窖池及超 2000 口窖池资源，以“诗酒田园·和美乡村”为主题推进酒旅融合，打造“酒村露营”基地、“好酒不见”等特色业态，游客可在油菜花海中品酒、体验酿酒工艺，该模式不仅丰富旅游内容，更助力当地酒业吸引关注，在 2024 年全国糖酒会期间实现总签约金额 8 亿元；道明镇竹艺村则以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激活油菜花景观，游客赏花时可体验竹编工艺、参观竹编装饰景观节点，2024 年道明竹编年产值达 7500 万元，怀远古镇藤编技艺亦通过旅游场景转化，年产值超 3500 万元，从业工人年均收入超 4 万元，成为非遗与乡村旅游融合范例；白头镇五星村则走田园社区路径，保留川西林盘风貌，改造闲置农房为精品民宿，推行“四有三专”民宿标准，结合油菜花田发展精品民宿、稻田火锅、田园咖啡等新业态，形成“推窗见田、开门见绿”的诗意生活，既满足都市居民“看山望水忆乡愁”的需求，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二）体验业态与消费创新

崇州在油菜景观的旅游表达中，通过创新体验业态与消费场景构建，形成了多元特色商业模式。花田经济模式以“把春天煮进火锅里”的沉浸式体验为核心，在油菜花海中设置数十顶白色帐篷，游客可围炉品火锅、饮茶，将传统农耕景观升维为“农业+餐饮+文旅”的沉浸式消费空间，配合低空观光航线的立体化视角，形成“空中俯

瞰+地面体验”的双重吸引力；研学教育模式则依托油菜种植过程开发自然教育课程，结合道明竹艺村的非遗手工体验，将农业生产转化为自然课堂，实现“田园变课堂”的功能转化；休闲体育模式通过举办崇州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将金色花田与运动场景深度融合，2025年赛事吸引33.34万人次游客，带动白头镇五星村民宿入住率达95%以上，并联动非遗工坊订单激增，形成“赛事流量-消费留量”的良性循环。这些模式通过场景创新与产业联动，成功突破季节性限制，推动“春日限定”向“四季常青”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三）节庆赛事与品牌塑造

崇州通过节庆赛事活动深度激活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资源，构建起“天府粮仓”特色旅游品牌。农事节庆活动以二十四节气为轴，推出开耕节、插秧节、丰收节等沉浸式农耕体验，如天府酒村“过完春节过春糖”春糖会系列活动，通过非遗集市、花田火锅、汉唐巡游等业态，实现开业首期酒村露营地盈利2.6万元，同步带动周边白酒产业年产值突破1.7亿元；体育赛事赋能创新“花海+运动”模式，举办半程马拉松、国际风筝邀请赛等IP活动，2025年1-5月赛事经济直接拉动旅游综合收入91.74亿元，其中马拉松赛事带动民宿入住率达95%，非遗工坊订单量激增300%；文化节会推广则通过《陆游·梦回蜀画》实景演出、《红楼梦》四境美学展等文化IP，将油菜花季从单一观光升级为全年可续的文脉体验，形成“春赏花海、秋览稻浪、冬品年俗”的全时旅游格局，罨画池景区单日游客量突破3000人次，同比增幅达150%。以节庆引流拓市场、赛事留客稳消费、文化深耕延周期，崇州通过立体化运营打破季节桎梏，推动油菜旅游全年长红。

四、崇州案例的经验与挑战

（一）成功经验总结

崇州在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的旅游表达方面形成了系统性经验。多元融合机制上，通过“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模式打破产业边界，如隆兴镇梁景村以“酒+旅+文”创新路径，将百年窖池资源与油菜花海结合，打造沉浸式酒文化体验场景，带动酒业销售及文化传播；专业化运营体系上，构建“集体经济+合伙人”机制，采取“特色小镇+林盘+景区”开发模式，保障可持续发展并提升产品竞争力；全域旅游布局上，以稻香环线、蔬香环线、古镇原乡环线、大熊猫爱情走廊四条示范带串联162个村，形成“点-线-面”协同格局，油菜景观作为核心纽带串联起白头镇五星村民宿集群、道明竹艺村非遗工坊等节点，实现全域资源联动与价值倍增。

（二）面临挑战分析

崇州在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融合实践中虽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三重挑战。季节性平衡难题上，尽管通过低空观光航线、林盘休闲等业态尝试突破季节限制，但旅游人次仍呈现“春爆夏冷冬闲”的波动特征，2025年3月油菜花期日均接待量超10万人次，而6月非花期骤降至日均0.8万人次，导致部分旅游设施年利用率不足40%；文化表达深度不足方面，现有业态对酒文化、农耕文化的呈现多停留在场景复刻层面，缺乏深度绑定的系统性文化解码，导致游客对“天府粮仓”文化内涵的认知停留于表层；社区参与均衡性矛盾则表现为“核心区红利集聚”现象，存在资源整合与价值分配机制的待优化空间。

五、可持续发展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崇州油菜景观与乡村文化的旅游表达效果，建议从三方面深化实践。首先，强化科技赋能，在油菜花田布局VR/AR技术还原油菜生长全周期，结合无人驾驶插秧机、5G+智能农机等智慧农业场景打造“可感知的科技农耕体验”，并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偏好，开发“花期预测+个性化路线推荐”智能导览系统，实现从“季节性观赏”到“全年可游”的科技破局；其次，深化文化表达，以“油菜+”为核心构建文化体验矩阵，例如开发古法榨油工坊、油菜花蜜研学课堂等深度参与项目，联动陆游《剑南诗稿》中“岂信人间有蜀州”的诗意IP，打造沉浸式诗词实景演出与非遗手工作坊，推动文化资源向“可触摸、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转化；最后，完善利益联结，优化“集体经济+合伙人”机制，在现有“4321”分红模式基础上，探索“村民入股+职业经理人运营+平台流量分成”的复合收益模式，通过技能培训赋能村民参与民宿管理、文创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时建立“旅游收益反哺农田建设”的可持续循环体系，确保村民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

六、结语

崇州案例揭示了乡村美学价值转化与文旅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美学价值重构层面，通过视觉美学、生态美学及文化美学的三维解构，实现了生产性景观向消费性景观的升维。模式创新机制上，突破传统产业边界，构建“文化融合-场景营造-业态创新-品牌塑造”的协同系统，例如以“花田火锅”“林下露营”等业态打破季节限制，形成“春赏花海-秋览稻浪-冬品年俗”的全时体验链，通过“根系经济”模型推动生态资源向民生福祉转化。可

持续发展路径中,虽面临季节性波动与文化表达浅层化等挑战,但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利益共享机制优化及全域资源整合,构建起“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内生发展体系。这一实践为同类地区提供了“美学赋能-产业裂变-价值共生”的乡村振兴范式,其核心在于以文化根系激活资源禀赋,以制度创新重塑利益格局,最终实现乡村从“景观依赖”到“价值创造”的范式跃迁。

参考文献:

- [1]杨锦拉茂.价值共创理论视域下乡村旅游场景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成都的崇州竹艺村、大邑县南岸美村为例[J].中外文旅交流,2025,(15):143-145.
- [2]吴爱千,黄瓴,郭华康,等.文化感知视角下的乡村文旅空间营造策略研究——以崇州市道明竹艺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沈阳市人民政府.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规划的价值与作为——202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9乡村规划).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5:214-226.
- [3]王沁钰.近郊乡村旅游的发展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崇州农旅融合的结构矛盾分析[J].四川农业科技,2025,(08):115-118.
- [4]石婷婷.天府农耕文化与四川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耦合性探究[J].粮食问题研究,2025,(02):39-43+56.
- [5]石婷婷.数字孪生技术赋能四川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J].粮食问题研究,2025,(06):22-27.
- [6]央视网.“低空+文旅”创新场景推动春季消费升级[EB/OL]. [2025-03-12].https://news.cnr.cn/native/gd/kx/20250312/t20250312_527098185.shtml
- [7]四川新闻网.四川崇州:扶起“春风” 畅通“两山”[EB/OL]. [2025-04-28].<https://city.newssc.org/system/20250427/003582794.html>
- [8]央视网.坐飞机赏花、围炉煮茶、花田火锅……花样新场景释放消费新活力[EB/OL]. [2025-03-08].https://m.gmw.cn/2025-03/08/content_1303986599.htm
- [9]四川新闻网.在花海中寻宝,崇州这场活动 HIGH 翻了! [EB/OL]. [2025-03-23].<https://city.newssc.org/system/20250323/003578694.htm>

Tourism Expression of Rapeseed Landscapes and Rural Culture in Chongzhou's Tianfu Gran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Aesthetics

Shi Tingting¹

¹Chengdu Agricultural College, Sichuan,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rural aesthetic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examining the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rural landscapes. As the core demonstration area of the "Tianfu Granary," Chongzhou's large-scale rapeseed landscapes not only ser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act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rural aesthetics. Based on rural aesthetics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Chongzhou's rapeseed landscapes and rural culture in tourism expression. This perspective emphas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aesthetic values of landscapes—visu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transforming rapeseed flowers from productive landscapes into a nexus connecting agriculture, daily lif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s. By integrating rapeseed flower fields, western Sichuan's forested settlements,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Chongzhou has shaped a distinctive Tianfu rural scener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ndscapes into consumptive experiences,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foster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s of the Chongzhou model,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imilar regions.

Keywords: Tianfu Agricultural Culture; Tianfu Granary;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esthetics

AI 技术赋能传统手工艺符号的文创创新路径研究

贾涵迪 吴鑫馨 孙旭 年政旭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传统手工艺符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 其文创转化是传统文化当代活化的关键路径, 但当前面临创新不足、文化传递浅表化等困境。在生成式 AI 技术爆发的背景下, AI 为手工艺符号的文创创新提供了技术赋能新范式。本文基于符号学、设计学理论, 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与对比研究法, 系统分析 AI 赋能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的技术特征与发展现状, 重点探讨其在创作效率、符号转译、产业生态等方面对传统手工艺文创行业的冲击与重塑, 揭示当前行业面临的技术适配错位、文化表达浅表化、版权伦理模糊等核心问题, 并从技术优化、符号深耕、人才转型、生态构建四个维度, 提出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从形式复刻走向文化深耕的创新路径。研究认为, AI 并非替代传统手工艺传承的工具, 而是推动其文创实现“技术精准化、文化内核化、产业生态化”的重要引擎, 未来核心竞争力将聚焦于“AI 技术工具化+文化符号深度化+创意个性化”的融合创新, 为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提供新方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AI 技术; 传统手工艺符号; 文创创新; 技术赋能; 文化传承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72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随着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在文化创意领域的深度渗透, 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活化进入“人机协同”的范式革命阶段^[1]。传统手工艺符号作为地域文化的视觉载体, 涵盖刺绣纹样、陶艺肌理、剪纸造型等多元形态, 其文创产品既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媒介, 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而 AI 技术凭借“快速生成、批量优化、个性化定制”的核心优势, 正打破传统手工艺文创“高成本、低效率、窄传播”的发展瓶颈, 并且部分非遗文创实践中, AI 已将符号转化效率提升 50% 以上, 让小众手工艺符号获得更广泛的市场触达^[2]。

这种技术变革背后, 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需求的升级: 年轻群体既追求文创产品的文化辨识度, 又注重视觉创新与个性化体验, AI 与手工艺符号的融合, 恰好契合了“文化内涵+技术创新”的双重需求。但从行业实践来看, AI 赋能仍处于初级阶段, 技术应用与文化内核的适配性、符号转译的深度性等问题尚未解决, 仍需构建系统性的创新路径。

(二)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立足符号学与设计学交叉视角, 构建 AI 与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的对比分析框架, 揭示技术变革对文创设计范式的影响机制, 丰富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承与 AI 设计应用的相关理论, 为同类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

实践意义: 针对 AI 赋能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适配错位、文化表达浅表化等问题, 提出兼具可行性与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为文创企业、手工艺传承人的实践提供参考; 同时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方向指引, 帮助学

作者简介: 贾涵迪(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吴鑫馨(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孙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年政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贾涵迪

生明确核心竞争力培养重点，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采用多方法结合的研究方式：一是文献研究法，梳理 AI 技术应用、传统手工艺传承、文创设计、符号学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构建理论基础；二是案例分析法，以满族民间刺绣、西秦刺绣、传统吉祥纹样等手工艺符号的 AI 文创实践为案例，对比分析传统文创与 AI 赋能文创在创作流程、文化传递效果上的差异；三是对比研究法，明确 AI 技术的优势与局限。研究框架遵循“现状分析-影响解构-问题诊断-路径构建-结论展望”的逻辑，系统探讨 AI 赋能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的全链条发展问题。

二、AI 与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的融合基础

（一）文化符号转译的核心逻辑

文化符号优先的转译逻辑：AI 赋能打破了传统“形式复刻”的转译模式，形成“内涵拆解-元素重构-创意生成”的逻辑。符号学视角下，文创设计的核心是“文化内涵决定视觉表达”，这一逻辑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拆解手工艺符号的民俗寓意、历史语境，再提取纹样结构、色彩体系等核心视觉元素，最后结合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确保符号转译不脱离文化本质，实现“文化内核+现代表达”的统一^[3]。

多场景适配的视觉策略：针对不同文创载体（实体产品、数字内容、线下场景），AI 采用差异化视觉表达，例如实体产品注重刺绣针脚、陶艺肌理等技艺细节还原，数字内容强化高饱和色彩、符号化造型的视觉冲击力，线下场景强调动态纹样、沉浸式投影的互动性，确保在不同场景中高效传递文化价值。

个性化定制的算法能力：通过分析用户审美倾向、使用场景等偏好数据，AI 可快速生成定制化文创方案——从纹样组合到色彩搭配，无需重新绘制基础资产，仅通过 Prompt 优化即可实现风格切换，满足年轻用户对“小众审美”的追求。这一能力在传统吉祥纹样的 AI 文创实践中尤为突出，用户可通过关键词指定“国风+极简”等风格，AI 快速输出适配不同用途的定制化方案，印证了生成式 AI 在传统纹样文创中的个性化应用价值^[4]。

（二）AI 赋能文创的关键技术支撑

实现上述设计逻辑的基础是生成式 AI 技术栈，形成模块化的生产流程：一是符号提取模块，通过图像识别技术从手工艺实物、文献资料中精准提取视觉特征与结构规律；二是创意生成模块，借助 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等工具，基于提取特征快速生成多样化文创方案；三是优化调整模块，通过 ControlNet 参数控制、LoRA 模型微调，保障符号形态的一致性与技艺细节的还原度；四是后期适配模块，结合 TTS 语音合成、AI 辅助排版，实现文创产品的多场景适配（如文具、饰品、数字藏品等）^[5]。

这些技术的协同应用，使手工艺符号文创实现“70%流程自动化”，一个 3-5 人的团队可在 2-3 周内完成系列化文创设计，而传统手工创作同等规模作品需 2-3 个月，技术降本增效的优势显著。

三、AI 赋能对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行业的多维影响

（一）创作模式与传承方式的革新

从“手工主导”到“人机协同”的创作范式：传统文创依赖传承人的手工技艺与经验积累，创作流程线性且封闭；AI 赋能下，传承人主导文化内涵与技艺标准把控，AI 承接基础执行工作，形成“创意主导+技术执行”的并行模式。这一范式转型与生成式 AI 介入传统手工艺传承的行业实践趋势一致，既保留手工技艺的核心价值，又通过技术提升创作效率，实现传承与创新的平衡^[6]。

从“口传心授”到“数字化传承”：AI 通过数字化存储手工艺符号的“视觉特征-技艺参数-文化语境”，构建可复用的数据库，避免技艺流失与符号变异；同时，AI 工具降低了传承门槛，非专业设计者也能参与文创创作，扩大了传承主体。

（二）生产效率与成本结构的优化

传统手工艺文创长期面临“高投入、慢产出”的困境，手工绘制、反复修改导致人力成本占比达 60%以上。AI 技术通过替代基础纹样绘制、方案初步生成等重复性工作，将人力成本降低 40%-60%，同时减少修改周期，使创意迭代速度提升 3-5 倍。这种效率变革激活了小众题材的文创需求——以往因预算限制无法落地的地方手工艺符号，如今可通过 AI 快速转化，为行业注入新活力，这也正是传统手工艺 AI 数字化辅助设计的核心价值所在^[7]。

（三）产业生态与市场格局的调整

AI 赋能推动产业生态从“单一链条”向“协同网络”转型：形成“传承人+设计师+技术人员+企业”的协同链条，传承人提供文化与技艺资源，设计师负责创意转化，技术人员优化 AI 工具，企业主导市场落地，各主体分工明确又深度协同。

市场格局呈现“大众化+小众化”双轨发展：一方面，AI 批量生成能力满足大众市场的规模化需求；另一方面，个性化定制功能激活小众市场，让地方手工艺、冷门技艺符号获得精准受众，打破传统文创“同质化竞争”的格局。但产业生态重构过程中，版权归属、训练数据使用规范等问题逐渐凸显，为后续行业挑战埋下伏笔，这也需要依托 AIGC 可版权性的制度建构提供解决方案^[8]。

四、AI 赋能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的现实挑战

（一）技术应用的适配问题与风险

尽管 AI 提升了效率，但技术短板仍显著：一是技艺还原度不足，AI 难以精准捕捉刺绣针脚密度、陶艺窑变概率等隐性技艺参数，生成内容缺乏“手工质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手工艺专属数据集的匮乏，而非遗数据库的构建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9]；二是符号一致性难题，复杂场景或动态表达中，AI 易出现符号形态变形、特征丢失；三是技术依赖导致创意退化，部分创作者过度依赖 AI 生成，放弃基础设计训练，作品缺乏独特性。

（二）文化表达短板与版权伦理争议

文化表达的浅表化问题：AI 基于公共训练数据生成的文创，常出现“符号堆砌”现象，比如简单叠加手工艺元素，却未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导致作品沦为“视觉空壳”。

版权与伦理的模糊地带：手工艺符号多为公共文化资源，AI 训练数据的采集与使用是否侵犯文化权益，尚无明确规范；“人机协同”创作模式下，版权归属（设计师、传承人、平台）难以界定，侵权纠纷频发；部分团队利用 AI 批量生成低俗、同质化内容，冲击行业审美底线与社会责任感。

（三）产业生态失衡与人才供需错位

AI 赋能导致行业生态短期失衡：流量向 AI 生成文创倾斜，传统手工文创市场份额受到挤压，部分中小型文创企业因资金短缺、转型困难陷入经营困境。这一现象在博物馆 AI 文创的创新实践中也有体现，技术变革带来的市场格局变动，让传统文创企业面临转型压力^[10]。同时，行业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作品品质参差不齐，优质原创作品被同质化内容淹没，影响产业长期发展。

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的错位：AI 时代需要“技术应用+文化解读+创意转化”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高校课程设置偏重传统技艺或纯技术操作，缺乏文化转译、人机协同等核心能力培养，导致毕业生“传统技能用不上、新型技能不会用”。例如在满族民间刺绣的 AI 文创实践中，部分设计团队因缺乏“刺绣文化解读+AI 工具应用”的复合能力，难以实现符号内涵的深度转译，印证了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的错位问题^[11]。

五、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优化手工艺专属 AI 工具

聚焦核心技术瓶颈突破：扩充手工艺专属数据集（涵盖不同技艺类型、地域风格），优化 AI 模型对隐性技艺参数的捕捉能力，提升符号形态一致性与技艺还原度；鼓励企业与高校共建“手工艺 AI 实验室”，开发针对

性工具（如西秦刺绣针法还原插件、陶艺肌理模拟系统），实现技术与手工艺的深度适配。人工智能在西秦刺绣非遗技艺传承中的创新实践已证明，专属工具能显著提升技艺还原度，让 AI 生成内容更贴合传统手工艺的核心特征^[12]。

构建“人机协同”的工具链：定位 AI 为“创意助手”而非“替代者”，开发支持手动修改、实时预览的交互功能——AI 生成基础方案后，设计师可通过手绘调整细节、传承人可标注技艺标准，实现算法效率与人工创意的结合。

（二）挖掘符号内核与现代转化

挖掘文化符号的精神内核：摆脱“元素拼接”的浅表化表达，深入挖掘手工艺符号背后的民俗寓意、历史语境、匠人精神，将其转化为 AI 可识别的“文化关键词”，引导 AI 生成兼具视觉美感与文化深度的作品。

推动符号的现代性转化：将传统手工艺符号与现代生活场景、设计语言结合，如将剪纸纹样转化为 UI 图标、将陶艺肌理融入产品包装，让文化符号自然嵌入当代生活，提升用户接受度与传播力。

（三）构建复合型能力培养体系

高校课程体系迭代升级：重构课程结构，增设“AI 设计工具应用”“传统手工艺符号解读”“文化转译创意”“版权伦理规范”等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引入真实文创项目，组织学生完成“符号采集—AI 生成—人工优化—作品落地”全流程训练，培养人机协同能力。

行业技能更新平台搭建：行业协会组织 AI 工具培训、手工艺符号解读 workshops 等活动，帮助传承人掌握 AI 基础操作，将手工技艺与技术工具结合；鼓励设计师深入手工艺产地调研，积累文化体验，提升符号内涵解读能力。

（四）完善质量标准与版权机制

建立行业质量标准：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高校、企业制定 AI 手工艺文创质量标准，涵盖技艺还原度、文化表达深度、视觉创意性等指标，引导行业从“效率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型；平台优化推荐算法，增加文化内涵、原创性权重，扶持优质作品传播。

完善版权保护机制：明确版权归属，将设计师的 Prompt 创作、传承人的技艺指导、人工优化等创造性劳动纳入版权认定范围，AI 工具平台仅享有技术使用权；建立训练数据授权机制，规范手工艺符号数据的采集与使用，保护传承人的文化权益。

推动协同发展生态：促进传统手工文创与 AI 文创互补共生，例如传统手工文创聚焦高端定制、非遗传承，AI 文创聚焦大众市场、规模化传播；鼓励传统文创企业借助 AI 工具提升效率，AI 文创企业与传承人合作强化文化深度，形成“高端+大众”“传承+创新”的产业闭环。

六、结论与展望

AI 技术的崛起标志着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进入“技术赋能文化”的新时代，其对行业的冲击本质上是创作范式、产业生态与传承模式的革新，而非简单的技术替代。当前 AI 赋能面临的技术适配错位、文化表达浅表化、版权伦理模糊等问题，根源在于技术应用与文化遗产的失衡，未来只有实现“AI 技术工具化+文化符号深度化+创意个性化”的融合，才能推动行业从短期流量依赖走向长期文化深耕。

研究认为，AI 并非替代传统手工艺的工具，而是推动其文创创新的核心引擎——技术层面实现精准适配，文化层面坚守内核深度，人才层面构建复合能力，生态层面打造协同格局，四者协同发力，才能让传统手工艺符号在数字化时代保持鲜活生命力。

展望未来，随着多模态 AI、专属模型训练等技术的持续优化，以及行业规范的不断完善，传统手工艺符号文创将进入“人机协同、文化彰显”的新阶段。AI 与手工艺符号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更多小众手工艺符号走进大众视野，更能推动传统文化从“博物馆里的遗产”转变为“生活中的文化”，实现“传承中创新、创新中传承”的良性循环。对于创作者而言，把握技术工具与文化内涵的平衡，是在 AI 时代立足的核心关键。

参考文献:

- [1] 张彰,张婷婷.传统手工艺复兴视域下的文创产品设计实践反思[J].美与时代(上),2023,(09):9-14.
- [2] 王子路,杨顺.基于人工智能背景下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开发[J].新传奇,2024,(36):108-110.
- [3] 刘雨桐.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创产品视觉包装设计[J].玩具世界,2025,(12):133-135.
- [4] 刘晋霞.基于生成式 AI 的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青岛理工大学,2025.
- [5] 危田媛,杨理理.AIGC 赋能下传统文化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网印工业,2025,(03):74-76.
- [6] 杨红,纪静怡.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传统手工艺传承的现状影响展望[J].中原文化研究,2025,13(04):68-76.
- [7] 潘玥.传统手工艺的 AI 数字化辅助设计[J].包装工程,2025,46(20):487.
- [8] 王海霞.符号互动论视域下 AIGC 可版权性的制度建构[J].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5,(06):113-123.
- [9] 丁丽.用户共创与 AIGC 融合下的传统手工艺非遗数据库平台构建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9(12):72-76.
- [10] 余冰雁.基于 AIGC 技术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创新设计研究[D].武汉科技大学,2024.
- [11] 赵丹彤.AIGC 赋能满族民间刺绣纹样传承与创新设计[D].大连理工大学,2024.
- [12] 杨微.人工智能在西秦刺绣非遗技艺传承创新设计中的实践路径[J].丝网印刷,2025,(17):121-123.

AI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ymbols

Handi Jia, Xinxin Wu, Xu Sun, Zhengxu 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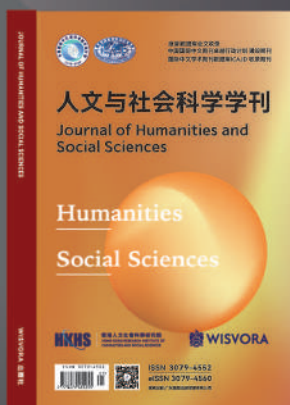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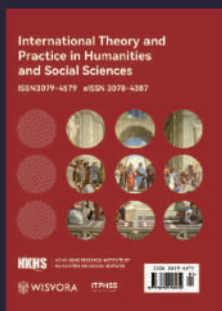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ymbols carry profound cultural genes, and their cultural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s a key path for the contemporary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they currently face dilemma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superfici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explosion of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AI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of handicraft symbols. Based on semiotics and design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case study method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AI-enabl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ymbols, focusing on exploring its impact and reshaping on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 terms of creation efficiency, symbol transl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It reveals the core problems facing the industry, such as technical adaptation dislocation, superficial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mbiguous copyright ethics, and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ath for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ymbo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move from formal reproduction to in-depth cultural cultiv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technical optimization, in-depth symbol exploration, talent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AI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traditional handicraft inheritance, but an important engine driving i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 achieve "technical precision, cultural core orientation and industrial ecology". In the futur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will focus on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AI technology as a tool + in-depth cultural symbols + personalized creativity", providing a new direction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AI Technology; Traditional Handicraft Symbol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